

# 米勒兰事件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米 勒 兰 事 件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 大 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有李兴耕、殷叙彝、  
刘桑、费新录、陈双苑、王以平、苏冰桐、  
袁延明、李其庆等同志。

## 米 勒 兰 事 件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著 大林 编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弥敦道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625印张 221,000字  
1960年8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800

书号11002·549 定价0.90元

## 编译说明

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未经党的同意，就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一起参加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的联合内阁。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叛变事件，被称为“米勒兰事件”。它的产生和伯恩斯坦主义在德国的出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伯恩斯坦在1899年1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提出了完整的修正主义理论，而米勒兰则在法国直接行动起来，因此列宁指出，米勒兰事件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页）。

亚历山大·米勒兰当过律师，1885年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身分当选议员，曾担任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撰稿人，1893年转向社会主义。当时法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统一起来，至少存在五个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派别，它们是：1879年建立的以盖得和拉法格为首的法国工人党；1881年建立的以瓦扬为首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布朗基派），1898年改称革命社会主义党；1882年建立的以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1890年从前者分裂出来的以阿列

曼和格鲁西埃为首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一组织中后来又分裂出以格鲁西埃和德让特为首的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以维维安尼、白里安和饶勒斯为主要代表的独立社会党人；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党人的“自治联合会”。1893年的议会选举后，这些组织在议会中成立了社会主义联合党团。米勒兰属于独立社会党人这一派，1896年5月，他曾在圣芒德举行的社会主义者集会上发表一次演说，提出一个彻头彻尾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即所谓“圣芒德纲领”。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实际上是这一纲领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1898年以来，法国资产阶级面临着由德雷福斯案件引起的一次严重政治危机，有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指望通过吸收社会党人参加组阁而获得社会主义力量方面的帮助，渡过困难。米勒兰在同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私人接触中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瓦尔德克-卢梭在受命组阁时就向他发出邀请。米勒兰不但欣然同意，而且玩弄手法，欺骗社会主义联合党团，企图使党团面对既成事实。米勒兰的叛变行为遭到盖得派和布朗基派议员的严厉谴责，他们为了表示抗议，退出了联合党团，并且组成单独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团。另一方面，饶勒斯表示坚决支持米勒兰入阁。从此，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盖得与瓦扬为代表的反内阁主义派和以饶勒斯与米勒兰为代表的内阁主义派的对立。这一对立后来发展成两个社会党并存的局面：一个是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1901年11月成立），一个是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1902年3月成立）。

米勒兰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意大利的拉布里

奥拉等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支持盖得派，反对米勒兰主义。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奥艾尔、福尔马尔、安塞尔等则支持和赞扬米勒兰。在1900年9月于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这一议程时，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围绕米勒兰入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会最后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是折衷主义的，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隙，因此意大利社会党人费利把它称为“橡皮性”决议。列宁在1901年底至1902年初写成的《怎么办？》一书中彻底揭示了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派别的思想根源，并且对米勒兰事件同伯恩斯坦主义的内在联系作了精辟的分析。

1902年6月，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垮台，1904年1月米勒兰被法国社会党开除出党，但是围绕米勒兰事件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同第二国际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在1904年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讨论“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时，盖得提出了一个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为基础的决议草案，要求大会坚决谴责修正主义的企图。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通过了盖得的决议案，给了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法国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也在1905年合并成立法国社会党（又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为了给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工作提供原始材料，我们编译了这本专题资料。本书编辑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

法国各社会主义派别关于米勒兰事件的声明、宣言和决议；  
(二)第二国际 1900 年巴黎代表大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讨论记录和 1904 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有关发言；(三)法国、德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活动家的有关文章和信件。全书按时间顺序编排，书末附有人名索引。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列宁 斯大林

1979年12月

## 目 录

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宣言·····	1
(1899年7月)	
法国工人党埃佩尔内代表大会决议·····	4
(1899年8月)	
威·李卜克内西 致维·阿德勒(摘录)·····	6
(1899年夏)	
茹·盖得 在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巴黎代表大会上的 发言·····	8
(摘录)(1899年12月)	
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巴黎代表大会决议·····	14
(1899年12月3—8日)	
威·李卜克内西 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	15
(摘录)(1899年)	
饶勒斯和惹罗-里夏尔在《小共和国报》上关于“德雷福 斯案件和社会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参加政府” 问题的国际性征询·····	23
(1899年)	



罗·卢森堡 德雷福斯案件和米勒兰事件 .....	35
——对一次“国际性征询”的答复	
(1899年)	
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 级政府联盟”问题的讨论记录 .....	41
(1900年9月26—27日)	
三德威尔得的发言(26日) .....	42
考茨基决议草案 .....	44
费利的发言(26日) .....	48
恩利科·费利的决议草案 .....	52
饶勒斯的发言(26日) .....	54
儒安迪的发言(26日) .....	58
盖得的发言(27日) .....	59
盖得—费利决议草案 .....	61
安塞尔的发言(27日) .....	63
瓦扬的发言(27日) .....	63
奥艾尔的发言(27日) .....	64
科斯塔的发言(27日) .....	68
卡·考茨基 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人部长 .....	71
(1900年10月10日)	
让·饶勒斯 两种方法 .....	86
(1900年11月)	
茹·盖得 两种方法 .....	113
(1900年11月)	
爱·伯恩施坦 巴黎和美因兹 .....	130
(摘录)(1900年11月)	

爱·大卫 国际代表大会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	136
(摘录)(1900年11月)	
格·福尔马尔 关于米勒兰事件	142
(1900年12月)	
罗·卢森堡 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	167
(摘录)(1901年1—2月)	
爱·瓦扬 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	195
(1901年1月28日)	
让·饶勒斯 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	199
(1901年4月7日)	
爱·瓦扬 米勒兰入阁	207
(1901年4月25日)	
格·普列汉诺夫 谈谈最近的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 大会	213
——给授予我委托书的同志们们的公开信 (摘录)(1901年)	
让·龙格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	227
(1902年2月)	
《新时代》杂志编辑部为龙格《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 一文写的后记	241
(1902年2月)	
罗·卢森堡 法国社会主义危机的终结	245
(摘录)(1902年3月)	
爱·伯恩施坦 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近的发展	262
——另一个侧面的景象	

(摘录)(1902年)	
让·饶勒斯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81	
(摘录)(1904年8月19日)	
奥·倍倍尔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92	
(1904年8月19日)	
爱·安塞尔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301	
(1904年8月19日)	
格·普列汉诺夫 在阿姆斯特丹 ……………306	
(摘录)(1904年)	
人名索引 ……………323	

# 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宣言

(1899年7月)

公民们：

法国有组织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们退出了不久前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政府成员的社会主义联合议会党团，这不只是简单地表示愤慨的行动，也不是打算把他们的共同行动限制在一时的抗议的限度内。

必须同实行妥协和背离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彻底决裂；长期以来，人们竭力用这种政策来代替战斗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政策，即革命的政策。

这两种政策的矛盾总有一天不可避免要表现出来。而当一个社会党人和五月的刽子手<sup>①</sup>手挽手地进入瓦尔维克-卢梭内阁的时候，这一矛盾就暴露出来了，而且是在十分严重、令人愤怒的情况下暴露的，在社会主义声誉和利益的败坏者和维护者之间根本不再有调和的余地了。

社会党，作为一个阶级的政党，不可能是一个内阁党，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内阁党，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它不应该和资

---

<sup>①</sup> 指屠杀巴黎公社社员 的刽子手加利费，他在瓦尔维克-卢梭内阁中担任陆军部长。——编者注

产阶级分享政权，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不过是维护他们的统治和社会压迫的工具。社会党的使命就在于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并把它变成谋求解放和进行社会革命的工具。

今天我们是反对党，将来我们仍旧应当是反对党。我们只能以敌人的身分把我们自己的人派进议会和其他经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其目的是去反对敌对阶级和他们形形色色的政治代表。

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巴黎公社以来，两大陆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伟大的国际的党并进行战斗。如果在我们负责的本国战场上，我们没有坚持这个唯一能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 strategy，我们就不配作为这个党的成员，这个党就有理由斥责我们是逃兵。

一旦我们决心要把拯救社会主义的事业进行到底，那么任何东西都无法使我们分裂。最紧密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责任维护这种团结。

我们深信法国的劳动者会响应我们的号召，同时要告诉那些仍旧企图使法国劳动者抛弃自己利益和背离本阶级义务的人们，欺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深信法国劳动者会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和我们一起把这场光荣的战斗进行到最后胜利。这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一场必不可少的战斗；是革命反对联合在一起的一切反动派的一场必不可少的战斗。

**革命社会主义党执行委员会**——众议员：阿拉尔、肖维埃尔、桑巴、瓦扬、瓦尔特；  
巴黎市镇参议员：朗德兰等；

**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巴赫博士、茹尔·盖得、保尔·拉法格、德洛里、佩德龙、鲁塞耳等；  
**共产主义同盟**——众议员：德让特、格鲁西埃；  
市镇参议员：贝尔托、法伊埃等。

发表于1899年7月。译自泽瓦斯《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311—313页。

# 法国工人党埃佩尔内代表大会决议

(1899年8月)

鉴于全国委员会声明它的宣言<sup>①</sup>并不针对任何人，也不打算开除任何人，鉴于参加辩论的大多数代表指出的许多背离行为，法国工人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

一、全国委员会在当时条件下发布这一宣言，是使用了党的章程第五条赋予的权利。

二、全国委员会根据历届代表大会决议，呼吁法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在阶级斗争这一真正的阵地上进行战斗，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代表大会指出：

法国工人党一直认为，夺取国家政权，就是要从政治上剥夺资本家阶级，不管这种剥夺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因此，这种剥夺只允许占据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工人党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即组织成阶级政党的工人来取得这种职位。

---

<sup>①</sup> 指1899年7月发表的《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宣言》。见本书第1—3页。——编者注

代表大会委托全国委员会将来在适当时机根据具体情况,研究一下在不脱离阶级斗争阵地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占据其他职位。

发表于1899年8月。译自泽瓦埃斯《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313—314页。



## 威·李卜克内西 致维·阿德勒(摘录)

(1899年夏)

亲爱的朋友：

.....

您对于法国的争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这样做很好。我们现在必须最严格地中立。米勒兰加入加利费内阁是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是饶勒斯的“运动”（它把一切都服从于“案件”<sup>①</sup>）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饶勒斯决不是一个无赖，而米勒兰在我看来是属于奥艾尔<sup>②</sup>、福尔马尔<sup>③</sup>一类的极端狡猾的家伙，然而也不能把他们看作是“叛徒”。现在正进行调解。杰维尔<sup>④</sup>、拉维涅<sup>⑤</sup>和其他人已着手这一工作，也包括我，我是

---

① 指德雷福斯案件。——编者注

② 伊格纳茨·奥艾尔(Ignaz Auer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之一，曾任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③ 格奥尔格·福尔马尔(Georg Volmar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之一，曾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编者注

④ 加布里埃尔·杰维尔(Gabriel Deville 1854—1910)——法国工人党成员，著有《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其他著作，二十世纪初脱离工人运动。——编者注

⑤ 雷蒙·拉维涅(Raymond Lavigne 1851—1930)——法国工人党成员，1898—1899年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编者注

双方的受托人。因此,要当心!

.....

忠实于您的

威·李·

译自《维克多·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  
卡尔·考茨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  
319页。

茹·盖 得

## 在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巴黎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1899年12月)

……关于无产阶级不可能与各个资产阶级合作的理论根据，你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对于这些理论根据，也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论述，因此，我不打算再以无谓的重复来打扰各位。我想请你们放下理论而注意这个问题的实验方面，同时请相信我，我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抱任何私嫌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实验方法跟个人利害无关，我就愈有权利说明，它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社会党以新的力量。

乍看几个月来的试验而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当一个社会党人在内阁中陷入资产阶级多数内阁成员的重围，无疑是绝对无能为力的。由于他的阁员同僚占绝大多数，而这些人必然是维护现代社会制度的，因此，在他身上，在这个主张社会改革的人的身上，什么党的目标和党所代表的阶级的目标全都无影无踪了。他所能试图推行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他所能通过法令来实现的改革，甚至说不上是一种支离破碎

的改革；这简直是改革的幻影。在上层，我们看到的是无能为力，而在下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人们抱着过大的希望。

啊，真的！当大家一开始知道有一个社会党人好容易挤进了政权机关（拉法格当时这样说过，后来饶勒斯又引用了他的话）的时候，欢乐的呼声传遍了无产阶级世界。这不就是好日子的开端吗？的确！工人又充满了信心——他们站起来了，从克列索的坟墓里复活了。在西方，工人们冲破了防止他们染上社会主义瘟疫和工会思想的防疫警戒线。现在，终于轮到他们同志中有人居然进入内阁了；他们高呼“前进！”而出征了。但结果呢！这些满怀希望的人得到的是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想到他们时能不心寒？（座位上有人热烈鼓掌）

群众完全相信这一新的事实，对此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们认为，这个事实本身会使他们早日达到目的；但不然，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又碰到了以前那些宪兵队，以前那些步兵队，以前那些骑兵队，这些人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法制，象以前一样疯狂地扑向群众，还是用以前那些武器驱逐群众、殴打群众，还是象以前一样凶恶，象以前一样残暴，一切都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些座位上热烈鼓掌）现在谁敢肯定说，这种状况如果再拖延下去，不仅不会引起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瘫痪，而且也不会引起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彻底瓦解呢？

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每时每刻在向无产阶级讲解些什么呢？它告诉无产阶级说：要组织起来，把阶级对抗从对你们无恶不作的经济基础上转移到能够消灭阶级对抗的政治基础上来；掌握国家政权，成为生活的主人！那

时，你们就不再服从资本主义的法律，而将颁布你们自己的法律——社会主义的法律；那时，只是由于国家用全部强制力量加以保护才能存在的私有制，这种现在还压迫着你们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将趋于消灭，而且必将消灭干净。你们将把这种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你们自己的所有制，就象十八世纪大革命时代把封建所有制变为资产阶级所有制一样。到政权属于你们的那一天，你们就成为自由的人了；到这个政权掌握在你们手里的那一天，你们就得到解放了；到政权归你们所有的那一天，你们的贫困处境、你们的奴隶地位就都将永远结束。工厂、工作器械、生产工具，都将是你们的了。你们将不再是别个阶级的仆役，不再是机器的奴隶，在机器公有制的条件下，你们将是机器产品的主人；现在你们还被生产所愚弄，是生产的牺牲品，将来你们就要管理生产，使生产完全听从你们支配。这将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当夺取政权的斗争不再象以前那样使无产阶级失败，而是使资本家阶级失败的时候，这个新世界就来到了！……

你们强使无产阶级相信由于有一个部长职位让给了社会党人，社会主义就真的取得了国家政权（恰恰相反，这个政权使社会主义服从于它），现在无产阶级就要起来，要求你们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们对你们说：“结帐的日子到了，兑现吧！”你们却无法向他们交帐，只好求助于宪兵队的袭击（又一次鼓掌），判几个月徒刑，课处罚款——这一切无论对于这个使一个社会党人完全丧失掉个人意志的内阁来说，或者对于另一个完全是资本主义成分的内阁来说，都是十分慷慨的！

我坚决认为，这种局面如果你们不马上加以消除，将导致

社会主义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在有组织的工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受了骗，转而鼓吹行动起来。这些工人会说：“由于在我们阶级的党里也出现了其他党里通常发生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注定要给别人当向上爬的阶梯，让别人骑在我们背上去取得权柄，——所以我们要自己动手干，因为我们对人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被人欺骗了，现在就只好去相信原素的力量，相信革命的化学，这样，你们就给无政府状态奠定了基础。（有些座位上长时间鼓掌，表示赞同，另一些座位上大声喧嚷）

（听众中有人说：您是想吓唬人……）

盖得继续说道：至于另一些工人，从你们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的时候起，他们甚至对革命化学也失去了一切希望，于是就回到自己家里，对一切人、对一切事都心灰意懒了。结果，你们这些打算拯救共和政体的人听着吧，你们说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共和政体下成熟起来，你们是否知道，你们这样就给社会党人以借口去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你们给共和思想与共和政体造成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危险：对社会主义政策和机会主义政策同样感到失望的群众，基于同一原因（座位上有人鼓掌同意，另一些人则大声反对。有人高呼：“饶勒斯万岁！”）把政权交给第一伍长，就象淹没在血泊里的1848年6月共和国于12月2日被交给路易·波拿巴先生执掌一样。（掌声）

我对事态所作的这种分析，首先是为了论证，一个无能为力为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会使人产生无法实现的希望，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主义的毁灭。其次，我要向你

们指出，资产阶级政府之所以作出甘心跟社会党人合作的姿态，只是为了想利用这个社会党人作为抵挡社会党攻击的一种盾牌。最后，我还要再次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参加国家政权所能引起的最惨痛的一个后果。

大约在十四个月以前，我在斯图加特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议程上提出了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能不能要求对工农业实行关税保护。这个问题的讨论，费了很长时间，而且极其慎重。提出了许多见解，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其中有一种见解显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顿使一方意见占了上风。其论点如下：主张保护关税，也就等于是反对工人的国际团结；这也就是借口利益一致而硬把各国无产阶级拴在本国资本家阶级的身上，而不是为了共同求得解放，冲破一切的边境哨防线，把实际上属于同一祖国的所有国家的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团结并联合起来，反对各国剥削者和掠夺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鉴于保护关税是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完全背道而驰，是人为地使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形式而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尖锐化”，于是否决了并且谴责了保护关税政策。

从国际主义的观点来看，参加内阁的政策就更显得有害。目前，可以说大陆战争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谁也再不会想派出三四百万军队互相攻打了；资产者已经十分害怕战事失利；因为战事失利就会变成革命；另一方面，特别是自从兵役义务大致合理地普遍由一切阶级居民承担以来，资产者更是无比珍惜本阶级代表的鲜血，他们绝不想让自己亲生骨肉

去当炮灰。(掌声)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欧洲大战的时代是已经结束了;但我们看到,另一种性质的战争天天在发生,而且次数逐日增多;这就是殖民战争,商业战争,争夺商品销售市场的战争,奴役远东黄种人和中非黑种人的战争。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战争远还没有终止;这反而看来会成为连绵不断的持久战争;这就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战争;这就是各国资本家为了争夺利润而发动的战争,他们用我们的血汗为代价互相争夺世界市场。

如果是这样,那请看一个社会党人在欧洲某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里当一名部长的作用,他是在参加或者照料这种为了更好地剥削而进行互相残杀的勾当。请看,英国的米勒兰、意大利的米勒兰、德国的米勒兰与法国的米勒兰一起,为了资本主义掠夺而唆使无产阶级互相为敌。请问,同志们,那时还有什么工人的国际团结呢!一旦米勒兰事件由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普遍现象,我们将只能放弃任何国际主义而变成民族主义者,这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同意的。(座位上许多人不断鼓掌)

发表于1899年12月。选自《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1964年三联书店版第84—85页。



# 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巴黎 代表大会决议

(1899年12月3—8日)

**第一项决议：**阶级斗争能否允许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表决结果：818票反对，634票赞成。

**第二项决议：**代表大会承认可能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那时党必须研究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大会同时声明，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国外，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目前条件下，党要集中全部力量去夺取市镇、各省和全国的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因为这些职位取决于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占据这些职位，就是合法地、和平地开始对资本家阶级实行政治剥夺，这一剥夺最终将通过革命来完成。

表决结果：1140票赞成，240票反对。

发表于1899年12月。译自泽瓦埃斯《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314页。

威·李卜克内西

## 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

(摘录)

(1899年)

.....

我根据法国同志的要求，就米勒兰事件和党的统一问题，给法国工人党（“马克思主义派”）在埃佩尔内举行的最近一次年会写了下面这封信。

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认为不干涉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事务是我的天职。但是，由于你们想听取我对你们代表大会及整个工人的和社会主义的法国所关注的那些迫切问题的意见，也由于有些社会主义者，即对这个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的你们的同胞也想听取我的意见，我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更何况你们现在在法国所处的境况，实质上同我们德国人所处的境况没有什么不同。

社会主义的国际性质是日益为人所知的一个事实，是日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实。我们社会主义者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是在世界各国同一种的国际民族。而资本家及其走狗

(这种资本家手中的工具)和受骗的莽汉同样是一种国际民族,因此我们实际上可以这样说:现在在全世界只有两种民族,它们之间正进行标志着新革命的伟大的阶级斗争,即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了捍卫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为了捍卫资本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因为资本主义掌握着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资产阶级),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在统治,一切国家必然是阶级国家,一切政府必然是阶级政府,它们为统治阶级的目的和利益服务,进行拥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拥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拥护我们的敌人反对你们和我们的阶级斗争。从阶级斗争这个战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来看,这是真理。关于这一点,常识的逻辑,事实的逻辑都不容许有任何的怀疑。社会主义者要是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倒向敌人方面,就是使自己屈从于敌人。至少,一个成了资产阶级政府成员的社会主义者,就同我们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分离了。他可以依旧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他可以深信自己的忠诚,但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实质,不懂得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现在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无论哪一个富有仁慈思想和最良好意愿的政府,都不能为我们的事业做出什么认真的事情。必须谨防各种幻想(自我欺骗)。还在几十年前我就说过,如果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那末通向失败的道路就是用幻想铺成的。在现代社会下,不可能有非资本主义的政府。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进入这一政府的那种倒霉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想背叛自己的阶级,就注定是无所作为

的。英国资产阶级掌握巧妙的手法已经一百年了，为麻痹反对派，资产阶级让反对派参加政府，而在英国历届政府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吸收反对派中幼稚得足以成为别人手中玩物的最激进分子加入政府。这种人成了他的政府“同事”的掩护物，解除了自己朋友的武装，因为这些朋友不能对他进行打击，正如在战斗中不能射击敌人放在自己前面的人质一样。

这就是我对社会主义者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的答复。

现在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关于团结和联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取决于党的原则和利益。我赞成党的团结，赞成党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团结。但是它应当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团结。同敌人的团结，同抱有其他目的和利益的人的团结，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团结。我们应当争取团结，不管它需要什么代价，什么牺牲。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取得意见一致和团结，我们应当摆脱一切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对想在敌国从敌人手中征募新兵来补充自己军队的将军，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愚蠢到极点吗？把敌人，把抱有同我们敌对的目的和利益的士兵吸收到我们的军队里来，吸收到我们的党（它是一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的军队）里来，这就是失去理智，这就是自杀。

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基础，我们就要毁灭，因为我们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威力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受到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比较认真的改革来推翻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

我们不能拿我们的原则来做交易，我们不能同统治制度进行任何妥协，订立任何协定。我们应当推翻统治制度，同它进行殊死战。它必须被打倒，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要知道，我们事实上不能期待统治阶级本身会给自己和自己的统治以最后一击。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教导工人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本身的事情。

毫无疑问，有这样的资产者，他们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出发站在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一边，但是这只是一种例外，因为资产阶级群众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浸透了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此外，由于资产阶级群众是统治阶级，它具有的阶级意识甚至比无产阶级要尖锐得多，强烈得多。

我的话完了。你们询问我的意见，我对你们谈了。你们应当做党的原则和利益要求你们做的事情。

向埃佩尔内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敬礼。社会主义者的和工人的法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威·李卜克内西

1899年8月10日于魏玛

对这封信我用不着再补充什么了。从那时起经历的事件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既不能得到也不能制止某种没有他也可以得到或者制止的事情。相反地，既然社会民主党准许或者同意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那末

它对当时政府的一切违法行为和失职就要负责，因为社会主义者是政府的成员。

的确，为了求得开脱或谅解，有人说什么事情关系到特殊情况——拯救共和国，要不然它有遭到灭亡的危险。但这是经不起一驳的，保持住法兰西共和国的，并不是呆在政府里的（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几个人，而是有大部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法国工人，因此，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是绝大多数不受僧侣愚弄，不容反动资本家暴力支配的法国人民。法国的军国主义，远不如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这样有力，这样危险，而且法国军队比起德意志军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的军队”。法国军队在数量上也象德意志军队那样庞大，虽则法国的人口要比德国少一千五百万，因此法国军队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法国实际上达到这种地步：它应当消灭掉它从1870年到1871年战争时模仿来的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制度，或者用象陆军部长加利费将军指挥的一支不大的训练有素的近卫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或者把现在的体制改组为所有能拿枪杆子的人都普遍武装起来的民兵制。这样的军队不会造成国家政变。即使部分军官还是非常反动，但士兵群众却同人民联系得非常紧密，不会被人利用来发动国家政变。

如果事情真如有人告诉我们的那样，当瓦尔德克-卢梭和加利费内阁成立的时候，事情关系到保卫共和国免受国家政变的话，那末法国无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思想对于政府是一个足够的保证，无论如何要比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有更多的保证。

这个内阁总理是个非常典型的资产者大富翁，而陆军部长是个最无耻的撒谎家和“小拿破仑”的打手，又是对付公社的最残忍的刽子手之一，这些情况只会更加清楚地指出米勒兰的整个行动的整个虚伪性。在瓦尔维克-卢梭的位置上的，即使是一个象布里松<sup>①</sup>那样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资产者，而在加利费的位置上的是一个没有被血腥玷污过的可敬的士兵，那末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做法恐怕同样是不能容许的。这只不过稍微减轻一些对感情的侮辱。

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是事实。在阶级对立存在和阶级斗争延续的时候，国家必然是阶级的国家，而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也同样必然是阶级的政府。一个允许自己参加这样的政府并同意成为这样的政府的成员的社会主义者，即使在内阁的大门外面，还不象一个伊斯兰教徒在进入寺院时脱掉自己的鞋子那样马上扔掉自己的阶级意识，但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利用第一个合适的冲突和分裂的时机，他也会很快完全失去阶级意识的。

一个社会主义者能够参加非社会主义的政府这类事情，一般是否可能发生，对于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并不感到兴趣。只有在某种危害国家的灾难之后，例如世界大战的时候，当阶级国家的政府被推翻，而一开始没有找到必要的成员来马上成立社会主义政府，那末这类事情才可能发生。

但这种可能的情况在法国实际上不曾有过；而且在整个

---

<sup>①</sup> 亨利·布里松 (Henry Brisson 1835—191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1878年到1912年是国会议员。——编者注

法国，比瓦尔德克-卢梭和加利费这两位先生更少具有“拯救共和国”才能的人，恐怕是找不到的了。社会主义的党按其使命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保卫共和国的唯一救星——不管有没有米勒兰在内。

法国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盖得和拉法格，在一篇反对“内阁的”机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指出，在人民选出的代表机关中进行活动和参加国家行政机关或政府，这是有区别的。国家政权和政府是阶级的统治机构，它按照自己的性质是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至于参加代表机关(国会、邦议会、市镇参议会等等)则相反，有人民的最高意志(人民的主权)作为自己的源泉，这种意志虽然受到阶级统治的影响，但它超过后者的势力，并且是能够消灭后者势力的唯一力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这样的代表机关里象几块玄武石，它从地里面开掘出来时，穿过砂石层和板岩层；他们来自人民的内部，是人民的一部分，本身拥有人民主权的权利和力量，而这种人民主权的意义和权利超过国家和社会其他一切力量的权利，并决定着这些权利。他们能够在这里，并不是由于有产者政权的照顾，而是违反了有产者的意志，违反了有产者的力量；是的，他们是官，但他们是可尊敬的官，不是为有产者政权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人民选举他们，是为了由他们来实现人民主权的意志。正因为如此，把我们在议会和其他代表机关的活动看做同统治阶级政权妥协是根本错误的。的确，我们不得不在那里同我们的敌人一起工作，然而作为独立的力量来实现人民委托的权利。这并不是在共同的观点和目标的基础上的合作，这是斗争，是相互竞赛，是力量的鉴定，而立



法和管理就是从这些东西的配合、趋向和总和中，按照力的四边形的永恒法则形成的。

.....

发表于 1899 年。选自《不要任何妥协！》1964 年  
三联书店版第 72—77 页。

# 饶勒斯和惹罗-里夏尔 在《小共和国报》上关于“德雷福斯案件 和社会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参加 政府”问题的国际性征询<sup>①</sup>

(1899年)

问题1: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能够在不违背阶级斗争原则的条件下, 为了挽救政治自由, 或者象在德雷福斯案件中那样, 为了捍卫人道而干预各个资产阶级党派之间的纠纷吗?

问题2: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阶级斗争的原则是否绝对地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社会党部分地夺取政府的权力?

## 不同回答的态度分类表

问题1: A 栏, 是, 无条件地	27 人
B 栏, 是, 有保留地	1 人
	<hr/>
	28 人赞成

李卜克内西对这一问题没有发表意见。

<sup>①</sup> 引自《双周杂志》第11卷第1期, 巴黎1899年版。——原书编者注

问题2: 四种基本态度:

C 栏, 是, 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参加并应该参加	9	}	共计 12人 赞成
D 栏, 是, 在米勒兰事件中, 为了 保卫共和国可以参加	3		
E 栏, 否, 除非是在非常例外的 情况下, 但在不是米 勒兰事件中	11	}	共计 17人 反对
F 栏, 否, 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 参加	6		
29人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b>德 国</b> 倍倍尔		1				1	问题 2, 否, 或者在非常例外的条件下, 并得到党的允许。
休恩朗克		1				1	问题 2, 否, 或者除非在危机和受到全党的委托的情况下, 但米勒兰所遇到的形势不是这样。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考茨基	1				1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原则上是否定的，除非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并且为了特定的目的。
李卜克内西	-	-			1		第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倍倍尔认为李卜克内西将会同意，埃·米尔豪德 <sup>①</sup> 认为他将反对……） 问题 2，否，任何时候都不行
福尔马尔	1		1				问题 2，是，如果这种合作的好处超过了所应承担的责任带来的损害，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力量。

① 参看埃德加·米尔豪德《社会主义的策略和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第46页。——原书编者注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伯恩斯坦	1		1				问题 2, 是, 如果党并不是为了暂时的好处而牺牲它的解放事业的……长远利益。
罗莎·卢森堡	1					1	问题 2, 否, 除非在绝对例外的条件下, 但米勒兰的情况不是这样。
辛格爾	1					1	问题 2, 否, 任何时候都不行, 我们可以从外部支持, 但不是部长的位置上。
帕尔乌斯	-	-	-	-	-	-	没有回答
克拉拉·蔡特金	-	-	-	-	-	-	没有回答
麦·席佩耳	-	-	-	-	-	-	没有回答
英 国 海德门	1					1	问题 2, 否, 或者只有在受到全党的委托的条件下, 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内。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汤姆·曼	1		1				问题 2, 是, 如果受到党的委托。
布拉奇福德	1			1			问题 2, 是, 一个看到法国处于危险中的社会主义者有权进入他认为能够拯救它的内阁。
凯尔·哈第	1		1				问题 2, 是, 自从社会党变得象在法国和比利时那样强大以来, 这是必要的。
奎尔奇	1				1		问题 2, 否, 或者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并且受到全党的委托, 在危机的时刻。
贝尔福特·巴克斯	1					1	问题 2, 否, 任何时候都不行。在米勒兰事件中, 他不谴责米勒兰, 因为问题的出现对米勒兰是意外的。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b>比利时</b> 王德威尔得	1						问题 2, 否, 或者是在完全例外的情况下。
<b>贝 特 兰</b>	1			1			问题 2, 是, 由于例外的情况; 但是, 原则上需要党的同意。
<b>德菲伊索</b>				1			问题 2, 是, “米勒兰为了拯救受到威胁的共和国而接受部长职务, 他是履行了社会主义者的义务。”
<b>比利时</b> 安 塞 尔							问题 2, 是, 他寄给米勒兰一封信, 祝贺他“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了“部长的战斗岗位”。
<b>德·布奔凯尔</b>	-	-	-	-	-	-	没有回答
<b>H·德尼斯</b>	-	-	-	-	-	-	没有回答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b>意大利</b> 恩利科·费利	1				1		问题 2, 否, 或者当党将成为多数派的时候。
布里索拉蒂	1	-	-	-	-	-	问题 1, 他的同事之一博罗尼, 在(他的报纸)«前进报»的一篇文章里为德雷福斯案件向饶勒斯致敬。
安得列阿·科斯塔	-	-	-	-	-	-	问题 1, 他由于在监狱里生病没有能回答, 但是 1899 年 8 月 25 日意大利的社会党议员曾为了饶勒斯干预德雷福斯案件而向他热烈致敬, 这时科斯塔已在监狱里。
安·拉布里奥拉	1				1		问题 1, 是, 但不应把德雷福斯派和社会主义混在一起。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问题 2, 否, 米勒兰的入阁是一个错误。社会主义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同资产阶级联合, 但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
屠拉梯	-	-	-	-	-	-	没有回答
佩斯切蒂	-	-	-	-	-	-	没有回答
<b>俄 国</b> 普列汉诺夫	1				1		问题 2, 否, 或者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 为了确定的目的, 并受到全党的委托。
拉甫罗夫	1				1		问题 2, 否, 或者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有造成令人讨厌的先例的危险。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施德洛夫斯基	1		1				问题 2, 是, 社会主义者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努力争取直接参加政府。
克里切夫斯基	1				1		问题 2, 否, 或者除非在完全例外的情况下。
荷 兰 特鲁尔斯特拉	1					1	问题 2, 否, 或者在特殊的情况下以及为了明确的目的。
万-科尔	1		1				问题 2, 是, 在当前完全特殊的情况下。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丹 麦 迈耶尔 孔德森 奥尔森			1		1		问题 1, 是, 这甚至是一种义务。 问题 2, 是, 因为如果米勒兰的愿望实现了, 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社会主义应该“通过一切最微小的缺口渗透到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去, 以便在那里进行爆破, 摧毁旧的法律和旧的机构”。
西 班 牙 帕·伊格列西亚斯			1			1	问题 1, 是, 但是某地社会主义者走得太远了。 问题 2, 否, 在任何时候都不行。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瑞典和挪威  L·迈耶尔							问题 2, 是, 除非这是一种圈套。但是在米勒兰事件中, 他们感谢他为北欧国家做出了榜样。
瑞 士  格曾列希							问题 2, 是, 如果部长有勇气在内阁里维护自己的立场, 并且宁愿提出辞职, 而不愿违背他的党的原则, “因为共和国目前正经历着可怕的危机”。
奥托·朗格	-	-	-	-	-	-	没有回答
查理·默尔	-	-	-	-	-	-	没有回答
美 国 萨尼亚尔	-	-	-	-	-	-	没有回答

被征询的社会主义者的姓名按国家划分	态 度						表 决 说 明
	问题 1			问题 2			
	A	B	C	D	E	F	
<b>葡萄牙</b> 格内科							没有回答
<b>奥地利</b> 阿德勒							没有回答
<b>匈牙利</b> 达申斯基							没有回答

发表于1899年。译自让-雅克·费希特《法国社会主义：从德雷福斯案件到世界大战》1965年日内瓦法文版第69—75页。

罗·卢森堡

## 德雷福斯案件和米勒兰事件

——对一次“国际性征询”的答复<sup>①</sup>

(1899年)

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要求无产阶级在涉及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一切地方采取行动。这对于使资产阶级分裂的一切冲突都是适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势力相互关系的变动，国内政治关系中的变化也首先影响工人阶级的处境。我们不可能象无动于衷的见证人那样旁观资产阶级内部发生的事情，除非社会主义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实现，例如通过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单独的移民区。既然我们不幻想这样从资产阶级社会移进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相反，要运用在这个社会内部制造出来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胜利进程中就应当尽力影响一切社会事件朝着有利于自己

---

① 征询的问题有两个：德雷福斯案件和社会党人参加政府问题。这次征询是由饶勒斯的《小共和国报》发起的（参见本书第23—24页）。但该报没有刊登罗莎·卢森堡的答复，而只把它转给了沙尔·佩居伊的《双周杂志》。文章的题目是《1898—1912年的法国社会主义》一书的法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的方向发展。它应当力求成为一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政治事件中发挥越来越重大作用的强大力量。阶级斗争的原则不但不禁止这样做，而且还要求无产阶级积极干预资产阶级内部发生的一切比较重要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

以德雷福斯案件为例，我们既不必用关于资产阶级冲突的一般观点，也不必从社会的人道主义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证明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干预是正确的。因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显露出了四种社会因素，它们直接使这一事件具有阶级斗争问题的性质，这些社会因素是：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教权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这些直接敌人，我们一向是根据我们的原则和基本倾向在一般的鼓动中进行口诛笔伐的。所以，当需要我们运用当前的活生生的事件而不是用拍象的陈词滥调去揭露这些敌人的时候，我们却不投入战斗，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

因此社会党人参加由德雷福斯案件激起的运动这件事本身，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不应引起任何怀疑。唯一能够成为问题的是怎样参加这一运动。用这种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作用和资产阶级“修正”派的作用截然不同。资产阶级“修正”派只打算纠正一场合法的谋杀，而这件事却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分裂。资产阶级分子想通过对总参谋部采取的行动医治军国主义的脓肝，使它能够在活下去，而社会主义者却必须与没落的军国主义制度本身作斗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民兵和人民武装的要求。

社会党的态度和资产阶级德雷福斯派的态度可以截然下

同，因此甚至没有必要提到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修正”阵营的支持，因为社会主义者得到了进行一场完全独立的斗争的机会，也就是说一场使他们区别于运动中的其他派别的鲜明的阶级斗争。

至于这个运动实际上在多大程度具备这个特点，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觉得，有时我们的同志可能过多地强调抽象正义和维护德雷福斯个人的观点，而多少忽略了关于民兵制的鼓动。这样做的结果，无产阶级所得到的阶级意识可能要比它能够获得的要少些。但是批评容易实践难，况且今后当法国的全体社会党人理解这个社会事件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意义时，法国的同志仍有许多机会利用德雷福斯案件的教训及其全部后果为阶级斗争服务。

我们认为，德雷福斯案件对无产阶级的真正政治意义在于，它使无产阶级有可能把一场震撼全国的大规模政治活动变成阶级斗争的题目，并且使它有可能通过这种办法在短暂的时间里传播更多的社会主义意识，超过在运用抽象宣传我们原则的方法时许多年才能达到的程度。

正因为如此，这个运动把许多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卷进了自己势不可挡的潮流。如果说德雷福斯派的运动在社会主义者的行列里引起了强烈的抵制，我们认为这是来自一种虽说是本能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感觉，即法国无产阶级的一切大规模的自发的阶级运动都不会局限在各不同组织的框框内，并且有冲破这些框框的危险。但正由于这个原因，法国社会主义各支分散的力量的联合才表明是任何广泛的强有力的行动的先决条件。至于我们，我们并不担心不同的社会主义组织在



日常政治斗争的灵活战斗中实行联合会给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带来丝毫的危险，因为这一学说和这些原则已经在法国扎下根了。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再没有比摆脱了抽象的陈词滥调的伟大的生气勃勃的阶级斗争更好的学校了。唯物史观也不允许我们相信抽象的公式能引起富有生命力的人民运动的发展，相反，正是在整个无产阶级参加的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上，才会对理论和原则获得一个明确的观念。

对第二个问题即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问题的答复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这种参加，是把它理解成象参加立法议会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斗争的正常方式，还是理解成在国家生活中一个特殊时刻采取的特殊措施。我们觉得饶勒斯公民在他的《组织起来》（《小共和国报》7月17日）一文中赞成后一种观点。他清楚地、鲜明地提出了问题：“一个社会党人能否在危机时期，在一定的期限内响应资产阶级政党的呼吁和他们携手合作从事政府活动？”接着，他引用我们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7月6日）上的一篇文章<sup>①</sup>，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认为一个社会党人进入政府只有在绝对特殊的情况下才是许可的，但是表示怀疑在法国现在是否存在这种情况。他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如果人们只是考察一个特定的行动，那么对于当时提出的要求和形势的复杂性无条件地加以否定，的确是狭隘的学理主义。

---

<sup>①</sup> 指《一个策略问题》一文。——编者注

可见，在米勒兰事件中问题归结为：要弄清楚法国当时的形势是否已使社会党人入阁势在必行。在这里无法考察只有法国同志能够作出判断的实际情况。但是在一个局外人可以发表意见的限度内，我们觉得，由于缺乏先决条件之一，也就是缺乏一个唯一能够授权进行这场危险试验的强大而统一的党，这场试验就显得是不能容许的。但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饶勒斯提出问题的方式就有些不同了。在《社会主义的方法》（8月3日《小共和国报》）一文中，看来他是把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的活动与他们在议会、市参议会等机构里的活动相提并论的。他写道：“实际上，如今的社会主义已强大到足以进入一切机构，夺取一切权力而不致被资产阶级社会吞掉。”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等于在原则上同意把进入政府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许多行动手段之一，但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的。在前面提到的7月6日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论述了我们认为应该遵循的观点，所以在这里只择其要点说一下。

我们能用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法是阶级斗争。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机构，并且利用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并容许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切事件。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党人基于自卫的精神必须干预德雷福斯案件。但也正是根据这种观点，参加资产阶级政权就显得是不许可的，因为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本身排除了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是替社会党人担心政府活动的危险和困难，我们不应当在无产阶级利益给我们安排的岗

位带来的任何危险和困难面前退缩。但一般来讲，内阁不是一个从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政党的活动阵地。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不取决于它的成员的个人特点，而是由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职能决定的。现代国家的政府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它的正常运转是阶级国家存在的条件之一。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后，阶级统治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政府不会变成社会主义政府，而是一个社会党人变成了资产阶级部长。一个对工人友好的部长能够实行的社会改良本身绝不包含丝毫的社会主义，这些改良只有当它们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的时候才是社会主义的。来自一个部长的社会改良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性质，而只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这个部长，由于他担任的职位，是把这些改良和他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其他职能、军国主义等等所承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议会、在市参议会里是通过和资产阶级政府斗争而争得有益的改良的，而在担任内阁职位的情况下却只有支持资产阶级国家才能达到同样的改良。所以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并不象有人以为的那样是社会党人局部地夺取了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局部地征服了社会党。

发表于1899年，原载于《双周杂志》  
1899年第11期第77—82页。译自罗  
莎·卢森堡《1898—1912年的法国  
社会主义》1971年巴黎法文版第61  
—85页。

# 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关于 “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 联盟”问题的讨论记录

(1900年9月26—27日)

## 第四天

9月26日(星期三)

### 1.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上午)

主席：埃米尔·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

.....

大会开始讨论第九个问题：夺取社会权力以及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

多数派和少数派在第九委员会中有各自的报告人：王德威尔得<sup>①</sup>是多数派报告人；恩利科·费利<sup>②</sup>(意大利)是少数派报告人。

---

① 埃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welde 1855—1938)——比利时主要社会党人，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② 恩利科·费利(Enrico Ferri 1856—1929)——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任《前进报》编辑，后来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编者注

阿德勒接替王德威尔得担任主席。他宣布：“少数派要求召开一次委员会的补充会议。但为了不中断正在进行的会议，我们现在就宣读报告，在会议结束以后，再召开委员会的补充会议。”

王德威尔得：“我想向大会尽可能客观地扼要介绍一下委员会的讨论。

关于问题的前半部分（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讨论是非常简短的。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不管是属于哪一民族和哪一种社会主义倾向，在这方面都是抱着同样的态度看问题的。这一点的证明是，我们法国工人党的同志们在伊夫里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文本，就是委员会一致建议的我们的最后文本。它的全文如下<sup>①</sup>：

---

① 王德威尔得宣读的这份经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只包括法国工人党伊夫里代表大会决议的最后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全文：

#### 夺取社会权力

法国工人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必须把夺取社会权力理解为对资本家阶级实行政治上的剥夺，不管这种剥夺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这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要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始终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

大会同时宣布，出于同样的理由，阶级斗争禁止同敌对阶级的任何派别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盟。

虽然大会也承认，在特殊的情况下，有时进行联合也是必要的（当然不能把纲领和策略混为一谈），但是，党应竭力使这种联合减少到最低限度，直到完全取消，而只是在缔结协定的有关团体所属地方组织或全国组织承认有必要时，才容许建立这种联合。——编者注

## 决 议

大会宣布，阶级斗争禁止同资本家阶级的任何派别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盟。

虽然大会也承认，在特殊情况下，有时建立这种联合是必要的（当然不能把纲领和策略混为一谈），但是，党应竭力使这种联合减少到最低限度，直至完全取消，而只是在缔结协定的有关团体所属地方组织或全国组织承认有必要时，才容许建立这种联合。

实际上，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已被证明是不能够持久的，因为这种行动方式会违背阶级斗争的原则。最多只能偶然缔结这种联盟。

费利对委员会说：‘假设在某一地方，路途很不安全，有三个政治和哲学信仰明显对立的人相遇，并且同时受到袭击。这时，他们就会为了抵抗共同的敌人而把他们的分歧丢在脑后’。

对于社会党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在自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例如在意大利，联合是合法的。另外，当事情涉及到维护个人的权利时，象法国不久以前那样，联合同样是合法的。最后当事情涉及到掌握普选权时，象在比利时那样，它也是合法的。（鼓掌）

总之，我们认为，联合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但是有时这种坏事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时候应该善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要极其谨慎使用的斗争方法。一句话，只有在特殊的和暂时的情况下，联合才是可以

容许的。

关于问题的后半部分(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认为这是涉及局部利益的、次要的问题，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两个决议：一个是考茨基提出的得到二十四票赞成的决议；另一个是恩利科·费利和茹尔·盖得提出的仅得到四票赞成的决议。费利—盖得决议主张明确地、绝对地禁止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至于考茨基的决议，我可以称它为社会民主党内最受崇敬的人之一的卓越的理论建议。决议是这样写的：

#### 考茨基决议草案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

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

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社会党的多数赞成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又继续成为本

党的全权代表时，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一行为才有可能给战斗的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的结果。

反之，如果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不服从自己的党，或只是部分地代表自己的党，那么他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一行为就有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里造成混乱和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就是说，不是巩固党，而是削弱党，不是促进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而是阻止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

总之，六会确认，即使在非常的情况下，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该退出内阁。

这就是以二十四票对四票通过的决议全文。

我不想冒昧地代表委员会全体成员发表意见，我想向你们谈谈我的个人意见。关于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和联合，我可以非常简单地概括为：在这样做时必须极其谨慎，因为它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联合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坏事。

我现在谈谈使一个民族特别感到关切的决议。我要说，我们通过的这个决议既不应被看作是对法国社会党人的行为的指责，也不应被看作是对它的默许。投票赞成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人多数是出于宽容和谅解，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该对你们说，如果允许我们就我们的法国同志所关心的具体事件发表意见，那么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会说，不管社会党人部长具有多大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价值，我们认为害处远远大于好处。我们要说，米勒兰和他的朋友们以个人名义擅



自接受这样的任命是错误的。(法国工人党方面鼓掌)他们坚持违背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的意志,就犯了更大的错误。(大厅一侧发出掌声和胜利的欢呼)我请法国工人党党员不要对我这样鼓掌,因为一会儿他们中间就会有人起来批评我们,并说,通过的决议太空泛和太一般化了。

此外,国际代表大会不是进行谴责和宣布革出教门的教令的法庭。相反,我们的作用就是要宽容和谅解。

我们应该在原则问题上表示明确的态度,但是涉及到策略问题,我们应该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由。(独立社会党人方面鼓掌)

我们同法国工人党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认为,入阁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独立社会党人方面鼓掌,法国工人党抗议)你们看,我要求你们不要那样给我鼓掌是有道理的,你们已经后悔了。

你们了解我们某些法国朋友的观点,那就是:社会党人可以接受选举的职位,而不能承担任命的职位。根据这种观点,一个社会党人可以成为利尔的市长,但是他应该拒绝进入政府。

我们不能把这两种情况完全等同起来,但是,在一个民主的代议制国家里,部长同由政党选出的市长是一样的,都是他们所体现的党的代表。(鼓掌)为了使这一论点名副其实,部长不应是没有得到委托书的个人,而应是党组织的代表,这个党组织对他实行监督和管辖。(鼓掌)

万-科尔<sup>①</sup>对委员会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或者在德

<sup>①</sup> 亨利克·万-科尔 (Henrik Van Kol 1851—1925)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右翼领导人之一,曾在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多次担任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人。——编者注

国，谁要是不经过自己的党的同意而加入资产阶级内阁，那就是太‘愚蠢’了，他立刻就会被开除。

一句话，这样的参加内阁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参加时必须有这样的条件，即不会成为分裂的原因，而应成为团结的保证。社会党人不应容忍令人厌恶的混杂，不应承担不能接受的连带责任，不应使人有可能造成混乱，来搞乱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就有权对他说：‘你脱离了我们的队伍，请你回来吧！’

我的结论是：我们既把联合问题看成是基本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必须说，参加内阁问题，正如饶勒斯昨天所宣布的那样，只是在无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偶然事件和一个插曲而已。（鼓掌）

我们认为，不管担任部长的社会党人有什么样的价值，他的部长职位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天平上是永远不会有很大分量的。（鼓掌）

总之，法国社会党人之间停止纠纷，将会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感到慰藉。社会主义者的战斗同议会走廊上的斗争和争夺部长职位的斗争是两回事。在为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和完全的正义的艰苦战斗中，我们的任务更伟大。在这艰难的道路上，将有一些人由于疲劳过度或被敌人的枪弹打中而倒下。

我们将继续进行把工人组织起来的缓慢的和坚持不懈的事业，我们要培养在体质上、智力上、道德上强有力的一代来反对旧世界。我们要通过紧密的团结而建立一个紧密的联合体，当野蛮人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用自己锤炼的链条把彼此拴在一起。我们要同他们一样，用无限的爱、共同的信仰和共

同的行动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欢呼）

当无产阶级在体质上、道德上和智力上为自己的伟大任务作好准备的时候，它就成熟到可以统治世界。它将在资本家阶级面前站立起来并说：离开这所房子，它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理应住进去。”（长时间的欢呼）

会议于十二点三十分结束。

## 2. 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下午）

主席：公民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

翻译王德威尔得公民在上次会议结束时的发言。

第九委员会少数派报告人恩利科·费利：“我是正式的少数派报告人。昨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深信自己将作为少数派发言人。而今天早晨，如同被判处死刑的人一样，我怀疑起自己是什么人来了，并且确信，我是多数派的报告人，王德威尔得的发言证实了我的这一想法。

第九委员会所审议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党派的联盟。

会议首先讨论了第一个问题：以二十二票对四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提案，这个提案在原则上坚决支持并且在实践上也完全允许参加政府。至于联盟，委员会全体一致把它否决了。而我是支持在前几次代表大会已经被击败并在今天将再一次被击败的观点的。（抗议）

首先，让我们证明，不管表决会是什么样的，将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

很明显，这些策略观点的差别不是个人的欲望或能力的表现，而是社会主义情绪在整个世界的结果。我们正在度过国际社会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法国能够为它增添光彩，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同样的情绪：在法国有米勒兰事件；在意大利有‘自治策略’；在德国有倍倍尔关于参加邦议会选举的决议。

对外国代表来说，为了制定一个‘本丢—彼拉多’式<sup>①</sup>的决议而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是没有意义的。

当人们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对米勒兰事件不感兴趣时，如果这仅仅是就米勒兰而言，那是正确的，如果指的是整个事件，那是错误的。我们无权谴责它，但我们有权对它作出判断。我们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大树，广大社会党人、工农业无产者是树根。我们有义务作出决定，但不应忘记，树浆是从根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来源于无产阶级群众。无产阶级要求一个准则，一个指南针。

让我们排除争论中的个人因素。意大利的屠拉梯和我处于象法国的饶勒斯和盖得一样的情况，所不同的是，在意大利，我们已跨过了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阶段。（鼓掌）

二十年来法国工人党一直力求贯彻准确的、纯洁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鼓掌，骚动）我认为，最近一个时期，法国工人党的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有点死抱着一些概念化的公式

---

① 此语出自福音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本丢和彼拉多是罗马的一个犹太总督的名和姓。据福音记载，耶稣被解到本丢那里受审，本丢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属希律所管，就犯地送交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给彼拉多。人们沿用这一典故形容人希律，而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这句话的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编者注

不放，而这些公式只不过是马克思的门徒的教条主义解释。

另一方面，在法国，与第一个社会主义潮流并行，还有另外一个社会主义潮流，它致力于逐步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这个法国社会主义政党深深地卷入了德雷福斯案件。我们注意观察了这个党在这次危机中的态度，我们以这个“同时代的后来人”的观点，也就是外国人的观点来看待它。

如果说法国工人党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那么我所说的另一个社会主义潮流则进行了拥护现代法国、反对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光荣斗争，这种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不仅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相反，它是一切时代都有的，它有钱，也就是说拥有很多报刊，拥有有影响中间地带的公众舆论的力量。饶勒斯投入了论战。现在进行了一次国际性征询。欧洲的大多数社会党人赞同、钦佩和赞扬饶勒斯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态度。（鼓掌）……但我正是为了团结才这样说的！双方都有功绩和错误；我们都是可能犯错误的人。

难道说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和解是不可能的吗？不，是可能的！（鼓掌）在罗马，我曾受到我的朋友屠拉梯的攻击。尽管我受到了攻击，可是，我们在第二天仍然和前一天一样是兄弟。现在，人们会说法国社会党人：‘请看，他们多么团结！’是的，在代表大会期间，如同博览会期间的内阁和民族主义一样。（鼓掌）但是这种和解不应象洒在海面上的油一样，虽然可以暂时平息一下风暴，但随后却会使风暴来得更加猛烈。（鼓掌）法国同志们，应该结束个人纠纷。（热烈鼓掌）法国社会党应该团结起来，而不应分裂成两部分。（长时间鼓掌）这就是委员会的精神；不是把法国党分裂成两个，而是把两部分联合起来。

当社会主义由幼儿成长起来变成青年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在改变它的策略。它说：不要镇压，而要对它施行催眠术。应该象母亲们征服丈夫时所做的那样。姑娘在年青人经过她面前的时候只不过微笑了一下，年青人却认为姑娘的微笑以及可能成为他岳母的人的微笑是为他而发的，这样，他就变成了驯服的丈夫。（鼓掌和笑声）

去年，在德国这个僵硬的绝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人们争论过这个问题。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罗莎·卢森堡说：‘最终目的就是一切，运动是微不足道的。’李卜克内西走来说：‘最终目的是主要的，但是需要运动来达到目的。’而在美因兹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知道，倍倍尔提出了一个提案，规定参加邦议会选举是一种义务。这既不是倍倍尔的过错，也不是饶勒斯的过错，它是正常发展的结果。

有人说现在所争论的问题是同我们无关的，应该把策略同理论区别开来。而我认为不能作这种老的、经院式的划分，因为实践不过是行动中的理论，而理论不过是实践的概括。（鼓掌）我们说不能关上门以后又打开窗户。现在向你们提出的是一些橡皮性的规定。我在意大利旅行过很多地方，随时可以看到一些同志声明他们是处在特殊条件下，需要放弃原则。考茨基的提案固然宣布了所有的原则，但是它指出代表大会不能研究策略的细节。它错了，不能把策略和原则分开。难道你们要把原则贴在社会党人部长的背后，同时在前面又给予他行动的自由吗？

委员会通过了考茨基的提案，但好象它是毒药似的，委员

会接着又通过了盖得的提案，作为解毒剂。而我认为，在市政府里，社会党人可以参加市政领导机关，但要以不建立任何联盟为条件。所以我曾提议绝对禁止社会党人参加政府，除非党取得了多数。有人会说这是幼稚的，因为如果党有了多数，它就会把资产阶级排斥在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不会把任何人排斥在外！（鼓掌）

我们认为，考茨基提案包含着作者本人所没有意识到的很多危险。这是一个斜坡，只知道从哪里开始滑下去，但不知滑到何处。在意大利，有一些社会党人参加了官方组织的翁伯托<sup>①</sup>的葬仪。当然，我们反对刺杀国王的反人道行为，但我们不能支持参加官方的葬仪。在法国，通过了远征中国的拨款，没有一个社会党议员投票反对。”

桑巴（法国代表）：“这样说不不对！”

费利：“我却认为事实是这样的，但是即使不符合事实，我也坚持我反对这次国际掠夺行为的意见。”

我来谈一下第二个决议。我感到盖得的决议并不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准确。决议说，不要联盟，但要一种把联盟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联合。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党组织可以允许或反对米勒兰入阁。所以我们请求我们的法国朋友实现统一。”（热烈鼓掌）

#### 恩利科·费利的决议草案

国际代表大会确认，在社会党日益壮大从而使资产阶级政府感到不安的国家里，尽管议会的、政府的和立法的策略变

<sup>①</sup> 翁伯托一世（Umberto I 1844—1900）——意大利国王。——编者注

化了，但是有关资本家阶级同工农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划分的这些现代社会的原则并没有改变。

代表大会重申，社会党只有在工人的阶级意识已经明显地和充分地觉醒的时候才能建立和发展。

代表大会声明，为了夺取社会权力和迫使统治阶级实行局部的改良（在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中，并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体质和道德方面的提高说来，这种改良是有益的、逐步取得的胜利成果），既不应改变社会党的纲领，也不应改变它的宣传方式和政治、经济斗争的方式。

只有在无产阶级有阶级觉悟的政党组织相当发展和巩固的国家里，以及在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党领导的监督下，出于捍卫公众的自由或者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的当务之急，才可以同资产阶级党派结成暂时的、特殊的联盟。

至于社会党人参与政权和行政权，只有当它是社会党在政治代表会议和地方自治会议中获得多数的结果的情况下，才是容许的。

费利最后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实行这种紧急的联合：在需要保护公众的自由时或者在有发生政变、禁止出版报刊、取消集会自由和工会的危险时。

请你们不要忘记，与会的很多外国兄弟还没有争取到使人们可以自由呼吸的共和国。（鼓掌）在我国也不会提出参加内阁的问题，因为意大利国王决不想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内阁。（鼓掌）

我的结论就是，我们是主张禁止联盟（极端紧急的情况除



外)的多数派的代表。至于参加政府，这是把原则束之高阁，而把实践放在首位，我们将在所有的国家做试验。我想结果会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而在下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将会重新回到不可动摇的、有关生死存亡的原则上去。不管代表大会的表决和它的实际结果如何，社会党人需要统一，这一需要将会使你们法国社会党人共同前进，并以这种社会主义的自豪感指引你们去夺取未来。(鼓掌)痛苦和流血的意大利社会党正是怀着这种希望高呼，民族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的统一万岁!”(热烈鼓掌)

代表大会根据海德门的建议决定，每个发言人的讲话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报告人不得超过二十分钟。

饶勒斯：“我用十分钟的时间就足以说明我的立场。我将要阐述的观点只代表我，也就是说只属于我在这里所代表的团体的。

在同资产阶级党派联盟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是徒劳无益的。不管各自的表述方式多么巧妙，归根结蒂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首要的事实是，为了保卫自由或争取普选权，所有的社会党都采取缔结联盟的办法。几乎国际上所有的社会党都声明，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把同蓄意捏造的谎言进行斗争的工作让给资产阶级去做，他们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同样，在德国，社会党人同莱茵河彼岸的知识分子一起在海因茨法案问题上捍卫了思想自由。这是他们的光荣，因为多亏了他们，德国没有成为阿提拉的祖国，它依旧是歌德的祖国。(鼓掌)

在美因兹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德国民主派赞成必须直接参加邦议会的选举。费利刚才提到了意大利社会党人同共和派的联盟。在比利时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了抵抗同盟。因而，争论对于掩盖国际社会主义缔结联盟的普遍实践是徒劳无益的。

在我这方面，我明确说过，现今在全世界引起明显不安的原因之一，在于社会主义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策略。

至于把这称为联盟还是联合，这种语言上的微妙之处并不特别使我产生反感。当人们不再能改变事物时，他们就改变用词。(热烈鼓掌)人类的纯朴娱乐太少了，我不忍心使他们失去这种娱乐。

在另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即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上，我赞成考茨基的决议案，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均势，一种不很肯定、但现在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

王德威尔得说，米勒兰问题是纯粹法国的問題。实际上，它只能在法国出现。但是，请允许我为这个问题不能在别处提出面表示遗憾。是的，这是法国的問題，这就是说，共和国所带来的自由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成熟，而其他国家却还没有出现这一问题。我要请求我们的外国同志，当有人对他们说在法国社会党人应当拒绝资产阶级国家首脑提供的职位时，请他们不要忘记社会党人正在竞选国家首脑。”(一些人鼓掌，另一些人抗议)

有一个人喊道：“社会党人弃权或投反对票。”

饶勒斯：“我听到抗议声，好象我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一样”。(鼓掌声和笑声)

沙文(法国工人党):“这是挑衅!”

饶勒斯:“当外国同志在我的发言的记录中看到,在我说这些话时,有一些社会党人对我喊:这是挑衅,他们会感到惊讶的!”

王德威尔得:“我请求到会的人尊重使这个讲坛增光的大演说家。(热烈欢呼。会议一大部分人起立为主席的发言鼓掌)这些问题很重要,所以不能不让所有的观点都发表出来。我请求代表大会不要打断饶勒斯的发言。”

饶勒斯:“我说过为什么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个问题在目前是法国的问題,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不能扩展到具有实际的议会制度的一切国家。正如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昨天假设的那样,陷入帝国主义的旧的自由党一旦破产并因而导致产生新的自由党,那么,问题也可能在比利时、瑞士和英国出现。

因此,我说,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法国,在比利时最近几次选举中,如果比利时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击败了教权派多数,这个问题本来是可能出现的。但是,那里不会有王德威尔得问题,因为有组织的社会党不会让个人去承担责任;问题将以非个人的形式出现。

我赞成考茨基的决议案,这是因为它允许社会党在一定的情况下有权决定这个问题;这也是因为它确认,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原则问题。

社会党曾多次犯过把策略问题变为原则问题的错误。有时以阶级斗争为借口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起先禁止参加邦议会选举,然后不得不容许参加,然后又规定必须参加。人们

就这样给自己披上为阶级斗争而战斗的外衣，因为他们提出阶级斗争来无理地干涉辩论。

阶级斗争使我们必须确认，既然要用共产主义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同这种代替有利害关系的阶级就能够为实现它而工作。

阶级斗争使我们必须说，无产阶级不再象罗伯特·欧文曾经要求维也纳会议拯救工人阶级那样等待今天的有势力的人来拯救他们。

阶级斗争使我们必须说，无产阶级已经成长到能够进行自己的事业，正因为如此，不应该束缚他们的手脚。

我赞成考茨基决议案的理由还在于：决议案规定只有有组织的党能够作出加入或退出的决定。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补充一句，这是防止经常作这种参加政府的危险实践的真正保障。

资产阶级已经能够召唤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了；如果他是整个党的代表，那么资产阶级会更加犹豫，因为这将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只有当一个巨大的危机使资产阶级承认自己无力拯救自身，或者当无产阶级的抵制造成一种真空，使资产阶级象堕入了深渊一样，这时资产阶级才会屈服。

这就是我赞成考茨基决议案的原因。”(热烈鼓掌)

马赛尔·桑巴纠正恩利科·费利的一个说法。他是议会的社会主义党团为了抗议对于殖民地、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远征而一致选出的代表。

他说在第九个问题上，他和他的朋友们将服从国际代表

大会的决议。他希望这些决议是明确的。“请作出明确的判决，我们将执行这些判决。”

儒安迪(法国)在法国工人党代表们高喊“李卜克内西万岁”声中开始发言。他郑重表示自己的社会主义感情，并为支持有米勒兰公民参加的内阁的那些社会党人辩护。

他说：“应该想象一下米勒兰进入内阁时候的法国是什么样子，那时社会党还没有组织起来，应该说当米勒兰进入内阁的时候，他是真正走上了一个战斗的岗位！”(鼓掌)

在当时，人们确实认为这个行动是好的，因为当内阁受到威胁时，他走上街头去保卫它！(一部分人鼓掌，另一部分人强烈抗议。嘘声)每当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受到攻击时，例如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整个民族为了一个种族问题都扑向一个人的时候，无产阶级就会立刻站起来。”他表示同意考茨基的提案。

会议于六时结束。

## 第五天

9月27日(星期四)

### 1. 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

(上午)

主席：公民万-科尔，菲尔霍尔茨和普列汉诺夫

万-科尔建议大会决定下届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德国代表建议1905年召开；英国建议1902年；最后以二十一票对十九票通过大会召开的时间为1903年。荷兰代表建议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奥地利代表建议在维也纳。克里切

夫斯基说俄国代表恐怕不能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代表大会，因为奥地利和俄国的警察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以大多数通过在阿姆斯特丹召开。

盖得发言。（许多人鼓掌并欢呼：共和国万岁！）

茹尔·盖得（法国工人党）：“我赞同我们伊夫里大会作出的关于联盟的决议，尤其是因为它以阶级斗争的名义禁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任何联盟，如果说它不容许联盟却容许联合的话，那就是想把联合减少到最低限度，直到完全取消，而且规定联合应当得到地区组织和全国组织的赞同。从这方面看，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现在来谈考茨基的决议。我赞同考茨基的意见：不能认为一个社会党人参加内阁就是夺取政权的开始。这样就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同乞求部长席位这两件应当分开的事情区分开了。（法国工人党方面鼓掌）

考茨基说，为了实现我们的纲领，我们需要掌握全部中央政权，这一点我也同意。的确，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能实现一些软弱无力的改良，而不能以集体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没有任何事情表明，为了达到这一最终目的不需要一直进行到实现阶级的专政，而1793年的资产阶级是毫不犹豫地实行了阶级专政的。（法国代表团中的独立社会党人方面抗议。也有鼓掌声）

考茨基谴责了由于一个社会党人同政府合作而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引起的混乱和组织涣散状态。他还补充说，这种合作远远不能使我们接近目标，而只能使我们离开它，并认为它不是使我们党加强，而是使我们党削弱。他这样

说也是有道理的。

由于削弱不仅限于一个国家，因此提出这种纠正就更加重要了。费利已发现到处都有这种情况。国际工人党的脊梁骨已经弯曲了。我们的行动在广度上取得了成就，但在深度上却遭受了损失。

对于考茨基的决议我几乎要投票赞成，因为这个决议已经包含着初步的必要的纠正。但是考茨基在理论上谴责了这个‘新的事实’以后，接着又承认将来在发生特殊情况时可以允许这样做，这一点我所代表的那些组织就不能赞同他了。但是，阶级斗争即使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不会导致阶级的合作，除非这种特殊情况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李卜克内西说，一个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党人可能还认为自己是社会党人，但实际上他已经不是了。因为，既然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那么他就更加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

总之，一个人不能既代表社会保守的力量，又代表社会革命的力量。这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什么力量也不能抹煞这种矛盾，什么力量也不能使它消失，即使万一能得到党的授权也不行。党的授权远远不能纠正错误，而只会使它加深。

这样做实际上就会是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罪行承担责任，这就是说，不久就要失败和破产。（法国工人党方面鼓掌）到那时，无产阶级将在枪炮和刺刀的闪光下擦亮眼睛，厌恶地停步不前，抱着反感离开我们。

而这一决定性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请你们想象一下这

种情况吧：社会党人部长有责任提出战争拨款的要求并为之辩护，而我们的议员的义务却是这样回答：‘不给一分钱，不给一个士兵！’有了意大利的米勒兰，德国的米勒兰，英国的米勒兰，就再也不可能有国际了。（法国工人党方面长时间鼓掌。有许多代表抗议）

如果不把考茨基的提案重新送交委员会，并由委员会按这一精神进行修改，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投票赞成它的，而且我们认为代表大会也不可能投票通过它。

公民们：不要以例外为借口而回避问题，因为，正如恩利科·费利昨天所说的，例外的情况可能为数很多，以致最后会把规则本身冲垮。”

盖得宣读他以工人党的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他同费利意见一致，要求首先表决这一草案。

#### 盖得—费利决议草案

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指出，必须把夺取社会权力理解为对资本家阶级实行政治上的剥夺，不管这种剥夺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因此，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这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要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始终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

盖得继续发言：“王德威尔得想证明市长的职能和部长的



职能是一样的。他错了。市长是自己的党的代表，如果他不  
服从党，就要垮台。相反，部长是敌人任命的，他越背叛自己  
的党，就越能长时间地当权。如果你们通过委员会的草案，你  
们就是给予背叛以奖赏。（法国工人党方面长时间鼓掌，独立  
社会党人方面抗议）

另一个后果是将会把最坏的‘新精神’引进党内。有了成为  
部长的可能性，想成为部长的愿望就将随之侵入人们的头脑，  
就将掌握被称为参谋部的那些人。他们将千方百计实现这一  
愿望，并且说：‘这是党所希望的。’过去人们忠于自己的党  
直到牺牲生命，现在人们将是忠于自己的党直到获得部长职  
位！（法国工人党方面长时间鼓掌）

我们最后向你们提出的决议，在我们看来是有各种实现的  
可能的。它只禁止应该禁止的东西，就是王德威尔得所说  
的那些取决于敌对阶级的任命的职位。由选举产生的一切职  
位仍旧是合法的，党甚至有义务去争取这些职位。在任何情  
况下，我们的绝对信念是不能超过由选举产生的职位。这一  
策略可能是‘老一套’，而我们正是靠这老一套尽了自己的责  
任，把阶级区分开的。（鼓掌）现在有人想要弥合我们撕开的裂  
缝了。（独立社会党人方面强烈抗议。喊叫声）

在这项要把我们造成的分裂弥合起来的政策实行以后，  
我认为，除了愚弄工人和维持社会现状以外就再也谈不到别  
的了。”

法国工人党向发言人热烈欢呼。

有一个人喊道：“但愿意得不会成为法国社会党的独裁  
者。”（鼓掌声和抗议声）

安塞尔<sup>①</sup>说，他并不因为自己是首先赞同米勒兰进入内阁的人之一而感到遗憾。

他之所以赞同，是因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这样做会使他的阶级找到一种新的行动办法。

为了论证他的意见，他引用了许多话，举出许多事实：社会党的行动应该是连续不断的，不论是在议院和在内阁，还是在工会和在合作社都一样。如果代表大会敢于对人民说，他们的解放是一项缓慢的、长期的和艰巨的事业，那么它就是做了应当做的事。如果说社会主义出现了危机，那么这不是一种衰退，而是由于发展过快引起的危机。如果说考茨基的建议不够直率，那是因为形势不允许这样的方式。

如果工业发展的状况可能会实现克列索和昂赞<sup>②</sup>的社会化，那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会拒绝批准一个社会党人加入内阁吗？（某些代表鼓掌）

不断进行改良会使最终目的接近，而不会排斥革命。（热烈鼓掌）

瓦扬登上讲台，（呼声：公社万岁！）他说：“在盖得发言之后，我要说的话不多了。

我要直率地肯定社会党应该始终是反对党和革命党。任何协议，任何联盟，任何社会党人参加政府，都要受到谴责。举例说，如果施奈德先生迫于克列索工会的强大力量，不得不从

---

① 爱德华·安塞尔（Eduard Anseele 1856—1938）——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合作社运动活动家。——编者注

② 克列索和昂赞都是法国当时的工业中心。克列索位于索恩-卢瓦尔省，昂赞位于诺尔省。——编者注

工会中挑选一位经理，结果也无非是他从工会雇用一名厂主代理人而已。因为，如果新的经理不为资本家效劳，他就会被撤职。同样，一个社会党人部长也只能完成维护资产阶级的

工作。

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社会党人在政府中正式代表我们，那么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党参与了在夏龙和马提尼克<sup>①</sup>的屠杀。(鼓掌和抗议声)

我们要求考茨基解释，为什么他在德国同伯恩斯坦胜利地进行了斗争，而现在却投降。(抗议声)

我们的决议应该是明确的，而考茨基的提案却并不是这样。代表大会只有首先表决通过委员会少数派提出的决议草案才能作出正式和明确的决定。关于这一点，你们是不能拒绝我们的。”(大厅的一侧鼓掌)

奥艾尔(德国，国会议员)说：“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代表，我也是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发言的。我不怀疑这一点，因为我对于法国人的礼貌和殷勤评价很高，从来不会相信他们会拒绝让我们发言。

对于我们德国同志来说，这次争论中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看法，所有这些使法国无产阶级激动、发怒和分裂的问题，所有这些我们刚才听到你们长时间争论的问题，几年前我们在德国已经争论过了，只不过也许不这么激动而已。我们关心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和社会党人进入市政委员会的问题已

---

① 1900年2月在马提尼克岛和1900年6月在索恩河畔夏龙发生工人罢工，厄尔德克-卢梭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了这些罢工，一些工人遭到枪杀，许多工人受伤。——编者注

经二十年了，是经验促使我们做了法国社会党人（如果他们不愿损害工人阶级的最切身利益的话）现在终于不得不做的事情。

确实，我们那里还没有出现米勒兰事件！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是，我希望，我期待我们不久就将如此！（鼓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纯理论的问题。而目前我们党的领导（他们将来可能碰到类似的问题）距离单人牢房比距离部长职位近得多！（笑声）

当你们争论时，我觉得自己好象处在路透<sup>①</sup>的小说里的那个可怜的短工的地位，人们在他面前争论这一道菜还是那一道菜更好吃，这个下德意志的贫苦而朴素的工人表示：煮李子和烤肉都是名菜，但我们是永远看不到的！（全场笑声）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但是，还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提出问题。在法国，允许一个社会党人成为部长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呢？

问题在于要弄清楚，在法国，共和国是否将要崩溃，反动势力是否将要获得胜利；要弄清楚人们是否要把这一伟大的解放运动多少年多少年地推迟下去，而特别是你们，你们法国人，你们是为这一运动流了血的！我只是为了遵循我们党的传统才对你们作如下的声明：从前在类似的时刻，当问题在于击退反动势力对自由的攻击时，当问题在于阻止政治和经济的倒退时，我们一刻也没有犹豫就履行了我们的职责。而如果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会用这样的口气对那

---

<sup>①</sup> 弗里茨·路透(Fritz Reuter 1810—1874)——德国作家。——编者注

些被迫转向我们的政党说：‘请放心，正是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存在本身要求我们和你们共同为自由、正义和进步而战斗。’或许由于考虑到我们对我们的领导者的感情，我们要加一句：‘我们不要部长职位，虽然如此，你们可以信赖我们。’但是，我假设那时会有某一个人来对我们说：‘这一切只同资产阶级有关系，同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问题仅仅在于将出现一个保守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而我们将会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口号将是：要路贝<sup>①</sup>，永远不要、无论如何也不要一个凯撒！（长时间鼓掌）

下面就是我以我们党的名义在委员会上的发言：尽管在我们德国，一个社会党人不经党的同意就进入内阁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避免把这种对于我们这样的组织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情照搬到另一种不同的局势上去。面对米勒兰事件，我对自己说：既然存在意见分歧和混乱，而目前我们法国同志的组织又是一座真正的巴比伦塔<sup>②</sup>，——是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米勒兰应该向谁去征求意见呢？（热烈的赞同声）你们想阻止米勒兰事件发生吗？那就消除你们的怨恨，使党成为一个强大的党、团结的党、伟大的党吧！只有到那个时候，如果历史上重新出现一个象你们现在所处的时刻，你们就会感到法国社会民主党该是多么有力，多么强大，并且具有什么样的决定性

---

① 埃米尔·路贝 (Emile Loubet 1838—1929) ——当时的法国总统。——编者注

② 巴比伦塔一词出于《圣经》，在洪水泛滥以后，人们要建立一座通天的塔。耶和华神知道以后十分生气，便使人们语言彼此不通并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巴比伦塔一词一般是指混乱的意思。——编者注

影响！很可惜！这一时刻还没有在我们那里出现。而对你们来说，它已经出现了。而我们的全部期望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一伟大的日子，在它出现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渺小的人物！（热烈鼓掌）

我们投票赞成考茨基的决议。这并不是说我同意它的全部提法。但是它的总的倾向我是赞同的。人们指责它是摇摆的，暧昧的，人们说它没有为各种情况都作出规定。但是如果它是这样全面的话，我倒不会投它的票了。我们不愿意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上都受到约束。我们愿意在严格地忠实于我们的理论和纲领的条件下采取适应特定形势的决定。我们不放弃我们的权利。我们不是口袋里装着最后真理的狂信者、预言家和教会创立者，（热烈鼓掌）我们在寻找真理，正是为了寻求真理，我们应当让道路通行无阻。（鼓掌）所以我们赞同考茨基决议。

我们希望法国人从这些争论中吸取教训，认识到他们应当在他们彼此之间和在他们本国解决这些问题。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打算在这里讨论参加邦议会选举的问题，那会怎样！国际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表明最带普遍性的观点，这是它的职能。历次代表大会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盛大示威，是这一巨大力量的示威，而未来是属于这一巨大力量的。愿法国人不是分为战胜者和战败者，而是手挽着手，作为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战斗的兄弟离开这个大厅！”（除法国工人党代表外全体长时间鼓掌）

会议于一时结束。

### 3. 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

(下 午)

安得列阿·科斯塔<sup>①</sup> 声明同意考茨基的提案，他说它同上届罗马代表大会上以一百零六票对六十票通过的提案非常相似。这个提案是这样说的：代表大会在关于选举策略的问题上，在肯定它对于阶级斗争、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这些基本原则的信念的同时，宣布各组织在策略问题上完全有自主权。

在罗马代表大会的表决之后，公民费利(我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我象喜欢一个兄弟一样喜欢他)说他要象一个忠诚的战士那样接受这个决议。但是我要坚持说费利不是代表那些以一百一十九票对七十三票表示支持自主权的意大利社会党人，而是代表第九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言的。而那些参加了翁伯托国王葬仪的社会党议员之所以该受谴责，不是因为他们行使了自主权，而是因为这些公民缺乏社会主义教养。

讨论结束，以民族为单位进行表决。首先表决考茨基的决议。表决的方式是投票表示赞同委员会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王德威尔得代表委员会表示赞同万-科尔提出的这种表决方式。

考茨基的提案以二十九票通过，盖得和费利的提案获得九票。(鼓掌，——法国工人党方面喊叫：到夏龙去！——长时

---

① 安得列阿·科斯塔 (Andrea Costa 1851—1910) ——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早期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后来脱离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并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编者注

间喧嚷)

票数分布情况如下:

	考茨基的提案	费利和盖得的提案
德国	2	0
英国	2	0
奥地利	2	0
比利时	2	0
捷克	2	0
保加利亚	0	2
丹麦	2	0
西班牙	2	0
美国	1	1
法国	1	1
荷兰	2	0
匈牙利	0	0
爱尔兰	0	2
意大利	1	1
挪威	0	0
波兰	1	1
葡萄牙	2	0
阿根廷共和国	2	0
俄国	1	1
瑞典	2	0
瑞士	2	0



随后举手表决联盟问题。一致通过盖得的决议。

译自《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五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正式记录》1901年巴黎法文版第56—90页。

卡·考茨基

## 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人部长

(1900年10月10日)

美因兹和巴黎的代表大会满足了我们对它们所抱的期望。两次大会表明，在激动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上，特别是在今天起决定性作用的海外征服政策问题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巴黎和在美因兹，实质上都再一次提出了同一个引起相当深刻的冲突并且极大地激动人心的问题：在反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态度问题。当然，问题在美因兹出现时的形式，和它在巴黎被提出时的形式不同，那里看问题的着眼点也与这里完全不同。在德国，前几次代表大会已经在原则上承认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是可以容许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实践中贯彻这一原则的最好途径。在法国却相反，社会党人部长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一年以来在实践中已经解决；这一参加是否可以容许的问题却一直没有确定。

国际代表大会决定接受我根据委员会的委托起草的决议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过是在遭到严重反对之后才通过的，而且后来从右面和左面都对决议作出了极其多种多样的解释。

虽然我早已要求发言，但是辩论的结束使我不可能发表意见，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详细地谈一谈这一决议和它的主题。

这并不是为了替我的受到伤害的革命纯洁性挽救名誉。责备我过分“节制”，正象责备我过分激进一样，都不能使我激动。但是一年多以前我对关于米勒兰事件的国际性征询所作的回答可以使我免于受到说我在米勒兰问题上屈服的责备。我当时写道（《小共和国报》1899年9月28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能否参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国家能够作出不同的回答，我不敢以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参加在瑞士和英国是可能的，在德国是不可能的。

但是正因为我不能作出无条件的回答，我也不能断言，阶级斗争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一个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站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社会党人不会愿意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正象一个无神论者不会愿意加入教权派的内阁，或者一个共和党人不会愿意加入波拿巴派的内阁一样。他在这样一个内阁中的活动，长久下去，除了腐化和玷污他自己和他的党以外，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别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例外情况下，为了一定的目的，社会党人不能在不致损害阶级斗争的原则的情况下一度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同一政府中为反对共同敌人合作。这种做法固然

总会是危险的，但是可以设想有这样的使它看起来有道理的情况。

一句话，我不把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问题看成一个原则问题，而是看成一个策略问题。

至于我对于引起这次征询的那一具体事件的想法，我已经在《前进报》上发表过了。”（这是说，我不久以前在《前进报》上坚决表示不赞成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

这是我在去年8月12日写的，那时我刚好完成我那本反对伯恩斯坦的书，并且正以最恶劣的搜索异端行为和最疯狂的教条狂热著称。可以看出，我今天对这一问题的想法同一年以前完全一样。

那时我的回答和今天具有同一的性质；如果说这一回答是含糊的、橡皮性的，那么这不能归咎于回答者的思想，而是要归咎于问题的类型。对于一个策略性问题，只有在它是联系着一定的事例提出来时，才能给以清楚的和确定的回答。凡是需要从原则上回答一个策略性问题的人，始终将面对着这样的抉择：或者把一个只有有限的适用性的回答当作无条件适用的，或者提出一个给解释的技巧留有广泛活动场地的附有条件的回答。

遗憾的是，这两次——在国际性征询时和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问题的提法都犯了这种错误。无论是这一次还是那一次，都不是要求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发表对米勒兰事件的观点。一次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是否绝对地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社会党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另一次又提出夺取政权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

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果这样笼统地表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怎么能知道，我们将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夺取政权！可能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更久，但是也可能比我们可以梦想的更短。我们是否在三年、三十年或九十年以后达到这一地步，有谁敢对此说一些确定的话呢！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这一决定性历史事件中，正象在任何一个决定性历史事件中一样，预料不到的事物将起很大的作用，这一事件将在同今天大不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而我们居然要在今天绞尽脑汁去考虑我们在这些一无所知的、对于每一个国家都将是不同的条件之下打算怎么办！这真可以说是：还没有下蛋就想孵鸡。

夺取政权的问题只有在同米勒兰事件联系起来时，只有在理解成这样的问题时才有意义：米勒兰加入内阁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开始吗？这也是普遍的见解，而决议是与此符合的。但是问题提得不清楚，不精确，因此回答也不可能清楚和精确。

但是问题之所以用这样复杂的形式提出来，是有它的正当的理由的。法国同志在米勒兰事件上彼此不能取得一致，他们打算把它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裁决。但是大会必须在原则上拒绝对个别社会党的内部的策略性争论问题作出决定；它不介入法国人关于米勒兰事件的争执，正如同它不干涉美国人关于工会策略的争执一样。

老的国际就已经避免这种干涉。例如，没有一次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德国同志的斗争中支持和反对过约·巴·冯·施韦泽<sup>①</sup>，没有一次代表大会企图使两派和解。德国的分裂维

持到国际结束以后，要知道国际的精神领袖是一个象马克思这样的威信很高的人，国际是一个严密的、有一个执行机关为首的组织，而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特点还发展得很差。今天我们没有马克思，没有国际总委员会，每一个社会党组织都如此被本国的事件吸引住，以致我们中间只有很少几个人有时间密切地注视外国的事件，正如为了作出国际裁决所必需的那样，而这时居然要国际代表大会决定一个社会党的内部争执问题！

如果尽管这样人们仍旧想作出裁决，那就除了以笼统的措辞表述具体地设想的问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那时人们对于所得到的回答也就不应当奇怪了。

但是对笼统的问题的回答必然不能象我们的大多数法国同志所希望的那么明确，正因如此，把我的决议说成对米勒兰担任部长的批准，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它的意思不是这样，在忠实地解释时也不能把它理解成这样。它仅仅说明，米勒兰加入内阁不是从根本上应加谴责的行为，而必须根据事实来加以审查。

关于这样的审查的结果如何，决议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它的确已经提出了审查时应当考虑的最重要的几点。

我的决议首先尖锐地和毫不含糊地反对米勒兰的信徒所努力主张的见解，即似乎政府权力正象议会、地方参议会等等

---

① 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1833—1875)——德国新闻记者，拉萨尔分子，曾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编者注

一样，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似乎凡是认为集中制国家的政府是一个统一的机构、只能或者全部加以占有或者根本不去占有的人，都是布朗基主义者和盲动主义者。

尽管关于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府的见解如此奇特，它今天在所有那些人中间仍旧找到了人数很多的信徒，这些人认为，进步无论怎样逐渐地进行都不为过分，甚至推翻一届内阁，只要带来了彻底的制度变革，也意味着一次灾变，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这些人如果生活在宗教改革时期，就会希望通过路德教徒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大主教团而取得路德教的胜利。

在集中制国家中，凡是存在着具有明确坚决的纲领的强大政党的地方，政府总是清一色的一党政府。联合政府在和平时期是腐化的结果；它在各政党丧失了自己的伟大的、独立的观点的时候，在它们成为政客的派系的时候出现，这些政客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不是用它来为贯彻一个明确的纲领服务，而只是对国家进行掠夺。

如果社会民主党有一天成熟到加入这种联合内阁的程度，那么这将是它的彻底堕落的一个标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希望它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

此外肯定也有由具有高瞻远瞩的纲领的、力量充沛的政党所组成的联合内阁，但只是在紧急状况之下，为了对来势汹汹的、力量过于强大的内部或外部敌人进行自卫，这一敌人威胁着各有关阶级的生存利益或民族的生存利益。

如果1870年在推翻帝国以后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被吸入法国的民族保卫内阁，恐怕“国际派”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

对此提出反对的；如果今天——这当然是不大可能的——德意志帝国的军队被沙皇的军队打败，并且存在着鞭子政府<sup>①</sup>在欧洲称霸的危险，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定片刻也不会犹豫就把自己的代表派进负有组织人民战争的任务的内阁去，即使他们在这一内阁中必须同自由派和偏左的中央党人合作。

因此如果基本的民主制度受到了威胁，如果用别的方式不能拯救民主制度，那么社会民主党也有权利同任何适当的资产阶级同盟者在一个共同的执行机关中为保卫民主制度而合作。

在研究米勒兰事件时的大问题是，在米勒兰加入内阁时是否存在这样的紧急状态。国际代表大会只能提出这一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也是这样做的。这一问题要由法国同志的代表大会来回答。

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证据表明米勒兰入阁是为了拯救共和国所必需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所需要的是社会党人在议会和人民中对它的支持；即使米勒兰不加入内阁，他们也能够提供这种支持；的确，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那时也许更加容易提供这种支持。

但是紧急状态的存在仅仅是我的决议为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所提出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条件是一个严密的党组织的同意。米勒兰无论如何没有满足这一条件。奥艾尔说，在法国没有米勒兰可以对之提出询问的人。如果情况是这样，

---

<sup>①</sup> 指沙皇俄国。——编者注



那么这对于米勒兰来说还要难，因为只有当他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律师，而是作为战斗无产阶级的代表接受他的职位时，他才能令人满意地任职。人们说到存在着紧急状态。我们否认这一紧急状态。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存在着紧急状态，那么它是要求恰恰米勒兰个人加入内阁，还是不如说要求战斗的无产阶级支持内阁呢？米勒兰的加入内阁，只有在他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受托人而不是作为普通的个人时，才能对拯救共和国有所帮助。

但是法国同志也根本不是处于象在代表大会上看起来那样的混乱之中，他们有自己的各个具有执委会的严密的组织。米勒兰如果打算作为社会主义的代表加入内阁，本来是可以询问这些组织的，是必须询问的。事实上米勒兰既没有询问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五个大组织中的一个，也没有询问由这些组织选出来作为联系环节的社会主义协调委员会，也没有询问议会的社会主义党团。

他尤其必须询问法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即工人党（所谓盖得派）的领导，这个党在上次选举中曾经独力给自己征集了三十万张选票。

米勒兰成为部长时并没有得到法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的同意，而且情况立刻表明，他是在同各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对立的情况下担任部长的。

他死赖在他的职位上，尽管共和国并不需要他参加拯救，尽管他看到他的部长职位极其严重地威胁了刚刚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的他的党的统一，并且把新的钉子打进了刚刚来得及统一起来的组织。

但是对于部长席位上的不服从纪律的党员同志的敌视必然也要成为对于内阁的敌视，于是米勒兰由于把自己的入阁强加于他的一部分党员同志，而得到了这件事本来应当得到的东西的反面：入阁本来是应当通过争取议会中和国内的社会党人支持内阁而拯救共和国的，它却使社会党人分裂，从而削弱了共和国可以用来保卫自己的最强大的力量，并且使一部分社会党人动员起来反对内阁，而这一部分人如果不是因为米勒兰入阁肯定是会保卫内阁的。从盖得派当年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内阁的坚决性看来，这件事是丝毫无可怀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米勒兰通过自己的入阁简直是削弱了社会党人对于内阁的影响，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是如此奇特。凡是在社会党人作为独立的团结的力量对待一个其生存取决于他们的投票的激进派内阁的时候，这一内阁必然对他们有所顾忌，必然对他们作种种让步。米勒兰却做到了使法国社会党人分裂成两派，一派对内阁抱敌对态度，另一派在一度发表意见支持米勒兰以后对他和他的内阁追随不舍，并且愿意与他一同赴汤蹈火。内阁无需害怕这一派别，因为它是内阁的俘虏；但是同样也无需害怕另一派别，因为它的投票由于前一派别而失去了效力。

只有这样看才能说明，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为什么能够纵容自己作出象驱逐意大利社会党议员莫尔加里这样的反对社会党人的丑恶行为，甚至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府，如果多少看重它在工人中间的声望的话，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

米勒兰是作为某种高级工厂视察员和官方发言人而受到

内阁容忍的。法国社会主义对于社会党人部长和通过社会党人部长所起的政治影响等于零。这位部长只不过用为数众多的警察队来欢迎国际代表大会，而在公社斗士墓前献一个简单的花圈时在旁监视的大批骑兵和步兵，在许多外国的党员同志看来，同样也是社会党人部长对政权的夺取的奇特象征。

如果说我的决议为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所提出的条件是米勒兰事件实际并不具备的，那么被我接受的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案就是直接针对米勒兰留在内阁这件事的了。这一修正案宣称，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人在这一内阁一旦表明反对无产阶级的偏私态度时有义务立即退出。即使人们想随同米勒兰的朋友们一道假定，关于夏龙屠杀的案件还没有结束，那么还有仅仅以莫尔加里曾经组织罢工的工人为理由就把他驱逐出境的事。社会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这一可耻的行为承担责任。他必须阻止这一行为，或者如果他被多数票击败的话，就必须辞职。

可见我的决议决不是对于米勒兰入阁的批准。不过它的确不包含任何对米勒兰是否满足了那些条件的直接判断，只有这些条件才使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看起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再说一遍，作出这一判断不是国际代表大会的任务。

可惜我们工人党内的朋友们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要求国际代表大会作出只有一国的代表大会才能作出的决定。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要求，国际代表大会应当把策略性问题转变为原则性问题，它应当颁布不许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

家和任何情况下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无条件禁令，它应当通过宣布这种加入触犯原则而说明米勒兰和一切赞成他担任部长的人已经背叛了我们的原则，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有阶级觉悟的社会党人队伍之外了。

代表大会不想也不能走得这么远。如果它由于处理这一问题而被迫干涉法国的事务，那么它这样做也只是出于和解的意图，出于促成统一的意图，而不是出于任何别的意图。

我也是按照这一意图来理解决议的任务的。如果说指引我的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以外还有实际的考虑，那么这一方面的考虑促使我给予决议以这样的形式，使它能够成为致对的兄弟借以彼此接近以便就分歧点达成协议的黄金桥梁，而不是这一个兄弟可以拿来打倒另一个兄弟的武器。这次表决说明，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的意图。

我们的工人党的同志们本来完全可以投票赞成决议，而丝毫不致有损自己的尊严。就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势来说，决议已经尽可能迁就他们了。由于怕们看不到这一点并且拒绝了决议，由于他们做得太过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多数派的决议获得了它本来不应当有的那种意义，决议的通过被看成米勒兰的一次胜利，对于工人党的国际同情显著地降低，而这种同情在这以前已经由于德雷福斯案件而减少了。

我们对于工人党享有的国际同情的降低感到衷心的遗憾，因为我们远不想象现在屡次出现的情况那样，把它看成一个 *quantité négligeable*<sup>①</sup>。工人党不仅对现代法国工人运动

---

① 拉丁文，意为“无足轻重的事物”。——编者注

有着不朽的功绩，这是它通过值得羡慕的、紧张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才取得的；而且它今天仍旧是法国社会主义的支柱，尽管有个别的策略错误。它就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来说即使不超过、也几乎等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组织。它还在统一和团结方面胜过它们，而现在新成立的、没有它参加的社会主义的联盟是一个从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直到想用总罢工代替政治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者，想通过消费合作社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温顺的唯合作社主义者的大杂烩。工人党在一切决定性问题上是一致的，而新的社会主义的联盟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首先是在米勒兰入阁这一决定性问题上是不一致的。

不幸的是，在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的新的分裂，不仅象任何分裂一样有严重地削弱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危险，而且有促使两派的不同特性发展到极端的危险，在针锋相对地斗争时，分歧的因素比联合的因素被强调得更为厉害，而那些最彰明昭著地代表这些分歧因素的分子最出人头地。

在工人党内，特别强烈地强调我们运动的原则性基础和严格纪律。在相反的方面，适应实际情况的必要性和自由的自我批评被提到了首位。这一方面的因素同另一方面的因素一样，对于我们运动的进行都是必要的。它们不一定要在一个人身上全都具备——它们的和谐的结合造成完美的政治家——但是它们在党内必须均衡地发展。无论是这一方面还是另一方面的因素的过分发展都是有害的。而这是目前的分裂威胁着法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

片面地强调原则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即把原则缩减为空

洞的抽象，把它们从由现实推演出来并且为更深刻地理解现实服务的原则，变成似乎可以用来驾驭现实的公式。严格的纪律如果被夸大了，最后就有压制思考和行动方面的一切独立性的危险。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实际条件的适应，如果不是建立在透彻的理论见识的基础上，如果不懂得区别本质性事物和非本质性事物、持久性事物和暂时性事物，就有成为不坚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无节制地自我批评导致怀疑主义，导致对自己和对运动的怀疑，人们就会仅仅因为需要运动来实行眼前事物才置身运动之列；无节制的宽容为一切混乱制造者和一切野心家大开方便之门。

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断定两派已经具有这些特征。无论在这一方和那一方，群众和站在前列的同志们都没有发展这些特征的意图。但是如果两派长久分开并且互相敌视地行动的话，它们就会被驱向这一最终目的。

可惜不能指望这种运动很快告一结束。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已经表明双方的个人仇恨如何强烈，而后来发生的事件只会使它加强。至少只要主要的争吵根源即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人部长还没有被排除，我们就很难指望两派取得统一，不管我们多么迫切地希望如此。

这一争端本身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最好的解决。固然我们有一切理由假定，无论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还是在法国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性的多数都赞同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所发表的意见。我如果发言也会表示这样的意见：赞成我的决议决不是意味着批准米勒兰担任部长，米勒兰加入内阁是一

个错误，他留在内阁已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不幸。但是，正如已经说明的那样，由于盖得和他的法国朋友们采取拒绝的态度，国际代表大会的表决对于旁观者来说就带上了对米勒兰友好的性质；而法国的全国代表大会又被形式问题吸引住了，以致应当由它而不是由国际代表大会来回答的决定性问题，即对待米勒兰的态度，根本没有提出来讨论。

因此这位社会党人部长又从各社会党方面赢得了一次新的缓刑期，他尽可以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了，如果对于一个社会党人来说，通过瓦解自己的党而维持一个部长席位能够算是胜利的话。

尽管如此，他的部长威风是不会耐得住长久的批评的，因此整个如此吸引我们注意的问题将长期地、也许永久地被埋葬。

乐观的人固然已经预言，这一问题对于其他国家、对于比利时、对于意大利来说不久也会成为迫切的问题。据说那里的联合起来的各人民政党大有在下次选举中取得多数的希望，它们将因此能够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一同组成联合内阁。

如果即将来到的选举真正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我们将大为高兴。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后果肯定决不会是资产阶级和社会党的联合内阁。由于社会党的胜利，那时所有善良的自由派都将提心吊胆，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一个联合内阁，不过是一个自由派—教权派的或者自由派—保守派的联合内阁，而不是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内阁。

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在目前的选举中是屡次出现的，

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曾经造成混合内阁。这种联合是一种形势的产物，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成为值得重视的盟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腐朽，反动势力变得更为强大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它寻找援助并且在社会主义中找到了援助，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有着共同的敌人，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清算它的地步。

可见法国的社会党人部长同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的各人民政党的选举联盟以及英国的这种选举联盟的萌芽一样，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标志，不如说仍旧是反动的力量的标志。

反动分子一旦被打倒，形势在当天就会完全改变。从那一天起，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将是无产阶级，因此从那一天起，自由主义将毫不犹豫地投入反动派的怀抱——这是假定反动派还没有在这以前就把自由主义吞掉，假定一切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在这以前就抛弃自由主义的旗帜。

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标志着一种形势，在其中这两派都处于守势。在向统治的政府进攻时无产阶级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政权的夺取只能由无产阶级独立完成，就是说只有在它已经强大到足以胜利地进行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的时候才能完成。无产阶级将不是依靠一种联合，而是反对一种联合来完成它。

发表于1900年10月10日。译自《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1册第2期第36—44页。



让·饶勒斯

## 两种方法<sup>①</sup>

(1900年11月)

公民们：

你们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愉快，并不在于你们对我们的欢呼，而在于你们听取我们的讲话。社会党组织象今天晚上这样的辩论，这是社会党的光荣，我相信我可以说社会党是唯一对自己的原则的威力有足够的信心，可以象这样在它的积极分子中间组织一个政治辩论的政党。

我们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东西，我们的党是一个在行动上纪律的党，关于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我们随时准备服从组织起来的党的正式决议，但是我们的党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的党，我们经常注意什么才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最好的手段这个问题。

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心平气和地但也是毫无保留地说明我的意见。

### 分歧的起源

盖得同我之间的分歧是从何产生的呢，是在什么时候、是

---

<sup>①</sup> 这是饶勒斯1900年11月16日在利尔的一篇演讲。担任会议上席的是利尔市长德洛里。——编者注

怎样产生的呢？当我说到盖得同我的时候，这当然不是我们之间有可悲的私人争执。我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是更为高尚但是也是更为严重的争论和分歧，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所说的旧的、可恶的竞争，这是策略上和方法上的分歧，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分歧提到党的面前，而党将作出最高的裁决！（欢呼声）

那么，这个分歧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有人说，并且一再说这个分歧是在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的时候产生的，确实，这个事件是加深了、突出了早已存在的方法上的分歧，我待一会儿就会解释我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但是分歧并不是由于这个事件而产生的。这个分歧原来就存在，它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经表现出来。

你们实际上都记得，当时我们的许多战友和我，我们都参加了这场战斗，我们有决心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正在这个时候，在1898年7月我们在法国工人党中的同志们的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警告劳动者和无产者不要过分深入地卷入这一场战斗，要保留他们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

在那以后，在来勒兰参加政府以后的第二天又发表了一个响亮的宣言<sup>①</sup>，这个宣言宣称社会主义者的责任不仅仅是要对付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而且要纠正据宣言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年之前的背离行为。这又是对于我们中间许多人在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1—3页。——编者注

德雷福斯案件中所运用的策略的一次新的谴责。

而最近盖得在万蒂埃大厅发表悼念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时，他又回到这个可怕的问题，他再次宣称，我们参加这一场不适当的战斗是错误的，我们这样做就是为民族主义的利益服务，他说纠正资产阶级社会的错误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总之由于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就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阵地。因此我有权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这个说法，我们在方法上的这个分歧开头并不是在关于米勒兰入阁的问题上产生的，而是由于德雷福斯案件而产生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听众中有人喊道：“盖得万岁！”有人喊：“肃静！”）

德洛里：公民们，我们已经要求你们不要打断讲话，请注意听；这样你们才可以自由判断你们愿意采取什么方法。

饶勒斯：我相信我说的话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准确地概括了反对我们的人针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我就要说明，既然这一场冲突已经震动一切有思想的人，而我们曾认为在这一斗争中必须表明立场，这不仅是为保卫受到迫害的个人；也是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既然关于这场冲突有人说我们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阵地、阶级斗争的阵地，因此我说我们首先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阶级斗争呢？这个经常为人们所引用而又极少得到明确解释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 阶 级 斗 争

公民们，照我看来，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由三个因素、三个概念构成的。首先一个因素也是根本的

因素，就是证实一个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把人们分为两类，把利益分成两大类，这两类人、两类利益必然会强烈地对立起来。在一方面，有那些掌握生产手段的人，他们这样就可以支配其他的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有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必须通过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的生产手段才能运用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们要受这个资本家阶级的摆布。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经常进行斗争，这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雇佣劳动者要提高自己的工资，资本家要压低他们的工资，雇佣劳动者要确保自己的自由，资本家要使他们处于依附地位。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因素。作为阶级斗争基础的实际条件，决定阶级斗争的实际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就是私有制。请你们注意，因为这是涉及到劳动的手段，从而也是涉及到生活的手段的问题，所以这就涉及到人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需要，涉及到人的私生活，涉及到人们日常的生活。因此，由于社会分为占有者与非占有者而产生的冲突并不是表面上的冲突，它是一直贯穿到生活的基础上的冲突。(热烈的鼓掌)

但是，公民们，单单有这种利益上的对抗还不足以产生阶级斗争。如果无产者、劳动者设想不到有可能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如果他们虽然认识到他们所处的依附地位、脆弱的地位，他们却不能预见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如果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永世长存，这种必然性逐渐就会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就会放弃推翻

一个非正义的制度的任务。照他们看来，这样一个任务将是不可能完成的。（有人打断发言）

德里：公民们：请不要打断发言。如果再有人打断发言，我就只好请维持会场秩序的纠察员把打断发言的人赶出去。（掌声，有人继续插话打断发言）

公民们：难道你们不认为对这两位要发言的人更正当的态度就是不要去打断他们的发言吗？如果你们打断饶勒斯的发言，就显得你们认为盖得没有能力回答饶勒斯；如果你们打断盖得的发言，就显得你们认为饶勒斯没有能力回答盖得。

我相信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位同志都有足够的才能，可以向我们解释我们面临的两种理论，用不着别人插话，正象我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插话只会扰乱这场讨论。（鼓掌）

饶勒斯：因此，为了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为了使整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单单有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对抗还是不够的，雇佣劳动者还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法则，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所有制不再是垄断的，不再是个人的、私人的所有制，而是成为社会所有制，以便使一切互相协作的生产者都同时参与对劳动的指导，共享劳动的果实。

因此，利益对立的双方必须意识到它们自己（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已经是正在进行斗争的两种相对立的社会，一个是今天的社会，它铭刻在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证书上面，另一个是明天的社会，它铭刻在无产者的脑海中。

这两种社会在目前社会中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最后，阶级斗争的存在还有第三个条件。如果无产阶级可以期望借助于一个中立的、仲裁的、凌驾于互相冲突的利益之上的权威来得到解放，来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为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它就不会自己起来担负捍卫这个事业的责任。

你们知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承认有两种对立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人民说：“你们不要举行起义，不要组织起来，有一个慈善的、来自天上的权力，教会的权力，用不着你们举行起义，它就会在我们中间实现兄弟友爱的正义。”

好吧，如果劳动者相信这些话，他们就会听任这个来自天上的权力指导，那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如果劳动者可以期望资本家阶级、特权阶级本身由于受到正义的感召而使他们得到解放，那也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

公民们，你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那个时期，社会主义者曾经相信无产阶级的解放将自上而下地实现。

伟大的英国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曾经向在举行维也纳会议的神圣同盟国家发出呼吁。我国的伟大的傅立叶，他每天总是等待在他所指定的一个时刻会有一个慷慨的捐助者为他带来必需的资金，以便创立第一个共同体，他希望这个光芒四射的共同体将逐步传播推广，可以说是扩大组织和和谐的圈子，他希望单有这个共同体的范例，就足以使人获得自由与欢乐。

在那以后，路易·勃朗从另外一个观点设想，只要资产阶

级恢复 1793 年时的一些精神，它就能解放无产者。在他所写的《十年史》一书的结尾，他要求资产阶级充当无产阶级的监护人。

只要无产阶级可以这样期待来自天上的或是资产阶级的监护人，只要它可以期望依靠它自身以外的其他的权力、力量来获得它的解放，那时就不会有阶级斗争。

自从无产阶级从六月的日子<sup>①</sup>中得到了经验，认识到只有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它自己的组织，才有获得拯救的希望，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阶级斗争。

可见阶级斗争的原则首先以社会分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这两大对立的阶级为前提，其次一个前提是无产者要认识到明天的社会和获得集体主义的经验。而当无产阶级得到这样的信念，即认识到它应该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时，阶级斗争的前提就完全具备了。（长时间的鼓掌。欢呼）

### 策 略 问 题

公民们：这就是我对于阶级斗争的看法和我给阶级斗争下的定义。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严重的矛盾。可是我认为，只要你象这样分析、解释阶级斗争，你就不可能运用阶级斗争来预先详细确定每一天的策略和方法。

是的，阶级斗争的原则使你们有责任让无产阶级感觉到它在今天社会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是的，它使你们有责任向

---

<sup>①</sup> 指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起义。——编者注

无产阶级解释集体主义所有制的新制度。是的，它使你们有责任组织工人的工会、政治团体、工人合作社，增加阶级的机构。

但是，单是有阶级斗争的观念，你们还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参加竞选的斗争以及应该在怎样的条件下参加这个斗争；也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或应该关心资产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关心这种斗争。单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原则，你们就不可能说你们是否可以缔结选举中的联盟，或者应该拒绝一切选举中的联盟。

这是一个普遍广泛的原则，它向你们指出一个总的方向，但是你们不可能从这个原则中推论出日常的策略和解决日常问题的办法，就象你们单是知道总的风向还不足以预先确定森林中每棵树将怎样摇动和每片树叶将怎样抖动一样。

同样，你们尽管知道一个将军的整个战役方案也是枉然的，你们不可能由于对这个战役方案有总的了解，就预先确定组成全军的每一个战术单位应该完成的所有个别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冲击或撤退的行动。

因此，根据阶级斗争的原则，我们之间可以就要发动的战斗的总的方向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是当问题涉及到确定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德雷福斯案件中去，当问题涉及到社会党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加国家权力机构的时候，如果只限于引用阶级斗争的一般公式，就不足以解决这种问题。

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都必须研究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所以，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我们也不说这是其他的问题。（长时间的鼓掌）

同样，如果你们按照反对我们的人经常说的那样，把社会



党说成应该永远是一个反对党，那你们也不能认为这样就是运用了阶级斗争的原则。我认为这样一种提法是特别暧昧、特别危险的提法。

是的，社会党是不断地、坚决地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行为、思想、宣传、投票行动都应当以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为日的。但是不能因为社会党是从根本上、实质上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政党就得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对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相继执政的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府作出任何区分：

是的，今天的社会分裂成资本家和无产者两个部分，但是今天的社会同时也受到一切旧时代的势力卷土重来的威胁，受到封建野蛮制度、教会独揽全权的制度卷土重来的威胁，而当共和自由遭到损害，信仰自由遭到威胁，引起旧时代的种族仇恨和残酷的宗教纠纷的古老偏见看来又在复活的时候，社会党的责任，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要同那些不愿意开倒车的资产阶级派别一同前进。（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我确实觉得惊讶，我竟需要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基本的真理，这些真理本来应该是一切社会主义者的财富和准则。马克思自己就写下过这句很好、很明确的话：“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又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乡绅和教士。”（热烈的鼓掌）

有一个公民说：这不是事实！

德洛里：公民们，很遗憾又有人打断发言，我刚才已经说过为什么这是令人遗憾的。

饶勒斯：公民们，我已经认出了刚才很不客气地打断我的

讲话的那位同志，我只想对他说，请你和你的朋友们去查对一下我刚才引证的那句话，如果我引证的话是准确的，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来作为补偿，就是在我们以后的一次会议上，站到台上来公正地证明我没有引错。（欢呼声）

如果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派别和那些至少还愿意保留自由的若干残余或若干萌芽的资产阶级派别之间不作任何区分，那它就不可能不违背它的一切责任、一切传统和一切利益，同样，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者议员说来，也不可能对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加区分。

我用不着再强调这一些，人民根据他们的革命的良知已经对梅利纳<sup>①</sup>政府和布尔茹瓦<sup>②</sup>政府加以区别了，他们对于今天的政府和正在等待机会取而代之的民族主义政府也是区别对待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用举其他的证据，我只需要提到社会党议会党团那次全体一致的投票就行了……

一个公民讽刺地问道：是关于夏龙事件吗？

饶勒斯：请注意，你们以为说这句话就会使我难堪吗？

德洛里：公民们，请允许我向一位老同志、一位创建党的人，也就是说向一位在我们队伍里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人说一句话，他应该比别人更有耐心等待盖得同志的答复。

你们都知道打断发言的后果，我呼吁党的忠实的同志来作证，希望他们注意不要由于首先开始插话而给我们的敌人

---

① 茹尔·梅利纳（Jules Méline 1838—1925）——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96—1898年任法国总理。保护关税主义者。——编者注

② 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 1851—1925）——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1895—1895年任法国总理。国际联盟的主要倡议人之一。——编者注

有可乘之机，使他们可以继续扰乱我们的会议。(鼓掌)

### 德雷福斯案件

饶勒斯：公民们，为了把我的想法说透彻，我还要补充一点：有的时候，无产阶级阻止资产阶级自身在精神上和道德上过分急剧地蜕化堕落，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当不同的资产阶级派别围绕一件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展开你们所知道的一场斗争的时候，当资产阶级中极少数的人，面对着一切肆无忌惮的谎言，企图伸张正义并且传播真理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责任是不要保持中立，而要站到真理受到摧残、人道在发出呼唤的一方面。

盖得曾经在万蒂埃大厅说过：“让那些崇拜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去纠正那个社会的错误吧！让那些赞赏资本主义太阳的人努力去抹掉那里的黑斑吧！”

好吧，请允许我对他说，只要是对于一个人犯下了一件罪行，即使是资产阶级所犯下的罪行，但是只要是无产阶级通过进行干预本来能够阻止这个罪行，那么要对此负责的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要负责，由于它没有阻止正待动手的刽子手，它也就成为刽子手的帮凶，于是，这个黑斑就不再是遮盖、玷污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太阳的黑斑，这会是玷污正在上升的社会主义太阳的黑斑。我们可不愿意无产阶级的黎明蒙受这个耻辱的玷污。(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个大悲剧开始时，给我鼓励和督促最多、促使我参加这场战斗的，正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欧洲和法国的社会党都应该了解这个事实。

同志们：你们必须了解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到上届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面前的。

当这个问题初次提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确定我们应该对此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社会党议会党团内大致分为两派：

一方面是当时被称为议会党团内的温和派的人，请允许我也这样称呼他们。这就是米勒兰、维维安尼<sup>①</sup>、茹尔德<sup>②</sup>、拉维<sup>③</sup>这些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介入。”

另一方面是那些当时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党团中的革命左派的人。这就是盖得、瓦扬和我，我们说：“不，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战斗！”

啊，我还能记得起左拉的信件发表的时候盖得的令人赞叹的语调。我们社会主义党团中的温和派的同志说：“但是，左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怎么说左拉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难道要社会党盲目地跟着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跑吗？”

而盖得当时听到这些话就象感到要窒息似的，他起身把我们会议室的窗户打开，一边说：“左拉的信是本世纪最伟大

---

① 勒奈·维维安尼 (René Viviani 1863—1925)——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属于“独立社会党人”集团，米勒兰的拥护者，后脱离社会党；曾屡任部长。——编者注

② 安都昂·茹尔德 (Antoine Jourde 1848—1923)——法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法国工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后脱离工人党，拥护米勒兰入阁。——编者注

③ 艾梅·拉维 (Aimé Lavy 1850—1921)——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主义者，著有《米勒兰的业绩》一书。——编者注

的革命行为！”(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后，我由于受到这番话的鼓舞，也由于我自己的信念，在左拉受审的时候出庭作证，在那一大群上校、将军面前(人们当时已开始怀疑他们的罪行，不过还没有对这些罪行进行深入的追查)作证、揭发，以后又回到众议院的时候，盖得对我说了这些我将终生不会忘记的话：“饶勒斯，我爱你，因为你的行动永远同你的思想是一致的。”(长时间的轰动)

当那些总参谋部的生番们继续对一个被制服的人大逞淫威时，盖得对我说：“将来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于堕落到这种地步、腐化到这种地步的人类该怎样办呢？”他十分忧郁地说：“我们将会来得太晚，当轮到我们来建设我们的大厦时，人的材料都已经腐朽了。”

那么，在说了这些话、发表了这些声明以后的几个月，党的全国委员会在7月间为什么又试图要让无产阶级撤出这场战斗呢？

我曾多次对自己试图解释这个原因，也许是革命派觉得我们在这场战斗中耽搁的时间太多了，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精力和人民的精力吧？

但是，请允许我对他们说：如果在这一场反对一切谎言、一切压迫势力的战斗中，我们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又如何能发动人们的革命劲头呢？

至于我，我愿意继续下去，坚持下去直到那个狠毒的野兽被迫吐出它的毒液时为止。(欢呼声)是的，必须追究一切伪造证件的人、一切撒谎的人、一切屠夫、一切叛徒；必须用真理之剑的锋芒逼迫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他们

罪行的可耻。(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

请注意，就是在7月间发表了通知我们必须放弃这场战斗的宣言以后几个星期，我们由于坚持了这个战斗，就迫使昂利上校供认了他的伪造文件的行为<sup>①</sup>。

我们没有听从别人向我们发出的撤退的信号，我们代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代表革命，对于揭发军人集团犯下的反对人类的最大罪行之一作出了贡献，请允许我为此感到庆幸。(鼓掌)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当这些罪行暴露出来以后，当你们学会认识到军国主义的一切耻辱、一切谎言、一切阴谋诡计以后，军国主义在人们思想中的威望就会不断下降。应当了解，军国主义之所以危险，不仅仅因为它是资本的武装捍卫者，而且因为它以一种虚假的伟大形象、以一种虚伪的忠诚和牺牲精神来迷惑人民。

当人们认识到，这个粉饰得如此光彩夺目的偶像，为了满足它的可怕的欲望，要求牺牲整代整代的人，当人们认识到，这个偶像是腐朽的，它的内容就是耻辱、叛国、阴谋和谎言的时候，军国主义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而社会革命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热烈的鼓掌)

有一个公民说：加利费万岁！

饶勒斯：我说，无产阶级这样一来就加倍履行了它对自身的责任。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无产阶级履行了它对自己、对文明

---

<sup>①</sup> 1898年8月30日，法国总参谋部情报处处长昂利上校供认，证明德雷福斯叛国罪行的主要证据是假伪造的。——编者注

和对人道的义务，因为无产阶级充分展开了阶级行动，以至和路易·勃朗所说的相反，不是资产阶级充当了它的监护人，反而是它在这次危机中成了资产阶级自由的监护人，而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保卫这个自由；因为无产阶级在这一伟大社会悲剧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才可能有一个社会党人直接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

### 米勒兰问题

不管你们对于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有怎样的看法，不管你们对以这种方式开始实行的策略和它产生的结果有怎样的看法，你们大家都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总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

你们还记得，一年以前拉法格公民自己也这样说过。他从一开始起就反对米勒兰参加内阁，然而他宣称这是我党力量增长的决定性的象征。

我记得，在几个星期以前，在国际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们，不理睬茨宾总监手下的警察们的笨拙的示威，前往巴黎公社社员墙献花圈，代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极左翼、在德国代表中唯一投票反对考茨基的妥协性提案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辛格尔<sup>①</sup>公民当时曾说道：“我们不能同意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但是我不能不说，

---

<sup>①</sup> 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 1844—1911)——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884—1911年为国会议员，从1890年起同倍倍尔一起担任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编者注

三十年前资产阶级曾在这里枪杀无产者，然而社会党现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所以到了危急关头，资产阶级为了挽救基本的自由，也不得不拉一个社会主义者入阁。”

因此，我们之间关于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怀疑。不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当着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面一致宣称，这证明我党的力量增长了。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是否正确，是否明智，是否合乎原则？

公民们，照我看来，现在是到了应该冷静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总是在激烈的争辩中讨论这个问题，至于我——请原谅我再次回忆一下往事——如果我回顾一年以前 12 月的代表大会和最近 9 月底的代表大会，我就想起我肯定听到过这些论据，但是我也听到过各种的叫嚷：“加利费！夏龙！马提尼克！”

我以为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讨论方式了，因为有人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们，其实这种方式也可能伤害你们的朋友，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对我嚷道：“加利费！”意思是说我们由于赞同米勒兰入阁，从而可以说就是对加利费过去的一切行为负责，或者负连带责任。

请你注意，刚才那位用无声的手势打断我的发言的同志，我感谢你提醒了我而没有扰乱会场的秩序，请你注意。

你们利尔市的劳动者，在米勒兰入阁以后两个月，你们也曾在这里欢迎过他，你们也曾在这里向他祝贺，向他欢呼，我想，尽管他那时已经成为加利费的同事，你们不愿意同时向加利费本人欢呼。所以，你们还是不要搬起石头来打我们，以免



打了你们自己的脚吧。(赞许声。欢呼声)

现在，我想就马提尼克和夏龙的可悲事件说几句，但是请允许我提醒那些任意动肝火，甚至于把这些事件归咎于我们的同志，他们很奇怪地把事情弄得混乱不堪了。

当我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支持一个政府、哪怕是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政府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那样的天真，会期待这个政府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完全主持正义，完全尊重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不公平的世界，只有脱离了资本主义才能脱离不公平的世界。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在敌人中有更加残暴、更加凶恶、更加野蛮的敌人，当我们支持一个政府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赞成这个政府，我们是反对其他更坏的、想取而代之以便损害你们的政府。

有人由于我们所支持的人的过失、错误和罪行而责备我们，这是极端不公平的，我们所以支持他们，只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罪行。(热烈鼓掌)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当马提尼克岛法国人的屠杀事件刚传到欧洲时，当我们的朋友接到头一批信件，政府收到最初的报告时，在巴黎开会的安的列斯群岛社会主义小组就向政府提出了交涉。

它要求政府三件事，要求调走以最粗暴的方式判处罢工者徒刑的行政长官，要求对行凶的军官卡恩予以申斥并给予最严厉的纪律处分。

有人说：应该枪毙他！

饶勒斯：最后它要求立刻释放一切由于罢工而被判刑的黑人无产者。

那个军官已经受到处分，法官们已经被调定，已经用电报发出命令，释放一切被判刑的罢工工人。（欢呼声）

至于法国的罢工，我只想谈一件事，政府采取了一种策略，就是不解除市政机构对于警察的指挥权。不论如何，如果无产阶级将来能一直迫使政府这样做，这对于无产阶级还可能会有好处。

你们知道，象梯叶里这样的马赛资本家已经抱怨政府没有从马赛的社会主义者市长、我们的朋友弗莱西埃手上夺走对警察的指挥权。

在夏龙，市政府禁止游行的罪行就是引起骚动和产生凶杀事件的原因。

不管怎样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警察是归由无产阶级选举出来的、生活在无产者中间的市政府掌握，无产者就会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必须坚持要求警察归市政府掌握。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如果由于我们支持瓦尔德克-卢梭政府，反对民族主义和反动势力，你们就有权控告我们在马提尼克和夏龙事件中犯了什么同谋的罪行，那么你们对于你们的朋友们又将怎么说呢？

请允许我毫不拘束地说几句，你们在这个讲台上集合了法国工人党的市长们。好吧，请问你们，如果马提尼克和夏龙事件就是政府政策的特征，如果这些罪行就是政府政策的真正表现和特征，那么那些由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包括你们的市长们在内，已经同意去同那些杀人的执政者参加同一个宴

会——而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你们对于那些市长们又将怎样看呢？

利尔市的市长，德洛里公民，富尔米市——就是那个遭到屠杀的城市——的市长，所有由选举产生的市长，所有担负市政责任的人，他们都将同瓦尔德克-卢梭一同参加宴会。而当众议院复会，议会开会，有人对总政策提出质询，不仅仅是涉及到夏龙和马提尼克事件的问题，而且涉及到被可耻地驱逐出境的西皮多，涉及到被赶走的莫尔加里，当涉及到这一切问题时，当时客观事物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是不要听任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反动势力摆布，因此你们的全体议员，包括在座的泽瓦埃斯<sup>①</sup>，包括瓦扬，所有的议员都对政府投了信任票。

请你们当心，如果你们要谈起夏龙和马提尼克事件，你们所打击的就不是我一个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

所以我们是超越这些个人之间的论战，超越这些兄弟自相残害的斗争的，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认识原则问题。

我敢对你们说，也许我的自信是过于狂妄了，不过我相信我的话是会被未来年代的事实所否定的，我敢对你们说，三十年来，每当社会党尝试一种新的行动形式，每当社会党放弃它初期的、被称为革命态度的那种置身局外的态度，采取行动来干预各种事件时，总是会有一些不妥协派对于社会党提出责难，就象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今天对于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

---

① 亚历山大·泽瓦埃斯 (Alexandre Zévaès 1873—1953) —— 1893—1902年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189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02年脱离了法国工人党。——编者注

个资产阶级内阁提出责难一样。

## 策 略

公民们，三十年来，社会党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参与了许多事件、许多机构，而在开始时它对这些事件和机构都是不介入的。我们今天进行的讨论就是为了要了解社会党是否应该参与议会的行动。

可是，同志们，你们可不要以为过去的情况一直都是这样的。在社会党三十年的历史中，有一个时候，凡是建议社会主义者进入议会的人都会象我们今天这样遭到激烈的反对和严厉的谴责。

我请你们听一听全体社会主义者所哀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公民威廉·李卜克内西同志在1869年所写的话。

在1869年，为选举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而建立的普选制已经在德国实行了两年，李卜克内西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探讨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所能够做、应该做的工作。

他不但不允许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过问改良的行动，而且认为议会的讲坛也是没有用处的，即使为发表纯宣传性的演说也是这样。他写道：

“我们的演说不能直接影响立法；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演说来改造议会，凡是我们通过演说能在群众中传播的真理，我们都可能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来传播。

那么，在议会中发表的演说又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一点都没有。没有目的地说话，这是傻子们的消遣。

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且还有坏处。这是牺牲原则，降低政治斗争的水平，把它变成议会中的争吵；使人民相信俾斯麦的议会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愚蠢的行为或是叛卖的行为。”<sup>①</sup>

这就是1869年时社会主义民主派对于我们的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对他们的宣传活动的看法。我想你们已经看出，这是就一个不同的问题提出的同样的谴责，人们就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一个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对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谴责。

但几年以后，由于客观事物的不可抗拒的运动，李卜克内西不但是帝国议会中的一名战士，而且还进入了萨克森邦议会，在进入这个议会时必须宣誓效忠于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宪法，誓词是：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会场内发出喝倒采声）

德洛里：公民们，那些由于需要插话而打断别人发言的人使自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了，因为饶勒斯不过是引证了一句话而已。（笑声）

饶勒斯：公民们，你们瞧，我们之间的偏见可能会引起多么奇怪的误会啊！我刚才对你们说过，凡是进入邦议会的人都得宣誓效忠于萨克森国王；我提醒你们，我告诉你们李卜克内西为了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所作的宣誓的誓词，可是有些过于性急的同志居然不惜指责我是教权主义。（笑声）

---

<sup>①</sup> 参见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1964年三联书店版第13—14页。

——编者注

请你们记住，这些话都是李卜克内西说的：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要毫不动摇地忠实于宪法，我要凭我的良心，以我的建议和投票为君主与祖国互不可分的利益服务。愿上帝帮助我。”

同志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单纯的人、毫不妥协的人对社会民主党控诉李卜克内西，认为他不应该为了在邦议会里取得一个议席而作这样的宣誓。而李卜克内西这位杰出的革命者当时很正确地回答他们说：“宣誓又怎么样呢？如果统治者只要用一纸誓词就足以阻塞我们的道路，那我们就只好永远受他们愚弄。”

试问，如果一个社会党人部长接受了所谓的内阁礼仪，即在表决时和他的内阁同事表面上的连带责任的礼仪，有人认为接受这种礼仪是犯罪行为，试问，这种礼仪为法国社会党带来的侮辱是不是就比在上帝面前宣誓效忠国王给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者带来的侮辱更为严重呢？

试问，如果我们面临这种纸上的障碍，面临这种礼仪和繁文缛节，我们是否会停步不前呢？如果为了我们的事业，有必要使我们中间的一个打进资产阶级政府的堡垒，那么，我们是否会犹豫不决呢？（“不会！不会！”欢呼声）

但是，这还不算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可是，我忘记时间了……公民们，我很抱歉我讲得太长了。（“讲下去吧！讲下去吧！”）

我很快就让盖得来演说。

德洛里：再过一刻钟，你就该结束发言了。

同志们，我们要求你们耐心一点。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

问题，值得我们牺牲几分钟时间。饶勒斯同志将尽可能简短地概括一下，以便使盖得可以答复。（欢呼声）

饶勒斯：我刚才说，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也遇到了一个同样困难的问题。

在普鲁士，还没有实行普选制，那里有三个等级的选民。那是一种道地的根据财产决定选民资格的制度，采取的选举办法使社会主义者绝对无法单独竞选进入普鲁士的选举产生的议院，他们只有同资产阶级政党缔结联盟，或是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妥协，才能被选进议会。

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科伦代表大会上，根据倍倍尔的报告，通过了下面的宣言：

“鉴于同敌对的政党达成妥协是违背我党迄今所遵循的原则的，因为这种妥协必然会使我党涣散，导致党内的争论与分裂，因此，代表大会声明：

我党在普鲁士的党员的义务是，在现行制度下完全不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认识到，由于他们完全不参加选举活动，他们就是听任反动的政党去击溃自由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的权利、结社的权利，联合的权利都受到威胁。

1898年在汉堡，1899年在斯图加特<sup>①</sup>，他们开始允许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参加普鲁士的邦议会选举。

最后，这样做还是不够，于是倍倍尔，也就是在1893年曾

---

<sup>①</sup> 饶勒斯弄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7年在汉堡，1898年在斯图加特举行代表大会。——编者注

要求社会党禁止所有党员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那个倍倍尔，也认识到所犯的错误的、策略上的过错，他在1900年就要求美因兹代表大会作出明确决定。

在美因兹代表大会上，即宣布禁止社会党人参加选举以后的七年，德国社会党就指示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参加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

然而，德国社会党在1893年却曾经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以党的策略的名义禁止德国社会党人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以后，他们看到，阶级斗争迫使无产阶级保卫它的基本自由，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起来，他们过去表示“反对”的，现在表示“赞同”，而且还发出了指示。你们是不是会谴责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背叛呢？（热烈鼓掌）

至于我，我现在不可能向你们说明我的全部理由，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将来总有一天统一的、组织起来的社会党也会指示它的一个或几个党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以便监督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尽最大可能反抗反动势力的诱惑，尽可能参加改良的工作。

## 统 一

公民们，朋友们，如果我就这样草草结束我的不完备的发言，以便让盖得接下去发表讲话，那我就是滥用了你们的好意，我就会感到很为不安，在结束之前我必须说明，不管在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分歧、困难和暂时的争论，我们总是会重新会合在一起的。

当党将来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将回来，不再是为了互相



进行斗争和争论，而是作为忠诚的同志，在一起探讨为我党利益服务的最好的方式。有人对我党说：“要继续保持孤立，站在一边，不要参与政府的活动，尽可能离资产阶级的国家远一点。”

可是我却要对你们说，一切伟大的革命所以能在世界上完成，都是因为新的社会在它蓬勃开展以前，就已经通过一切的裂缝，通过一切最细小的根茎，渗入到旧社会的土壤中去

了。

有一天考茨基带有一些讽刺的意思对我们说：“难道你们以为可以通过争到一个一个的部长席位而夺取国家政府的权力吗？这就象新教徒在宗教改革时期设想可以通过在红衣主教团中争取一个一个红衣主教的办法来征服世界一样。”

我请考茨基原谅我这样说：在十二世纪、十三世纪时各种异教、独立的宗教信仰的大暴动之所以有力量，以后宗教改革之所以有很大的力量，正是因为它夺取了旧的教会的一部分权力；这是因为在十六世纪时，有一段时期，宗教信仰者们都不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的红衣主教、主教或修道士是跟教皇站在一起还是站在路德一边。

天主教会很清楚地感到，很清楚地了解到这种渗透方式对它的威胁，所以在组成耶稣会来保卫教会的时候，耶稣会规定的口号就是，要到处渗透，本身却不允许任何方面渗透进来。

天主教会保存了好多世纪，它对于新社会的行动一概拒之于门外。但是天主教会能够做到的事，资产阶级民主制却做不到。它不能把自己关闭起来，它已经让你们渗入到市政机构中去了。

有人谈到一个社会党人部长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内所承担的责任，可是难道你们那些当选市政领导人员的人就不承担责任吗？

难道他们就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个部分吗？但是任命他们的普选制还是要由资产阶级的法律来规定，受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制。

如果我想驳倒你们的某些朋友的毫不妥协的观点，我可以提醒你们，你们是通过普选制才取得市政权力的，而资产阶级的法律由于把接受救济的人和没有固定住处的工人排除在普选制以外，就是把最贫穷的无产者排除在外了；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市长，尽管他是社会主义者，也可以被中央政府解除职务，而且在一年以内他不能再度当选；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因为他是市长，他必然要同意实施、执行大量的资产阶级法律；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如果在你们的街道上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也不得不使用治安部队，否则别人就会说社会主义就是抢劫与凶杀。

你们看吧，在马赛，这些时候社会主义的市长所负担的责任是多么沉重啊！当他在克吕格尔<sup>①</sup>到达马赛时亲自到场照料，当他保护英国人避免遭到可能发生的群众暴行的时候，他就不再是马赛的社会主义市长，他对安全、对全法国的声誉负责。

如果不需要承担这些责任，那么在群众面前当社会主义

---

<sup>①</sup> 保卢斯·克吕格尔(Paulus Krüger 1825—1904)——南非反英战争的领导人，他曾到欧洲活动。——编者注

市长就太方便了。但是他必须承担这些责任，因为他的任务是重大的，因为他同时既是正在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部分。

所以，光有一个机构还不足以使社会主义的市政府行动起来，必须要有有头脑的人，谨慎的人，能思考、镇定而意志坚强的人，象弗莱西埃、德洛里这样的人。（长时间的欢呼声。高呼：“德洛里万岁！”）

是的，随着社会党的权力的增加，它的责任也增加了。

但是我们不怕承担这个责任，社会党不怕承担这个责任；它对工人阶级有信心，条件是工人阶级必须是有组织的、统一的阶级。面对所有其他一切混乱的、互不协调的政党，工人阶级必须只组成一个政党，就象它只组成一个阶级一样。

是的，在我们之间将来会有方法上、策略上的分歧，也许还会是长期的分歧。但是，在比利时、在德国也有这种分歧；这并不妨碍他们统一起来，进行同志之间的真诚的讨论。

我们也愿意象这样继续讨论，我们希望通过智慧、理性和组织公开地准备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统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团结；而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要进行改良的工作，并且在改良中开始革命的工作，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温和派，我和你们一样，是一个革命者！

发表于1900年10月。译自《两种方法》1945年巴黎法文版第3—24页。

茹·盖得

## 两种方法<sup>①</sup>

(1900年11月)

男女公民们：

同志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饶勒斯很好地把问题提了出来，这个问题正是你们今晚来开会想要解决的唯一问题。饶勒斯超出一个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争论范围，一直追溯到德雷福斯案件，这就从历史角度说出了我们的分歧的真相。

是的，这正是分歧的起源、开端和根子，而分歧本身从那以后不断地加剧和扩大了。

### 阶 级 斗 争

饶勒斯在开始他的演说时首先向你们提供了一切判断所必需的基础，他提醒你们，现今社会是分裂为必然互相对抗、彼此斗争的各个阶级的，他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正确地指出，你们只有站在社会主义这个立场上才能在他和我们之间作出抉择。

---

① 这是盖得1900年11月16日在利尔的一次会议上对饶勒斯演讲（见本书第86—112页）的答辞。——编者注

不过，据我看来，饶勒斯在谈到阶级斗争时太不谨慎了。他把阶级斗争称为一种原则，而我称它为一种事实。瞧！他给你们下了一个多好的定义。他向你们证明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在所有工场里都很猛烈，证明当它进入政治领域并且有计划地进行后，是消灭阶级、解放劳动、解放社会的必要手段，然后一转，却又对你们说：“我们刚才明确承认过的并在理论上加以说明了的阶级斗争，我们就要抛弃它了，因为它无法规定我们每天的行为、政策、策略”。他把阶级斗争和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天堂相提并论，而这个天堂如此遥远，不着边际，不影响日常生活，不指导现今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意志和行为，它只归结为一种空虚的简单的信仰。

如果饶勒斯下了很好的定义的阶级斗争不应当决定你们每天的行为、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策略，那它就是谎言和欺骗。对我们来说，恰恰相反，阶级斗争是而且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行为的准则。（连声热烈喝采）

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是为了在承认它、宣布它之后又抛弃它。阶级斗争是我们的唯一立足点，是工人党赖以组织起来的基础，是我们应当坚持用来考察一切事情并加以分类的依据。

### 最初的分歧

有人对我们说：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但是当统治阶级的某一成员受到不公正的判决时，阶级斗争并不禁止无产阶级忘掉自己每日每时遭遇的不平，忘掉每日每时他们的家庭、妻儿

老小遭到的残暴对待，相反，它要求无产阶级忘掉这些，它使这一点成为工人的义务和法律。

他们必须忘掉这一切；仅仅落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无名的屈辱、无名的不平，不算什么。但是只要有某个参谋部上尉或某个资产阶级领导人受到本阶级司法的迫害，无产阶级就必须抛弃一切，争先恐后出来打抱不平。

我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我认为这样理解的阶级斗争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啊！饶勒斯还援引了自己的回忆呢，他跟你们谈到了1893—1898年那一届众议院任期终了的时候社会主义党团中发生的事情。那时，德雷福斯案件刚开始，可以说还处在萌芽阶段。饶勒斯对你们说，当时有温和派（他不属于这一派），还有极左派即激进派（他自己是这一派），他说，这时盖得自己催促社会主义党团介入这一件不带个人或私人色彩的案件。

正如饶勒斯所说的，那时我反对温和派的态度。你们猜猜他们是怎样说的？饶勒斯本来应当在这个讲台上讲讲。温和派之所以不希望我们卷入这件事，是因为，他们说，我们正面临大选，那样一来可能会影响我们重新当选。他们还说：“啊！要是再过一两年才举行普选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研究这个问题，再根据党的利益和任务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介入。”

我的抗议正是针对这种竞选的卑鄙行为和这些只知道谋取议员席位的人的。（热烈鼓掌）我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因为我走得更远。我说，如果无产阶级利用普选的目的只是为了重新当选或保住议席，那还不如抛弃议会方法，只限于从事纯

粹的革命活动。

我讲得对吗，饶勒斯？我当初是这么讲的吧？（连声喝采，骚动）

同志们，请允许我讲得再具体点。当时饶勒斯和我是一致的。……

饶勒斯：很好，说得很对。

### 我们的态度

盖得：同志们，可是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否要把无产阶级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呢？难道要把一个人的无罪或有罪这样的画谜提到工人阶级面前吗？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案子是一个真正的画谜，而且始终是一个画谜。一些人宣誓为这个人的话作证，另一些人宣誓为另一个人的话作证。你们永远也无法弄清这一堆矛盾和混乱并形成自己的看法。问题不在于断定、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当无产阶级需要拯救本阶级，拯救整个人类的时候，当然更不能强求无产阶级去拯救一个人！（长时间鼓掌）

在左拉的诉讼案问题上，我们目睹了总参谋长和一批高级军官演出的令人难忘的丑剧。他们在本国的法庭上以武力或辞职相威胁，左右裁判结果。他们说：“如果法庭拒不同意我们所要求的判决，我们就要立即离开我们的岗位，丢下、放弃我们负责的国防不替。”

我对饶勒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共和国，即使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屈服于高级军官的这种最后通牒，那这个共和国就没救了。我还说：“我们应当在议会发表意见，应当立

即要求逮捕布瓦代弗尔<sup>①</sup>及其追随者，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塞纳省大陪审团面前的反叛行为。”

我说的这些也没错吧，饶勒斯公民？（热烈鼓掌）

我就这么变成了德雷福斯派，也就是说，我反对肆无忌惮的、以至在与之狼狈为奸的政府掩护下拿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来进行威胁的军国主义，在这一斗争的限度内，我才是德雷福斯派。一直到大选，我们都持这种态度。竞选期间，有人在鲁贝市的墙上告发我被收买了，被出卖给了德雷福斯。如果鲁贝市的同志们来了的话，他们可以证明。难道我反驳过这种控告吗？（没有！没有！）难道我曾经有片刻考虑过这会使我失去一些选票并可能使对手成功吗？没有，同志们，和以往一样，我根本没有担心我的行为可能给我个人带来的后果，而我的—切行为都受我所代表的并唯独想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引导、决定和支配，因为谁也不会忘记在鲁贝的墙上张贴着的话：“老板们不要投我的票，资本家们不要投我的票，我不想也不会同时代表互相斗争的两个阶级。我只想也只能作为其中一个阶级的人去反对另一个阶级。”

这就是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你们给了我而我也履行了的委托。（热烈鼓掌和喝采）

---

① 拉乌尔·弗朗索瓦·沙尔·布瓦代弗尔(Raoul-François Charles Boisdeffre 1839—1919)——法国将军，1894年起任法国总参谋长，1898年在昂利上校揭发反动军事当局在德雷福斯案件中伪造文件的罪行后被迫辞职。——编者注



## 德雷福斯和社会党

但是选举一结束，情况就完全变了。这一回，我们面临的不是约束军国主义的问题，也不是揪住那些反叛的将军和上校们的衣领的问题，而是使无产阶级完全卷进一场个人斗争中的问题。

有人讲，而且在演说中和文章中不只是讲了一次，而是一百次，不只是一百次，而是一千次：有一个特别的受害者，他有权让人专门为了拯救他个人而发起一次运动。这个受害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参谋部的一个上尉，他非常年轻，有他的家族从被剥削的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巨额财富可以依仗，他本来可以作一个有用的人，可以用他靠那几百万财产得来的学识为人类利益服务，他却选择了军事生涯。他说：“我要用我受的教育，所获得的大量知识绞杀我的同类。”这是个多么有趣的受害者呀。（热烈鼓掌）

我很理解你们这些工人、你们这些农民，人们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把你们从工场、田间拉走，给你们套上军装，让你们扛起枪，当你们受到可怕的军事司法的迫害时，你们确实有权利和义务向我们，向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呼吁，因为你们是被迫进兵营的，因为你们从未赞成过你们所屈从的条例、组织及所谓的军事司法。而他呢，当他选择军人的职业时，他很清楚自己眼前摆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是自愿走上这条道路的，他是军事法庭的拥护者，他深信，军事法庭只打击无产阶级，并且将由他，一个指挥官、军官来运用盲目的、秘密的军事司法对付无产者。某些人企图动员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全部

力量来拯救的就是这么个受害者……

同志们，刚才提了些往事……（鼓掌）请不要鼓掌，让我把话讲完，不要用你们的喝采使我太吃力。既然提起了个人的回忆，那就让我再作一下补充吧。

饶勒斯对你们所说的不是一个宣言，而是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声明。

在这之前，社会主义者还曾召开过一次协商会议。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你们。米勒兰和维维安尼曾组织过一次饶勒斯和我们之间的会晤。饶勒斯不仅想介入这次德雷福斯案件，还想把全党都卷进去，而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反。

我们在巴黎郊外维维安尼的别墅开了一夜的会，瓦扬没有能出席，他向饶勒斯提出了书面意见……我在这里再次请饶勒斯回忆一下……

饶勒斯：我不否认瓦扬有一封信，但我的确没收到过。

盖得：那好吧，我们把瓦扬写信给饶勒斯这件事先搁在一边。我说过，在全国委员会声明发表之前的那天晚上开了一个会，会上米勒兰、维维安尼（他们同我和瓦扬一样，不赞成把社会党牵扯到德雷福斯案件中去）都同意我对你说的话：“公民饶勒斯，你不能把党卷进去，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你当时向我们保证只以个人名义参加运动。（喝采）

饶勒斯：我一直就是这么讲的。

盖得：饶勒斯承认我讲的情况完全属实。我讲这些事情，仅仅是为了弄清责任。他刚才对你们说到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声明时认为，这一声明把可以说已经投入战斗的我们的人撤出了，这是在整个战场上的变节和叛变行为，他却忘记告诉

你们，凡被征求过意见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和组织全都告诫过他，不要把社会党跟他一起牵扯进去。

所以，我们发表声明，只是坚持了我们一直主张的决议，表达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的一致意见。

啊！我本来还可以再多谈些这样的个人方面的细节，不过我以为我所讲的已经足够了，就不再多说了，我再回过来谈我们的阶级立场。我认为我们不能承诺，一旦资产阶级的某个成员遭遇不平，他们就有权要求无产阶级停止作为无产阶级，停止自己的斗争，而去盲目地追随一些最损害名誉而又最声名狼藉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无法忘记，领导这场为个人鸣冤叫屈的运动的主要人物曾经提出过一项对一个阶级极不公平的法案。他因为军事法庭对一个无辜的人的审判而起来反抗，却不怕未经审判就危害全体铁路职工，因为他想通过剥夺罢工权来剥夺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这个所谓追求真理的人，主持正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铁路的奴隶需要忘掉这些人策划的反对他们的阶级的罪行，才可能和特拉利厄先生、伊夫·居约先生以及那些进行剥削或美化对劳动者的剥削的资产阶级精华人物共事；（笑声和鼓掌声）要是能做到这样，那就需要并且也就可能，在坚持阶级斗争的同时，把无产阶级拴在监禁工人并曾于1871年枪杀工人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上。

办不到！同志们，在这一关头，工人党大喝一声：“住手！”党号召工人们回到自己的阶级使命上；但是它没有建议工人采取漠不关心或弃权的态度。声明中讲得一清二楚：要准备回过头来对付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付军事方面的巴拿马丑闻和金融方面的巴拿马丑闻。我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所

看到的实际上是，这个制度本身蒙受了奇耻大辱，遭到了沉重打击。这正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武器，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这个武器打击整个资产阶级，而不是动员无产阶级跟在资产阶级的一派后面去反对另一派并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

您刚才提到了卓越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他对德雷福斯案件也表示过态度，他和我们工人党一样，不赞成你的运动。

他给你写道：“我不赞成，我也不能赞成，因为您帮了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忙。”

说得太对了，同志们，德雷福斯案件结束时，军事法庭没有取消，军事司法丝毫没有改变，许诺给你们的事没有一项兑现，只有一个人摆脱了魔鬼岛<sup>①</sup>的悬崖峭壁。个人的行动只落得了个人的后果。（不同的反响）

## 资 产 阶 级 化

噢！不对，的确有某个东西产生了，这个东西正是饶勒斯本人有勇气承认的。他对你们说：从德雷福斯案件，从我和某些社会主义者一起为德雷福斯发动的运动中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合作。这是事实，公民饶勒斯，撇开别的不谈，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谴责您所吹嘘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合作了。

的确，只有作了这样严重的歪曲，只有一部分无产阶级放弃他们的阶级立场，才能在一定的时候把一个社会主义者进

---

① 魔鬼岛 (l'île du Diable)，位于法属圭亚那附近的小岛，德雷福斯曾被囚禁在这里。——编者注

入内阁说成是胜利，这个社会主义者在内阁中无足轻重，他只是个俘虏，一个人质。瓦尔德克-卢梭这个出色的策略家把他从反对派阵营中拉过去当作掩护物和挡箭牌，以此来解除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武装(喝采声)，不仅阻止工人向瓦尔德克-卢梭开火，也阻止他们向加利费开火，因为在工人和加利费中间隔着米勒兰这个人。(鼓掌)

啊！你们竟断言，你们在德雷福斯运动中是正确的，因为它导致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内阁，而我认为，这一点恰恰对运动作了最后的判决。一旦社会党逐步离开了它的阶级立场，一旦它和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结成了联盟，它就有沿着这个斜坡滑到底的危险。为了打抱不平而为某一个人恢复名誉，社会党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现在它又卷进了和这个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之中。

这样，阶级斗争最终导致了阶级合作。这个新的合作形式把一个既然是社会主义者就应该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其他占大多数的、以保存这样一个社会为唯一目的的人结合在同一个政府里。有人把这说成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获得的力量标志。正如拉法格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威胁，它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因为资产阶级想渗入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中去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

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争取到了政权，而是一个社会党人及其追随者被资产阶级政权夺走了。

于是，同志们，我们看到了我但愿永远不会看到的事情：

工人阶级本来应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就象应该进行自己的革命一样，现在却被号召去为他们的主人的共和国站岗并且被迫去保卫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了。

我认为当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当这个文明的建立将取决于担负着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任务的无产阶级的時候，应该坚决地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种更高的文明上来；我认为应该准备摧毁所谓现今的制度而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

然而，事实似乎不是这样，似乎 1789 年的大资产者本来应该以在十八世纪期间所实行的改革为借口而忙于维护旧制度的；我却认为他们所做的正是向这个制度进军，把好的和坏的东西一古脑儿全部铲除了；我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并不比他们差；它是肩负着实现和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使命的阶级，它不是少数人的解放者，而是全人类的解放者，它除了自己的阶级利己主义以外不应有其他的动机，因为它的利益和全人类整体的、最终的利益是吻合的。

有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提出的新政策就是想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阵地上把无产阶级单独组织起来，然后把这支现成的队伍交给某一个资产阶级参谋部。当资产阶级被日益觉醒并脱离它的政治行列的雇佣工人所抛弃而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人却对我们说，每当发生不公平的事情，每当有黑斑使资产阶级的太阳变得暗淡的时候，我们象过去一样，现在和将来都要给予他们帮助。

啊！同志们，如果你想把这些黑斑一个一个地擦掉，即使是昼夜不停地连续干也无济于事。你们根本不能抹去那些

无法抹去的东西。但是在从事这项珀涅罗珀<sup>①</sup>式的工作的时候，你们却会延长压榨你们的统治，使现行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在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八个月之后，这个制度和在梅利纳、杜毕伊<sup>②</sup>、佩里埃<sup>③</sup>时期一样沉重地压在你们的肩上。

### 集体主义和革命

只要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还没有被社会所有制即你们自己的所有制代替，在目前社会中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向全体法国工人灌输的这个思想应该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头脑中的唯一指针，同时我们还要把这种思想传播到那些还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工人中去；这是我们唯一的任务；这就是要组织并扩大一支突击队，它在夺取国家的大决战中还必须象攻占封建的巴士底狱一样，去攻占资产阶级的“巴士底”；如果我们半途而废，象期待施舍一样期待资产阶级的所谓改革，——资产阶级有时从本

---

① 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赛的妻子，在奥德赛外出二十多年间，有无数求婚者向她求婚。她想出一条妙计，说让她织完一匹布后可以改嫁。她白天织布，到了夜晚把白天所织全部拆掉，这样来拖延时间。——编者注

② 沙尔·亚历山大·杜毕伊 (Charles-Alexandre Dupuy 1851—1923) ——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内阁总理 (1893, 1894—1895, 1898—1899)。——编者注

③ 卡齐米尔·佩里埃 (Casimir Périer 1847—1907) ——法国大资本家，昂赞煤矿矿主，1864—1895年为法国总统。——编者注

阶级的利益出发或许会抽出某些改革以迎合人们的要求，而这些改革只能是“画饼充饥”——那是很可悲的。我们是而且只能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因为我们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

同志们！如果我们脱离这场斗争，那就是背叛，就是临阵脱逃，就是为今天的资产者效劳。这些资产者非常清楚，正如米勒兰在朗斯所说的那样，雇佣制度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他们非常明白，正象德夏内尔<sup>①</sup>在波尔多随声附和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但是他们却在延长这个最后的奴役形式，使它的消失变得遥遥无期，这个日期的到来甚至要比宗教中至少在你们死后即可进入的天国更为遥远。你们现在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和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要只满足于这些空洞的诺言。

### 不 容 混 淆

然而，饶勒斯走得更远；社会党人是利用普选权作为一种斗争手段进行竞选活动的，他却试图把这和执政的资产阶级进行的内阁活动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既然你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卡雷特选进了鲁贝市政府，把德洛里选进了利尔市政府，你们就应该允许米勒兰接受你们必须与之斗争到最后胜利的那个阶级的一部分权力。另外，他还向你们引证了李卜克内西的一些话，说明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谴责社会

---

<sup>①</sup> 保尔·德夏内尔(Paul Deschanel 1856—192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98—1902年和1912—1920年任议长，是进步共和党领袖之一。1920年曾当选为总统。——编者注



党人进入资产阶级议会，而在同年他又和倍倍尔一起参加了北德意志联邦议会；他还提到李卜克内西同样进入了萨克森邦议会。那时他必须宣誓，李卜克内西说：“如果我们不能越过这个纸上的障碍，我们就不是革命者。”

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可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只有经过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的推选，只有通过社会民主党打开的缺口，才能进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这样产生的议员是本阶级的代理人。当然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必须宣誓，但是这种儿戏般的誓言如同甘必大在帝国面前的宣誓一样，并不妨碍人们作为敌人进入选举产生的议会，就象人民的大炮发射出来的炮弹一样……难道你们敢说米勒兰接受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部长职位是属于同一种情况？难道是无产阶级去年在选举中打开了一道缺口使米勒兰得以通过吗？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是应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召唤进入政府的。（掌声和欢呼声）他是为了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进入政府的，否则他们并不会要求他帮助。即使没有社会党人参加也可以组成一个甚至比我们一年半以来领教过的内阁更能保卫共和制的内阁。你们谈到布尔茹瓦内阁，这届内阁并没有社会党人参加，但是，可以肯定，它为共和主义事业所做的事情比现在的内阁更多一些。证明之一就是那时通过的有关继承的法律并没有得到现在的保卫共和国政府的采纳。这个有一位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放弃了那时的部分改革。（欢呼声）

同志们，一旦社会党、一旦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用与资本家阶级分享政权的形式去理解和实践阶级斗争，那时就不再有什么社会主义了；那时无产阶级就不再能够担负解放的任务了；

那时工人们就将回到二十二年前的老样子，不是响应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来反对保皇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是响应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来反对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那时他们就不过是追随别人的、驯服的阶级和政党，既没有存在的理由，更没有自己的前途。

## 在 斗 争 中

我想起了我曾经是其中一员的共和党，老共和党，它曾经拒绝做出类似今天有人想强加给我们社会党的那种妥协。帝国曾向五人团之一艾米尔·奥利维耶<sup>①</sup>发出呼吁，真正的呼吁，尽管这是可能做到的，即把执政官的帝国变成自由帝国，尽管在共和党人和波拿巴政府合作之后还可以获得结社和新闻自由以及工人联合的权利，尽管如此，更为不妥协的、对他们的议员控制更为全面的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一致地、毫不犹豫地、把艾米尔·奥利维耶先生当做叛徒处理了。

难道我们连帝国末期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力量和觉悟都不具备吗？这些不过是我附带想起的过去的事。我要指出的是，帝国时期的共和党就象今天的社会党一样说过：“应该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实现。”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甘必大，我想起 1876 年，他在贝尔维尔说过这样的话：“我

---

<sup>①</sup> 艾米尔·奥利维耶 (Émile Ollivier 1825—1913)——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和达坦蒙、法夫尔、埃衣和皮卡尔组成“五人团”。六十年代表示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 (1876 年 1—8 月)。——编者注

只知道有两种方式达到我的目标：谈判或战斗；我不赞成战斗。”

这样，老共和党灭亡了；机会主义诞生了，而机会主义的共和主义就是共和主义的湮灭，共和主义的破产。三十年来，它甚至没有能够实现在外国、在美国或者在瑞士共和国已经成为现实的那些政治改革；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灭亡！今天我们这个阶级的政党，我们这个社会党面临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越来越紧迫的必要性，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一些人主张用斗争来夺取政权，另一些人力图通过谈判一部分一部分地，一点一点地，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部一个部地取得政权。

我们不赞成谈判，因为阶级斗争不允许搞阶级交易；我们不要这种交易；如果你们，工厂和工场的同志们，肩负着从来没有一个阶级承担过的最崇高使命的无产者，一旦你们接受了这种新方法，你们不但会受到欺骗而且会把今天使劳动者站起来的革新的巨大希望也化为泡影。

### 阶级反对阶级

今天，只有所有力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权形式，借助于同样的手段即：通过对资本家阶级政治上的剥夺实现对他们经济上的剥夺，来达到同一目标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形成社会主义运动不可抗拒的力量。

一旦你们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使自己的行动听命于只是为了使我们脱离真正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战场才和我们联合的敌对阶级的一小撮人，那么从共同的经济地位中产生的这

个社会主义团结就会永远遭到破坏。

你们只有坚持用阶级反对阶级，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资本主义世界中可能存在差别，你们所肩负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而政治上的竞争或者说精心维持着的政治上的差别则使资本主义世界得以苟延残喘。

如果资本家阶级仅仅组成为一个政党，那么在和无产阶级冲突中第一个回合的失败就会使它彻底毁灭。但是，他们分成了保皇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以便在一派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总会有同一阶级的同样是和我们敌对的另一派来取而代之。

这是一艘带有隔舱的船只，尽管有一侧进水了，但是它仍然可以继续漂浮而免于沉没。这是无产阶级服苦役的船只，你们在这只船上划桨，受苦，不论谁来领航，只要这只船在继续航行，你们就得不不停地划桨，受苦，这只船上载着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财富，也就是说从你们的贫困和奴役中攫取的利润。（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发表于1900年10月，译自《两种方法》1945年  
巴黎法文版第25—39页。

## 爱·伯恩斯坦

### 巴黎和美因兹(摘录)

(1900年11月)

.....

这几段话<sup>①</sup>比巴黎决议<sup>②</sup>表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话却是把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人们说的，每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竟要在这些人面前画十字说：我谢谢你，等等，等等。事实是，他们的判断能力没有由于对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的幻想和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口头禅的那一套惯用语而受到破坏。幸而上述幻想在别的地方也已经开始消失，这对于理智地和深入地探讨经济问题是有帮助的，上述口头禅的生命却很顽强，特别是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时常出没。

美因兹大会上关税问题的辩论为前一情况提供了出色的范例，而巴黎大会关于社会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辩论为后一情况提供了形形色色的例子。

---

① 指伯恩斯坦从蒲伯纳编辑的《费边主义和英帝国。费边社的一个宣言》(1900年伦敦英文版)中引用的几段话。——编者注

② 指第二国际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问题的决议。见本书第44—45页。——编者注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这一辩论是巴黎代表大会最有意思的一场辩论，而且显示出了头等的演说本领。特别突出的是，一个个别国家的问题，即法国人关于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争论，成了这次国际代表大会讨论的高潮，成了压倒其余一切辩论的辩论。所有对这项议程发言的代表都意识到这一争论，所有发言的人，以及最后通过的决议都受了这一问题的迷惑，都被它——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用诡辩欺骗了。

如果人们想公正地评价所谓考茨基决议的话，就必须考虑到上述情况。决议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在法国人的敌对观点之间划了一条对角线，以便使两派都可能接受。如果说其中的有一派尽管如此还要拒绝这个决议，那只能用执拗的情绪和某种教条气的顽固态度来解释。事实上，这个决议对非可能派甚至比对另一派别更加有利。在这个决议的出色的开头一句之后，接着就是用一个理由充分的但是开始的第二句。它把前者的小腿狠狠地咬了一口。因为在辩论这句话的时候一再提到我的名字，请允许我就它说几句话。

“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任何这一方面的证据都没有。

“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

为什么不是呢？什么是正常的开端呢？

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的情况完全相反。一个阶级从来不会一下子就取得政权，而——不能持久的袭击除外——总

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府权力。在这一方面工人阶级也不会是例外，证据已经有很多了。

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的例子不如说是属于突然袭击那一类。虽然如此，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有必要吸收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参加他们的政府，这仍旧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且马克思恰好也承认它是这样的。那时的实验失败了，这部分地是那些同法国社会主义者现在的争吵非常相似的事件的结果。今天的米勒兰和博丹<sup>①</sup>，就是1848年的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的周围，或者说在卢森堡委员会的周围聚集了真正的工人运动的第一批干部。但是，雅各宾传统的继承者不喜欢这件事，因为他们尽量给临时政府制造困难，并且使为支持临时政府而发动的示威变成相反的示威。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临时政府解散了，路易·勃朗被赶出政府。工人组织的事业被推迟了二十年。

在美国，1886年第一次有一个工人进入世界帝国的内阁。当然可以反驳说，那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人。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代表一个阶级，不管人们能够在别的方面如何指责布鲁德赫斯特<sup>②</sup>，无论如何他总是他的国家的有组织工人的公认的代表。而他担任这个职务是得到他们的同意的。1892年伯特<sup>③</sup>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都是工人组织的支薪职

① 博丹(Baudin 1853—1917)——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主义者。——编者注

② 亨利·布鲁德赫斯特(Henry Broadhurst 1840--1911)——英国工联领导人，1886年任自由党内阁次官。——编者注

③ 托马斯·伯特(Thomas Burt 1837—1922)——英国矿工工会领导人，1886年和亨利·布鲁德赫斯特一起被任命为自由党内阁的次官。——编者注

员，在他们执行部长职务的期间工人组织一直保留着他们的职位。虽然布鲁德赫斯特和伯特不是路易·勃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被任命入阁不是由于一次袭击，而是在完全正常的条件下发生的，是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政治影响的结果。这件事的特别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在正常的条件下加入政府的这一情况。在英国，不再有任何一届自由党内阁可以不包括至少一个有组织工人的公认的代表。

在瑞士的许多邦里，工人代表参加了邦政府，邦政府的其他成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已经强调了这一情况。在瑞士，过去和现在是用国民的直接选举制将工人代表送进政府去的。但是，通常这是根据所谓分摊的名单来实现的。选民任命整个政府，而工人政党只是按照自己的力量有权利要求的名额将自己的党员提到名单上去。

简言之，我们恰好在最先进的国家中看到被决议称作夺取政权的“不正常的”开端的事情确实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实现。现实陷于不幸的处境，成为“不正常”的了。

但是也许正常一词在这里只应该表示，这种行动不符合在理论上规定出来的标准。不过这个标准是什么呢？难道是说工人阶级直到可以自己单独占有政权为止，都要不断地充当反对派吗？我为把这种情况定为标准的理论感到遗憾。

因为这意味着禁止工人阶级，或者直截了当地说，禁止工人政党充分利用许许多多的时机来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把运动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打算一直坚持作反对派的思想对于抱某种观点的人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对于一个大党来说，却是实际上行不通的。在每个文明国家的历史中都会出现一



些需要成立新的联合政府的阶段，这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因为迄今的统治阶级的政党已不再能单独地行使政府权力，使社会机体可以继续运行而不发生严重的停顿，而迄今的被统治阶级的政党还没有强大到这种地步。但是我们必须把利用每一种送上手来的权力称为对政治家的至上命令。要知道政治家是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阶级的代理人，他作为这样的人必须尽一切可能促进政党或阶级的利益。一个阶级愈成熟，它在这方面就愈不会疏忽。

许多人听信了这样的说法：米勒兰入阁给工人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是，这完全要看人们对工人事业如何理解。工人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没有受到损害，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影响也没有因此减少，相反，却不时得到了提高。那么，工人事业在什么地方受到了损害呢？是说这件事成了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磨擦尖锐化的诱因吗？但是这个问题同原则并无关系，而是同加入政府时的特殊的环境有关。环境是不正常的，这一点可以承认，我还没有教条到这种地步，竟会把可能给党的生活造成的损害看成一个在考虑赞成与反对的时候不算在内的因素。但是，不能根据这种可能性而制定普遍的禁令。

这个决议屡次被称作对我和其他人所代表的意见的一个让步，事后对它进行如此的批评，也许显得卑鄙。但是这些诮述的目的不是要对提出这个决议进行非难。我承认它是一个妥协，而且如果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决议，我在那一情况下也是会赞成它的。但是我在原则上对这个决议采取同奥利佛尔·特维斯托一样的态度：我还要添一点。<sup>①</sup>

我并不反对人们对于社会党人加入联合内阁提出某种约

束性准则。只不过这些准则不应当是不可能主义的。只不过这些准则不应当希图把根据一切已知的征象看来可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正常情况的事情限制成紧急状态下的情况。

对我来说，政权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这句话意味着放弃进化思想，而去接受社会灾变论。我也认为，关于一个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会削弱阶级斗争的主张是对这个斗争的狭隘的看法，是想把它的概念缩小成一定的形式。实践对这种缩小概念的做法根本不加考虑；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社会民主党对待象劳资间的工资协议这样的现象改变了态度这件事中看到了。联合政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归根到底也不过是劳资间的工资协议的一种类型而已。在这种协议中，年轻的缺乏经验的运动也许会上当，但是强大的运动如果不能从中吸取新的力量，那它们就未免太愚蠢了。

.....

发表于1900年11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0年第11期第714—717页。

---

① 参见狄更斯《奥利佛·特维斯托》1950年三联书店版第12页。——编者注

爱·大 卫

## 国际代表大会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摘录)

(1900年11月)

.....

通过在国际内部全面而强有力地开展社会政策方面和宪政方面的当前工作,巴黎代表大会迄今没有做到的事,即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也将得到实现。

为了了解在国际代表大会和紧接着召开的法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这一方面发生的事件,我们必须考察这以前的形势。考茨基同志在他的一篇论述两次代表大会的文章中认为米勒兰进入内阁是引起法国社会主义者新的分裂的原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米勒兰事件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只是那些想要重新挥起内战之斧的人求之不得的表面借口。这把战斧要把“改良主义者”的头颅砍下来,因为德雷福斯案件的结果并没有能使饶勒斯及其朋友们失去他们的追随者的信任。

盖得和他的朋友们,这些“革命派”确实指望国际代表大会对米勒兰和“内阁派”作出毁灭性的判决。他们认为李卜克内西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妥协性的一般见解,特别是关于米勒兰事件的见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是占优势的,他们对自己

的事情因此就更加有把握了。他们期望，有国际代表大会的判决作武器，他们就可以在法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分裂饶勒斯的追随者，迫使饶勒斯本人和他的亲密朋友们退出，就这样在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下并按照它的意图实现法国社会主义的“统一”。

法国工人党诺尔省联合会在科德里召开的地方代表大会（1900年8月5日）通过的决议清楚地表明这件事的意图就是这样的。它意味着公开对饶勒斯派宣战。决议中要求，由于所谓的独立社会党人在议会关于索恩河畔夏龙事件的质询中的行为，应当对他们进行谴责。决议还宣称，只允许同反对资产阶级、不与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统治的社会主义者实行联合，一句话，只允许同具有共同的策略、共同的纲领和共同的目的的社会主义者实行这样的联合，即会导致完全统一的联合。决议最后公开说，必须谋求法国工人党的胜利，法国工人党二十多年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已经教育、组织了工人，唯独它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使他们获得彻底解放。

这一宣战排斥了通过谅解与和解同对立一派联合的可能性。盖得派认为假如他们能够凭借国际代表大会的威望，他们同以瓦扬为首的布朗基派（革命社会主义党）联合在一起就足以压倒他们的对手。当国际代表大会接受法国工人党在伊夫里的全国代表大会（9月21—22日）上一致通过的、并由盖得向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的声明以后，这一点就做到了。根据这个声明，严格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于资产阶级政府必须采取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

从这些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考茨基决议对于“革命派”不

会有什么帮助。考茨基事后对他的作品似乎也不很满意。他惋惜盖得没有把他的决议当作“黄金桥梁”，并把这归咎于一种“错误的提法”：对立的一方把他的决议看成为米勒兰入阁的辩护。这一悲叹是有点滑稽的。考茨基应该懂得，盖得对“内阁派”的全部攻击所根据的论点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不是策略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因此，米勒兰事件是对原则的背叛。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接受一个认为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的决议。因此，用这一决议来解决这一整个争论问题，在原则上就已经有利于饶勒斯而折断了盖得最锐利的武器。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在目前情况下是否确实存在使米勒兰有理由加入内阁的这样一种紧急状态，考茨基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这不会对盖得有多大帮助，即使考茨基不仅是作为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他的决议里作了这样的回答，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只有我们的法国同志才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比外国的评论家更清楚地知道，米勒兰入阁对于保卫共和国来说是否必要。盖得对于考茨基反对米勒兰入阁这一特殊事例的论证大概也只会付之一笑。对他来说，法兰西共和国是否在社会党人不参加政府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存在这样的问题是无的放矢：是威廉还是路贝掌权，这对无产阶级有什么关系？

这种僵硬的学理主义在理论上的荒谬同它在实践中的危险一样都是很明显的。它的这一结论在法国工人党内部恐怕也不是得到一致赞同的。而在法国工人党之外，对于这种观点的批判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奥艾尔对这种观点所

作的诙谐的批驳也不会不起作用。

奥艾尔的发言也表达了大多数德国代表对考茨基决议的意义的看法。人们赞同考茨基决议，并不是赞同它的每一句话，而是因为它捍卫了今后将发生的情况所必需的行动自由。“我们不愿意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上都受到约束。我们愿意以我们的理论教育和纲领为指针，在特定的情况下选择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是口袋里装着最后真理的狂信者、预言家和教会创立者。我们在寻找真理，并且应该使追求真理的道路通行无阻。所以我们赞同考茨基决议。”（奥艾尔）<sup>①</sup>

我个人不赞同考茨基决议中的下述说法：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取得个别的部长职位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

与考茨基截然相反，我认为，在议会制国家里夺取政权只能而且只会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

在法国和其他地方，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还没有取得政权，只是因为人民的绝大多数还不愿意把政权交给他们。人民大多数的态度的转变决不会是突然的。我们的同志只能逐步地、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增加他们的议会代表。但是当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时，他们就可能在成立左派自由主义的政府时获得个别部长职位。一旦他们能够获得部长席位，他们就确实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选民群众迫使他们这样做。尽管理论家们经常很尖锐地指出，这是对于阶级斗争原则的可耻背叛。选民群众对此是不会理解的，而且也不容许他们的全权代表

<sup>①</sup> 此处引文与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法文版略有出入。参见本书第 67 页。——编注者

放弃一种权力手段。虽然他们不能凭借这种权力手段来建立集体主义社会，却可以靠它来实行大大改善无产阶级状况的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良。

米勒兰事件将一再发生，它在法国将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很可能也是如此。那时，人们在为社会主义者参加联合内阁辩护时将不再说这在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而是说它在正常情况下是有利的；也就是有利于朝着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化的方向对目前情况不断实行积极的改造。

米勒兰的入阁就其社会政策方面的成就来说是用不着害怕客观的批评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件事被利用来重新挑起法国社会主义各个派别之间的相互对立。在法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的令人遗憾的事件以后，很难希望很快达到完全的统一。盖得派在党内实际上是举足轻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把盖得派排斥在外而实行所有派别的联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此外，很值得怀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瓦扬和他的信徒是否会参加由饶勒斯和他的朋友建立的统一的党。但是盖得派所发起的这场联合运动更加不会导致真正的统一，这是很清楚的。因此两个阵营目前恐怕将继续保持分裂状态，相互的攻击如果能多少去掉一些愤恨情绪（他们一向是带着这种情绪互相攻击的，这使我们的敌人感到高兴），人们就应该感到满意了。

但是终究会实现统一，如果不是自上而下地实现，就会自下而上地实现。共同的、积极的日常工作，劳动群众对于直接改善他们的状况的共同关心，所有这一切将指明发展的方向。

尽管盖得或拉法格的理论看起来是多么不妥协，法国工

人党的实际活动也必定自然而然地日益转向当前任务。为此，他们已经注意同工会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党在市议会里的为数众多的代表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进行工作的。恰恰是在市政改革工作的领域里表明，凡是各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必须协力工作的地方，这都是在和谐一致和感到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实现的。它向我们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我们的法国同志愈是由于形势和由于他们的影响的扩大而能够从事当前工作，这种工作也就愈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胶合剂，它将不顾种种理论上的对立或个人不同观点而把争取独立人格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任何一个派别都无法避免这一趋势，否则它的追随者就会倒戈，从而使它垮台。

发表于1900年11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  
1900年第11期第706—709页。



格·福尔马尔

## 关于米勒兰事件

(1900年12月)

在上一期《社会主义月刊》上大卫和伯恩施坦对米勒兰事件、考茨基决议以及与此有关的大会进程发表了评论<sup>①</sup>，对于这一评论的积极的成果，我在一切基本方面都可以表示赞同。但是他们两人只附带谈到了考茨基在《新时代》第二期上对上述问题的阐述<sup>②</sup>。我认为，对考茨基的文章，不仅从所涉及到的问题的意义，而且从他研究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从他所提出的主张来看，都迫切需要详细地作出评价和回答。虽然由于《社会主义月刊》的出版期，现在来做这件事已经有些迟了；但是我已经考虑到，所涉及的问题是不会这么快就过时的。

\* \* \*

首先对事实作一简单的说明。

考茨基在事后对他的理所当然地出了名的决议的理由作了补充说明。这是要向我们表明，作者本人希望别人如何理解他的这一作品。这当然是他的正当权利。只是考茨基必须

---

① 指大卫的《国际代表大会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和伯恩施坦的《巴黎和美因茨》，见本书第136—141页和第130—133页。——编者注

② 指《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员部长》一文。见本书第71—85页。——编者注

明白，他的阐述仅仅说明他的个人意见，对于我们这些在巴黎投票赞同他的决议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因此决不能改变表决的性质。可是考茨基声称，他有“一切理由”假定，国际代表大会和法国的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人”同他一样，他们投票赞同决议，完全不是想表示对米勒兰事件的批准，倒不如说多数人的意见是“米勒兰的加入内阁是一个错误，他留在内阁已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不幸。”<sup>①</sup>这是一个十分武断的假定，考茨基不可能证明这一假定是正确的。

在法国的代表大会上有过两次可以表达代表大会对米勒兰问题态度的特别机会。首先是议会党团的议会活动报告，它为支持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进行辩护，如果大会的多数对此表示反对，那就一定会作出相应的决议，而且众所周知，由于党团的这种态度，四名盖得派议员以及几名布朗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公开退出党团，这就使人更加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决议了。但是报告在热烈掌声中得到通过，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接着讨论的是议员们在著名的夏龙事件中的表决问题，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已经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尖锐化，使它成为在米勒兰事件上的真正的决战，为此他们几个月来不断地要求谴责“内阁派”议员的“耻辱”。但是大会并不愿意同意盖得和瓦扬的观点，大会不仅拒绝“耻辱”<sup>②</sup>这个最重的词，而且甚至拒绝用最轻微的方式表示不赞成。大会认为没有必要对米勒兰事件作出任何其他的

---

① 见本书第83—84页。——编者注

② 瓦扬在这次大会上的有关提议中用了“耻辱”一词。——编者注

决议，虽然除了党的统一外，这个事件是讨论的主要内容。但正是这种情况和大会的整个进程（它以饶勒斯及其朋友们的显著成功和盖得派的重大失败告终）最清楚地表明，大会的多数对米勒兰事件的态度是怎样的。

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考茨基引证了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的讲话。确实，王德威尔得在对米勒兰的道德和思想品质以及他的改革的价值给予公正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他与考茨基不一样——之后，仍旧提出了看法，认为参加政府是一个错误。但是，王德威尔得是报告人，为了使双方接近，他在讲话时显然力图一会儿向这一方面作出让步，一会儿向另一方面作出让步，即使完全撇开这一点不说，同样肯定的是，王德威尔得的同胞安塞尔在他之后发言，以极其坦率的方式对米勒兰入阁的理由和益处发表了意见，并得到比利时代表的热烈赞同。我现在已想不起阿德勒曾经就这个问题在巴黎发表过意见，而且在最近出版的作了删节的记录中也没有找到。然而我从《维也纳工人报》上得知，阿德勒是按照考茨基确定的方针发表意见的。但是阿德勒不是整个奥地利党；我在《维也纳工人报》上也已经发现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远不是那么否定米勒兰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同情他的。大会之后不久埃伦博根<sup>①</sup>在维也纳一次集会上以一种与阿德勒全然相反的观点讲了话，并没有因此在会上或党报上引起反驳。意大利人费利作为少数派报告人为盖得的那个企图一劳永逸地

---

<sup>①</sup> 威廉·埃伦博根(Wilhelm Ellenbogen 1863—195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编者注

彻底禁止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提案辩护。但是首先，科斯塔能够不容争辩地断定，费利只代表意大利人的少数派；其次费利自己最近在曼图亚提出要求说，如果政府想实行真正的改革，那么就请它“让各人民党派直至社会民主党执政”。由此看来似乎费利对这件事重新作了考虑。关于英国人的意见，除了他们对于饶勒斯的发言以及盖得和瓦扬的发言所持的态度外，其他我一无所知，而这种态度使我觉得他们是不可能与考茨基完全一致的。至于最后说到德国人，那么过去和现在都可以肯定地说，奥艾尔所讲的是忠实地表达了绝大多数德国代表的意见；然而，考茨基并不想援引奥艾尔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在党内，我们参加巴黎大会的代表们的意见不是孤立的，这从我们党报的态度上完全可以看出来。对米勒兰的作用持否定判断的是极少见的，而象考茨基那种样子的怒气冲冲的严酷评论则几乎没有见到；还必须把帕尔乌斯<sup>①</sup>的《世界政治通讯》考虑在内，几周前它发表了两篇痛斥米勒兰、夏龙事件和可能主义的文章，但据我所知，只有一家党报刊载了这两篇文章。与此相反，在大会前后、尤其是对米勒兰的某些具体行动表示赞同的文章大量出现，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党的意见倾向何处。

因此，要说考茨基后来所提出的观点是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人”都赞同的，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多数派代表所做的

---

<sup>①</sup> 帕尔乌斯(Parvus, 即亚历山大·格尔夫德 Alexandre Helphand 1869—1924)——原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十九世纪初十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曾发表文章批判伯恩施主义和米勒兰主义，后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编者注

是，他们不顾盖得派和布朗基派的大叫大嚷，仍旧支持了考茨基决议案，从而拒绝了誓不两立地反对米勒兰的人的立场。考茨基自己不得不承认，他的决议的通过“被看成米勒兰的一次胜利，对于工人党的国际同情显著地降低”<sup>①</sup>。考茨基能够并且一定预先就知道盖得派会象那样采取行动的；因此如果他想避免那种“假象”，并且承认盖得在这件事情上是正确的，那他就必须把他的决议案写成另外一个样子。但是考茨基大概意识到，那样一来，它未必能过得去。

\*     \*     \*

说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保卫共和国政府”是不必要的、不可允许的和有害的，这种论断的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是不承认人们所说的那种迫不得已的局面，而考茨基决议是把这种局面作为个别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条件提出来的。

对于盖得派（考茨基认为盖得派是整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点，一切都围绕着它，根据他们的意志而行动）来说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当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并引起全体有教养的人们的愤怒时，只有盖得及其伙伴们无动于衷，并且同民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教权主义者和保皇派一起争着宣称，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案件”，这完全不过是富裕的犹太人的一个骗局，全法国不会有一百个工人关心这件事。整个事件至多只涉及资产阶级，工人们对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甚至当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普遍的国家危机时，当用反动派的钱所组织

---

<sup>①</sup> 见本书第87页。——编者注

的，并得到巴黎警察支持的游行示威开始的时候，当任何一个喊了“社会主义万岁！”或者只喊了“共和国万岁！”的人都受到镇压的时候，最后当任何人都一定认识到反动派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即使这时，盖得派仍旧自鸣得意，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在各派别联合组成的总委员会上有人要求，面临日益增长的危险，社会主义者终于应当奋起并且发起反对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这个提案遭到盖得及其伙伴们的反对和否决；他们不愿意蒙受极大的嫌疑，使人认为他们似乎支持与搞政变的人作斗争的政府。当然并不是所有盖得的朋友都对这种无所作为、袖手旁观的高超政策有必要的理解，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反对公开危险的要求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如果盖得不想完全被抛在一边，他就不得不顺水推舟，并且至少暂时作出让步。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个盖得有一天也会发现早已十分明显的危险，并且邀请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一个警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准备对付面临政变的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不是盖得的朋友们表示承认共和国的确处于危险之中的唯一的一次行动。当人们在隆尚普的那一天<sup>①</sup>必须准备对付民族主义者的冲击时，瓦扬及其伙伴们同饶勒斯及其朋友们在一起出动了，他们列队站在共和国总统的讲坛下保护他——资产阶级的总统，反对掌握警察、军队、街道以及政府（杜毕伊内阁）的一部分反动派。此后在布里松内阁倒台前不久，国防部长夏努安在大庭广众之前背信弃

---

<sup>①</sup> 1898年6月11日，法国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德雷福斯派在巴黎隆尚普举行示威，反对保皇党人——反德雷福斯派。——编者注

义地提出辞职(这是他事先同戴鲁莱德<sup>①</sup>商量好的),共和派就把这看成是政变的开始。议会会议开过之后,左派的所有党团立即举行集会,以便成立一个警惕和抵抗委员会;社会主义党团一致决定参加建立这一委员会,虽然它的代表们在委员会中站在可憎的和反动的梅利纳方面。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者居然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有损名誉的邻居关系和协作关系”,——这是盖得派在他们想使米勒兰和他的朋友们为政府的一切真正的或所谓的罪恶承担责任时喜欢使用的说法——可见危险一定确实表现得很严重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盖得及其朋友们在最严重的危险刚刚过去,保卫共和国的事业刚刚渡过最大的难关的时候,就在议会内外不断地给共和国制造障碍,从而使搞政变的人感到高兴;他们立刻又一次否认共和国存在着危险,最后终于完全回到他们关于政治形式无关紧要的浅薄说教和一种狭隘到麻木程度的阶级斗争观念,同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著名的口号:不管是路贝还是威廉掌权,对工人全都一样!

我当然知道考茨基不同意这种观点,而是相反,他承认共和国确实存在着紧迫的危险,而且在拯救共和国这一问题上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是有切身利益的。正是考茨基本人在去年对盖得的弃权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给饶勒斯的一封信中对饶勒斯以无可比拟的方式“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拯救了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表示十分钦佩,接着又说:“作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来说再也没有比在一场席卷全民族的危机中保持

---

① 保尔·戴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 1846—1914)——法国民族主义者,“爱国者联盟”主席,反德雷福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编者注

中立更为致命的态度了；我认为对于一个争取社会复兴的党来说，再也没有比在一个法律问题上漠不关心更为破坏性的态度了，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说，再也没有比面对横行的军人而优柔寡断更加不可饶恕的错误了”。如今考茨基不得不惋惜地看到人们过去对盖得派的同情由于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行为而迅速减少了（我们作为两次巴黎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是见证人），他想尽可能地保护他的这些老朋友——如今考茨基当然只不过温和地指责盖得派犯了“个别策略上的错误”，而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巨大功绩已经弥补了这些错误。我不想否认，从前盖得及其伙伴确实有过这样的功绩，虽然当时就已经有并非微不足道的阴暗面同这光明的一面相对立了。任何一种功绩都决不能为盖得派后来的大量严重的荒唐行为提供特许状。如果宣传工作是通过一种不可救药的学理主义，通过对革命空谈的迷信，通过一种政治上毫无成绩的以个人为转移的政策而进行的，并且在关键时刻暴露出这样一种“不可饶恕的”无能，就是说，如果全党追随盖得派的话，就会使法国社会主义遭到几乎不可挽救的打击，那么为党进行这种宣传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在组织一个集团之后只知道通过不容异见、诽谤和捣乱来阻挠党的统一，而且在即使这样也没有能迫使党接受他们的意志时就宁可公开使党分裂，那么组织集团又有什么益处呢？法国社会主义的多数派在自己的巴黎代表大会上作出实行渴望已久的统一的决定，并且抱着立即加以实现的最良好的愿望，而盖得派对他们一贯采取傲慢自大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我们与其通过不合时宜的恭维和原谅来为这种态度提供新的养料，确实不如十分严肃地对这些人说，他们



现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放弃他们的分裂主义，努力协助建立统一的法国社会民主党。

\* \* \*

由此可见，考茨基承认存在着一种危险。但是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证据表明”，为了拯救共和国，米勒兰的入阁是必要的；他宁可认为，通过对一个激进党政府的简单支持，完全同样可以拯救共和国。我觉得，作出这种判断的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产生的历史。要知道是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那时考茨基如此希望成立的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似乎有一定的可能性。有些被瓦尔德克-卢梭内阁预定为他的内阁成员的共和党人根本不能理解社会党人参加政府这一可怕的思想，因此非常激烈地加以反对，以致瓦尔德克-卢梭退缩了。但是他很快注意到，有人企图迫使他向右转，并且强迫他同那些向还很有影响的民族主义献媚的分子合作，简而言之，如果共和国不是公开转向社会主义并且与生机勃勃的工人阶级的力量相结合，它就必然会不可阻拦地走向政变。经过两天的动摇和试探之后，瓦尔德克-卢梭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组合都不可能真正地完成保卫共和国的任务，因此他不予考虑。这样，问题就不再是建立一个有米勒兰参加的坚定的共和主义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还是建立一个没有米勒兰参加的这样的内阁，而仅仅是在以下两种情况之间进行自由选择：要么建立一个有米勒兰参加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要么就是瓦尔德克-卢梭辞职，政府危机就有持续下去的危险，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后一种情况是保皇党人所希望的。当然，考虑到社会

党人加入一个按其多数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时所承担的责任，并且考虑到他们的代表在政府中极其艰巨的任务，要作出决断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认为，在这一既定的紧急状态下，不仅为了国家和民主制度的利益，而且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只能作出已经作出的那种决断。

\* \* \*

现在考茨基重复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谴责，说米勒兰参加政府是擅自行动，他不是一般地提出这种谴责，而是说得极其明确。“事实上米勒兰既没有询问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五个大组织中的一个，也没有询问法国社会主义协调委员会，也没有询问议会的社会主义党团。”因此，正如目前米勒兰竟敢拒绝盖得一布朗基少数派的要求，而“死赖在他的职位上”一样，他在开始升迁时也丝毫没有考虑到党，而是“不守规矩地”，完全随心所欲地行动的。

不言而喻，考茨基是诚恳地重复这种说法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旧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在利用情报方面不够谨慎（这种情况在他来说本来是不应发生的），他是在传播一种实际上错误的言论。我在巴黎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调查，并且从最熟悉情况的人士方面得到一份关于米勒兰加入内阁的经过的详细报告，没有一个有关的人对这一报告表示异议，因此我要比较详细地加以转述，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事实上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米勒兰第一次接到邀请他加入正在组织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建议时，他立即通过饶勒斯个人传话给迪布勒伊同志（属于革命社会主义党）和法尔雅同志（属于盖得派的工

人党)，请他们迅速报告他们的组织。于是饶勒斯在下一号《小共和国报》上要求社会主义党团立即开会，会议是在第二天举行的。米勒兰出席了这次会议，阐述了形势，报告了对他提出的邀请，报告了谈判中断的情况，并就此向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问题：如果在危机期间他再次受到邀请，他应该如何回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议员劝米勒兰拒绝。瓦扬和他的朋友桑巴向米勒兰表示完全同情，并对他说，在新的斗争中他们将全心全意跟着他；不过他们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对于这件事最好不要作出一个正式决议。马赛的议员卡德纳（当时是盖得派的工人党的成员）反对不作正式决议的建议。他认为，既然党团全体成员个人都赞成接受邀请，为什么他们不能通过一个共同的决议来表达他们的这种意见呢？米勒兰会遭到严重的指责，如果党团让米勒兰对没有一位议员应加反对的一项行动负责的话，那是不公正的，也是缺乏勇气的表现。卡德纳提议，党团应该通过一项决议明确表示同意米勒兰加入政府。只有瓦扬和桑巴仍旧坚持认为，由于党在组织上是不统一的，最好不要做出任何决议，然而他们再一次表示，他们将非常热诚地支持米勒兰。鉴于这种情况米勒兰决定，既然有些同事认为还是不要由于他参加政府而使党正式承担责任为好，那么他愿意个人承担责任。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在危机已经历了上述过程以后，向米勒兰提出了第二次邀请，并且就在同一天晚上组成了保卫共和国政府。

因此，正确的说法差不多是同考茨基的论断正好相反。米勒兰在得到邀请之后，恰恰是首先通知了两个现在表示反对的组织，好让这两个组织通知他们的议员。此外，米勒兰正式

询问过议会党团的意见。在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中唯一符合事实的是党团没有用一项正式的决议表示它在实际上是赞成的。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党内，这种事也许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在法国可惜还没有这样一个党。既然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对党团的意见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因此这一遭到指责的疏忽就更加是一个形式问题了。但是如果有人无论如何都要提出责难的话，那么这种责难与其说应当针对米勒兰，不如说应当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党团——包括现在表示反对的人在内。

\*     \*     \*

于是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有什么用处？米勒兰在内阁中起什么作用？他的成就是什么？

关于在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执政下为法国取得的纯粹政治方面的成果，我认为是几乎无可争议的。当然人们可以希望做得更多一些，甚至做相当多的其他事情。人们可以举出：“案件”<sup>①</sup> 还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因为无论是被告及其辩护人所受到的无理对待，还是军方的可耻行为，都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惩罚。对搞政变的人的胜利没有被利用来更加有力地消除反动派的危害，尽管采取了一切应加称许的措施来使陆军服从，但它终究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或早或迟能再一次成为威胁；此外，在国家机体内还存在很多不民主的、因而一再对民主的进步造成危害的因素——包括制度和人员；如此等等。并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提到把现政府执政十几个

---

① 指德雷福斯案件。——编者注

月以后的法国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模范的。但人们难道当真可以认为，有哪一个人曾经能够带来这样一种理想的情况吗？瓦尔维克-卢梭内阁就职时所遇到的那种形势难道看起来不是几乎没有前途的吗？政变就在眼前；国家大部分权力手段，首先是军队掌握在保皇党的叛乱分子手中；行政机关里尽是反动的和不可信赖的分子；巴黎为民族主义者所占据；人民由于受到有组织的煽动已激动到极点，毫无疑问不是站在新政府一边！谁只要具体设想一下所有这些情况，我认为他大体上只能对内阁的勇气和智谋表示称许，内阁凭着这样的勇气和智谋挫败了反动派的阴谋，并且领导濒于灭亡的共和国渡过风暴而进入比较平静的水域，从而开辟了良好发展的前景。但是这种对国家的整个文化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成就是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及其在政府内的代表的起决定作用的协助下取得的，我认为这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绝大多数来说是政治觉悟成熟的证明和荣誉的标志，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也可以为此高兴并且分享这样的荣誉。

\* \* \*

但是所获得的好处绝不是只有这些。我觉得很奇怪，考茨基在他反对米勒兰的控诉书中连有可能记在米勒兰账上的最微不足道的问题都没有忘记，但他却能够心安理得地一字不提他的被告在社会改良方面所进行的特殊活动。因为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显然是必须把这一领域中的行动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不应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事情忽略过去。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上，克拉拉·蔡特金也持这种态度，她认为可以这样来论证，就是说“米勒兰作为部长为了实现社会方面的意

图所做的或所忽略的事，在评价他担任部长对于社会主义党团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时，是完全不必考虑的”。由此可见，在人们对米勒兰横加指责，并且最终否认他具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资格之后，人们又想立即剥夺他用那些最明显地表达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行动来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事实上，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加方便了！这已经差不多等于象最狂热的盖得分子那样直截了当地宣称，在米勒兰担任部长时所发生的事对工人阶级不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且——科德里市盖得派的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用十八行生动的戏剧性语言对此作了表达——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政府是法国有史以来最资本主义的、敌视工人的政府，在它的统治下工人的处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恶劣……

面对这些情况，我认为通过几件事实说明米勒兰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活动，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在客观上是必要的。

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在法国是做得很差的。虽然有不少规章。但是这些规章对男人、女人、青年和儿童的规定是各不相同的，这一情况和企业家的种种诡计——特别是轮班制——给监督造成了困难，再加上“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工人立法极端无知，对于运用这方面的立法又漠不关心到不可理解的程度”（拉加德尔<sup>①</sup>语）。因此这些规定依然只是一纸空文。童工的工作日订为十个小时；实际上他们工作十二、十四、甚至十七个小时；近几年来在大部分工厂里工作日定为十一小

---

<sup>①</sup> 于贝尔·拉加德尔（Hubert Lagardelle 1875—1958）——法国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运动》编辑，米勒兰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家。  
——编者注

时。男工同样是工作到十二、十四、十六、甚至二十四小时。米勒兰立即制定了一项法律，而现在已经生效，他对雇用各种工人的工厂的所有工人规定了同样的标准工作日，1899年至1901年的过渡时期为十一小时，1901年至1903年为十个半小时，从1903年起法国将实行十小时工作日。一项关于承担公共劳动的条例规定，在所有合同中都采用标准工作日和标准工资，这就使工人不再受企业主任任意摆布。如果本地地区的工资增加了，企业主必须根据工人的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如果没有付给所规定的工资，那就从企业主为承担工程应得的款项里相应地扣除那笔钱，并由当局直接付给工人。除此而外，不遵守劳动条件的企业主不得继续承包公共工程；禁止计件劳动。由米勒兰（作为邮电部长<sup>①</sup>）直接领导的制造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迄今大部分转嫁给工人的事故责任保险费现在必须由企业主单独负担了。

米勒兰特别重视工人的组织，他让职工联合会承担不断扩大的社会职能，并使它在与企业主的斗争中成为工人的得到国家承认并且拥有行政职权的代表。劳动交易所（一种地区性职工联合会，主要从事介绍工作，但此外也从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工作，并为工会运动提供场所，它为此接受社会捐助——最近一次达五十六万法郎，其中巴黎占十八万二千法郎）脱离了地方行政官的监督并完全交给工人自己管理。最近成立的全国性的中央劳动介绍所是根据工会和劳动交易所提供的情报开展工作的，因此对工人起着重大影响。工会直接参加监督劳动保护法律的实施，米勒兰责成工商业视察员迅速

① 米勒兰在内阁中的职务是工商、邮电部长。——编者注

调查工会向他们报告的工厂里的违法行为。为了正常地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建立了劳动评议会，它们基本上符合我们的国会党团一再提出的、但遭到拒绝的提案的要求。他们对一切工人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调查现行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研究出现失业和发生罢工的原因，提出消除这种现象的建议，提出关于劳动保护状况的年度报告。劳动评议会及其地方组织由工人和企业主各占一半组成，二十五岁以上的法国人不分性别都有选择权，只要他们属于职业性组织就行。这条措施虽然没有正式规定要组织起来，但是实际上已经使每一个想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有一些发言权的工人必须参加组织，而组织是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前提，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把有效地贯彻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现行法律和设施以及争取新的法律和设施的可靠手段交给了工人阶级自己。米勒兰新近组织起来的最高劳动委员会处于劳动评议会之上，其任务是研究总的劳动情况，并且对劳动情况进行调查，以及准备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为此所必须的工作由一个常设委员会来处理，它请最高劳动委员会注意现存的弊端，并提出实行必要的改革的建议。在选举这个机构时——它成了部长在劳动事务方面的顾问——很多工会参加了，除此而外，米勒兰也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这一机构。

最近米勒兰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一次对朗斯工人的轰动一时的演说中——他在这次演说中“公开承认信仰社会主义学说”，“还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于这样做”。（《维也纳工人报》）——米勒兰“提出了一个无论如何是大胆的社会改革纲领”（《前进报》）。由于工人反对资本的经济斗争不是个人



的行动,而是具有集体行动的特点,因此这种斗争也不可能是由个别人的利益决定的。所以在工资斗争中,无论是涉及罢工还是复工问题,决定权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此外,米勒兰表示赞成强制性的仲裁机关,通过这些仲裁机关,独断专行的企业主被迫讨论工人的要求,并从而使工人可以避免旷日持久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但是,米勒兰并不想停留在空洞的诺言上,有关强制性仲裁机关的法律草案已向复会的议会提出就是这一点的证明。米勒兰在这个问题上将走得多远,以及米勒兰的其他思想将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形成法律草案,这当然不仅取决于这位社会党人部长的愿望,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议会的状况所提供的机会。

\*     \*     \*

那么我要问:难道所有这些事情——不管人们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都是次要的和没有意义的,以致于工人阶级在判断整个问题时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吗?如果不正是为了争取实行同样的或类似的措施,从而提高工人地位以及加强工人为新的目标而斗争的力量,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以及其他地方所从事的工作的一大部分(倍倍尔1890年在哈雷代表大会上说是“十分之九”)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有差别,我们有一部分人所提出的要求要更加慎重得多,我们几乎不能想象法国工人由于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而已经获得的种种东西。有些自认为特别“自觉的”善良的人把为目前需要而进行的工作看成是“次要问题”,究竟要多少次向他们指出,马克思说过英国工厂法的颁布是英国工人阶级复兴的开始呢?考茨基决议

开头的一句话固然是人们应当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它，而现在已把这个论点看作是无可争辩的了，我认为单是这一点就已经是巴黎代表大会的巨大胜利。这句话是这样的：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sup>①</sup>。好极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幸运地达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应该提防不要由于低估了有助于组织和复兴的措施而重新引起一种信念，即似乎达到目的的道路可以笔直地通过蔚蓝色的天空，而不可能是沿着平凡的大地上“漫长难行的”小道前进的。如果人们认识到这条现实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路，那么在这条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最好的旅行者不是仅仅不断谈论“最终目的”的人，而是懂得采取踏实可靠的步伐的人，这种步伐是同他自己的力量和地形相适应的，正因如此能够使他向前迈进。

但是我认为目前法国工人阶级前进的步伐是很稳健的，并具有某种特色，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只能因此对孚日山脉<sup>②</sup>那边的兄弟们感到羡慕。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法国过去十四个多月中关于工人问题在立法和管理方面所实现的比以前二十年中所实现的还要多，而且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或者说——如果只允许对社会主义

---

① 参见本书第44页。——编者注

② 界于德法边境的山脉。——编者注

的这个词作狭义解释的话——现代精神的支配。“米 勒 兰 是 作为某种高级工厂观察人和官方发言人而受到内阁容忍的。法国社会主义对于社会党人部长和通过社会党人部长所起的政治影响等于零。”<sup>①</sup>——考茨基认为可以用这些蔑视的话来评论这个党员同志，而上述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同志勇敢的首创精神和顽强的毅力造成的，他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至少在法国是人人皆知的。看到象考茨基这样的重要人物由于采取了片面态度竟允许自己错误地作出这样一种在任何一个冷静的判断者看来都是自然不能成立的描述，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

\* \* \*

当然有一些人懂得必须对米 勒 兰 为工人利益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他们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者支持一个激进派内阁的话，那么我们即使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也能够争取到这些好处。无需多说就可以证明，这个假设完全忽视了事实，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我已经指出过，那时要成立一个能够应付局面的激进派政府，没有社会主义者参加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参加政府就有可能使共和国陷入混乱。但是即使假设另外一种情况，那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者能迫使激进派政府听从他们的意见呢？人们难道忘记了曾经一度有过一个激进派政府——布尔茹瓦内阁，它只是靠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的吗？究竟为什么社会主义者未能从那个政府

---

<sup>①</sup> 考茨基《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人部长》。参见本书第79—80页。——编者注

得到米勒兰所做的那些事情呢？究竟在哪里有愿意并且能够实行现在已经贯彻的那一整套措施的激进派呢？不，假如一个纯粹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内阁在当时情况下竟能存在，那么社会主义者就会只限于充当无私的支持者的角色，并且从一开始就必须放弃实现任何一种重要愿望的想法。社会主义者支持政府，其决定性的原因是要拯救共和国，所以社会主义者不能因为政府拒绝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就在斗争中把政府抛开不管。因此，并不是如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内阁似乎掌握在社会主义者手中，而是社会主义者掌握在内阁手中。

\* \* \*

人们对米勒兰参加瓦尔维克-卢梭内阁以及对个别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唯一可以提出来的、有一定道理的指责是：社会主义者处于纯粹反对党立场的简单地位变得复杂化了，我们有代表参加政府就对政府负有一定的义务，就要承担危险的责任。我决不低估这一指责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简单地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并想劝告我们不经过认真考虑就急于接受向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建议，那么我会认为这是愚蠢的和不可宽恕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把危险夸大到极点，那么这与其说是对自己力量有信心，不如说是某种软弱感的表现。谁只要摆脱这两种极端，并且冷静地判断事物，他就一定会在任何个别情况下，既对总的政治情况，也对党的情况深思熟虑，并且权衡利弊。

反对米勒兰担任部长的社会主义者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米勒兰要为与他共事的资产阶级部长的一切措置，甚至要为任何行政机关乃至市长和宪兵的一切行为分担责任。这种

对政府责任的理解是过分地不着边际，过分地迎合一定的目的，以至无法加以合理地运用。当然每个政府一定有其每个成员都应负的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政府纲领或政府的总政策。在米勒兰这个事例中，纲领是共和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完全可以为此承担责任的。由于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因此在各个行政部门中会存在并且发生很多使我们社会主义者理所当然感到不愉快、并且希望尽可能迅速加以改变的事情，这是根本用不着说的。但是，如果说社会主义者在国家中的权力还是这样地受到限制的话，那么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权力也受到限制；不过社会主义者首先可以在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所获得的权限范围内实行最迫切的改革，此外还可以对总政策发生一种影响，他们能够利用这种影响来进行进步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资产阶级部长们的个别行为的责任只能由他们本人承担，从反对我们参加政权的人自己的言论中就可以推论出这一点。虽然这些人认为援引瑞士为例是无效的，——那里社会党的部长已经和资产阶级部长共事而谁也没有想到要这一方为另一方承担责任，——理由是那里实行人民直接选举。但伯恩斯坦已经指出，实际上这种选举只不过是根据进行合作的各个党的力量大小分配政府席位而已。除了瑞士就数英国了，在那个国家里，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也是可以允许的；众所周知，曾经一再有工人代表参加政府。但是根据大家都要共同负责的那种理论，那里的管理商业部的同志就必须对野蛮的英国刑事制度，或印度的饥荒分担责任。考茨基本人也认为，在德国受俄国打击、欧洲会受到专制制度统治的情况下，甚至

在德国也可以允许社会主义者参加为组织人民战争而成立的政府。即使完全撇开这种参加是否有益的问题不谈，毫无疑问，那时在德国毕竟也还会存在一些机构和习惯的做法，这些东西在战时尤其是不能立刻取消的，而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并且能够为它们承担责任。

这里只有两种情况：或者人们坚持这样的主张：一个社会党人由于进入一个按其多数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就要为资产阶级部长和他们的官员以及国内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坏事负责。那么社会党人担任部长无论何时何地毫无例外都是不容许的，那么就必须接受盖得的原则上采取否定态度的提案。或者人们象巴黎代表大会的大多数那样，认为这个问题全是策略性的，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允许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那么责任问题基本上就已经解决了。因为那样一来人们必须承认承担责任不可能是普遍的和不受限制的，在政府的共同纲领范围内，除了内阁总理之外，每个主管部门都是自己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而根据米勒兰自己表示，他是十分确定的利益的代表，作为这样一个代表他只需要为他自己管理的部门承担责任。

即使作了这样的限制，党仍旧由于米勒兰入阁而受到一定的束缚，党的行动也复杂化了，这是肯定的，正如完全的行动自由本身肯定具有优点一样。但是只有那些由于弱小而无足轻重的党才能够不作某些预计的自我限制；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同样要受到约束（而且不是互惠的），往往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必须受环境的迫使而行动。法国同志的自我限制并不是为了放弃什么，而是相反，是

为了替工人阶级以及公众获得较大利益。当然，即使想尽一切办法，仍旧可能出现相当不利和困难的情况；那时恰恰需要仔细地考虑党及其所代表的事业的尊严和利益的要求是什么。既然继续直接参加政权到目前为止表现出很大的益处，足以克服所引起的疑虑，人们就必须使小事服从大事，使形式服从本质。如果有一天发生了变化，那时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的同志自己也作出改变。那时他们将简单地解除已经结成的关系，并重新采取老的立场。以便从这个立场出发，改变形式，加强力量，继续进行原来的斗争。

\* \* \*

考茨基认为，米勒兰的“部长威风”不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很可能的。工人阶级的敌人自然最乐意或者在政府中孤立并单独地推翻一个这样地对待企业主神圣利益的部长，或者在政府表示支持这位部长的情况下使他同整个内阁一起倒台。巴尔图<sup>①</sup>这位从前梅利纳反动内阁的内务部长，就已经在奥列龙的讲演中提出挑战并在议会中首先发动攻击，当然攻击是失败了。然而，这种攻击肯定还会继续出现，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已经要求在社会改革方面加强活动，情况就更会如此。但如果保皇派、归顺派、民族主义分子和梅利纳分子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更加巧妙地选择机会，那么，在组成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时被抛在一边、此后对政府不满并且首先想搞垮米勒兰地位的左派集团就有可能同他们合作；

---

<sup>①</sup> 路易·巴尔图(Louis Barthou 1862--1934)——法国政治活动家，从1894年起屡次担任部长，1934年在马赛被刺。——编者注

如果有意见分歧的社会主义者继续争论下去，从而使米勒兰的资产阶级反对者更加容易这样做，那么很可能，排除社会主义的劳动部长，并由工人阶级的一个敌人取而代之这一个大目标，或早或晚总是会以这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达到的。如果米勒兰看到他的地位实际上已不牢固，也许他也想为自己寻找一个他认为最符合党的利益的机会。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忘记，不管是米勒兰，或是瓦尔德克-卢梭都是卓越的策略家，而且全国对他们的坚定的共和主义的统治是抱有好感的。因此事情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但是不论今后的过程将如何，我坚信，考茨基所说的全部问题将随着米勒兰的下台而“长时期地、也许永久地被埋葬”<sup>①</sup>的看法将不会应验。如果“米勒兰事件”一旦结束，社会党人部长的成绩完整地、并且摆脱一切附加的个人因素而放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我相信，连社会主义方面的反对者也将学会作出另一种判断，并会看到，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不易消除的成见和一个可以在其上继续发展的基础。因为工人们看到了，通过社会主义者坚定灵活地参加政府可以得到些什么。工人们将不再能理解这样的矛盾状况：我们虽然要求实行一切可能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合法改革，却又不允许我们自己通过政府实践来加以贯彻，而宁肯听任资产阶级政客去实行这些改革，尽管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资产阶级政客们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工人们将懂得，夺取政权不可

---

① 考茨基《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人部长》。参见本书第84页。——编者注



能是有朝一日突然出现的、一致的、不可分割的行动，就象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能一下子从经济上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工人们将进一步看到，在选举赋予的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固然有差别，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自愿放弃我们能够借以对事态产生影响的随便那一点权力，是错误的，要长久地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工人们将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今天已足够强大，可以在各个方面进入资产阶级机构，而不致被它们吞掉，社会主义因此有力量，有权利，有责任向资产阶级社会要求自己的一份权力，并且越来越多地给事物打上自己的印记。

因此，我认为，米勒兰固然是第一个社会党人部长，却不是最后一个！

发表于1900年。译自《社会主义月刊》1900年  
第12期第766—783页。

## 罗·卢森堡

### 法国的社会主义危机<sup>①</sup>(摘录)

(1901年1—2月)

#### 一 导 言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问题中，米勒兰事件是第一个引起国际上普遍兴趣并成为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议题的。可惜巴黎代表大会更多地是作为理论家而不是作为实际政治家来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它对于议程的第九个问题<sup>②</sup>只作了一般的理论回答，没有对米勒兰事件明确表示态度；任何一般性的决议，不论表述得是否成功，都可以作各种解释和说明。在代表大会之后，饶勒斯在法国和伯恩斯坦在德国正是这样急于把巴黎代表大会的结果说成是有利于米勒兰的，最后，福尔马尔也在《社会主义月刊》12月号上发表文

---

① 我当然本来打算亲自答复福尔马尔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的反对我的文章(格奥尔格·福尔马尔：《关于米勒兰事件》，载于《社会主义月刊》第4卷1900年柏林版第767—783页)。但是由于卢森堡同志在该文发表时已经同我讨论过以这篇论文为导言的一组论文，由于她的论述使我本来要说的后大部分成了多余的，因此我就不想发表意见了。——考茨基注

② 指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议程的第九个问题：夺取社会权力以及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编者注

章<sup>①</sup>，否认考茨基有解释考茨基决议的资格，并把考茨基决议说成是米勒兰的一次胜利。福尔马尔表示，他自己对于米勒兰入阁感到欢欣鼓舞，米勒兰入阁对社会主义有良好的后果，并且叹息说，可惜德国社会民主党远远落后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队伍里也有美丽的海伦，在类似的情况下，只要帕里斯钟情于她们，她们是甘愿被帕里斯拐走的<sup>②</sup>；我们还可以象当年聪明的伊戒希那样，当人们问他法国的巴拿马事件在他的祖国加里西亚是否可能时，他回答说：“这样的人肯定是会有的，只是没有运河。”因此，福尔马尔的文章在这方面并没有向我们说出什么新东西。即使在他提出事实为米勒兰辩护时，也只是重复众所周知的、饶勒斯和其他人在法国经常重复的论据。在下面一些文章中，我们将有机会分析饶勒斯的观点，福尔马尔的观点自然会由此得到说明。福尔马尔的文章除了阐述他自己的看法外，还承担了向德国人报道法国的事实、向法国人报道德国的舆论的任务，而且是同样报道错了，在这一方面它才需要特别加以回答。

有两个问题在判断米勒兰事件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第一个问题是：米勒兰在接受部长职位时有没有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同意，第二个问题是要确定，国际代表大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通过考茨基决议对米勒兰入阁究竟作了怎样

---

① 参见本书第142—166页。——编者注

② 海伦是希腊神话中的美人，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得到爱神阿佛罗狄忒的帮助，把她诱走，因而引起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编者注

的判断。

福尔马尔首先对德国读者说，考茨基由于不够慎重而大大受了骗，他在《新时代》第二期上的文章<sup>①</sup>中把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说成是他擅自采取的、事先未经社会党同意的行动。福尔马尔（他不是考茨基那样的糊涂虫）在巴黎“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调查”，并且“从最熟悉情况的人士方面”得到了关于米勒兰入阁经过的“详细报告”，他现在很乐于提供这个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我们看到米勒兰就象是一个乖孩子，他在受到瓦尔维克-卢梭的邀请后立即要求召集一次社会党议会党团会议并请求同志们给予指示。在会上对于参加政府不仅普遍表示赞成，而且具体说来，盖得派和布朗基派，特别是瓦扬和桑巴，可说是高兴得热泪盈眶，对他的行动表示祝贺。

如果事情正如福尔马尔所描写的那样，那么即使对于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估价总的说来没有改变，然而对于米勒兰的行为以及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其他方面的党内斗争的迄今为止的估价，就要完全改变了。既然米勒兰这时是作为社会党的合法代表出现的，社会党也为他承担责任，那么，法国工人党和瓦扬派对此粗暴地表示反对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这种反对显得确实象福尔马尔所竭力描述的那样是对社会主义团结的破坏。

幸而国际社会民主党现在用不着把迄今关于米勒兰事件所说的以及所写的一切都颠倒过来，因为福尔马尔只不过上

---

<sup>①</sup> 卡尔·考茨基《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人部长》。参见本书第71-85页。——编者注

了一位法国的爱开玩笑的人的当(显然这种事是最谨慎的人们也会碰到的),他的“最熟悉情况的人士”肯定是善意地欺骗了他。瓦扬在去年12月4日所写的下面这封信(他准许我们公开加以引用)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实际情况。瓦扬写道:

“我多次有机会公开说明事实。在内阁组成的前两天,米勒兰在一次社会党议会党团的会议上象叙述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那样说,在杜毕伊内阁垮台后,有人建议他参加一个正在组织的内阁,他仅仅是在他个人负责的情况下参加这一谈判,与党完全无关。我立即声明,我注意到了米勒兰的发言,如果类似的谈判例外地重演并且获得成功的话,我要请求议会党团和党发表一个声明,使党完全不牵涉到这样一种个人行动中去,因为党决不能参加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参加内阁。米勒兰在听了这些话之后作了一个表示赞成的手势,我们多数人随即动身去参加议会全体会议。当时我们中间没有人想到要怀疑米勒兰所说的话,据他说,组织内阁的谈判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因此,当第二天一位被认为是十分了解情况的朋友告诉我,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组成了,米勒兰和加利费一起参加了内阁,我对此感到很惊讶。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并且立即通过风动邮筒发了一封信给米勒兰,我在信中请他毫不延迟地对谣传加以澄清,我认为这种谣传是一种诽谤,在信中我附带说,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我在议会党团会议上所说的话就失去了它的效力。我指的是,由于内阁中有加利费,我们不再能只限于发表声明,米勒兰参加政府既不能代表党,也不能使党承担义务,而且我们还必须用一切力量反对使一个社会主义

者成为镇压公社的刽子手的同僚的行动。

因此，当我第二天同时接到刊载着关于瓦尔德克—米勒兰—加利费内阁组成的消息的报纸以及米勒兰通过风动邮筒寄来的明信片（他在其中写道，他收到了我的信，他刚参加了内阁第一次会议，事情已经做了，他认为他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未来将会作出判断），我急忙赶到我党（革命社会主义党）议员和友好议员那里，同一天晚上，报纸上发表了我们的抗议书，我们从社会主义议会党团中分离出来并组成了一个革命社会主义党团，以此对我们的抗议书作了正面的肯定……

我再一次读了您的来信，我看到，我们的隐蔽的敌人根据一位议员的叙述指责我和桑巴否决了在议会党团中就米勒兰之事提出的建议。（参看福尔马尔的文章。——罗·卢森堡注）<sup>①</sup>上面我给您所写的这些话就足以纠正这种说法，我有一次曾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它并不因此而不是虚假的。它或者是一种误解，或者是一种谎言（une contrevérité）。”

由此可见，事情十分清楚。米勒兰既没有召集一次社会主义议会党团会议，又没有向会议表示他可能参加内阁，也没有取得党团对于他入阁的同意。相反，根据他的话议会党团根本不可能认为，他说的是有实在意义的现实的事情，而瓦扬和其他人对待米勒兰的这种模糊的暗示的整个态度，就可以使他毫不怀疑，他只有违背老的党组织的愿望才能参加政府。

如果福尔马尔象他热情劝告考茨基的那样细心周到地自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142—166页。——编者注

已着手收集情报，那么，他就会在《革命社会主义党年鉴》（1899—1900年，巴黎新地街45号，第39—53页）上找到所有这些叙述，它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版，并且据我们所知直到现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怀疑或反驳。这样一来，他就不必费力去传播错误的消息并且拿这些消息来教训别人了。

考茨基阐述了他的得到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的意义，福尔马尔对此作了纠正，他在这样做时已不再是根据可靠的消息，而是依靠自己的敏锐观察和精巧的构想了。他说，巴黎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决议的表决，并不象考茨基所臆想的那样是表示反对米勒兰，而是表示支持米勒兰。文中把一些党的领袖在代表大会上和会在外的某些言语和行动非常精巧地拼凑在一起并且加以对比，以此作为证据。

例如，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作为考茨基决议的报告人，当然曾经直率地反对米勒兰入阁。但是，福尔马尔这个通晓人情的人知道，在这种场合不能把王德威尔得的发言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是报告人，所以他不得不对双方都讨好。至于王德威尔得早在一年前（1899年9月21日《小共和国报》）关于米勒兰事件就发表了同样的意见，福尔马尔忘记了，因此，他关于这一点也无法奉告读者，那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即使王德威尔得确实是反对米勒兰的，但安塞尔在王德威尔得之后发言，“无保留地”支持入阁。既然一个比利时人支持米勒兰，另一个表示反对，那就很清楚，多数的比利时人是支持米勒兰的。

但是，福尔马尔甚至连一个代表的意见都不需要听，就可以了解一个代表团的判断了。例如，英国人对于米勒兰问题

根本没有发表意见，但是福尔马尔知道，他们很可能也是支持而不是反对米勒兰的。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对饶勒斯的鼓掌就不会超过对盖得和瓦扬的鼓掌，而尽管巴黎代表大会上很乱，但这一点福尔马尔是看得很清楚的。一个细心的人有什么东西觉察不到呢！

至于说到德国代表团，福尔马尔认为，“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同福尔马尔一样为米勒兰感到高兴。既然福尔马尔没有疑问，那么读者就更加用不着怀疑。事情就这样了结。

但是德国代表团对米勒兰入阁表示赞同的态度也是符合党内舆论的，根据福尔马尔的说法，党的报刊上“许多表示赞同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评论的是“米勒兰的个别行动”，因此根本没有涉及他的入阁问题）证明了这一点。

意大利人也没有逃脱福尔马尔强加的论据。因为同费利相反，科斯塔指出，多数的意大利代表赞成考茨基决议。既然意大利人投票赞成考茨基决议，那么他们就不是按照考茨基的意思，而是按照福尔马尔的意思来理解决议的，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人能够怀疑吗？

甚至米勒兰的最厉害的敌人费利，福尔马尔也有办法把他变成一个朋友。为了确定巴黎代表大会上投票的意义，福尔马尔恰好发现，费利在两个月之后“对事情重新作了考虑”，并且在曼图亚表示赞成社会党人入阁<sup>①</sup>。这样一来，巴黎代表

---

① 我们不得不纠正福尔马尔关于事实真相的这个论断。恩利科·费利在去年12月12日的一封信（考茨基把这封信转给了我们）中写道：

“我一如既往表示反对。我在曼图亚只是说，如果新的国王真正想



大会上通过考茨基的决议就变成了有利于米勒兰的一次辉煌的国际示威。

可惜从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论据中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在德国也已经成熟到可以担任部长职位了，因为我们也不缺乏律师的才能。但是根据普通人的理智，就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真正意见。

考茨基决议指出：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得到整个党组织的赞成，而社会党人部长继续作为本党的全权代表时，这种冒险的尝试（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罗·卢森堡注）才有可能带来益处。如果社会党人部长不服从自己的党，如果他不再作为自己的党的全权代表，那么他参加内阁就会从巩固党的手段变为削弱党的手段，从促进夺取政权的手段变为阻碍夺取政权的手段。”<sup>②</sup>

米勒兰不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全权代表接受部长

---

走上改良的道路（我们的政治家右刺杀国王事件发生后，以及在勃路议事进程的运动向他们证明了反动法律无能为力之后，曾一再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就必须选择有能力进行改良的人，而不是那些现在只是为了钻进政府而谈论改良的老反动分子（索尼诺之流）。

由于极左翼是由社会主义者、共和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因此我说，可能会把激进派召唤到政府中去（激进派的首领萨奇利议员公开承认君主政体）。相反，我经常说，社会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参加政府在意大利王国是不可能的，或是荒唐的。最近我在关于新国王的纲领的一次议会演说（12月3日）中重申了这一点。因此，从巴黎以来我丝毫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卢森堡注

② 《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0年9月23—27日）会议记录》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17页。参见本书第44—45页。决议的德文本与法文本略有出入。——编者注

职位的，这一点不仅从法国不存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党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而且从他既没有得到个别的组织的委托、也没有得到议会党团的委托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至于福尔马尔后来在巴黎听到的来自“最熟悉情况的人士方面”的有趣内幕，无论如何国际代表大会是毫无所闻的。相反，整个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米勒兰入阁是一种擅自采取的个人行动。甚至米勒兰的辩护者饶勒斯也证实这种看法，他恰恰再三把米勒兰擅自采取的行动用来作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实行统一的论据。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的多数在通过考茨基决议时即使没有点出米勒兰的名字，仍是用这个决议来表明，他们认为米勒兰入阁是削弱法国无产阶级和阻碍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由此可见，如果说福尔马尔事后对代表大会的表决作了有利于米勒兰的解释，那么，这只不过是那种人们熟悉的办法的新的样品罢了，按照这种办法，有的人自己赞成一个意味着他的观点失败的决议，事后却又能够把这个决议解释成他的胜利。

至于特别说到德国党——对于法国同志来说，说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发表在《小共和国报》上的国际征询<sup>①</sup>中，除福尔马尔之外，在德国进行活动的所有的党的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和考茨基都表示反对米勒兰入阁。但是，到底谁表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福尔马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23—34页。——编者注

尔还是上面提到的四个人，福尔马尔只要回想一下他在策略上同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和考茨基相对立的那些实际事例及其结局，就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这一点了。

## 五 米勒兰事件和各国社会党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只是停留在实际政策的范围，只是从饶勒斯所说的社会党人入阁要达到的直接目的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人们通过实践达到的结果，每一次都同根据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原则从一开始就得出的结论一样，这一次也是如此。如果说正是饶勒斯的策略没有完成它预期要完成的实际使命，那么这只不过是下列事实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个策略由于把社会党人入阁从一种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手段变成工人阶级斗争的正常方法，同时也就背弃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负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废除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使命，但是它却参加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而这个政府的任务是维护私有制并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永远存在下去。社会主义者负有把无产阶级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政党并引导他们同所有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使命，但是他们却把工人阶级变成共和派资产阶级的附庸。

把参与对无产阶级实行奴役当作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把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上的结合当作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这一内在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饶勒斯当然否认这种矛盾。他认为，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中央政府只是得到公认的参加立法机构和市政机构这一

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策略从空想的宗派主义的弃权态度到积极的现实政策的发展中的更高阶段；在他看来，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联盟是下列原则的结果：工人阶级必须支持和利用资产阶级中的进步派别去反对它的反动派别。

我们认为，饶勒斯对得到公认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引证，无论在前一场合或后一场合都是建立在对于国家的本质以及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错误观念的基础上的。

从社会主义的任务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的立法机构和中央政府按其本质和职能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机构。

议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斗争和派别斗争的机关，因此它成为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统治进行有组织的反抗的最合适的场所，但是政府内部的工人代表从一开始就绝不能起这样的作用。中央政府负有把在议会中和在国内展开的党派斗争的最后成果付诸实现的使命，它首先是一个行动的机关，它的生命力建立在内部的同质性上。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的各个部门——生产、交换、信贷和运输是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工业的世界贸易在中世纪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以及社会主义的交换在私有经济生产的情况下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资产阶级国家既然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组织，在它的各种职能之间也必然存在完全的和諧一致。

一种现代的大工业的殖民政策是以一种相应的军国主义的形态及其实行世界政策的实力为前提的。一种侵略性的保护关税的贸易政策要以热中于掠夺的殖民政策为其自然的补充。没有一种能够通过间接税制度从人民群众中榨取相应的

资金的财政政策，现代军国主义就会是不可思议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赋税制度、国债制度和垄断制度不仅直接地而且通过交易所的中介同工业政策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军国主义、贸易政策和殖民政策就其整体来说决定着对外政策的内容和方向。

因此，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就象是一部齿轮机，它的各个部分在所有方面都互相联结在一起，彼此决定和调整它们的运动。使整个齿轮机转动起来的直接传动装置是资产阶级议会，但是原动力首先是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统治政策的一致性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致性。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如果否认每一个政府成员对整个政府的政策应承担 responsibility 并且把内阁的每一个部门看作是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的势力范围，那么，这是以彻底的机械主义国家观为根据的。从政府各种职能的内在联系自然而然产生政府各个成员的连带责任。法国宪法以及任何一个以议会制为基础的宪法中规定所有部长全体为政府政策负责的条文，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种国家法的微妙的说法，而是对职能上的一致性的恰当的法律表述，这种一致性是资产阶级政府的生存原则。

饶勒斯当然把内阁对于国家的连带责任看作是空洞的形式，是中国式的礼仪。<sup>①</sup>在他看来，社会党人部长对资产阶级

---

<sup>①</sup> 参见饶勒斯在利尔的演说。《两种方法》第8页（参见本书第107页）。

——卢森堡注

政府的行动负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就象社会党人在参加萨克森邦议会时必须对国王和宪法宣誓一样。他援引李卜克内西的例子，后者以高傲的蔑视态度跨过了这个“纸上的障碍”。

饶勒斯在这里忘记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前面提到的宣誓一点不妨碍社会党人一旦参加邦议会就立即对政府和邦议会中的多数派采取根本的反对立场，而社会党人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中却不得不参与执行政府的政策。如果社会党议员在邦议会中由于他们的宣誓而不得不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的席位上去，并且同他们团结一致地进行投票，这种类比才是正确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类似之处，而是存在直接的对立：社会党人参加人民代议机构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参加政府则是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行动承担责任。

其次，要是以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政策，另一个部门可以执行社会主义政策，因此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也就是按各个部门把中央政权夺取到工人阶级手里，这是十足的空想计划。

如果米勒兰在社会党内的追随者竭力否认他对其他部长的行动负有责任，而把他的责任限制在他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至少相信可以把米勒兰自己的行动说成是“社会主义政策”。除了对米勒兰的社会改良无批判地加以吹捧外，他们还把社会改良说成是商业部长的唯一工作，而对其他一切闭口不谈，以此来制造后一种幻想。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只不过是许多生产条件中的一个条件，同样，在资产阶级的工商业部的职能中，对工人

的社会救济只不过是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次要的方面。这个部的职能全都是致力于使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繁荣昌盛。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贸易政策。

要是米勒兰想在这一领域里按照社会党的最低要求行动，他就必须公开地设法取消梅利纳 1892 年建立的自治的、以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为基础的高额保护关税，首先是废除粮食关税。但是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米勒兰在 1899 年同美国签订的协定对此作了回答。当热中于当部长的梅利纳刚刚想要攻击这个协定是对农业保护关税主义者合法权利的背叛时，米勒兰的社会党朋友们就能够把这当作卑鄙的诽谤而加以驳斥。他们可以自豪地指出：“……在贸易协定中农业产品被排除在特惠税率之外，……贸易协定不适用于粮食，它的进口由一项特别的法律来调整，……畜牧业者的利益比在梅利纳的草案中得到更多更好的保护，因为对美国的皮革和鞣皮不实行最低关税。”<sup>①</sup>

这就成功地证明，米勒兰作为商业部长卓有成效地代替了“Père famine（饥饿之父）”梅利纳，同时还表明，只有当一个社会党人显示出他有能力执行资产阶级政策并且放弃社会主义政策时，他才能够<sup>在</sup>资产阶级政府中起作用。

米勒兰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活动使社会党人入局的整个问题得到了新的说明。情况不仅是：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私有制和阶级统治存在着，作为现政府成员的社会党人就不得不执行资产阶级政策。而且在目前社会的基础上，

---

<sup>①</sup> 富尼埃，1899 年 8 月 17 日《小共和国报》。——卢森堡注

除了资产阶级政策外，根本不可能存在另一种政策，甚至即使部长实行了社会主义纲领对目前国家的全部要求，他也仍然是资产阶级部长。他至多用他的活动促进资产阶级发展中的进步倾向。但是不仅如此。事实表明，一个部长在现政府中不仅一般地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而且同目前的统治集团和派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不仅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奴仆，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奴仆。

前面提到，饶勒斯把米勒兰对内阁的总政策承担责任当作空洞的形式而同李卜克内西对萨克森宪法宣誓相提并论。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假定的根据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的一种完全机械的理解。但是我们乐意只限于考虑米勒兰对于他自己的职权范围的责任。只是饶勒斯还需要证明，李卜克内西对萨克森国王的宣誓给萨克森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同米勒兰的贸易政策给法国人民带来的后果是一样的。那时他也会得到对于他在利尔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如果为了我们的事业，有必要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打进资产阶级政府的堡垒，那么，我们是否也会犹豫不决呢<sup>①</sup>。这个计划只不过等于“我们的人”从资产阶级堡垒中同资产阶级一起向我们自己的队伍开火。

参加市镇参议会的问题则完全不同。确实，市镇参议会和市长都要执行交下来的行政职务和贯彻资产阶级法律，但是从历史上看市镇参议会和市长是同政府完全对立的因素。

政府是体现着集中的国家政权的，市政机构则是从削弱

---

<sup>①</sup> 《两种方法》第8页（参见本书第107页）。——卢森堡注



中央政权的地方自治中产生出来的，是对于中央政权的解放。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特殊手段；军国主义、文化政策、贸易政策、外交政策构成政府的真正本质，而市政机构则专门担负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任务，也就是说，它所担负的任务是同不知道任何阶级划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行政机构相应的。因此，中央政府和市政府从历史上看是目前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两极。在法国，市政机构和政府之间、市长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的经常斗争是这一历史矛盾的具体表现。

对于社会主义的策略来说由此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目前国家的中央政府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体现，把它消灭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自治是未来的因素，社会主义变革将以肯定的方式以之为出发点。

当然，资产阶级政党也懂得把它们阶级内容注入到市政府的经济和文化职能中去。但是社会党人在市政府中决不会陷于必须背弃自己的政策的处境。只要社会党人在市镇代议机构中还处于少数地位，他们就完全象在议会中一样，把采取反对派立场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但是如果他们成为多数，那时他们就把市政府本身变为反对资产阶级中央政权的一个斗争手段。

饶勒斯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来为他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联盟辩护，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建议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反动派。<sup>①</sup>他显然指的是《共产党宣言》结

---

<sup>①</sup> 参见饶勒斯在利尔的演说：《两种方法》第4页（参见本书第94页）。——卢森堡注

尾的一段话，那里写道：“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sup>①</sup>但是这段引文是以一种完全确定的历史内容为根据的。

《共产党宣言》的指示恰恰是针对上一世纪前半期的斗争而言的，这一斗争的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代替封建阶级的统治。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支持一个上升的阶级，它对反动派的政治上的胜利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性。现在的情况则根本不同了。资产阶级已经到处达到了他们力图达到的目的，我们看到他们现在不再为反对反动派而斗争，而是同封建主义的残余联合起来成为反动派的正式代表。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几乎只是指小资产阶级。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一个力图代替资产阶级的上升阶级的表现。我们并不是走向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正象不是走向小手工业对大企业的经济上的胜利一样。目前社会发展中同资产阶级跟封建主义的斗争相类似的内容，不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地位当然也决定了它和工人阶级之间暂时具有斗争的共同性。但是在现阶段无产阶级负有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领导成分的使命，而小资产阶级则是同路的附属的成分，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政党即使在它的道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

路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道路有很长一段距离相重合的地方，也有责任不把自己的斗争限制在同小资产阶级共同的领域里，而是相反，要有计划地超越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图，并极力加以引伸。

即使在饶勒斯所援引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没有建议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实行政治上的融合。恰恰相反。宣言作为原则提出了共产党给予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支持，然而立即补充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sup>①</sup>

要是饶勒斯想直接用马克思的学说来检验他的策略，那么他就应该首先考虑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战斗之后向无产阶级所作的指示，这个指示固然起初是预期革命要继续下去的，后来却也成了和平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准则。在1850年的第一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向工人们建议：

“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他在列举了一系列具体的例子后在结尾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sup>②</sup>，而且要按照这一精神，即工人绝对要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若重点是卢森堡加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1页。若重点是卢森堡加的。——编者注

一切方面比小资产阶级走得更远。(着重号是我加的。——  
罗·卢森堡注)

但是饶勒斯一派在同法国激进主义建立联盟时的态度是  
怎样的呢?我们已经看到,坚持米勒兰入阁迫使社会党人把同  
激进主义的联盟作为自己整个策略的牢固的基础,因此愈来愈  
愈缩小和背弃革命的阶级斗争。

首先,社会党对政府的批评和国内的政治启蒙工作停止了,  
政治斗争集中在议会中进行。其次,在议会本身也放弃了  
反对派立场。关于大赦法的表决向我们表明社会党右翼放弃  
了反对政府的独立斗争。

但是还在继续滑下去。在关于结社法的讨论中饶勒斯的朋友  
们又向前走了一步。十名社会党议员在2月4日的会议上  
竟走到这样的地步:由于政府拒绝了一个以保护工人的结社  
权为目的、由整个社会党议会党团签署的提案,他们投票反对  
自己的提案!我们在这里看到社会党人从一个负有进行原则  
的阶级斗争、领导国内全体反对派的使命的党,变成议会中临  
时组成的动摇不定的派别,变成一个傀儡,其活动由资产阶级  
政党来决定,并且正如从前的激进派于尔班·戈伊埃在《曙光》  
上以令人震惊的蔑视态度称呼他们的那样,变成了一群  
“马木留克兵”<sup>①</sup>。

因此饶勒斯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正象  
他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一样,是站不住脚的。在我党的  
历史上和目前的实践中没有一个地方找得到任何一种同社会

---

① 马木留克兵是埃及中世纪的禁卫军,大都由奴隶组成。——编者注

党人入阁的理论相似的观点或者支持它的论点。

当然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同任何社会主义政党一样在发展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策略。但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不断扩大和加强阶级斗争，但从来不是放弃阶级斗争。因此饶勒斯所拥护的策略远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法的一种结果，它对于德国工人运动以及法国工人运动来说完全是一种“新方法”。

只有当人们注意到饶勒斯策略的最后结果时，才会懂得使法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派别发生分裂的深刻内在矛盾。

最近，特别是从德雷福斯案件以来，在我们报刊上也渗透进一种观念，似乎法国的兄弟之争的原因在于，革命派的代表，即盖得和瓦扬的这两个老的党信奉一种十足宗派主义的教条狂热主义以及一种僵死的弃权政策，他们对日常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要求漠不关心，而饶勒斯派则代表了社会党策略的生机勃勃的发展、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多样性的适应以及对工人阶级当前利益的关心。

这种观念是以对法国社会主义实际状况的完全忽视为依据的。恰恰是工人党（所谓盖得派）和革命社会主义党（所谓布朗基派）这些老的组织开辟了法国社会主义进行活动的实际斗争的全部道路，并且制定了一种其基本特性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致的策略，虽然大家知道法国和德国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上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

正是工人党首先在法国把议会活动按照该党经马克思校订过的纲领的说法“从资产阶级欺骗的工具”变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而且不仅是为了达到鼓动性的启蒙工作的日

的，也是为了争取目前的实际改良的斗争。

我们有意举出 1889—1893 年这一届的议会会议，在这一时期，饶勒斯派的最优秀的力量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法国工人党的代表在上述一届的议会会议上建议并在议会中主张：1. 实行象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完整的劳动保护纲领；2. 禁止工厂中实行罚款，由劳资双方人数均等的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修改工厂规则；3. 将所有的工人救济基金交给工人管理；4. 禁止在发生劳动冲突时使用军队；5. 对于企业主侵犯结社法实行刑事追究；6. 改组最高劳动委员会，使其一半成员由工会选举产生。7.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男女工人平等的最低工资，禁止国营火柴工厂雇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8. 煤矿国有化；9. 把劳动保护扩大到商店和家庭工业，最后，由工人选举工厂视察员。我们在这里看到最详尽的议会改良工作，它同我们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活动完全符合。

上述两党在本届议会中的活动也是同样的情景。当事情关系到劳动保护或酒类税，对外政策或劳资仲裁法庭，捍卫议会的监督权和预算权或捍卫共和国反对僧侣时，布朗基派议员的优秀队伍及其“共产主义同盟”和法国工人党的同盟者——布雷东、德让特、格鲁西埃、桑巴、瓦扬、泽瓦埃斯等总是站在战斗的前列。

上述两个党组织同样在法国市镇参议会中展开了可以看作其他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典范的活动。单是法国工人党就在一个以上的市政机构中占多数，在几百个市政机构中占强大的少数。他们年复一年不倦地从事的建设性细小工作遍及

教育、卫生、救济事业、照明、供水、甚至戏剧和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工作不是属于过去的，它直到今天还在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着。

最后，在工会斗争的领域里，盖得一拉法格的党以及瓦扬的党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法国工人党在 1882 年就已经承认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以后，它在 1890 年向它的全体成员建议参加相应的工会，这个决议是同我们德国工会的愿望相适应的。它在 1895 年决定提出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一切劳动部门中工会章程对于所有从业工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它通过自己不倦的鼓动创建了纺织工人、海员、皮革工人的全国联合会，许多地方的矿工工会等等，并且领导了所有重要的罢工斗争：1882 年在罗昂，1885 年在德卡兹维尔，1890 年在加来，1892 年和 1895 年在卡尔莫，目前它在夏龙和蒙索累明开展活动。最后，当饶勒斯及其朋友们用一切方法助长法国工会活动家的空想——总罢工的思想时，工人党企图通过同这种思想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来把工会运动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当饶勒斯派为了政治上的利益想使工会同社会主义政党完全合并的时候，盖得和瓦扬则为了工会自由发展的利益维护工会对于政党的组织上的独立性。

由此可见，在法国社会主义的所谓“反内阁主义”派和“内阁主义”派之间所争论的不是关于实际工作还是“革命空谈”的问题。如果说米勒兰的支持者指责他们的对手忽略实际的改良工作，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把实际工作同无条件地赞颂现政府的一切行为等同起来了。

谁反对米勒兰—科利亚尔法案，也就是说反对规定童工必须跟成年工人同样长的劳动时间，那么，他就是反对劳动保护！谁把政府关于宗教团体的提案说成是不彻底的和毫无用处的，那么，他就是为教权主义反动派的胜利效劳！谁向全国揭露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共和主义的”卑劣行为，那么，他就是反对保卫共和国！

这种说法同德国国会中的反动派的奇谈如出一辙，他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说成是社会改良的反对者，因为它曾反对俾斯麦的劳动保险。

实际上法国党内的争论涉及的不是实际工作，而是实际工作的方式方法，实际工作的“两种方法”，只有从法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才能判断和理解这两种方法的矛盾的全部尖锐性。

在君主制的国家，例如在德国，共和制仅仅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要求，因此同社会主义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共和制在法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必须对这一形式进行批判和反对。只有当社会党人得以破除对于共和制国家形式的幻想，揭露其社会内容时，他们才能够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阵营并且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同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进行不断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盖得派和布朗基派（部分地还有所谓阿列曼派，虽然是以另一种途径，即通过极端否定政治斗争）这些老党的不朽历史功绩就在于促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实行分裂。

将近二十五年来，盖得、拉法格、瓦扬及其朋友们不倦地致力于加深无产阶级和共和派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壕沟，而饶



勒斯策略的客观倾向就是要重新完全堵塞这一壕沟。如果说这一倾向在议会党团的态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那是因为除了饶勒斯的追随者外，还有他的坚决的反对者瓦扬、泽瓦埃斯及其同志们参与决定议会党团的策略，并在很大程度上使饶勒斯的指示丧失了影响。

当然，饶勒斯派也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他们坚决相信，通过他们的“新方法”恰恰能够给社会主义立下巨大的功绩。饶勒斯自己在1900年2月10日在巴黎所作的一次演讲中甚至声明在所有基本的理论观点上同意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是一个党是什么样子，并不在于它把自己说成什么样子和以为自己是什么样子，而是要看它的行动。尽管饶勒斯具有真诚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及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极大的献身精神，饶勒斯派活动的决定因素，即它的政治策略恰恰导致工人阶级重新溶化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阵营中去，这就是说，使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所完成的全部事业重新化为乌有。

正是由于害怕重新沦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老的社会主义组织才往往在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日常的政治利益这一点上走得太远，并且在共和国危机中向工人阶级提出了弃权的口号。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德雷福斯危机中袖手旁观，而不是相反地站出来领导运动并从而决定运动的方向，这无疑也是一个令人遗憾不止的事实。

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出于对政治形式的漠不关心，那是完全错误的。早在1889年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就在

对布朗热危机发表的宣言中明确地宣布：“共和制是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政治形式。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共和制。”

即使现在，两党在议会中也支持“保卫共和国”内阁，把它当作较小的祸害，尽管它有种种卑劣行径。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保卫共和国，而在于工人阶级党应当是同一切资产阶级相对立的独立政党，还是只应当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一个消极的组成部分。

考茨基两年前曾说过，饶勒斯通过他的德雷福斯运动挽救了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那么今天必须说，盖得和瓦扬通过他们顽强地抵制社会党人入阁不仅挽救了社会主义的荣誉，而且挽救了社会主义本身。

从最近一次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以来，法国社会主义的情况完全改变了，而人们在国外没有觉察到，也没有重视这种转变的影响。

在代表大会期间饶勒斯派得到很大的国际同情，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由于他们勇敢的德雷福斯运动和由于他们争取社会主义统一的有力行动。

此后，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分子在德雷福斯危机中的合作，由于米勒兰入阁事件插了进来，就蜕化为对政府和激进党盲从的政策。这一来饶勒斯及其拥护者就把他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在一个时期内取得的在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中的领导地位重新让给了老的党组织，这些组织现在同过去一样，是国家政治中的先进部分。

由于饶勒斯派在对待米勒兰入阁的态度上丧失立场，米勒兰入阁对于社会主义统一问题同样是非常不幸的。米勒兰

事件作为德雷福斯危机期间的一个特殊情况还可以勉强加以辩护，因为那时不仅法国的当事人，而且外国的观察家都觉得共和制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在内阁的保卫行动失败后，为米勒兰的行为辩解的任何借口都消失了。但是饶勒斯却不再把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看作是一种例外的措施，他在利尔和布尔日的演说中，同他所接受的第一次法国统一代表大会（1899年）的决议以及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考茨基决议直接相对抗，把社会党人入阁说成是工人运动的正常斗争手段，是“新方法”，这一来，他就把他那一派的活动置于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在这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统一是非常困难的。由此可见，现在恰恰是饶勒斯这位团结思想的不倦的代表者由于坚持一种策略（向这种策略作斗争不仅是他的社会主义对手们的权利，而且是他们的义务）而葬送了他自己的事业并成为不团结的因素。

由此可见，从国际代表大会以来，事态发生了整整一百八十度的变化，这一情况使社会主义界对法国党内状况的看法有必要作一次根本的修正。

对于我们德国来说尤其如此。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外国的一个在所有基本特点方面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党，也没有任何理由赞扬外国的这样一种倾向，在我们这里，在所有的实际场合，这种倾向只要稍一冒头，党就要加以反对。

实际上我们在饶勒斯的策略中重新发现了我们在德国也已经熟悉的社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所有基本特点。关于法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复兴的理论不过是关于小手工业稳固性理

论的政治摹本。把社会党的政策降低为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采取共同行动，这就是在实际上克服“贪食奇谈”。取消对“共和主义”政府的任何批评以期待它乐善好施的行动，这就是“向善意伸出手来”这一原则的实现。目光短浅的无原则政策（它唯一指望议会中暂时的组合），这就是“随机应变”政策的体现。而实行高额粮食税的社会党人部长，这就是“实际政策”对灰色“理论”的极大胜利。

因此，如果法国米勒兰入阁以及与之相联系策略在我们这里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得到机会主义的拥护者最热烈的同情，那么，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情况也使得米勒兰事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

我们现在在法国看到一次机会主义策略的出色试验，在其他地方缺乏这种试验的一切前提。在德国，不仅由于国家的政治状况，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团结一致，看来使这一策略的拥护者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论来塑造工人运动并把他们的意向付诸实现。他们只能在“实际工作”的空谈方面下功夫，却无法造成值得一提的影响来进行这种“实际工作”。

在法国我们现在看到行动中的机会主义。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中特殊因素的独特结合，它骤然间取得了权力，“实际工作”的词句在付诸实行，纸牌上的国王骤然间成了真正的国王。它手中掌握了权杖，它可以表明它能够干些什么。

它正在表明这一点。

它一半已经陷入窘境，它很快将彻底地名誉扫地。瓦尔

德克—米勒兰内阁的经验有助于打消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对机会主义试验的兴趣。因此我们祝愿它长寿！

发表于1901年1月—2月。《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1册第16期第495—499页、第22期第676—688页。译自《罗·卢森堡著作集》第1卷第2分册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5—12、57—73页。

爱·瓦 扬

## 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sup>①</sup>

1901年1月28日于巴黎

亲爱的编辑公民：

我刚刚看了《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转载的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福尔马尔的文章《关于米勒兰事件》<sup>②</sup>。我很惊讶地读到他写的关于我以及社会主义党团的态度的那些话。我没有料到会捏造出这样一些不仅同真实情况而且与健全的理智和人所共知的确切事实相违背的谎言。硬加到我身上的那些话同样是假的。但是我不想同这样的说法进行争论，我只限于用一种断然的否认来加以反驳。我还要用下面的对事实经过的叙述来反驳它，我曾多次公开地在口头上或以书面形式谈到过这一事实经过，在1900年代表大会上我也提到过它，我曾把这一叙述寄给罗莎·卢森堡公民，她把它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我现在把它从革命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同盟的《1900年年鉴》上剪下来寄给您。

---

① 这封信发表在1901年2月15日《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编者注

② 参见本书第142—166页。——编者注

某些内阁派社会主义者曾写文章说明并肯定米勒兰曾把他接到参加组阁的邀请一事告诉了或设法通知社会主义党团和社会主义议员。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并且我也不认为米勒兰曾经想这样做。

社会主义党团在星期二举行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次会议不是根据米勒兰的要求，而是由党团的秘书处召集的。米勒兰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政治形势。米勒兰要求发言，他说，正如我们无疑地已经听到的那样，在危机开始时他就接到了参加组阁的邀请，但是就此进行的谈判没有结果，中断了，关于这件事再也没有向他提起过，这是一件完全过去的事情，他还可以担保，在谈判中，他自始至终不是以社会主义党团的名义讲话，他没有把党牵扯进去，而仅仅以个人的名义讲话和行动。

我随即要求发言，我在发言中说，我满意地了解到情况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丝毫没有卷入和牵扯到这些谈判中去，但是如果谈判当时成功了，或如果今后重开谈判并达成协议的话，我保留和我的朋友们一同发表声明并要求社会主义党团发表声明的权利；谈判以及米勒兰同意入阁，正如刚才他所承认的那样，仅仅涉及他个人，决不能把党和社会主义党团牵扯进去，党永远不会以任何借口变成政府的和内阁的党。

米勒兰讲了一句话并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手势。

我们又谈了几分钟其他的事情，大家分手时都认为，有关米勒兰进入内阁的谈判和建议，如同米勒兰所说的那样，已是过去的事情，并且今后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当时与会的人无论是米勒兰，还是社会主义党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到

加利费的名字和有加利费参加的内阁。

我只是在第二天即星期四的三点钟从一位朋友那里了解到，昨天夜里决定的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加利费内阁现在已经组成了。我立刻通过风动邮筒给米勒兰发了一封信，对他说，我不能够相信这些；我请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这个决定把社会主义党团会议上说过的一切话都勾销了，他参加有加利费在内的内阁在道义上是不允许的，等等。我只是在第二天即星期五早晨才收到米勒兰的复信，与此同时，报纸公布了昨天夜里由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加利费组成的新的内阁部长的名单。我立刻跑到革命社会主义党、共产主义同盟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议员那里，议会中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团就立即成立了。我只是在下午才在议会里碰到了法国工人党的议员，他们同我们一样决定脱离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联合党团而组织一个法国工人党的议会党团。

这是完全确凿的事实。

我在给米勒兰的信中说，社会主义党团会议上说过的话由于他同加利费一起参加内阁而一笔勾销了，我的意思是说，简单地声明我们作为一个党一点也没有参与他的行动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反对这一行为的严重后果。这就是我们立即脱离社会主义党团而组成革命社会主义党团的理由，也是在内阁名单公布的当天上午，即社会主义党团在这一时期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会议的第三天公开发表声明和抗议的理由。

我对于我所叙述过的并且现在向您叙述的这些事实所作的肯定本来是足够的了。但是我还是再次征询了我的亲近的朋友们的意见，以便把他们的肯定和证明同我的结合起



来，证明这些肯定和叙述是真实的。这些赞同我并允许我这样做的朋友就是：公民阿拉尔、布雷东、贝内泽赫、肖维埃尔、岸唐、德让特、迪富尔、阿尔蒂尔·格鲁西埃、莱唐、马赛尔·桑巴、瓦尔特和泽瓦埃斯。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我正是以他们的和我自己的名义说话和行动的。他们之中的四个人，公民贝内泽赫、布雷东、迪富尔和桑巴曾同我一起参加了社会主义党团的会议。

请您在《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刊登这封信和其中包含的引文，以便纠正福尔马尔的断言。亲爱的编辑公民，请接受我的敬意和我对社会主义团结的保证。

爱德华·瓦扬

译自泽瓦埃斯《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  
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295—298页。

让·饶勒斯

## 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sup>①</sup>

1901年4月7日于巴黎

亲爱的拉加德尔：

我不愿意再次参与关于“米勒兰事件”的辩论。在我看来，这场辩论持续下去会变得非常无聊。辩论双方要说的话，几乎都讲过了。如果我们过分坚持，看来总有一天会使我们党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陈规陋习之中。试验在继续着，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然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社会党人急于结束这种试验。现在只能敞开心扉，让时间来使情绪平静下来，等待党自己能够对一个社会党人第一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会带来的得失利弊作出总结。

但是你们发表了公民瓦扬的信，这使我不得不作一些说明。在答复福尔马尔的一篇我认为总的来讲是很正确的文章时，瓦扬公民指出，他从来没有对米勒兰可能参加共和行动内阁一事向他表示过同情。

为此，瓦扬让他的几个朋友为他作证。然而，他自己讲

---

① 这封信发表在1901年4月15日的《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编者注

的话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他比任何人更能够回忆起他讲话的确切意思以及他思想的细微之处。在这一点上，我要指出的仅仅是，根据昂提德·布瓦埃<sup>①</sup>和卡德纳<sup>②</sup>向我提供的情况，他们把那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中的所有发言都看成是对米勒兰同情的表示。况且，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解释卡德纳提出的建议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坚持这一建议。他说：“我要求在议会党团内进行一次明确的、正式的表决。米勒兰告诉了我们，有人曾经邀请他参加内阁。这样的邀请还可能再次提出，米勒兰会受到激烈的攻击。我们只是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向米勒兰表示同情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正式的和公开的表决来和他共同承担责任。”如果有人曾明确表示过敌对性的保留态度，怎么可能讲出这样的话呢？

然而，问题决不在于这一点。两年之后，再来讨论说话的人和听的人对这句话或那句话如何理解，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对于党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

1) 米勒兰参加内阁，并不是出人意料的事；

2) 起初，当党开始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人提出原则性的非难，也没有从阶级斗争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没有人谴责这是“偏向”，是“损害声誉的行为”。

没有什么意外，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社会党议员只有承认自己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得出奇和漠不关心到惊

---

① 昂提德·布瓦埃(Antide Boyer 1850—1918)——法国社会主义者，1890年加入法国工人党，赞成米勒兰入阁，1900年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② 贝尔纳·卡德纳(Bernard Cadenat 1853—1930)——法国社会主义者，1898—1899年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赞成米勒兰入阁，1899年12月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人的程度，才能够说，他们对此感到意外。

社会主义党团曾正式委派代表参加共和国警惕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有共和党的各派的代表。当危机爆发，杜毕伊内阁倒台，需要克服无数困难以建立一个政府的时候，社会主义党团怎么能够不去考虑它在议会里参加保卫共和国事业的下一步将是什么，怎么能不去考虑它将以什么方式去参加行动和战斗呢？

人们只要读一下6月15日至6月23日的《小共和国报》，就会看到，我们不断地提醒党注意酝酿中的事态的“新发展”。我们发表了布尔茹瓦先生的声明，他对共和国总统说，根据他对局势的了解，社会党愿意提供最积极、最直接的帮助。就我个人来说，当米勒兰向我透露瓦尔德克-卢梭先生向他提出的建议后，我立即告诉他，他是无权对此保守秘密的，他立刻表示同意。我马上向《小共和国报》的同事们讲了我们知道的一切，并且特别请求迪布勒伊<sup>①</sup>和加布里埃尔·法尔雅<sup>②</sup>两位公民将这一切转告他们的朋友。在你们发表的文章里，迪布勒伊公民公正地承认，我曾经和《小共和国报》的编辑交谈过形势。他确实还说过在这些谈话里，没有涉及任何正式的东西，这绝不是米勒兰和社会党之间进行斡旋。我认为迪布勒伊的保留是由于翻译福尔马尔文章时出现的小错误引起的；翻译中说，是通过我的斡旋，米勒兰才事先通知了他的

---

① 路易·迪布勒伊(Louis Dubreuilh 1862—1924)——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派的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1905—1918年为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编者注

② 加布里埃尔·法尔雅(Gabriel Farjat 1857—1930)——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1900年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同事。而福尔马尔写的却是通过我的传话。但这里涉及的绝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和措词上的问题。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及时地得到了通知。他们正是通过我，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正式组成前三、四天就知道米勒兰已经接受担任部长的邀请了。如果米勒兰这一行为在当时就认为是件丑闻，对于党来说是危险的、可耻的事情，那么党是有时间提出抗议的，是有时间预先采取行动阻止一个社会党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我还要指出的是，我曾经在6月20日(星期二)，或是6月21日，告诉社会党的积极分子特别是迪布勒伊公民说：邀请加利费将军参加内阁，是让他去当一个文职部长的办公室主任，而不是当陆军部长。实际上，问题起初就是以这样的措词提出来的。

事情还不仅如此：我在《小共和国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在内阁危机期间，社会主义党团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这使我感到惊讶。秘书富尼埃公民召集了议会党团会议，米勒兰于6月21日(星期三)参加了会议，他把别人建议他入阁一事告诉了议会党团。在那个时候，瓦尔德克-卢梭先生由于温和派的反对和活动，的确是失去了信心，放弃了组阁的想法。因此米勒兰把接到邀请入阁的建议一事只是作为已经过去的事谈谈而已。事实上，当时危机并没有解决。既然象瓦尔德克-卢梭先生这样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觉得有必要请一名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问题还没有结束。

在那个时候，反内阁主义的社会党人本来应该作出一项原则决定：“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都是背叛行为。”

谁要同意这样做，就要被开除出党。”他们这样说了吗？没有。当时他们竭力阻止社会党人参加内阁了吗？也没有。当时有谁提到阶级斗争了吗？没有一个人。

瓦扬公民说他曾表示有保留意见。他说，如果米勒兰参加内阁，那只是以他个人名义，而党是不承担责任的。这一点是清楚的。然而这只是一**种善意的保留态度，谨慎的保留态度**，它与开除出党的判决或者以后发表的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都毫无关系。

下面这一封信，更确切地说，通过风动邮筒发来的一封信，是瓦扬于6月22日，即议会党团举行会议的第二天，寄给米勒兰的。

“亲爱的米勒兰，

但愿我写给您的这些话是无的放矢。我是真诚地这样希望的。尽管刚刚这里所说的事情是难以置信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应该给您谈一谈。有人说您和加利费一起参加了内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行为就把昨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一笔勾销了。要是说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应该在内阁名单中出现，因为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代表了凡尔赛的一切罪恶和一切反动势力，那么这个名字就是加利费。他加入内阁是对我们的一种挑衅，是向我们提出挑战，我们必须起来应战。他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刽子手和敌人，有人企图让他把枪口对准我们。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无耻，多么卑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希望尽快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好使自己放心。我不能相信，您竟会接受这样一个伙伴，您在被征求意见时竟没有说一个这样的内阁不可能

是共和主义的内阁；正因如此，我就更加认为这一可怕的消息是不可能有的了。过去甘必大<sup>①</sup>就是仅仅因为和加利费发生了接触就失去了全部民心，而这是罪有应得的。

最后，但愿我的不安只是一场虚惊。亲爱的米勒兰，请接受我诚挚的友情和敬意！

爱德华·瓦扬

1899年6月22日，星期四”

“这一行为就把昨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一笔勾销了。”我几乎用不着去强调信中这句话的重要性了。我绝不是要从这句话里得出结论说，瓦扬公民在21日星期三曾经正式同意可能出现的一个社会党员参加内阁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就是瓦扬至少没有发表宣战书：在使社会党不承担集体性责任的同时，瓦扬并没有对邀请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这样一种做法表示愤怒与厌恶，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而引起瓦扬公民强烈反应的，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加利费将军上台他自然地 and 理所当然地流露出来的感情。任何一个真诚的人，在读了这封信之后，都不会否认，如果加利费没有参加内阁，那么瓦扬公民丝毫不会反对社会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因为向政府派遣一支先遣队，同时还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全部自由，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布朗基主义策略的。

---

<sup>①</sup> 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 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1870—1871年为国防政府成员，1880—1882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编者注

但是，加利费将军的名字使瓦扬公民不可能继续保持一种既冷淡又善意的态度了。

这个时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非人格化的专政”这类一般性公式提出来了，以便从原则上证明他们的谴责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这种谴责是由于非常偶然的原因引起的。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我有权说社会党对米勒兰进入内阁并不感到意外。我有权说，如果没有加利费的名字，革命社会主义党人绝不会提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只是事后才想出来的。就在这封信里，瓦扬公民也根本没有想到对米勒兰说：“放弃原则竟然会走到这种地步！”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明显吗？他的全部努力的目的只是把加利费从内阁中赶走；似乎他还希望米勒兰把加利费这个人物从内阁中赶走，这样组成的内阁就会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了。

要说明这些人和那些人的态度并不困难。米勒兰向党作了报告。但是很明显他不想正式地作党的代表。他宁可由个人承担自己行动的责任。这样，他的行动就更自由一些，他也就不承担使内阁全部成员服从有组织的党的义务了。在他看来，全党不能接受的东西，他个人就可以接受。这就是米勒兰并不十分急于接受正式授权（卡德纳以他惯有的坦率和勇气曾要求议会党团这样做）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党人掌握资产阶级政府部分权力的这种大胆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不管怎么说，还是唤起了瓦扬公民的革命激情。但他不希望正式实行这种没有把握的冒险尝试，不希望有损于党。他不愿意谴责和反对米勒兰；他也不愿意让社会主义和革命承担集体责任。因此，在6月21日



的议会党团会议上，米勒兰和瓦扬，出于不同的动机，却一致同意否决卡德纳的提案。

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真实经过。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无休止地去辩论这个问题了。考茨基盛情友好地约我在《新时代》杂志上回答罗莎·卢森堡的一组文章<sup>①</sup>。我请求他允许我推迟我的答复。目前进行这种辩论只能是老调重弹，毫无益处。只有事态的发展才能使各种观点得到调整，才能展示未来的前景。

不论人们做什么，也不论人们以何种方式去阐述它，判断它，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事实，这是任何驱除妖魔的符咒也无法将它从历史上抹掉的。即使这一事件不会以完全同样方式再现，它还是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这一事件证明了社会党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是有力量的，从而使这个党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为这个党确立了进行活动和创造的崭新的法则。因此，要从事巨大的组织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要怀着满腔的热情来进行准备。为此需要的是理想而不是幻想。

祝您好！

让·饶勒斯

选自饶勒斯《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  
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299—305页。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167—194页。——编者注

爱·瓦扬

## 米勒兰内阁<sup>①</sup>

1901年4月25日于巴黎

亲爱的拉加德尔公民：

饶勒斯公民给我写了回信。他承认，我曾经对米勒兰参加内阁表示过必要的保留意见。但是，在他看来，这是我个人的保留，其实我并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了党才这样做的；况且，从当时情况来看，提出这些保留意见也就够了。对于议会里的情况，他只是间接地知道，因而他的话以及他的结论缺乏准确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所讲的已被革命社会主义党、共产主义同盟和法国工人党的全体议员证实，其中一部分议员还参加过内阁成立前夕举行的议会党团会议；我所讲的没有遭到否认，也是不可能遭到否认的。这是主要的。

米勒兰在这个会议上说，别人建议他参加内阁已经是过

---

① 这是瓦扬给拉加德尔的一封信，发表在1901年5月1日的《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同时作为给考茨基的信以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31期上。《新时代》编辑部给这封信加了这一标题，并且发表按语说：“我们的朋友瓦扬给我们寄来了这封信，现转载如下。我们认为，关于米勒兰事件的开端的文件的发表至此可以结束。”

——编者注

去的事情了；在整个谈判期间，无论他讲话还是办事情都是以他个人身分。他绝没有把议会党团和党牵连进去。

我立刻发了言。我说我注意到了米勒兰的讲话。如果有人向他提出同样的建议并且被他接受的话，——然而米勒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我将要求议会党团声明：议会党团和党都不可能参加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因而，米勒兰的行为和他接受入阁一事根本没有也绝不能牵连到议会党团。

这就是我讲话的简要概述，但也是我讲话的确切意思。我刚刚讲完，米勒兰便作出一个手势并讲了一句话，表示赞同。后来再没有人发言，似乎议会党团同意我的讲话了，于是我站了起来，和几个同事去参加议会的会议了。

直到最近几天，我还是以为议会党团会议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我的一位朋友和其他几位朋友都证明我当时确实是这样讲的。——拉加德尔公民，在我把我讲的话写信告诉罗莎·卢森堡之后，我曾立即告诉你。——与此同时，这位朋友告诉我，在我们走后，会议还继续开下去，但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情况。

如果在我离开会场的时候，昂提德·布瓦埃和卡德纳讲了些什么，而我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听见，如果人们还为此交谈了几句话，那么我只能够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样，对此已毫无印象了。如果卡德纳提出了类似饶勒斯所说的那种正式的建议并进行了讨论，而我到场却不知道，这是不会有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如果有这样的建议，它只能是对刚才讲的话和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否定。

如果卡德纳提出了这一建议，我还参加了讨论，我肯定是要坚决反对的。这是因为根据饶勒斯的说法，卡德纳要求我们“承担”责任，而我呢，我则是要我们“摆脱”这一责任。即使卡德纳的建议有所不同，由于下述的这些原因，我还是要反对的，而这些原因是由议会党团的现状和各组织议员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决定的。

确实，我认为，我提出的我们对新的谈判以及谈判的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建议，是议会党团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米勒兰的赞同，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对。我还认为，预先作出关于重开谈判的决议——如果这个决议不是对米勒兰个人的谴责，而且谁也没有要求这样做——那么，即使不是实际上磋商依然作为议会党团成员的米勒兰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参加内阁，而且是以党员和议会党团成员的身分参加内阁，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一定会造成这种印象，这样一来，就会把党和议会党团卷进去，而当时却必须使它们完全摆脱开。

有必要回顾一下那一时期多数社会党人的看法。只有少数人对米勒兰加入内阁感到惊讶，而多数人长期以来却认为他一直窥伺部长的职位。

自从米勒兰加入社会党以来，我参加过多次交谈。人们在谈话中对这一假定进行了讨论，得出的结论总是不变的：“让他去参加内阁吧！只要他自己承担风险，和党不发生什么关系，不把党牵连进去，不损害党的声誉。我们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坏处。”

正是根据这一精神，我提出了保留意见并且要求别人保

留意见，以便使党摆脱参加内阁的责任，不损害党的声誉，同时却没有在议会党团内讲过一句对米勒兰个人不友好的话。

这次在内阁危机期间唯一的议会党团会议是在星期三午后举行的。米勒兰在这次会上说他不再参加入阁的任何谈判了。然而过了几个小时，在同一天晚上，饶勒斯向迪布勒伊说，瓦尔德克—米勒兰—加利费内阁如果没有成立的话，至少也在筹建之中。迪布勒伊在第二天即星期四下午又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星期四下午，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给米勒兰发了一封信，后来饶勒斯将它发表了。事实上，当时内阁已经组成。

当天晚上，米勒兰参加了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在给我的复信中说道：让未来作出判断吧！

在给米勒兰的信里，我说，如果他和杀害巴黎公社社员的刽子手加利费的合作不幸得到实现的话，就把在议会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勾销了，这一点饶勒斯已强调指出过。我的意思不仅是说，他这样做就把我对他个人的同情的话勾销了，而且我主要是认为，只是发表一项使党不承担责任的声明已经不够了，还必须提出抗议，鉴于当时的环境，这一抗议是无论怎样尖锐都不为过分的。以后发生的事情是这种想法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因此第二天即星期五上午，当我同时收到米勒兰的信和登载新内阁名单的报纸之后，马上就去找革命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同盟的议员；也就是在这天上午，我们发表一份抗议书，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党团并成立一个单独的革命社会主义议会党团。

由于我们确信议会党团是不会跟我们走的，所以我们认为只有退出议会党团，才能使我们的抗议具有更大的意义和影响。我在当天下午才会见了法国工人党的议员。他们作出了一个类似的决定，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党团。

在下一个星期二的会议上，中央革命委员会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发表了第一个抗议。议会里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同盟各党团也发表了类似的抗议来表示响应。在众议院里，我们对着部长高喊“公社万岁！”的口号。在讲台上，我和泽瓦埃斯一起抗议屠杀巴黎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刽子手坐在政府成员的席位上。

毫无疑问，加利费参加内阁以及由此我们产生的厌恶心情，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是议会党团成员和社会党党员的米勒兰愿意与这样一个人同流合污，这一切就是立即提出这些强烈抗议的原因。除了这些个人方面的问题之外，我们一如既往仍然认为，绝对不去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内阁——在目前制度下，是不可能参加的——对于我们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对于我们党来说是首先必须做到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绝不感情用事，我们要象过去一样，在采取行动和参加表决时仅仅考虑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我们曾非常担心，在议会党团内外，有那么几个人，出于对米勒兰的友谊而走得太远。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尽管不断恶化的局势本来有可能使他们改变意见，却有一些社会党人——不论是议员还是非议员——起来鼓吹一种学说，进行煽动，搞阴谋活动，建立一个内阁主义的党。米勒兰则是这个党的预言家，是社会党内第一个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新方

法付诸实现的人，从此以后社会党将有一名成员作为它的代表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了。

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内阁主义，反对这种离开社会主义的极其危险的偏向，发表新的声明和抗议势在必行；革命社会主义党和法国工人党、共产主义同盟一起发表了保卫和拯救社会主义以及维护社会主义的荣誉的宣言。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诚心诚意地、满怀感激和喜悦的心情欢迎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非常出色的文章<sup>①</sup>。

不管人们讲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真相总是越辩越明的。我在这封信里，对我过去就这一问题听说的和所写的稍加重复，进一步作些解释并且表示坚持，我力求以此来准确地说明真相。

亲爱的拉加德尔公民，请接受我的友情和敬意！

爱德华·瓦扬

译自译瓦埃斯《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  
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305—310页。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167—194页。——编者注

格·普列汉诺夫

## 谈谈最近的巴黎国际社会党人 代表大会(摘录)

——给授予我委托书的同志们的公开信

(1901年)

同志们：

你们委托我代表你们参加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我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你们报告，你们的代表对于大会上发生的一切采取什么态度，并且说明为什么他恰恰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另一种态度。

先谈谈9月23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国的代表们代表自己的党向大会表示祝贺，对于统一的意义谈得很多，并且坚决地劝告法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向共同的敌人进行一致的斗争。有一些发言人如此热中于统一的思想，以致对论据和例证不加选择。善于演说的比利时代表埃米尔·王德威尔得援引了“在1793年高举革命旗帜的人们”的例子，认为分歧并没有妨碍他们共同反对敌人。发言人大声地说：“1900年的社会主义者！1793年的资产者做到的事情，难道你们就做不到？”这些话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些话很奇怪。的确，1793年标志着山岳党



同吉伦特党的最激烈的斗争。如果说这一斗争并没有妨碍法国革命者给予共同的敌人以坚决的反击，那么，这意味着，革命者的统一并不是他们胜利的必要条件。还应该指出，山岳党对吉伦特党的胜利使革命派的抵抗力增强了十倍，而调和这两派大概会削弱它的抵抗力，因此，在革命事业中好的争吵有时胜于坏的和平，革命力量的统一并非总是有益的，而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有益的，——这个结论同王德威尔得所希望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

谁宣传统一，就不应当只限于一般地谈论统一的好处，而必须仔细地考察斗争的各方不得不在其中进行活动的具体条件。只要弄清楚这些条件，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什么是统一的障碍，那时，统一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只要消除这个障碍，就可以为巩固的和平奠定巩固的基础。如果他们由于某一种原因而不愿意为消除统一的障碍出力，而只限于空谈争吵的坏处和彼此友爱的美好，那么，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完全无助于统一，不管他们的言词是多么有力，多么漂亮。

当我倾听王德威尔得的有力的漂亮的发言时，我头脑里迅速闪过这些想法。由于无论这一位发言人或者鼓吹统一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接触到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真正原因，也没有表示打算帮助消除这些原因，因此我决定完全不涉及这个有趣的题目，——我不愿意在一片调和的谐音中发出不协调的声音，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参加一般地谈论争吵的坏处是多余的。当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在向大会致贺词时只限于说明我们俄国的状况，在俄国，俄罗斯工人组织和犹太工人组织在同一旗帜下为争取更好的未来而斗

争，勇敢地击退政府的打击，这个政府残暴的专制统治使整个文明世界蒙受耻辱。

.....

在这些争论问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预先估计到，正是这个问题将受到大会最主要最集中的注意。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具有这样突出的意义？有些人说，这是由于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引起的。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关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无疑地由于米勒兰参加上述内阁而变得非常尖锐起来。但是早在米勒兰开始同残忍的士兵加利费紧密合作来拯救法兰西共和国之前，各国社会主义者就意识到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加利费在镇压巴黎公社时表现得极其野蛮和残酷，他因此出了名。米勒兰是在1899年6月22日入阁的，而在那一年5月，在布鲁塞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就根据我的建议作出决定，把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列入下一届代表大会议程。因此很明显，不管米勒兰是否出现在没有必要的地方（象赫尔岑所说的那样），而且在这一事件之前，各国社会党人就已经积累了充分的理由来重新向自己提出问题：争取自己的经济解放的无产阶级究竟应该向自己提出怎样的政治目标？

谁如果注意最近几年来的社会主义著作，就会知道这些理由是什么。最近几年的特点是在这种著作中出现新的“批

判”流派，这个流派的代表硬说，运动就是一切，而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坚决地劝告社会民主党抛弃任何关于革命的行动方式的想法而转变为和平的社会改良的党。这种“新”学说发展下去，就合乎逻辑地必然会导致修改关于工人阶级政治任务的概念，并且企图从其中消除所有那些不符合“新方针”的因素。

当我向布鲁塞尔国际代表会议建议把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日程时<sup>①</sup>，我想迫使“批判家们”说出自己的全部想法，从而揭示它的真正内容。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以李卜克内西为首支持我的建议的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们也抱着这样的打算。

可惜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在这方面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期望。这次大会没有导致在所谓教条主义者（人们在气愤的情况下也把他们称为狂热分子和宗派分子）和自称的“批判者”之间的决定性的交锋。不仅如此，在代表大会上还作了很大努力来回避分歧，而在我们队伍中这些分歧的存在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些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关于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盖得向代表大会提出了几天之前法国工人党伊夫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其中说，这种联盟（请不要忘记，同志们，这里指的是在西方，那里已经存在立宪制度）对于社会党始终是有利的，因此应把它减少到

---

<sup>①</sup> 据我所知，在布鲁塞尔没有谈到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注

最低限度，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而且只是暂时地才能缔结这样的联盟。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当然非常值得怀疑这个决议完全准确地表达了“新方法”的拥护者的观点。但是他们没有反对这个决议，显然，他们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问题不在于决议本身，而在于对它的解释。既然米勒兰借口特殊情况迄今仍旧留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犯下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反对工人阶级的罪过，既然米勒兰的说法在饶勒斯以及其他许多或多或少“独立的”法国社会党人看来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么，在由于特殊情况而被迫缔结暂时联盟的借口下，显然总是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而丝毫不违背巴黎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文字。“新方法”的拥护者善于对各次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作非常广泛的解释，我们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德国也看到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伯恩斯坦分子”在德国是怎样解释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作出的汉诺威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就够了。

但是，尽管巴黎通过的关于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决议可能遭到那些能依靠歪曲决议来捞到好处的人的曲解，但是终究不应怀疑，巴黎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就是作了最大的努力来清楚、正确地回答它所面临的问题。而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的态度则不完全是这样。

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内容如下：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简单地是某种暴力行动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

立法会议的结果。

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

至于在某种情况下，是否存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形势，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社会党的多数赞成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又继续成为本党的全权代表时，这种冒险的尝试才可能是有益的。

如果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不服从自己的党，或者不再是党的全权代表，那么他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一行为就从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手段变成削弱无产阶级的手段，从有助于夺取政权的手段变成阻止夺取政权的手段。”<sup>①</sup>

在这个决议中首先使人惊讶的是它的第一部分，其中说，夺取政权不可能简单地是某种暴力行动的结果，而要求长期的艰巨的准备工作。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代表大会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思想呢？难道代表大会上有人否认这一思想的正确性？不对，在代表大会上没有这样的人。或者在各文明国家的社会主义著作中也许有一些“批判者”开始要证明，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只需要一次大胆的“袭击”就可以了？不对，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批判者。与此相反，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44—45页。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引用的决议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与巴黎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法文本在文字上略有出入。——编者注

却常常听到有另一些批判者，他们否认马克思的下述无可争辩的原理的正确性：暴力始终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定决议草案时必须首先表达对这些批判者的否定态度，只是在这以后才指出那些只能逐渐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暴力能够起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助产婆的作用。他必须采取进攻的行动方式。考茨基却不是这样行动的。他想到，“批判者”指责我们是“布朗基主义”，为了防御自己受到批判者的攻击，他请求代表大会表示反对那些以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暴力行动就能够夺取政权的人。

这种策略是不适当的和不够的。不适当的——因为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可能被解释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解释为）他在暗指法国布朗基派，而对他们进行攻击至少是不必要的。这种策略是不够，因为对于“批判者”的态度过于温和，而对这些人应该是应该坚决地、尖锐地加以反对的。<sup>①</sup>

当我读完了这里所分析的这一部分决议时，我向考茨基指出，进化的观点丝毫不排斥把暴力当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因素的观点。他在回答时向我指出“夺取政权不可能简单地是某种暴力行动的结果”（在决议的德文本中是：eines blossen Handstreichs<sup>②</sup>）这一句话。他说得很对：如果说为了某一日的采取一种因素的行动是不够的，这并不意味着否

---

① 考茨基还忘记补充一句，他所指的“现代民主国家”远非在西欧所有国家中都存在，这一情况对于社会党人的策略不能不起极重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注

② “一次简单的袭击”。——编者注

定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或适宜性。但是，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乐曲是由音调组成的。我觉得，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的“音调”可能引起许多误会。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经验表明我是正确的。

在这个草案的法文译本中，把不可能“简单地是某种暴力行动的结果”写成“不可能是某种暴力行动的结果”，由于这样地去掉一个很“简单的”词，暴力的助产婆作用就被宣布为对“现代民主社会”来说是完全多余的。我不知道，由于谁的过错（或者由于谁的发起）产生了这种对德文原本的歪曲，但是这对于“新方法”的拥护者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我们在代表大会之后不到两星期就证实了这一点。

星期日，10月7日，米勒兰在朗斯（法国北部）发表演说，凭他所具有的律师的机灵，他能够在演说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考茨基的决议（按照它的经过歪曲的形式），谴责“作为社会改造方法的暴力”，而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谴责阶级斗争。米勒兰的忠实辩护人饶勒斯非常明白这个部长的声明的原则意义和策略意义，认为必须友好地责备部长先生对暴力的否定态度；与此同时他急忙引证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是按照它的经过歪曲的形式，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者们本身在这一点上离开米勒兰不远<sup>①</sup>）。同志们，请你们自己判断，这种令人愤怒的概念混乱好不好！

考茨基草案中涉及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其余部

---

① 见1900年10月10日《小共和国报》。那里刊登了米勒兰在朗斯的演说。——普列汉诺夫注

分具有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毛病。一方面，它似乎完全不涉及目前法国的情况，让我们的法国同志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去对待“米勒兰事件”。另一方面，它包含了一系列对伴随着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内阁发生的情况的间接指示。代表大会通过这个决议一方面似乎谴责了米勒兰，而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声明，米勒兰完全不受它的管辖。我觉得，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议会必须更坦率、更坚决地表示对这个人的意见，这个人顽固地不愿放弃部长的软椅，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法国社会党人的统一事业。我深信，如果代表大会用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达方式谴责米勒兰，它对于统一所做的贡献就会比大会的参加者就互相友爱的乐趣以及和解的甜蜜发表漂亮的、但没有结果的演说所做的要多得多。而且我过去和现在都觉得，关于米勒兰不受国际代表大会管辖的理论是大有问题的，甚至在这一场合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问题实际上不在于谴责米勒兰，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他的行为表示意见。我到目前为止不能理解，为什么国际代表大会没有权利对此发表意见。尤其是差不多每个发言人在谈到考茨基决议时都认为自己有责任说几句赞成或者反对米勒兰的话，因此这一点就更加不能理解了……

但是，不管怎样，代表大会选出的制定关于夺取政权问题的决议案的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正确或错误的理由，不希望代表大会公开地明确地表示关于米勒兰的意见。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私下的交谈（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使我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我试图对考茨基的草案中关于“米勒兰事件”所说的，——通过间接的指示，



——作某些(在我看来是有益的)补充。我建议对这个草案补充代表大会的声明：即使在社会党人可能被迫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非常情况下，只要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该退出内阁。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补充案可以说是经不住批评的：究竟哪一个资产阶级内阁能够不偏不倚地对待劳动同资本的斗争呢？但是，即使偏私也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并不是任何资产阶级内阁都决心象瓦尔德克—米勒兰内阁那样残暴地镇压经济斗争所引起的工潮。瓦尔德克—米勒兰内阁曾两次染上了无产者的鲜血。<sup>①</sup>我提出补充案的目的是使人注意到瓦尔德克内阁的这种残酷的偏私，从而再一次向米勒兰暗示，是他放弃部长职位的时候了。我不知道，委员会其他成员对我的补充案是怎样理解的，但是他们以很大的多数通过了我的补充案，这使饶勒斯不满，他向我发出呼吁，说什么要“正派”，并且报名发言反对我。这后一情况在我看来对于法国社会主义的那一流派的领导者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流派由所谓的独立派组成，然而它对于内阁却是完全不独立的。我很有兴趣地想知道，饶勒斯能够说些什么来反对我的补充案。令人遗憾的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当委员会主席让他发言时，他站起来想了片刻，

---

① 正当代表大会上讨论“米勒兰事件”的时候，这位部长的辩护人“饶勒斯分子”散布流言，说内阁将把枪杀夏龙工人的宪兵交法庭审判。“还能再要求它做些什么呢？”——他们以深受感动的心满意足的样子补充说。确实，对宪兵进行了审判，但是宣告他们无罪，对他们的审判一方面是为了欺瞒老实人而演出的卑劣的滑稽剧，另一方面是对开枪者的奖励，因而也是对工人阶级的新的威胁，这难道还用得着多说吗？——普列汉诺夫法

说实际上他并不想反对我的补充案，而只是请我作一些解释。他问道：“谁来判断内阁的偏私呢？是不是考茨基提案中所说的那个党组织？”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巧妙。我不能否认，作出判断的权利应当属于党组织。但是由于在法国不存在这样的统一的党组织，因此直到将来法国社会党人实行统一为止，我的补充案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失去任何实际意义。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米勒兰加入内阁才使法国社会党人发生了分裂。饶勒斯接受我的补充案，条件是委员会把它修改成这样：

“但是，大会确认，即使在这些非常的情况下，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该退出内阁。”

我试图拒绝饶勒斯提出的修正案，因为它是无益的，但是王德威尔得和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指出，他们在通过我的补充案时正是按照这个修正案所赋予它的意义来理解的。我确信委员会不会支持我，因此我不再说话。

这样一来，我的修正案得到了怎样的含义呢？它的含义是，在那些不存在统一的党组织的国家里，社会党人可以毫不犹豫地甚至留在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偏私的内阁中。但是我要说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代表大会如果稍微认真地对待事情，也不能同意这种真正令人惊讶的表达自己的方式。我决定使代表大会注意到这一情况，因此我来到代表大会会场的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名字列入所谓的发言人名单。

但是这个名单很长，而代表大会的时间很少，因此无论是我或者甚至是考茨基本人都没有得到机会就考茨基决议问题

发言，我希望对这个决议作补充，而考茨基则希望说明决议的真正含义。

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就这个问题发言，这使我面临相当困难的抉择；或者是无保留地投票赞成考茨基的提案，这个提案由于饶勒斯而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结尾，或者是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而支持茹尔·盖得提出的并得到我们（“第九”）委员会中少数派赞同的决议案。

茹尔·盖得的决议案全文如下：

“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指出，必须把夺取政权理解为对资本家阶级实行政治上的剥夺，不管这种剥夺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因此，要实行这种意义上的夺取政权，只有占据议席，而这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要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因此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始终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sup>①</sup>

我不能无条件地赞成这个决议案，因为它完全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而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象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为了捍卫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这种参加可能是必需的。问题仅仅在于，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党人不是用自己后来的行动和自己的言论来模糊工人的阶级觉悟，——象米勒兰所做的那样<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81页。——编者注

<sup>②</sup> 尤其是请参看米勒兰在“商业宴会”上著名的演说，资产阶级报刊兴高采烈地对这篇演说表示赞赏并作了评论。——普列汉诺夫注

而是加强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这是否可能？我认为是可能的。我相信，甚至米勒兰本人，——尽管他的玫瑰色的社会主义是模棱两可的，——本来也能够对法国工人阶级发生良好的影响，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只要当他确信无法遏止自己在内阁中的同僚们的保守派热情后，就宣布辞职，例如，在夏龙事件之后，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勇敢、坦率地在一个特别的呼吁书中向工人们解释自己的行为<sup>①</sup>。而比米勒兰更好地掌握阶级观点并具有更多革命热情的人还可以做得更多些。因此我认为盖得提出的决议案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个实质上不正确的决议案在我看来比加上了我的补充案的考茨基决议案更接近真理，因为我的补充案被饶勒斯弄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我决定投票赞成盖得的决议案。

大家知道，盖得的决议案被赞成考茨基决议案的绝大多数否决了。我尊重代表大会的意志，但是我不能不看到，饶勒斯对我的补充案所做的修改使考茨基决议案具有非常模棱两可的形式，此外，不能不使我感到惋惜的是，虽然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曾经如此具有说服力地劝告法国社会主义者实行统一，这个代表大会却不愿意通过对米勒兰和整个“新方法”的坚决谴责来促进这种统一。

我该结束了！在搁笔之前，我只是还要指出一点。自从

---

① 我在同饶勒斯派中的一位朋友谈话时说：“你们必须承认，米勒兰放过了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社会党人的良好机会。”——“这是怎么回事？”——我的交谈者问我。“很简单，他必须在夏龙事件后辞职并且大声宣布，夏龙的枪杀事件又一次证明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偏私。”——“这可能是对的。”——我的这位同时又是对手的朋友回答说。——普列汉诺夫注

我抛弃七十年代的半无政府主义民粹派观点以来，我理所当然地总是拥护“政治”的。但是，同志们，要是你们知道，“新方法”给国际代表大会以及随后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全国代表大会带来了多少政客手腕，那就好了！我直到现在无法摆脱这些政客手腕给我留下的沉重的、真正是令人痛苦的印象。要知道我们看到的只是“新方法”的花朵，它的果实还在将来。没有什么说的，真是令人愉快的前景！

紧紧握手，衷心希望你们不要经受到许多这样的印象！

忠实于你们的 格·普列汉诺夫

附记：我认为必须补充一句，由于我投票赞成茹·盖得的提案，我就同俄国代表团的多数人意见不一致，他们投票赞成考茨基的提案。然而，我荣幸地同巴·阿克雪里罗得、维·查苏利奇和德·柯尔佐夫同心一致地投票。

格·普列汉诺夫

发表于1901年。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卷  
192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3—116页。

让·龙格<sup>①</sup>

##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

(1902年2月)

1899年7月似乎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推动力迫使法国各种社会主义组织走向统一，这股推动力的确是很大的。

德雷福斯案件对老的党组织是一场艰苦的考验，它们最终经受住了这场考验，虽然这很难说是它们自己的光荣。尽管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从那时以后犯了许多值得惋惜的错误和过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只有他们表现出自己是跟得上时代的。他们纯洁的革命立场，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激烈斗争也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赞许。

那时，党内大部分“盖得派”和“布朗基派”的同志与其说接近他们的领袖盖得和瓦扬，不如说更接近饶勒斯和主张统一的社会党人——这是不容怀疑的。<sup>②</sup>

在特鲁瓦、格勒诺布尔、利尔的盖得派中间，或者在布尔日、科芒特里、甚至巴黎的布朗基分子中间，饶勒斯所受到的

---

① 让·龙格 (Jean Longuet 1876—1938)——马克思的外孙，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派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② 在最近几次斗争中最无情地攻击饶勒斯的人，绝大多数在1899年都曾或多或少公开表示赞成饶勒斯而反对他们自己的组织。——龙格注

欢迎比任何地方都更加热烈，他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政策和建立统一的党组织的思想所赢得的追随者比任何地方都更多。

米勒兰进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时候，绝大部分法国社会党人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盖得和瓦扬提出的抗议。但是任何人，只要他的阶级觉悟还没有被纯粹民主的观点压倒，总是本能地感觉到，参加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毕竟不能同一切反对专制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人们组成的联盟相提并论，对于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参加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内阁成立后不几天，我们的拉加德尔同志在《社会主义运动》<sup>①</sup>杂志上提到了“变了样的社会主义观点”，而米勒兰恰恰暴露了这种观点的危险，拉加德尔公开声明，“社会主义的代表和商业部长米勒兰先生之间的矛盾将不断加剧”。

1899年10月15日，本文作者在《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写道：

“细想起来，著名宣言<sup>②</sup>的作者犯了错误，他们没有哪怕只用几句话来承认象饶勒斯那样的德雷福斯派社会主义者所进行的运动是高尚、伟大和必要的。如果盖得派和布朗基派的全国委员会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们就会居于无懈可击的地位。《小共和国报》征询了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的意见，其结果是有决定意义的：一致赞成饶勒斯在德雷福斯案件

---

① 《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第2期第7页。——龙格注

② 指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1899年7月的宣言。参见本书第1—3页。——编者注

中所进行的斗争，但同时也几乎一致谴责一个社会党人，尤其是在米勒兰那样的情况下，加入资产阶级内阁。”<sup>①</sup>

不过毫无疑问，大多数法国同志觉得 1899 年 7 月的《宣言》与其说是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远不如说是盖得和瓦扬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立场合乎逻辑的继续，是他们对于党的统一的敌视态度的表现。

1899 年 12 月在雅皮大厅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还保持着这种印象，老的组织用很大的努力才使它们还没有失去的那些战士们保持了对它们的忠诚。

但是代表大会表现了统一各派社会主义力量的坚决倾向，就是说，会议决定在加速取消老的各个组织的同时，筑一道堤坝来阻止清一色的米勒兰支持者的“独立”运动。在法国还从来没有这么突出地强调过阶级组织的思想。米勒兰的朋友要为他们的领袖两年前刚刚提出的关于议员和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关系的理论进行辩护，是不容易的。米勒兰当时宣称：“每个候选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同他所面对的选民们自由地（！）商定将成为他们之间的选举协议的那些项目。”<sup>②</sup>

米勒兰的追随者同样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另一个观点，即一个社会党人可以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擅自参加内阁。饶勒斯（很久以前他就曾针对米勒兰关于每个社会党议员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的观点而坚决主张统一的阶级组织的思想）要求米勒兰的追随者放弃这一根本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认

---

① 《社会主义运动》1899 年第 2 期第 481 页。——龙格注

② 亚·米勒兰《选举讲坛》第 25 页。——龙格注



为，他们必须认识到“社会党议员只有经党的明确的同意，按照党规定的条件，为了党限定的一项任务才可以参加政府”，此外，“参加政府的代表个人要就对他的委托作出汇报”<sup>①</sup>。

但是这仍然是米勒兰分子为了反对老的组织而作出的一种完全暂时性的让步。他们已下定决心，要尽快地重新为他们关于夺取政权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辩护。<sup>②</sup> 饶勒斯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立场曾遭到米勒兰分子和老的组织的同样激烈的反对，当时他在许多点上与米勒兰有分歧，只是很久以后我们才不得不看到具有热烈的气质的饶勒斯同意机会主义带来的一切妥协退让。阿尔伯·里沙尔<sup>③</sup>说：“从现在起，再也不会再有处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之外的社会主义了。”整个代表大会报之以掌声。组织从来不曾具有如此的吸引力，而且在1900年初，总委员会开始工作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各个成员的重要性。

但是从那时起，所谓的或自称的 unitaires（统一派）不断地犯错误。法国无产阶级宣布，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党人不能进入内阁，而巴黎的社会主义报刊却比以前更为热心地继续替相反的观点辩护，捍卫米勒兰的极端非社会主义的行为。另一方面，老的组织丝毫不

---

① 饶勒斯在雅文大厅的发言（速记记录第55页）。——龙格注

② 前不久，最热心最盲目地米勒兰分子之一维克多·运勒还在总委员会上说：受到参加政府的邀请的“社会党人”就这件事去询问党是做不到的。——龙格注

③ 阿尔伯·里沙尔（Albert Richard 1846—1925）——曾为第一国际里昂支部领导人之一，巴枯宁主义者。八十年代追随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阿列曼派。——编者注

肯让步，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不可能主义”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从来都没有能够为之辩护。

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统一的阶级政党是十分困难的。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在瓦格拉姆大厅举行时，党内的每个派别都首先千方百计力图欺骗对方；这就叫作以多数票取胜。盖得派和瓦扬派出席1899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肯定大大超过了他们力量的实际比例。但是统一派中的多数人非但不制止这种舞弊行为再次发生，还极力在制造假的代表资格证书的技巧上尽可能超过他们的对手。他们在这样做时有时表现得极其惊人地迟钝，尽管如此，仍旧使用了非常令人遗憾的欺骗手段。代表大会上关于是否承认这些代表资格的辩论是混乱、冗长、一塌糊涂的，最后以法国工人党（盖得派）退出会场而告结束。读过会议记录的人都确信，统一派搞了一次真正的政变，他们强迫实行了就代表证书问题按人投票；而且这次政变与其说是反对大会的“左派”，不如说是正好反对了统一的思想，使这一思想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是另一方面，盖得派退出会场也是一大错误；只要“宗派思想”和“统一思想”之间的斗争继续引起误会，统一派就稳操胜券，但是如果有一个明确的决议把问题提到社会主义策略的基础上来，那么反对内阁主义的策略本来是可以获得压倒多数的！大会结束时，由于议员们在关于夏龙惨案的质询中的表决，统一派中就已经有一大批人脱离了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

瓦格拉姆大厅代表大会以后，总委员会不再代表整个法国社会主义，而只代表一部分人，虽说是大多数人。如果真要造成实现统一的先决条件，就应当放弃那种多少有些神秘地

实现统一的方法，而公开地同“法国工人党”谈判，以了解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们同意加入统一的党。当然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因为许多反对统一的老同志认为统一与内阁派的妥协是一致的，他们的成见现在就更加加深了。

1900年代表大会成立的总委员会确实表现出非常缺乏实际感：它埋头于没有结果的辩论，用无尽无休的会议来讨论本来在几小时内就可以解决的巴黎地区组织的问题。其次是内阁派在报纸上和议会中的立场以及他们的无数反社会主义的妥协使总委员会的任务难以完成。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在他们的盟友盖得派退出瓦格拉姆大厅会议以后，虽然一再责备他们的朋友做得太过火，却对于充当调停人——即在总委员会的社会主义者和脱离了总委员会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搭桥——这样一个的确有益的角色犹豫不决。相反地他们只限于当纯粹的反党派。似乎他们呆在委员会虽仅仅是为了谴责委员会的全部所作所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倒是同盖得派一起退出会场更加合乎逻辑。

1901年5月里昂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统一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还有可能实现。尽管内阁派犯了无数错误，尽管《小共和国报》和《小苏报》<sup>①</sup>之间进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激烈论战，如果代表会上有第三个党公开站出来在左派（缺席的盖得派实际上由布朗基派作代表）和内阁主义右派之间进行调解，那也就够了。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想起一些自治联合会的领袖，他们一向采取完全革命的态度，反对内阁主义，在过去

---

① 《小苏报》（《Le petit sou》）——阿尔弗雷德·爱德华兹于1900年创办的反内阁主义的日报，1902年停办。——编者注

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的行动完全是为联合各派社会主义力量着想的。其中包括奥斯特省联合会、汝拉省联合会、安省联合会、塞纳—瓦瑟省联合会、下塞纳省联合会和双塞夫省联合会以及象白里安<sup>①</sup>和德·普勒桑塞<sup>②</sup>这样的同时为实现统一和反对内阁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人。本来他们可以与布朗基派合作，形成既反对内阁主义同时又毫无疑问会拥护统一的多数。因为除了布朗基派的一百五十张代表证书，他们还拥有四百张代表证书，这些代表是始终赞成统一的。这样一个多数意味着盖得派重新回来，意味着实现统一，还意味着党摆脱非社会主义分子。

但是可惜左派自治联合会缺乏领导。在那些享有必不可少的威望的领袖中，有几个出于谦虚没有到里昂来，例如德·普勒桑塞，另一些则没有勇气与他们的内阁派朋友决裂，例如白里安。这样一来，他们就使他们的对手能够怀疑他们反内阁主义观点的真诚信，因为这种反内阁主义观点总是表现得只有利于内阁派。他们象本来能在左派一边推行统一政策的绝大部分人一样感到无所适从，这就只能加强纯内阁主义右派的力量。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运动》杂志小集团和列诺得尔、契普

---

①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 1862—1932)——职业是律师，起先倾向于半无政府工团主义，后来参加独立社会党人联盟。1906年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因而被法国社会党开除。此后历任部长、总理等职务。——编者注

② 弗朗西斯·德·普勒桑塞(Francis de Pressensé 1853—1914)——法国社会党人，从1902年起当选为议员，极力主张盖得派和饶勒斯派实现统一，曾参加第二届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编者注

里昂尼以及几个“革命的”自治联合会的努力就不得不以失败告终，而突然成为内阁派的救星的白里安多数派声势却非常浩大。统一派里不到一百人与布朗基派一起投票赞成德·拉波特的决议，九百人投票赞成白里安的决议。布朗基派退出了大会，随他们一道退出的还有自治联合会的若干代表，尤其是塞纳—瓦瑟省和双塞夫省联合会的代表。

乍看起来，说明里昂代表大会以后法国社会主义的形势及其力量的分布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我们认为，1901年6月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多数还属于总委员会，由此可见，当时不愿意脱离总委员会的那些人仍旧忠实遵守每个组织的这样一个基本信条：多数派在哪里，党也在那里。

看看法国的政治地理，就不难相信这一点。除了“法国工人党”（盖得派）占优势的诺尔省、尚皮尼（奥布省和马恩省）的一部分和多菲内（伊泽尔省）、“革命社会主义党”（布朗基派）占优势的法国中部（阿利埃省、歇尔省和安德尔省）和巴黎的一部分地区之外，其他社会主义地区都服从总委员会。而且我们不仅考虑到议员（十三名议员站在一边，二十六名议员站在另一边），或考虑到支持每一派的票数。人们可以正确地反驳我们：属于总委员会成员的议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仅仅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选民的情形也是一样。可是单从组织上看，留在里昂代表大会上的成员体现了法国真正社会主义组织的多数。我们只须指出阿尔登省联合会。一位卓越的布朗基主义者路易·迪布勒伊在1899年的代表大会<sup>①</sup>上

<sup>①</sup> 《速记记录》第323页。——龙格注

说过，该会有一个“绝妙”的组织；还有汝拉省的工人联合会，迪布勒伊 1899 年曾说该会的作用是“值得钦佩的”，还要指出柴纳省、下塞纳省、卢瓦尔省、安省、布列塔尼省、下诺曼底省的纯粹社会主义的联合会。相反，在最近的选举中，除了巴黎和诺尔省，大多数社会党选票是由法国南部各联合会提供的。如加尔省(22 341 票)，罗纳河口省(36 678 票)，瓦尔省(20 090 票)，塔尔纳省(18 000 票)，埃罗省(15 000 票)；但是它们的组织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他们的运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纯政治的，并且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特有的东西。1898 年选举时，社会党曾在巴黎(塞纳省)获得了 197 000 票，可以说大部分是投给总委员会的。

留在里昂代表大会上的纯社会主义分子想捍卫我们党的指导原则，使之不受损害，反对内阁派的迷误和妥协，而由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两个极端的派别，这些迷误和妥协发生的次数和频繁程度只会增加。因此列诺得尔、契普里昂尼和本文笔者于 1901 年 6 月 26 日，即里昂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就成功地促使总委员会在一个宣言中宣布：

“在过去举行的国内和国际代表大会上曾经两次受到批判的内阁主义观点已明确地遭到拒绝，社会党是反对内阁主义的并且必须坚持反对内阁主义。”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和阿列曼派的代表，和列诺得尔、莫里泽一道使总委员会就驱逐外国同志、迫害大学的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以及警察闯入巴黎的劳动交易所等等提出的强烈抗议得到通过。但是这些终究都只是毫无用处的示威。内阁派固然无法阻止这些示威，但是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阻

碍，而不去继续在报刊上和议会里推行腐败的、给社会主义者的统一造成越来越多困难的机会主义政策。

其次，这个总委员会尽管有许多重要的联合会作为它的成员，但是它的大部分代表却是那种被我们的莫里泽同志很确切地称为“徒有其名”的代表。这些联合会不选一位他们熟悉的、能够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代表，却容许选政治上的朋友们为代表，这些人与其说受他们名义上代表而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们的真实感情和意向所支配，不如说受他们个人见解的支配。

宣布沙皇抵达法国的时候，总委员会在向全国发表的一项宣言中声明，那些参加向屠杀我们俄国兄弟的刽子手致敬的可耻的欢迎仪式的人们，为社会主义无产者所不齿。继而在贡比涅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契普里昂尼要求立刻发表声明反对米勒兰，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各联合会决定。

商业部长的朋友们对瓦尔德克-卢梭政府的最令人愤慨的行为并不感到气愤，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党员”为对社会主义的最恶毒的攻击分担责任是很自然的。因此，他们没有理由对米勒兰先生在屠杀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刽子手面前卑躬屈膝表示愤怒，或者对他与莱格先生<sup>①</sup>这位惩治社会主义教师的人之间的默契表示愤怒。

但是外省的广大社会党人这次却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以致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以为多数组织将作出决定，开除这个看来对“他的”党的决定不加理睬的人。也还没有人想断言

---

① 若尔日·莱格(Georges Leygues 1857—1933)——法国政治活动家，曾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编者注

这次表决的结果是内阁派的一次成功：二十票赞成开除，二十六票反对。但是在所谓支持米勒兰的这二十六票中也包括诺尔省的自治联合会，它表示“赞成转入其他议程，以便在下次代表大会上不再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它接受列诺得尔提案的论据，就是说，把米勒兰看成已经被开除出党了！属于多数派的还有瓜德罗普的三票，这同它们所代表的微不足道的力量根本不成比例。最后还有巴黎的三票，那里的十分强大的反内阁主义少数派完全被忽视了，这是违反组织章程的。实际上，党的多数是赞成开除米勒兰的。

然而这个人事实上却因此而取得了胜利。他的朋友们多少对这个代价昂贵的胜利感到不安，他们对他施加压力，要他至少声明说，他对于在他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的党并不是完全不加理睬的。在进行了两年半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后，1月13日，商业部长在菲尔米尼发表演讲时声称，他仍然“忠于他的原则”，服从“他的党的决议”。<sup>①</sup>

给米勒兰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下定义并不容易。五年前，在圣芒德的宴会上，他的观点看来已经和各国社会党人的观点颇有差别；从那以后他与国际社会民主党接近的少数特点已消失殆尽了。甚至我们的“可能派”或者德国的“伯恩斯坦分子”中最温和的人也决没有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观点降低为“社会和平”的观点。究竟米勒兰怎样尊重他的党的决议，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如果他哪怕还有一丝

---

① 参见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年法文版第42页。——编者注



—毫愿意服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意志，那么在考茨基的决议案通过以后，他就应该立刻不当商业部长了！

其次，他在菲尔米尼的演说，正如拉加德已经在《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篇背熟了的肯定事先经人指点过的讲义。因为米勒兰事实上是某些“独立社会党人”的典型，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唯独法国有幸至今还有这样的“独立社会党人”。这些人对组织从来就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对党的监督完全采取厌恶的态度。1898年6月，在《小共和国报》于蒂沃利—沃大厅组织的集会上，米勒兰说“有人想使法国社会主义适应比利时或德国流行的统一的形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法国社会主义的独创性，这是很不聪明的”。在组织的领域和理论的领域里，米勒兰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

就米勒兰事件进行表决这一出喜剧导致了阿列曼派退出总委员会。后来少数派的十六个自治联合会发表了卢昂和哈佛尔的革命工人组织的代表列诺得尔同志起草的一篇十分强硬的宣言。

他们指出，总委员会的多数派表演了这出“不名誉的喜剧”：他们在一再发表反内阁主义的声明和痛斥政府的反动行径后，却拒绝触及应当负责的人们中“与我们最接近”的那个人。

然而这些革命的社会主义联合会和阿列曼派以及不属于总委员会的罗纳河口省、卢瓦尔省和洛林省的联合会不会轻易地加入前不久由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建立的、表达了法国工人运动激进倾向之一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虽然他们在参加

内阁这个重大问题与盖得派意见一致，但在另外一些重大问题上又与他们有分歧，因而他们不能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尤其是自治联合会决不会同意盖得派关于无产阶级对维护法律上的保证和共和国自由，即社会主义政党发展的最重要前提不感兴趣的观点；它们更不会轻视合作社和工会的活动。

另外，它们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完全统一，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们想要的党包括一切承认国际社会主义党的原则和策略的党派，这个党同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一样，有右翼、中派和左翼。它们认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不偏不倚的解决办法只能通过各种极端倾向保持平衡而产生。法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有足够的共同点来达成必要的妥协，这种妥协就意味着统一。

相反，我们觉得把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们列入形成这个综合体的成分是不行的。我们这里指的是米勒兰和他的顽固追随者。甚至保尔·布鲁斯（谁也不会把他说成“灾变论”的拥护者）在菲尔米尼演讲后也对“这一类的混乱、社会主义共和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这种共同的常规行动、这种继续合作”提出抗议，他十分中肯地说：“究竟还有什么阶级差别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可言呢？”<sup>①</sup>

我们认为，有一些人，其观点与其说符合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不如说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他们充当瓦尔德克-卢梭的大改良党的左翼更好些。而另一些人，不管他们

---

① 1月13日《小苏报》。——龙翰注

多么温和，但是他们今后还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行无产阶级特有的活动，他们就应当在统一的社会党内占有自己的位置。

形势对法国党来说再有利不过了：在生产中到处是极其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谷物和葡萄种植业中的生产过剩，纳税人不知不觉地付给大糖厂的一亿一千万奖金，民族主义的衰落，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党提供宣传鼓动的材料。为了利用这些材料，党必须恢复三年前的样子，那时它是一个战斗的党，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胜利前进，但是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腐朽政策和放弃我们的斗争的基本原则，它曾经几乎达到崩溃和灭亡。

发表于1902年2月。译自《新时代》杂志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21期第652—659页。

# 《新时代》杂志编辑部为龙格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 一文写的后记

(1902年2月)

我们打算冒昧地对我们的朋友龙格的有趣而重要的阐述补充几点意见，但并不想把我们对法国形势的看法同龙格有分歧的所有地方都加以说明。这不可能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允许我们的每个撰稿人有充分的自由来阐明他的观点，不论这些意见与我们的意见是否一致。但是如果对龙格涉及的一个问题避而不谈，就会造成不好的误会。我们在双方都有朋友，我们同他们的最同名的代表一样关怀法国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统一，因此我们对龙格的意见就更不会被理解成偏袒一方的干涉了。

龙格的阐述可能会使德国读者以为，似乎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同志们，即所谓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对维护共和国自由不感兴趣，似乎他们轻视合作社和工会的活动，似乎这一点造成了他们和拥护总委员会的反内阁派之间的对立，从而妨碍后者与他们联合。

如果龙格真的想这样说，我们就不得不断然提出反驳。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同志决不轻视合作社，他们也重视

工会。尤其是法国工人党对建立和促进工会是经常给予特殊关注的。它只不过反对许多工会所拥护的总罢工的想法，反对把工会并入政治组织——在这一方面它不仅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同德国工会完全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法国工人党也从未低估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态度并不妨碍它对法兰西共和国（众所周知，1891年这个共和国曾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为没有皇帝的帝国，见《新时代》杂志本年卷第12页<sup>①</sup>）的中央集权官僚军国主义政府机构进行批评。我们认为它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有一段时间采取的策略是错误的，但是这一错误离轻视政治自由还差得很远，无论是盖得和拉法格，还是瓦扬，都从来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不，就这一方面来说，总委员会的反内阁派（热中于举行总罢工的阿列曼派也许除外）和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之间至多是在立场一致的情况下有些细微差别，但不存在原则分歧。

尽管如此我们也认为，他们的统一今天还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由于“宗派思想”，而是由于，每次内部斗争必然要带来的个人怨恨和互不信任，即使在实质性对立消失以后也不会很快缓和下来。

也许行将到来的竞选斗争有助于缓和这些个人对立并从而为统一作好准备。在这一方面，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常常产生奇迹。但是只有当两个派别之间还存在着的主要障碍排除了，这个奇迹才会发生效力，这个障碍就是——饶勒斯。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页。——编者注

我们只是在经过慎重考虑后才写下这样的话，而且还是不愉快的。因为我们完全承认饶勒斯为我们的事业，尤其在德雷福斯案件的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我们承认他的人格（在最近十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中间他肯定是最伟大的）的力量和光辉，我们也承认他的这种力量可以给我们党带来巨大的利益。并且我们切身体会到，与一个如此具有吸引力的辉煌人物决裂是多么困难。但是我们对饶勒斯的估价越高，我们就恰好不得不认为他的作用（在它向相反的方向发挥的时候）越危险。遗憾的是今天的情形正是如此。龙格指出米勒兰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他入阁这件事如何在瓦解党，——龙格还可以说得更严重些，指出他如何在腐蚀党。龙格指出，米勒兰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在社会民主党内再也找不到什么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但是，米勒兰的一言一行饶勒斯都是支持的。没有饶勒斯，米勒兰就算不了什么。饶勒斯掌握着他，给他力量和追随者。饶勒斯是米勒兰体系的体现者，或者毋宁说，他从一个野心家的冒险试验中炮制出无产阶级解放的体系，他使妄想成为有条有理的想法。使人们能够相信似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都拥护米勒兰并且都为他承担责任的，是饶勒斯。使法国社会主义陷于它日前所处的可悲境地的，是饶勒斯。是他，社会主义统一的这位倡导者，由于支持米勒兰而分裂和削弱了法国社会主义，他为社会主义立下的所有丰功伟绩，现在被他带给社会主义的灾难抵销了。

同米勒兰断绝关系是不够的。如果不同饶勒斯也断绝关系，那么事情只做了一半。我们完全理解人们在为统一作出

牺牲，为了统一，人们把自己认为起了十分有害作用的某些人当作同志加以宽容，并且在自己一旦居于少数的时候，并不退出了事，而是努力争取成为多数。工人党(盖得派)退出瓦格拉姆大厅这件事不符合我们在德国所持的那些策略观点。但是今天法国的~~问题~~不在这里，法国已不再存在统一，而是有两个派别。对于总委员会的反内阁派来说，问题只在于他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准备他们所力求达到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是自己独立并和内阁派决裂，还是象往常一样继续被内阁派牵着鼻子走，听任他们愚弄，从而在事实上(即使是违心地)为他们自己认为危险的、每个清醒的诚实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都不得不反对的一种政策服务。

图尔代表大会将作出决定。如果总委员会一派的反内阁主义者独立出来，那么他们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合并，以及进而法国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力量合并成一个组织，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他们不与饶勒斯分手，那么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摆脱他，那么他们将一如既往屈服于他的影响，让自己今后也拴在嘲笑他们的空洞抗议的那位部长的凯旋车上，他们就始终是一股总是想做好事却做了坏事的倒霉的力量。这样一来，法国社会主义的分裂将一直持续到内阁主义完全破产为止。

只有反对饶勒斯而不是同他一起，才可能实现法国社会主义的统一。

发表于1902年2月。译自《新时代》杂志第20年卷  
(1901—1902)第1册第21期第659—661页。

罗·卢森堡

## 法国社会主义危机的终结(摘录)

(1902年3月)

—

历史闹剧同所有蹩脚的戏剧一样，都有一个特点：观众完全觉察不到剧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当公众舆论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法国并且期待事情进一步发展时，社会党人入阁的闹剧的最后一幕实际上已在不知不觉中收场。人们徒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进行“伟大试验”的国家并且等待着。剧情已经结束，角色已经演完，观众席上的正在熄灭的灯盏甚至已开始散发出恶劣的气味了。

我们并不是以此来预言瓦尔德克—米勒兰内阁马上就要垮台。我们认为，相反，只有染上一点那种有名的“议会痴”的人，才会按照议会制政府的部长更换这样的表面因素来划分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时代。我们只是认为，由于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而为法国的政治、特别是为法国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特殊形势的内在逻辑发展已经结束，它已经使它所孕育的一切后果都暴露出来，从今以后我们不必期望在危机中还会出现什么新的因素，而只能等待现存因素机械地继续发展了。



我们在我们对于上届议会期间的法国内阁政策的分析中，曾指出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独特的两面性，即向右边的明显让步和向左边的表面上的妥协。从此以后，形势以及内阁的政策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两面性政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在议会中缺乏一个牢固的基础来实行真正彻底的民主改良政策。成分复杂的内阁的激进党—社会党多数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表现得不稳固，随时都准备转向反动，并且除了为表面上平息由危机引起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所绝对必要的事情以外，不愿意多走一步。另一方面，内阁从一开始就指望议会中社会党人的支持。这一情况迫使政府至少对其最初的纲领作表面上的让步，进行民主的和社会的改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社会党人。他们可以通过无情揭露政府的“共和主义”政策的模棱两可和采取顽强的反对派立场来推翻内阁，或者迫使它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进行比较认真的进步的改良。但是他们虽然在议会中有决定性的多数，却由于受到米歇尔入阁的束缚而采取了相反的道路，这一来他们就放弃了政治上的控制权。他们在《小共和国报》上一贯维护政府的政策，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每一个想象得到的议程和每一个法案；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诬蔑，压制一次对殖民地问题的议会调查，赦免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陆军参谋部人员，预算，用所谓结社法来限制结社权，一句话，凡是政府想到要作为对内阁的信任问题提出的一切。社会党人通过这样放弃独立的政策和反对派立场，使政府摆脱了对他们的任何顾虑。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依附政府。所以政府可以有恃无恐地前进一步，连向它的

社会党和左翼激进党拥护者作让步的幌子也放弃了。本届议会向我们表明内阁的政策处于一个新阶段，作为上一届议会的特征的两面性在所有领域里都让位给一种明确的一致性。

在同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作斗争的领域内，与过去所作的要对军界要人加以控制的诺言相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目的在于不让常备军的反对者以及民兵制的拥护者发表意见。布尔日的社会主义市长瓦扬德由于对他所管辖的地区的新兵发表的演说而被撤职，他在这篇演说中提醒新兵服从人道和博爱的命令，警告他们不要向父母亲开火。中学教员爱尔威由于给一家反军国主义报刊撰稿而受到处分。巴黎的教授拉皮克由于对受处分的同事表示同情而被停职。《荣纳的士兵》、《红旗报》、《人民权利报》和《火炬报》等由于进行拥护民兵制的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而受到法律追究。与此同时，大学教师（例如在里昂和图卢兹）、担任职务的僧侣（例如兰斯的大主教）却可以公开进行反共和主义的煽动而不受惩罚，可以在公立学校（如在阿莱斯的女子中学）中为政府提案的失败举行祈祷。

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内激进党—社会党政府目前的意图表现为：完全绕过议会而对中国进行远征<sup>①</sup>，对土耳其进行远征<sup>②</sup>（在这次远征中借口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码头争执而使用了法国的战舰，实际上却是为了向土耳其政府索取洛朗多和蒂比尼这两家银行的债务），最后是对沙皇的接待<sup>③</sup>，这种对

① 指1900年包括法国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编者注

② 法国舰队在1901年11月占领了米蒂利尼。——编者注

③ 1901年9月俄国沙皇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受到法国总统非常隆重的欢迎。这一访问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编者注

专制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卑躬屈膝在整个欧洲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在社会改良的领域内，在本届议会期间除了稍微缩短矿工的劳动时间（这一问题已经转交参议院，很可能是为了把它搁置起来）之外，政府还有另一个表现是说明问题的。这就是粗暴地否决议会在11月14日从1880年以来第三次通过的关于按照法律实施铁路工人和职员十小时工作制的提案。商业部长的各种各样社会改良法令的结果是在最近半年中接二连三地批准企业主关于延长劳动时间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申请。而米勒兰的“社会改良”的顶点是，通过一切司法程序否决工厂视察员一再提出的对于重新实施成年工人四班制的申诉，这就使著名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主要条款成为一纸空文。

但是本届议会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在表决中国公债<sup>①</sup>时的态度，这也成了在所有方面对形势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众所周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保卫共和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教权派的斗争。整个德雷福斯运动，三年来的整个危机都是围绕着“无耻之徒”及其无耻的仆从和同伙进行的。在前一时期，出色的结社法本来是为这一斗争服务的，它对于教权派完全是虚晃一枪，却实实在在地打击了工人的结社权。这种模棱两可的政策的结果是毫不含糊地给教会送了一份礼，而且并没有同时装模作样地对民主派送任何虚假的人情。礼

---

① 1901年10月底，法国政府在议会中提出一项提案，为了弥补法军军队参与1900年对中国的侵略的费用而发行一项公债。这一提案在1901年11月25日以295票对249票得到通过。——编者注

物的形式是给予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将近五千万法郎，以“赔偿”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损失，与此同时，内阁总理 11 月 18 日在议会的一次演说中还更加明显地对教会表示敬意。

《费加罗报》11 月 20 日就这一问题写道：

“瓦尔德克-卢梭先生昨天发表了一次演说，我们愿意看到这一演说张贴在法国所有市镇的墙上。法国保守派现在产生了新的希望。革命者、无祖国者、民族分裂和社会灾变的兜卖者在他们本来指望找到一个合谋者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反对者。”

《巴黎回声报》写道：

“瓦尔德克-卢梭先生指出了天主教的历史作用，承认了对于传教会表示感激的权利，这些传教会是商业和工业渗透的先导，他声称，法国的真正传统由于它在国外的威望以及由于它的殖民扩张或者在保护国的扩张而得到保持，如果人们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就不会让自己受到细小争吵的迷惑并忘记法兰西共和国应当在世界平衡中起重大的作用。

这一切是如此明显，以致竟有人突然喊道：这是纯粹的民族主义啊！……”

最后，梅利纳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在他的《共和国报》上写道：

“利鲍先生如此出色地阐明了保护在东方的天主教徒的理论，通过瓦尔德克-卢梭先生的嘴说出来丝毫也没有失去力量。总理甚至更加有力地强调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巨大功绩，并且对他们的贡献更加热烈地表示祝贺。他不屑于回答出自众人之口的这样的轻微指责；如果传教士对于我们

国家是如此有益的，那么为什么过去那么恶劣地报答他们并且解散他们所加入的宗教团体呢？

我们让总理的朋友们去指出这些昨天似乎使他们感到惊讶的矛盾。这用不着我们去大惊小怪。当瓦尔德克-卢梭先生顺从他的多数派的庸俗本能，让教士和修女受他们摆布时，我们已经表示过惊讶了。现在我们认为他的立场是当然的，是符合伟大的法国传统的，符合他的过去的，一言以蔽之，是同他的过去相称的。我们祝贺他回到或转到共和主义大家庭中来，他是从那里走到冒险家方面去的，这些冒险家也许激起了他深深的怀疑主义，但是他们终于开始使他厌倦了。”

内阁在中国公债问题上急剧转向公开的民族主义，这给议会中的右翼和左翼都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处境。瓦尔德克-米勒兰内阁从开始起就是作为对于民族主义者和梅利纳派的一个可怖幽灵出现的，它的拥护者也是到处都把它当成这样的幽灵来加以辩护和“拯救”的。右翼在上一届议会中的全部策略的目的都在于通过形形色色无法预料的手腕推翻内阁。现在“共和国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认为自己不得以自己的投票来表示信任激进党—社会党内阁了。最近半年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批准中国公债——使民族主义者投入了政府阵营。

这一来完全没有造成任何新的事实。瓦尔德克-米勒兰内阁的政策从一开始按其本质来说就同梅利纳内阁的政策相同，因此它同梅利纳派进行的是一场合法的政治上的肮脏竞争。但是在上一届议会期间，政府表面上反对军队和教权派的行动却使梅利纳派得以把他们抢生意的嫉妒心用一般性质

的“原则性的”敌对掩饰起来。现在他们解除了武装并且不得不公开承认：使他们同政府取得一致的恰恰是政治原则；使他们发生分裂的，仅仅是对部长职位的觊觎。

因此，从政府方面放弃一切反民族主义的做法在反对阵营中引起一种可以理解的混乱。反动分子现在应当支持“激进党—社会党政府”还是应当象过去一样同它斗争呢？他们应当把原则还是把部长职位放在首位呢？在右翼那里关于这些策略问题爆发的争论是社会党阵营内部斗争的忠实反映。饶勒斯在这里忠于他的角色，号召人们在中国公债问题上也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盲目地支持政府，哪怕这对于他的同志们来说“不是没有痛苦的”，而在右翼方面担任这一角色的是君主主义的“高卢人”。他在11月28日完全按照饶勒斯的风格呼吁反动军队进行勇敢的斗争反对政府，甚至不惜非常痛苦地牺牲原则：

“但愿他们坚决地反对内阁，如果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昂首面对他们的选民。如果有人指责他们对待原则太随便了一些，那么他们中间每个人都可以象安贝尔将军那样回答说：我可以发誓，我在那一天拯救了祖国！”

这就公开证明，如果民族主义者采取反对“激进党—社会党”政府的立场，那么从今以后这是同他们的原则相违背的，只是作为议会手腕实行的。

另一方面，形势对于政府多数派的社会主义一翼来说同样是简单化了。在前一阶段它所起的作用是把政府的虚假的改良冒充为真正的改良，为它的政策辩护。自从政府抛弃了

这个幌子，自从内阁的政策受到反动派的支持，忠于政府的社会党人只需要捍卫内阁的存在而不顾它的政策就行了。

这样一来，在议会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形势，即形成了“两个少数派”，正如马赛尔·桑巴在议会讲坛上所指出的那样。其中之一以饶勒斯派的社会党人为主要力量，每一次都出来挽救内阁，另一个多数派由反动分子组成，它在极重要的问题上总是起来维护内阁的政策。梅利纳的《共和国报》对形势作了经典的阐述，他在11月30日写道：

“如果提出最高的问题：是否应当推翻内阁，那么，除了在纯粹的政治问题上，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没有真正自己的多数派，在他的原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你们要懂得，没有任何一个原则是他同他的多数能取得一致的。这个多数实际上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在他们中间对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有着相反的意见。社会党掌握着政府的命运。现在瓦尔德克-卢梭先生无论在宗教原则还是在爱国主义原则、社会原则和经济原则上同他们都不一致，以致于当涉及到一个原则问题时，他不得不诉诸他的对手。他有朋友，或者确切些说，有合谋者来照料他自己的事情，他利用他的敌人来照料国家的事情。”

这也并不是真正的新的事实。早在前一阶段，饶勒斯策略的实质就已经只是在于不断地支持内阁的存在。内阁派社会党人每次都把他们自己的信念服从于对内阁的信任问题，从投票赞成德雷福斯案件中的大赦提案到通过结社法，他们表明，从根本上来看，他们的全部策略的目的仅仅在于保持目前的内阁。但是现在这一事实已经暴露无遗。在政府的政策

抛弃了民主主义外衣之后，社会党人参与民主主义改良工作的虚假作用也就还原为它的真正核心即内阁的投票牲畜的作用了。

因此，法国最近半年的形势在其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中在每一方面都澄清了和简单化了，同时，由于最近的变动，已不知不觉地发展成同三年前的出发点截然相反了。

瓦尔德克-米勒兰时期的出发点是巨大的民主的和社会的改良纲领！成立激进党内阁是为了保卫和整顿共和国。这一点使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合法化，这一点为议会中的共和派联合的政策提供了根据，这一点证明社会党人的一切原则上的牺牲都是有道理的。在这次内阁插曲的第二乐段上，这一事业就已经表明是一句空话。然而它至少在形式上还以这种形态存在。现在连这样的词句也抛弃了，“保卫共和国”纲领的最后残余也随之消失了，政府突然表现为没有任何纲领了！

这一事实的表现是瓦尔德克-卢梭总理 1 月 12 日在圣亚田的脍炙人口的长篇竞选演说。除了带着不偏不倚的自我赞美来夸耀政府已经完成的一切伟大成就外，这篇演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面临的<sup>任务</sup>、打算在将来做的事情。既没有答应进行军队改革，也没有答应教会同国家分离，也没有答应进行社会改良和采取其他的“保卫共和国”行动。总理对未来的这种沉默态度在法国引起普遍的惊慌。象拉克鲁瓦这样天真的资产阶级激进党人在《激进报》上要求至少政府的另一个成员提出一个政府纲领。他们不懂得，政府首脑的沉默只不过是下列简单事实的相应表现：除了确实十分真诚的愿望即无论



以怎样的多数和怎样的纲领都要保持政权以外，激进党内阁根本不再有任何政治纲领了。纲领的词句在前一阶段也仅仅是为了取得社会党—激进党左翼的支持。一旦确有把握无代价地得到这种支持，那么，摩尔人做完了自己的事情，他可以走开了<sup>①</sup>。词句被放弃了，没有词句的部长职位留下来作为“保卫共和国”的唯一残余。

总理在圣亚山的没有纲领的纲领演说是对下列事实的正式确认：法国的危机时期结束了。一切异常的服装、姿态和套语被放弃了，通常的传统的社交礼节恢复了。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选民，总理在他的演说中以愤怒的心情指责似乎在暗中反对他的民族主义者，而这些民族主义者只有在极度克制以及牺牲自己的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够反对他。为反对天主教教团吵嚷了一阵，而就是这个教团在中国的分支刚刚在议会中受到他的正式赞扬，并且得到了从纳税人的钱袋中拿来的将近五千万的奖赏。而商业部长<sup>②</sup>又一次在国内进行业务旅行，为的是使工人们（在选举前的两个月！）想起，他始终还把社会党称作“他自己的”党。

这在第三共和国不再是异常的现象，而是竞选舞台上通常的场景，迄今为止的形形色色的部长们已经掌握一套熟练的技巧来安排这种场景。

在这种演变过程中，从内阁主义的社会主义“新方法”中

---

① 源自席勒《菲斯特的驯服》第三章第四场。意思类似“飞鸟尽，良弓藏”。

——编者注

② 指米格兰。——编者注

得出了什么结果呢？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仅仅是激进党内阁运动的消极反映。

在米勒兰时期的第一阶段，在十八个月的内阁准备进行震撼世界的保卫共和国事业的时候，“新方法”的任务是唤起、保持对于政府政策的期待和希望，并且把这些期待和希望激发到最高的程度。无论是在政府方面，或是在它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方面，这都是“诺言”时期。

接着是第二阶段——“实现”时期：大赦法、结社法以及米勒兰的社会改良。为了牢牢地掌握政府，“新方法”就有必要把“保卫共和国”的骗局说成是真正的改良工作，否认它的反动实质，夸耀它的进步的幌子。

但是现在政府公开地和正式地把“保卫共和国”的幌子及其整个纲领扔到角落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新方法”还剩下什么呢？在内阁主义祭坛上的一系列自我否认中，还必须采取最后的步骤，并且也为政府的没有纲领找辩护的理由和使之合法化。虽然玩这个把戏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三年以来人们已把“共和主义纲领”视为法国、地球以及宇宙的中央轴心。但是“新方法”通过为内阁主义辛苦效劳已学会完成许多困难的事情，“即使不是没有痛苦的”。因此，饶勒斯声明，一个施政纲领现在是完全多余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它已经实现了！“如果对事情加以全面考察，那么，内阁是忠于它以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个行动纲领的，它在广泛的范围内完成了它承担的工作。”（《小共和国报》1月15日）确实，内阁从来没有着手解决“保卫共和国”的主要任务，激进党纲领的第一项——教会同国家分离。当然，它没有解除同俄国沙皇制度

的非正式的婚姻<sup>①</sup>，而是继续维持这种婚姻。确实，它在贸易政策、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等方面没有一个地方同梅利纳的传统实行决裂。但是，难道瓦尔德克—米勒兰内阁真的许诺过这类事情吗？饶勒斯可以发誓说他对此完全记不得了，因此他甚至认为，“把内阁没有违背……它的纲领这一点当作罪名来加以指责，这是有些卑鄙的”。（《小共和国报》1月15日）

其次，一个施政纲领现在是完全不可能的。你们怎么要求一个内阁在议会选举之前提出一个纲领，从而在问题首先在于重新组成一个多数派时（哪怕这个多数派是由魔王自己的队伍组成的），去冒使某些人感到恼火，使某些人感到不满的危险呢？“只有在选举之后，一个具有独立的广阔的见解的政治家才能够确定公众的意图的重点，以便真正制定一个本届议会整个任期内有效的共同行动纲领。”（饶勒斯《小共和国报》1月16日）

正如“新方法”在议会中使自己的代表蜕化为简单的投票牲畜一样，它在“理论”上也堕落为政府的普通的脱靴器的角色。起初，当瓦尔德克—米勒兰需要大吹大擂作舆论准备时，它不是打着“新纪元”、“历史性世界转折”和“历史时代”的旗号，并且每天重复这类响亮的词句吗？后来，当瓦尔德克—米勒兰进入了积极的欺诈时期，它竭力使用诗歌的、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绚丽色彩，剽窃它们关于月亮、星星、花朵、朝露和林间风声的描写，以便把一场拙劣的资产阶级议会滑稽剧的

---

① 从1887年起，法国连续给俄国几笔巨额贷款，加深了俄国对法国的财政依赖。1891年两国缔结了协定，规定在发生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双方共同协商对策。1893年两国缔结了军事协定。——编者注

卑鄙蠢事打扮成一次“历史性的日出”。只要人们许可它用“广阔视野”的设想和胡扯来补充平凡的灰色的日常工作，它就  
很幸福了。

现在政府不再需要任何“视野”，它对“视野”完全厌恶了，它头脑中关心别的事情，它只致力于它的选举活动。“新方法”以“哲学的”恭顺态度对此作了说明，我也同意！在进一步仔细观察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任何“视野”，现在，在选举之前，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视野”。而在选举之后，只要  
我们重新回到家里，一切都将就绪……

“新方法”虽然有惊异的适应能力，却没有注意到，随着为内阁主义效劳过程中的这一最后的演变，它实际上结束了它的政治职能和政治演变。现在不再有任何任务。不再有任何期待（“如果对事情作全面的考虑”，一切都已完成！），不再有任何诺言（谁在选举之前会许诺什么确定的事情呢！），不再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态度需要否认（政府的政策变得非常明白无误！）。“新方法”使出了它的全部手段！它固然还常常重复在德雷福斯案件的美好时刻所说的响亮的词句：“全面的战斗！”它还结结巴巴地谈论“向一个愈来愈大胆的纲领”前进，谈论“民主的春天”。但是，饶勒斯的这些曲调听起来已经象威尔迪歌剧中的老的美妙的咏叹调一样，它过去出自阳光明媚的意大利任何一个黑眼睛的快乐小鞋匠口中时，就象人民春天的信号，而现在从手摇风琴的没有生气的机械装置里只是发出令人厌恶的单调声音：Tempi Passati!①

而手摇风琴的人本身带着无聊和茫然的目光望着；人

① 意大利文，意为：过去的时光——编者注

们看到,这只不过是熟练的手摇着用惯了的手柄,而思想是没有的。

### 三

有关内阁派社会主义的几出戏恐怕要就此结束了。它从失败走向失败,逐渐经历了“保卫共和国”、社会改良、联合政策以及最后社会主义统一的失败。它没有象许诺的那样使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得到加强,而只是造成政治上的削弱和组织涣散。此外还有道德上的蜕化。

发生巴拿马丑闻的共和国已经由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营私舞弊而完全瓦解,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这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加需要承担一个特殊的使命,即整顿公众的生活,纯洁政治气氛。他本来已经在顺利地完成这一使命。最近十年中,一切政党都陷入了丑闻的泥潭,而法国社会党人却保持着干净。由于议会制度的腐蚀作用,连最后一个“民主党”——激进党也可悲地垮台了,而面对这种作用,盖得、瓦扬和拉法格却向法国人民指出,除了愚弄群众之外,政治还可以有别的目的,议会制度并不需要绝对排斥诚实性。社会党人从共和国存在以来第一次表明,人们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却并不一定在几年之后就成为完全腐朽的政治尸体而毒化空气。从内阁主义的试验以来事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把整个米勒兰事件看成是一个巨大的行使贿赂的骗局,是个人野心和个人发财欲望的产物,那是愚蠢的。至少在米勒兰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方面,毫无疑问是从策略上的简单错误、流行的机会主义幻想开始在斜面上往下滑的。但是任何人只要

对事情加以仔细观察，就不再怀疑，米勒兰时代为社会主义队伍中形形色色政治的和个人的营私舞弊创造了深厚的基础。

因此，如果人们现在读一下资产阶级报刊——从机会主义的反动派到激进党的极左派，从《费加罗报》到克列孟梭的《联盟报》——关于社会党所说的一切，那么会发现一种蔑视、贬低的语调，而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早先，尽管法国的资产阶级政界对社会党人怀着愤怒和仇恨，但是它终究不得不表示尊敬，而在内阁主义的试验之后，在巴拿马分子那里尊敬已经让位给幸灾乐祸的感情，完全跟我们一样！如果说从大革命以来在一个世纪内先后受到所有政党和领袖欺骗的人民群众已经开始纠正他们片面地蔑视议会制度的态度，那么，现在在工会报刊上，对于“社会党员部长”及其在议会中的同伙们，重新有力地发出了法国工人的老的非常不祥的呼声来作为答复：你们要提防政客啊！

还不到三年的新曲已经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现在社会党也把它所收藏的完全陈腐的议会活动家和文人拿出来显示了，这些人对一切事情都曾经谄着次序赞成和反对过，曾经为此进行辩护、投票和写文章，他们许诺一切，但什么也不遵守，他们失去了任何节操，他们的政治招牌已经是百孔千疮了。

不受教条束缚的社会主义航船从它向实际政治水域的第一次伟大试航返港了，带回来的是折断的桅杆、毁损的舵以及甲板上的尸体。法国政治生活以及法国工人运动重新走上了正轨。不管瓦尔德克—米勒兰内阁是继续掌权还是让位给别人，现在法国没有一个人相信“危机”了。但是革命社会主义联

盟<sup>①</sup>作为危机遗留下来的产物存在着，它为社会主义进一步正常的发展提供了保证。随着饶勒斯党的瓦解，这个“联盟”必然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一切有益的和有生命力的分子的结晶核心。当然，这里还面临着某种过渡阶段。来自内阁主义阵营的逃亡者在加入老的“宗派主义者”行列之前，也许还会进行一些组织上的试验。从这一意义上说，也并不排除饶勒斯党的反对派分子暂时组成一个“第三党”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这个“第三党”得以成立的话，那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在一段时期内充当两面不讨好的角色，最后不是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就是变得无足轻重。因为现在万一要在法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间党，那么它的基础不会是原则分歧，而至多只是策略上的一些糊涂观点，从饶勒斯的词汇中继承来的关于“教条狂热分子的片面性”的一些口号以及过去三年的激烈摩擦和冲突时期留下的一些回忆和仇恨。

但是，危机的这些最后的波浪迟早终究要逐渐平息下来，它再也不会改变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这条大河的流向了。

其他国家中的公众舆论怎样呢？它也明显地离开了内阁主义的已经干枯的牧场。

而且在这里和那里促使人们得出过迟的认识的，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理由。例如，屠杀罢工工人，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对社会主义的污辱以及整个“保卫共和国”的垮台，对于这些事人们都安心忍受了，但在这之后，人们却到处在法国对沙皇

---

<sup>①</sup> 指法国布朗基派和共产主义同盟的代表退出了1901年里昂代表大会之后，同法国工人党建立的联合组织，它后来成为法兰西社会党。——编者注

的接待这一出比较无关紧要的轻歌剧中发现，社会主义的内阁主义是罪该万死的。

自从牛顿由于一个苹果落下而得出他的宇宙理论以来，似乎已成了一条规律，在腐烂的苹果还没有纷纷落到人们的鼻子上之前，人们连最简单的事情都不明白。

这样的时候终究很快要到来，那时，对于内阁主义将只有一种谴责的声音，而且按照众所周知的心理现象来看，根本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另一种意见。然而，在社会党国际终于结束关于法国巨大的机会主义试验的讨论而转入当前任务之前，对它来说，从这一试验中汲取教训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认为，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三年的法国米勒兰主义时期，和十个星期的1871年巴黎公社（这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同样重要的里程碑。

发表于1902年3月。《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23期第710—718页和第24期第756—758页。译自《罗·卢森堡著作集》第1卷第2分册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60—171、177—180页。



爱·伯恩斯坦

## 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近的发展

(摘录)

——另一个侧面的景象

(1902年)

我觉得，最近一个时期德国社会主义报刊对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事件的评论，就内容来说是不确切的，就它多次采取的形式来说，对于达到目的也是没有帮助的。我在这样说时，是把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各个纲领和决议所提出的达成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友好团结的任务当作已经确定的目的。

要实现这个目的不是很容易的事，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在德国，以及也许还在其他地方，只有少数同志在这方面积累了比本文作者更多的经验。正是关于这一点，我去年在这一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意见<sup>①</sup>，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到了正确地判断另一个国家的运动的困难，这里我很愿意重复一下。无论如何，前面所提到的对最近在法国党内出现的事件的判断，给我提

---

<sup>①</sup> 参看我的文章《对国际了解的几种障碍》。《社会主义月刊》1901年第1册第252页及以下各页。——伯恩斯坦注

供了一个即使还不十分恰当，却是很有意思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那篇文章中所论及的问题。

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分派情况而言，长期以来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令人担忧的对象。很少有哪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那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是分裂为几个派别的，而且我认为，这些派别的组合情况在哪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可以说，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主义迄今扮演的的是一个万花筒的角色：每次转动都会使组成这个整体的那些碎石得到一次新的布局。例如1896年在伦敦，以布朗基派、阿列曼派和形形色色的激进的社会革命家为一方，以盖得派、可能派、独立社会党人为另一方，一派激烈地反对另一派，以致根本不可能说服一派从另一派手中接受代表资格证书。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巴黎1900年）上，盖得派、布朗基派和独立的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反对阿列曼派、可能派和独立社会党人。谁敢预言在明年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的法国朋友又会怎样变换队伍呢？在这一点上，连我们之中最大胆的预言家都无法作出预言。

我肯定这个事实，不是为了伪善地嘲弄法国人，而只是为了根据这一事实，劝告人们在判断他们之间各个时期的磨擦时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尽管这个事实十分令人遗憾，它毕竟是由法国运动的本质决定的，并且成了它所固有的遗传病，这种毛病是同帮助法国精神获得巨大成绩的那一特点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运动就更加难于摆脱它了。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无尽无休的冲动：把每一种思想都引伸到最极端的结论，并且尽可能十分清楚地把这一思想表达出来。然而

不能认为这就是否认，也有许多较少值得注意的特点对历次的分裂发生作用，并且使实现统一的努力不能成功。

\* \* \*

我认为，任何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不管他对法国的其他事情抱什么态度，都不会反对这样的意见：在法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中没有人曾经象让·饶勒斯那样多年以来不间断地、耐心地、并且几乎是以超人的奋不顾身的精神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党。即使现在，我们还看到他在采取各种措施时都注意到造成迅速恢复统一的可能性。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在1899年经过努力而联合起来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剩余部分不久前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他对米勒兰问题才表示了这样的态度，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是承认软弱，是放弃自己的信念，是自我毁灭，而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则把这解释得更坏。

此后，饶勒斯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他的观点的发言摘要发表了，它的内容已经表明这种解释是很不恰当的。但是摘要把他的理由转述得还不够确切，因此我们在这里转载饶勒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于3月3日在《小共和国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与此有关的段落。我们将联系这一段话对当时的形势作一次一般的考察。

他说，参加大会的几个代表接受了一项委托，要争取在党纲中加一项原则上根据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处理参加政府问题的规定<sup>①</sup>，接着饶勒斯说：

<sup>①</sup> 根据这一决议，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伯恩斯坦注

“我个人认为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那些企图在部长问题上或在内阁主义问题上寻找借口，以便维持宗派统治，并推迟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人假装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事实上我始终认为社会党在壮大起来后无法回避在欧洲参加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当比利时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盟战胜教会党的时候——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肯定是要发生的——对于比利时社会党人来说，这个问题就会以一种使任何按教条办事的不妥协派感到不安的方式提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确信这种策略在将来是必要的，那么我也认为，超越党的普遍感觉而操之过急，是有罪的，是极有害的。党有权利要求不再一次承担责任。如果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下一次组阁的话，那么，即使从主张参加的策略立场来考虑，我也会认为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已经有了三年的经验。我曾经抱怨把米勒兰这个进行改革的好手当作攻击的目标是不公正的，我高兴的是这届内阁坚持住了，民族主义者的阴谋没有得逞，而这位商业部长得到了机会进行一次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严肃认真的尝试。但是在取得这三年的经验以后，无产阶级应该有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对已发生的事件客观地作出判断，确定‘内阁主义’策略的得失，肯定它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对它的成功和失败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我将把在下一次选举的第二天邀请社会党人入阁的任何政府以及接受这一邀请的社会党人都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直接敌人。

党有权利和责任恢复不偏不倚的精神和冷静态度，为了确定同它在民主制下不断增长的力量相适应的政策，这是必

要的。为此必须停止关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内阁联盟进行的论战。”

这是一个既诚实又勇敢的声明，他通过这一声明确实为党的统一作出了牺牲，但是丝毫没有放弃他的信念。他暂时放弃了他迄今所拥护的政策，但是他宣布，他一如既往认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他将一如既往维护构成这一政策的基础的那种原则性观点。

人们也许会问，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放弃中，牺牲究竟表现在哪里？但是对于严耐地对待自己的任务的党内同志来说，同意他的党在一段时间内自己放弃本来可以使它朝着它寻求的方向加速发展进程的那些可能性，这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在关于诸如此类的政治策略问题的争论中，通常是偏重于非常抽象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而把这个重要的观点完全忽略了。

不过，“内阁主义”的反对者方面的人们也力图否认参加政府会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保证比工人阶级作为反对党使用别的方法时更好地、更迅速地推动工人阶级的运动，即它的解放斗争。例如我们最近在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几乎只听到对米勒兰的行动表示不赞成的批评。即使这些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不言而喻，也不能说“内阁主义”问题——为了简单起见，用这来表述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被否决掉了，因为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措施的缺点可能是由于人的过失，而不是策略的过失。而上述攻击也确实有一部分是针对米勒兰个人的。

我既没有义务又没有能力在这里为这个人的内阁活动进

行辩护。为此我目前缺少时间，并且象我公开承认的那样，还缺乏对一切有关情况的足够了解。然而，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论，我毕竟可以说，某些社会主义者把米勒兰的内阁活动说得一无可取，我认为这种批评决不是令人信服的。

如果人们硬把一个人的企图或诺言说成是好高骛远的，并且对他实际做到的大多数事情避而不谈，那就很容易使这个人的行动显得微不足道了。有一个时期德国的敌视社会主义的报刊喜欢捏造说，社会党的选民们对于社会党选举胜利的成果抱有非常可笑的期望。据说那时不乏这种可怜人，他们宣称他们可以打碎这件或那件工具了，因为他们的苦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米勒兰的批判者也是按照这种方法行事的。他们捏造说，似乎米勒兰和他的朋友们曾许诺通过他的进入内阁给人们建立人间天堂，并且许诺最近就会出现一场革命。但是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在入阁时问题只涉及到使激进派内阁朝着一定的方向，也就是朝着民主制方面得到加强，并推动它前进一步。但是只有政治上幼稚无知的人才会相信，一个社会党人——在我看来是两个，如果把博丹也算进去的话——入阁就会立即消除法国的社会组成及其各党派的力量对比给一种革命政策造成的一切困难；也没有一个“内阁主义”的代表这样讲过。在最近的法国议会选举中参加投票的八百多万选民中，所有的社会主义候选人总计得到了八十四万张选票，因此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选民刚好比十分之一多一点。半个法国还从事农业；事情的本质决定，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指望部长采取突然的勇敢措施，只能寄希望于一种坚持不懈的、逐步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加强工人阶级的改良政策。

但是也许米勒兰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本来能完成的一切工作，因为这需要拥有 84 万张选票的社会党至少作为一个团结一致前进的团体做他的后盾，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个党的一翼立即竭尽全力否认他有充当先进工人阶级的受托人的权利。他在内阁中并不缺乏对工作的热忱，这甚至使他的批评者也无可争辩。同样也不能否认，他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屈不挠地遵循着一个方针：加强工人阶级。

我面前有一本法国社会主义者阿·拉维的详细描述米勒兰部长活动的书<sup>①</sup>。他的概述表明，无论如何这位社会党人部长在两年半的任职期间做出的成绩比其他部长通常所做的多得多，并且他的大部分成就在于纯粹的管理工作方面，这些成就是由许多规章法令组成的，其中的每一项个别来说固然显得相当微不足道，但是它们的总的的作用却肯定是向所涉及的管理部门灌输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把个别的措施或建议单独抽出来并加以批判，这样就很容易对措施的倾向作出错误的解释，从而把很多人引入歧途。这也适用于他的有关调解罢工的建议。这些建议同他的规定和法案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是为了加强工人的各种组织的规模和影响的，而且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不打算在这里对米勒兰活动的细节进行深入研究；我认为翻译拉维的书中的几章能说明，法国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为这个人的活动感到惭愧。

---

① 阿·拉维《米勒兰的业绩，一个社会党人部长（1899年6月—1902年1月）。事实和文献》巴黎若尔日·贝莱书店1902年法文版。——伯恩施坦注

拉维把米勒兰的活动分为五个方面：工人问题；邮电部门；商业和工业；技术教育；部长演说。第一类又分为五个部分：1、改善劳动条件（1899年8月10日关于国家、省和市镇的劳动分配，关于女工、童工、学徒劳动条件的法令；1900年3月30日关于在雇用各种类型工人的工厂里成年工人的劳动条件的法令；修改有种种可能遭到违反的1851年5月17日法令）；2、工人参加修改和实行劳动法律（改组最高劳动委员会——增加工人成员；劳动委员会；工厂视察）；3、减少劳动危险（事故防止和事故保险）；4、缓和与目前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危险（罢工条例；改革劳资仲裁法庭；失业救济；改革职业介绍所；老年和残废保险）；5、加强各种工人组织（扩大工会权利，扩大工人经济合作社的职权，促进劳动交易所，重建巴黎劳动交易所，编制劳动法典）。

从这些标题就已经可以看出，米勒兰仅仅在他的职权的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就已经是多么广泛；虽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一工作并不总是立即就有成绩的，但是他终究是为工人阶级创造了一些阵地，只要他们利用这些阵地，就一定会保证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长。为工会谋利益的活动不是完全无成效的，因为，法国在1899年1月1日拥有七十六个中央工会，下属一千一百三十二个地方工会和三十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名会员，而在1901年1月1日已有九十五个工会中央联合会，下属一千五百三十三个地方工会和五十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名会员。

拉维在他的书的第五章里除了转载米勒兰部长的多次讲话外，还转载了米勒兰于1896年5月30日——在他担任部



长的三年以前——在圣芒德举行的、由他主持的法国社会主义市镇参议员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说。其中讲道：

“我在这样指出我们党所追求的口标时，也就预先反驳了那种经常对我们党提出的荒谬指责，说什么它只等待通过暴力革命来取得它的思想的胜利。

我们卓越的朋友加布里埃尔·杰维尔下星期日将代表第四区来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党议会党团，他在几天前曾有力而明确地说，我们实行社会改革，决不能靠少数人的起义，而是靠大多数人的觉悟……不，为了实现当前的改良来帮助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从而使他们更加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为了在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条件下开始实现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社会党必须和只须通过普选争取国家权力。

社会党对结党营私是格格不入的，它摆脱了过去的任何羁绊，它在原则上毫不妥协，但对任何人都是宽容的，它唯一争取的是通过在一个经济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里逐步实现一个和谐组织的和平和秩序，以此来减轻贫困和解除痛苦，只有它能给予这个国家以一个最完美的道德理想与精神理想，因此社会党能够无所畏惧地发表意见。只要它是团结的，它就是不可战胜的。”<sup>①</sup>

演说以这句话作为结束，演说者受到与会的社会主义议员们，其中有茹尔·盖得和爱·瓦扬的热烈祝贺。不管人们对于他当部长时的改良工作在细节方面可以提出什么责难，但是这一工作在基本原则同上这次演讲中所阐述的观点是完

<sup>①</sup> 米歇尔《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03年巴黎法文版第31—32、35页。——编者注

全一致的。同样我们看到，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在六年之前关于在民主制度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所发表的意见，同他最近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所讲的也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人们首先应当避免在这里用什么交替之类的说法。如果说一部分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赞成米勒兰入阁，并一味指责他的活动，那么还有另一部分是赞成米勒兰入阁并至今仍留在内阁的，而且他们并不盲目地赞同发生的一切事情，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这些人具有社会主义信念，不管人们对入阁问题是怎么想的。

\* \* \*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它正在从一个具有强大的君主制行政机构的共和国改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在上面已经谈到的它的居民组成以及广大人民阶层还半固地背负着形形色色传统重担的情况下，这一过程经常有被一次政治危机中断、破坏或者至少是延缓的危险。米勒兰入阁所引起的危机正是一次这样的危机。从形式上看，也就是说，仅就政体而言，那些否认共和国在三年前处于危险中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在法国恢复君主制目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把共和国不是仅仅理解为一个没有君主首脑的国家，而是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受过民主训练的共同体，那么事实上那时共和国是受到严重威胁的。共和国的各种制度和机构的民主化过程中的任何一次中断，它的政治危机的任何一次延长或增加都有损于共和国的威望，都向民主发展的反对者提供给共和国设置新困难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助长那种认为共和国不能保证民族连续不断地发展的想法，使共

和国的存在发生动摇。由于这种原因，在法国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与社会主义工人民主派之间还将相当长期存在内部的互相支持的关系，问题仅仅在于，是否应当公开承认这种事实上的互相支持的关系，并且使之成为一种一贯应加遵循的策略准则。

因此，除了一小撮幻想者之外，无论是饶勒斯派的反对者还是饶勒斯派本身都懂得这种互相支持的关系。除了令人讨厌的涉及个人的问题之外，只有某种学理主义，因袭下来的关于发展进程的偏见以及类似的精心维护的传说在抗拒完全承认这种关系。人们以为，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承认就足以防止反动派的诡计，而且可以使党保留批评的自由和压力，甚至对于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党也是有必要使用这种批评的自由和压力的，但是如果承认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互相支持的关系，党就会遭到削弱。

事实上果真如此吗？表面上看来，“内阁主义”派社会党人在过去两年中的行为似乎证实了这种见解。他们难道没有一再在社会主义者方面应当尖锐批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情况下为这一内阁辩护吗？我不打算详细研究这里提到的那些事例，而是假定（这并不是说我承认上述说法）这些指责是中肯的，但即使如此，这些谴责仍旧不能有力地证明当前的这一问题。因为党的一个派别在由于另一个派别的分离和敌视态度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所作的事情，不能作为典型的事例来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党遇到这样的事情将会怎样行动。那时党是会由于公开参加政府而影响自己作出贡献的能力，还是相反，恰恰因此更有能力施

加压力和作出贡献（它一向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这完全取决于它的内部力量以及领导人的谨慎和毅力。

表面上持反对态度绝对不是施加压力的最有效的办法。1899年以前的历届法国共和主义激进派内阁同样确信，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反对保皇派—教权派联盟时总是可以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但是在其他方面它们却可以自由地执行一种随机应变的议会政策。社会党人根本不能听天由命，从而在一个严肃的联盟问题上帮助右派在议会中获胜。因此党自愿接受政府的一部分责任，而不分享其权力。社会党人在组阁问题上的弃权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其他方面的弃权态度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放弃了束缚别人手脚的可能性，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真正的行动自由。他们埋没了自己的才能，却没有让它发挥出来。

因此，政府问题不是一个根据教条就可以立即决定的问题。必须注意不要脱离一定的环境对这个问题作出一劳永逸的回答。谁只要略知一点党的历史就会明白，曾经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党给参加政治生活所规定的界石被远远地向外挪动，因为人们认为这种限制是一种讨厌的桎梏。人们既然有了这些经验，毕竟应当最终抛弃酷爱就政治纯洁性作出誓言的嗜好了。一个已经成熟的党在其行动方面除了服从政治状况和它自己的本质所产生的约束之外，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而它的本质是由它的总的原则和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性及社会地位决定的。如果党不相信自己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自己确定哪种态度最符合党的尊严，党的利益，以及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那么党就毫无希望了。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成

熟的，就不会把自己关在门外。

因此图尔代表大会<sup>①</sup>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入阁问题上没有作出一项永远有约束性的决议，而是把对这个问题各种进一步的规定保留给今后各次党代表大会去做。谁如果将这种态度诽谤为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他就是把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地革命的特性与盲动主义的革命性或暴力的革命性混为一谈。

当然这种情况在法国显然还会经常出现，而且在这个已经由街垒作出这么多政治决定的国家里，这毕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对于一部分法国社会党人来说难以充分设想在君主制或寡头政治的情况下的政治袭击同在民主制的情况下的政治袭击的差别，或者难以根据这种差别作出推论，那么并不能把这当作理由来非难那些已经理解这些差别的人。

正因为民主制下的革命只能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只能是改造迄今的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因此革命进行得很缓慢，它只有沿着这条道路逐步向前发展才是可以想象的。人们很少能在所谓的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民主制的经济制度，在现今的情况下人们也很少能突然改变它的外部关系。

很多社会主义者对米勒兰什么都可以原谅，只是不能原谅他在沙皇来访时的态度。但是请大家别忘记一件事。沙皇访问或对沙皇的接待只是一种仪式，其实质性的目标是两国同盟。谁不想承认前者，就不应当赞成或默默地承认后者。但

---

<sup>①</sup> 指饶勒斯派 1902 年 3 月在图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法国社会党的原则宣言、纲领和章程。——编者注

是有多么谴责接待沙皇的法国社会党人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在他们的纲领里提出立即废除两国同盟呢？如果他们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性步骤，却仅仅由于米勒兰作为部长没有回避他的职务所必然要求的礼仪，就对米勒兰进行谴责，那么这不过是儿戏（我不想用伤人感情的说法）而已。

两国同盟对法国方面来说是复仇思想的产物和体现。近几年来复仇思想幸而已有些缓和，但还没有彻底清除。只要它还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对于共和国的领导来说放弃两国同盟将是特别困难的。因此反对两国同盟的斗争必须首先同时以反对复仇思想的斗争的形式进行。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在法国是谁首先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发现谁的名字？这个现在被德国人革出教门、和米勒兰一起遭到咒骂的人，他的名字就是让·饶勒斯。

饶勒斯用出色的文章——可惜就我所看到的，这些文章都没有在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几个月之前在《小共和国报》上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战役，不是仅仅反对赤裸裸的复仇口号——这样做是算不了什么的，因为也有别人反对这种口号，而且它今天已经过时了——而是反对隐蔽的、用模棱两可的说法和虚构的危险掩饰起来的复仇思想，这种思想还在作祟，并且构成军国主义的支柱，——这次战役不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奇谈怪论起初固然令人吃惊，但后来却使人怀疑它的发起人对待事情是否认真；这次战役是以一种实质上尖锐、语调上却是十分温和、以严肃的历史证据为根据的陈述进行的，正因如此，它就更加应当受到赞许了。……

……

图尔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纲从理论上讲完全跟得上时代的水平。也许有一两个句子本来可以不用那么绝对肯定的措词；但是这种情况显然不会使纯真原则的维护者可以利用来谴责它。代表大会不经过辩论就按照受委托起草纲领的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一致通过了这一纲领，在这一点上，它与爱尔福特纲领的命运是相同的。与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一部分一样，图尔纲领的说明原则的部分保持了宣言的风格，只是比前者更详细一些。

人们怎么会指责它具有“观念论的特点”，这是难以理解的。纲领所包含的观念论比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多一丝一毫。相反，在它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思路才是它的特色。例如它一开始就从两个绝对现实的因素推论出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是民主制和现代生产方式。这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推理是相一致的。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法国革命和它的文献提供了法律和理论的出发点。这种联系以及从这种联系中得出的结论在纲领的原则性说明中都得到了出色的阐述。这一说明虽然没有涉及策略问题，却是党的策略规范的卓越的指导原则，这些规范是不受变化不定的政治状况影响的。

关于组织章程发表意见，就不象关于纲领那样有把握了。在这里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已经使人们不信任任何一种中央集权制，而且在法国一向存在着强大的联邦主义的传统，因此制定了一个把全部力量都转移到区联合会的章程，中央委员会几乎只是供装饰用的。这种形式是

否能保证党获得它为了有效地使用资金和力量所必须的那种行动上的统一和灵活性，这还必须等着瞧。

人们不应当根据德国的经验判断法国的情况。在法国对中央集权制的憎恨是多么的强烈，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了：在一向是盖得派堡垒的鲁贝，这个党的一部分成员在迄今担任地区领导人的昂·卡雷特<sup>①</sup>的领导下退出了组织，因为中央领导机构把一种市镇政治的策略强加给他们，而这一策略使他们在市镇参议会的选举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退党宣言表现了坚决的联邦主义态度。还有一个联邦主义的宣言，这就是安省、汝拉省、萨瓦省三个东部地区的社会党联合会写给图尔代表大会的信，其中阐述了这些联合会为什么决定不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暂时采取等待态度的原因：

“我们相信，我们在党内能够完成整个党无论在财政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但是我们也希望，组成我们的联合会、小组、工会和合作社的那些宣传单位和行动单位能自由地调整它们的关系并始终自己决定自己的策略，而不是必须屈服于社会主义议会制度的法律，这一议会制度力图象一个政府一样凌驾在社会主义思想之上。我们深信，外省的一切联合会都受到这种精神的影响，并且由于在各区开展了热烈的行动，不久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使代表们集合在一起。那时在社会主义的统一问题上将最终取得一致，因为这种一致要在自由的影响下完成，而不是在权威所规定的形式

---

<sup>①</sup> 昂利·卡雷特(Henri Carrette 1846—1911)——造船厂工人，1880年与勒佩尔创建鲁贝工人党，1892—1902年为鲁贝市长，1902年脱离法国工人党。——编者注



下实现的。”<sup>①</sup>

这封信在开头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论和争吵表示非常不满。这些争吵必然会使许多社会主义者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情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可以看到，若干联合会对于图尔代表大会抱有保留态度，决不是为了要发表一个支持反对派的宣言。

有三十四个联合会参加了图尔代表大会，共包括九百四十个小组，一共派来了九十四位代表。讨论是在极其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会议结束时主席惹罗-里夏尔除了指出这一事实外还能够声称：“我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受到委托的这一工作上，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时间去诽谤、侮辱、或者非难那些不赞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策略的观点的人。”

人们能够承认图尔代表大会所做出的这种成绩以及其他成绩，而并不因此就冤枉了另一部分法国社会主义者。但是无论如何，没有理由从外国来赞同这里流传的贬低图尔大会的代表们的言论，这是反对这些代表的人们加在他们身上的。即使完全撇开这种作法违犯国际准则这一点不谈，一个多世代以来国际党史的经验也禁止我们这样做。本文开头已经指出，法国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在各次代表大会上的组合是如何变化不定。我们本来也能够指出，这些集团中的某几个集团的策略是如何变化不定，其中恰好也包括那一个今天被当作坚定性的典范提出来的集团，它曾经突然有一天给不久之

---

<sup>①</sup> 参看《小共和国报》1902年3月12日。——伯恩施坦注

前还被诅咒的事情祝福。我们姑且不讲这一点，否则就一定要转移到个人争执的领域了，但应该提醒一下，为的是希望大家在判断中能够有所节制。<sup>①</sup>

在法国的派别斗争中，也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有各种在国外完全不能估计到的影响和动机在一同起着作用。的确，甚至对于已经很明显的事情，外国人也常常会判断错误，因为他特别难以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具有不同历史、不同设施的另一国人民的感情。让我们再一次举内阁主义问题为例。在德国，各部大臣是国王的官吏，人民代议机构是选举出来同国王及其官吏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那里一开始便存在完全由事物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对立；内阁主义（不管大臣的为人如何值得尊敬）是与民主的人民代表地位不相容的。但是在法国，和任何一个具有民主议会制的国家一样，部长是人民代议机构的官吏，他以它的名义任职，因此这种情况存在得越久，并且人民对这一情况的认识越明确，内阁主义的概念在他们那里就会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包含另一层意义。可见，如果人们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口号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将会引起完全错误的观念。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权利对任何另一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有争议的各派别作出裁决。在问题不仅是由于少数人搞组织分裂而闹得尽人皆知的情况下，只要争论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范围内进行，那

---

<sup>①</sup> 在让·饶勒斯不久前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巴黎1902年，保尔·奥朗道夫书店）一书的《必要的修正》这一章中，有一篇论述这个题目的文章。  
——伯恩施坦注

么,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其他国家有争议的各派别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因此不言而喻,任何时候都要保留批评的权利,但是,必须很有分寸地用自我克制的态度使用这种权利,尤其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更应这样;即使在辩论时十分尖锐,也决不当把这种权利歪曲成革出教门或类似的专横做法。这不仅是说,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违犯了最普遍的礼貌,而且也是说,它们通常是没有什效果,并且随后必然要以并不光荣的方式自己谴责自己撒谎。让我们向经验学习,它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先例,说明人们在国际方面应当怎样行动!让·饶勒斯不仅是法国的、而且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具有最杰出智慧的人之一,他不仅在写作和演说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头等天才,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仅仅因为他在法国引起一些人的个人不满,就反对他,就从德国发出革出教门的通令,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蠢事吗?因为谁只要稍微了解情况,也就会知道米勒兰事件只不过使长期以来猛烈燃烧的火焰更加旺盛罢了。

发表于1902年。译自《社会主义月刊》1902年  
第1册第4期第250—262页。

让·饶勒斯

##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1904年8月19日)

我尽量讲得快点，尽可能不超过主席团规定的时间。我希望主席的表走得慢一点。(笑声)

在一个受到委托说明引起讨论的各项条件的报告人<sup>①</sup>之后来发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在一个心平气和的报告之后，无论怎样平心静气也会显得即使不是暴躁至少也是激烈的。而且在你们听了关于社会主义联合和统一的号召之后，我却提出一个可能遭到整个大会很大抵制和抗议的论点，这会使人们产生极大的反感。

但是，社会党的统一不应是强制性的一致，如果社会主义否认少数派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自身也会遭到损害，它就会忘掉自己的职责。

我在双重意义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少数派。我没

---

<sup>①</sup> 指王德威尔得，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问题的报告。——编者注

有权利代表支持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决议案的少数派讲话，因为在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人中间，许多人不同意，甚至还谴责我所参加的那个党的多数党员奉行的政治策略。我在这里只能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大多数委托者。

我和我的朋友们拒绝了德累斯顿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同时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历次会议长期争论的结果。这项决议提出了一大堆理论和实践的观念。我不想在规定时间内涉及这些问题。这里，我只想阐明我们在论战中的立场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

我投票反对德累斯顿决议案，并不是因为我对于另一个组织的法国社会党人想利用这次表决对我们进行攻击而感到不安。我坦率地说，当他们不正确地、错误地硬说我们背离了阶级斗争的立场之后，当他们在长年累月的论战之后向你们拿出了德累斯顿决议案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能使我们的国家相信这个决议是对我们的策略和政策的谴责。我绝对相信法国无产阶级会看到并且将继续看到我们的政策并没有背离阶级斗争，而是在共和主义民主制下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有效手段。法国无产阶级不会背弃这个政策，我已经扼要地说明了它的总的成果；它保卫了自由，重新开始了工人立法和社会进步事业，粉碎了我们曾击退并且战胜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企图，从而加强了普遍和平的保障。如果我们的同志们，我们的对手想把大会投票结果和德累斯顿决议带到法国的论战中去，那么，好吧，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将对这种批驳我们的政策的、在我看来是荒诞无稽的理论提出质问，在法国的共和主义的、社会主

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面前，我们要向那些认为政治上的共和国根本不值得无产阶级花一小时或一天去保卫的人们提出质问，向那些认为争取学校世俗化和思想解放的努力应该延缓到盲目的力量不依赖无产阶级的智慧和觉悟而自行取得胜利以后再着手的人们提出质问。我们要对我们中间继承了布朗基传统的人们，对公民瓦扬和他的朋友们，提出质问，他们竟容许歪曲、取消、贬低已经成为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荣誉的那些自由思想、革命和共和国的传统。（热烈鼓掌）

因此，我并不是为你们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法国的互相对抗的派别斗争中引起的反响而感到忧虑。何况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我已经充分注意到德累斯顿决议案明确地或者含蓄地承认了社会主义行动和无产阶级行动的这两种必要性。这个决议指出，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就它的目的、组织和手段来说都应该是一个自主的党，我们和你们一样，也一向是这样认为的。目的上自主，因为它除了要进行可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弊病的改良以外，它还力求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完全改造成社会所有制。它要铲除、彻底根除一切资本主义的形式，包括利息、地租、房租、利润、赢利，使一切劳动产品归集体，归有组织的劳动者的社会共同体所有。为了实现这一改造，它要使每一项改良不仅成为减轻无产阶级的痛苦的手段，而且成为提高无产阶级完全实现其目标的思想 and 行动的能力的手段。刚才，王德威尔得在报告中好象说改良主义者把改良当作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对谁讲的，我不知道这些话可能针对谁。我只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什么程度上来说，

这些话都不能针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拯救共和国，保卫公众自由，教育的全面世俗化，教会同国家分离，赋税改革，劳工法，所有这些改良都只是为实现全面解放，为达到被压迫的劳动者的革命目标的阶梯。（掌声）

我们在目的上自主的同时，还要有组织上的自主，我们不断要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党派的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并不象宗派分子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与周围环境隔绝的、孤立的、狭小的、僵化的政党，而是一个独立地组织起来的、能够利用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提供的一切行动手段的政党。

但是，既然德累斯顿决议案肯定了这个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的必要性，那么，它同时也就承认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扩大政治自由应该利用社会立法和整个民主制。我们应该在这种起作用的民主制中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当我们的宣传使改良的必要性的观念和信念深入人心甚至扩大到党外去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地利用人们对民主的这种赞助来实现、达到、给予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一个初步的满足和力量。这就是一切社会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形式所采取的政策。

在我们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鼓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盖得说，在法国三千七百万居民中，只有二十万人在阶级利害关系上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直接的和激烈的冲突。我看到李卜克内西关于四千万德国公民也是这么说的。那么，毫无疑问，让这种无定形的、杂乱无章的、不稳定的民主派放任自流，将是极为轻率的，将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应该使这种民

主派服从纪律，由一个组织为自主的、与资本对立的阶级的无产阶级来引导它。同时，应该密切注意一切把没有受到民主启蒙的阶级引导到承认我们政策的必要性和接受我们理想的合法性的进化运动。例如，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存在着一个进步的激进党，社会主义激进党，它不象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党，它代表了一些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子，一些中小工业的工人、手工业者、民主主义农民，他们还没有完全懂得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路人，他们同意你们希望实行的一部分改良。在法国，这种社会主义激进派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接受世俗化改良、教会和国家分离以外，它还接受对收入和遗产征收大幅度的累进税以及价格指数表，它还接受对铁路、银行、矿山、制糖业、提炼业、保险事业，总之，对一切向垄断方向发展的工业逐步实行国有化。当然，我们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它同我们不一样，它不是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派。但是如果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击退反动势力，获得改良，发展工人立法，那么，拒绝这种帮助将是丧失理智的和犯罪的行为。（热烈鼓掌）

因此，我再说一遍，我和我的朋友们之所以决定投票反对德累斯顿决议，既不是因为我们的对手可能企图在法国歪曲运用这一决议，也不是由于这一决议的一般意义。

这首先是因为在我看来，既然社会党的一派是把这一决议案当作攻击另一派的工具拿到这次代表大会上来的，因此如果把它当作最高公式强加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那是令



人反感的。请允许我对要求我们和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同志们重建统一的倍倍尔、考茨基和费利说一下，不应该把统一只挂在口头上，应该表现在愿望和行动中。两个对立组织之一提出一个办法并声称要用它来反对另一个组织，如果采取这一办法来促成两个组织未来的和解和完全的统一，这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办法。

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我要责备德累斯顿决议的是，除了这个决议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外，还因为它特别坚持那些限制无产阶级民主活动的条文。我要责备的是，不管人们的愿望如何，也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决议表现了一种对无产阶级的极端不信任。人们总是担心，不断地重复说无产阶级会腐化、堕落、迷失方向，和民主党派合作，哪怕是短时期的合作都会削弱它的阶级意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愿意把世界交给无产阶级的，它宣布无产阶级有能力组织整个社会，重建社会，领导生产，指引全人类走向更远大、更崇高的目标。但是在这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现在人们总是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不团结的、不成熟的、软弱的、愚昧的，一半是不自觉的，它就象一个瞎子在陌生的城市中一样，不可能在干预它周围的生活时不迷失方向。（热烈鼓掌）

我们拒绝德累斯顿决议案，首先是为了对这一点提出抗议，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决议案主张用狭隘的策略公式（它本来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来束缚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种种迹象表明在许多国家都将出现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工人阶级需要保留全部策略和行动的自主性。在意大利，如果社会主义不投入行动，已经开始重整旗鼓的激进

党将和社会主义争夺民主。在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工人组织开始接近。有一天倍倍尔曾在委员会中说，在英国因为资产阶级巧妙地、接连不断地给无产阶级以改良，因而阻碍了英国工人阶级走向明确的和自觉的社会主义。

.....

在比利时，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两年以后教权主义党可能要被自由党和社会党必然汇合起来采取的行动所推翻，那时候，在比利时的同志面前将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困难性我们事前已经做了估计。他们将遭受痛苦和不公正的行为，他们将受到误解和错误的对待，我希望我们的经验有助于减轻他们的这一切遭遇。（骚动）

是的，公民们，当全世界无产阶级而面临着新问题的時候，用过于狭隘的策略公式去束缚他们是轻率的。当德国社会党人把德累斯顿决议案带到国际代表大会上来的時候，当他们想把他们在本国采用的、可能是权宜之计的策略准则变成国际的策略准则的時候，他们被一种可悲的臆想战胜了。他们想象，他们争论不休的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主义观点可以作为各国社会主义行动的统一尺度，一成不变的原则和至高无上的准绳。那么好吧！既然关于策略的决议案是以各国内部的政策为目标的，那么我们法国社会党就不得不——我们对此并不抱怨——解释我们国内的政策，我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是会承认我有这个权利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主义领域里自由地讨论我们内部的形势。

我说他们没有觉察到，当他们把德累斯顿决议案普遍化和国际化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目前带有的缺乏信念和摇摆不

定的精神传给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危及欧洲和世界，危及和平的保证和社会自由的保证，危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进步，危及欧洲和世界一切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不是所谓的妥协，也不是法国社会党人联合民主派拯救自由、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冒险试验，危及这一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软弱无力。

当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和令人钦佩的党，这个党虽然不是象人们有时说的那样，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所有的思想家，也是提供了某些最有力的最正确的思想家。它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一个采取一贯的有步骤的行动和有着各级强大组织的榜样。它不怕任何牺牲，在任何打击下都不动摇。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党，你们是德国的希望，是文明的和有思想的人类中最崇高最光荣的一部分。

但是，你们表面上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是用你们的逐年增加的选票和席位来衡量的）同你们的影响和行动的实际力量对比起来，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而由于你们选举力量的扩大，这种差别就更加明显了。啊！是这样，你们在这次六月选举中获得了三百万张选票，选举的第二天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你们有一支可观的进行宣传和争取群众的力量，但是你们无产阶级的传统，你们的体制都不允许你们把三百万选票这种表面上巨大的力量投入到有用的实际行动中去，投入到政治行动中去。因为无产阶级的主要活动的两个主要部分、两种手段你们都忽略了：你们既没有采取革命行动也没有采取议会行动……

我说过，我们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忽略了德累斯顿决议中

的主要缺点，这就是说，这个决议力求采用目前强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的那种行动准则，更确切地说，那种不得不放弃行动的准则。我还说过，无产阶级能够用来影响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两种手段，目前还没有为他们所掌握。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不错，德国无产阶级表现了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他们没有历史的革命传统。普选权不是他们在巷战中争取到的，而是由上面赐给的。如果说，要从亲自争得普选权的人们手中夺走选举权是难以想象的话（因为他们很容易把普选权再夺回来），那么，相反地，要从上面取消那些由上面所赐给的东西却是可以设想的。要是不相信，就请看看你们的红色王国，你们的萨克森“社会主义王国”是怎样不经过反抗就被取消普选权的……（热烈鼓掌）

当倍倍尔在帝国议会里就克虏伯事件发表了反对德国皇帝的义正词严和胆略惊人的演说的时候（我们已把这篇讲演翻译出来并且广泛传播），你们却不得不同时在你们党的机关报上，在那些每天谩骂我是无产阶级的大败类的杂志上，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们对于德国工厂主强迫他们在给你们的皇帝的无聊贺信上签字一事不要加以拒绝！这就是说要你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现在你们还继续这样在德国无产阶级中间软化、蒙蔽和削弱这支缺少革命传统的、在历史上十分软弱的力量。

你们正因为自己没有这种革命传统，所以才不满意其他国家的人民诉诸这种革命传统。我们的比利时同志们为了争取普选权而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你们却只会侮辱他们，你们的理论家只懂得蔑视他们。（热烈鼓掌）

你们不但没有掌握革命行动的手段，你们不但没有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所给予的力量，你们也没有掌握议会的力量，——这一点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即使今后你们在帝国议会中占了多数，你们的国家也将是一个社会主义力量虽占多数但不能当家作主的唯一国家。因为你们的议会只是半个议会；如果议会不掌握执行的力量，统治的力量，如果它的决议仅仅是一些可以被帝国政权机关任意勾销的意见，那它就不成其为议会。那时，你们就会知道并深深地感到自己处境困难。你们就会去寻找出路。我确信你们会找到出路的。命运的道路是阻挡不了的。何况你们既然是德国的无产阶级，你们也就是德国的命运，就是德国的救星！谁也阻挡不了你们的道路。但你们目前在实践中还不知道应当选择哪一条道路，还不知道你们将成为革命者还是议会主义者，还不知道如何在本国建立民主制度。

大家都期待着你们，全人类的社会主义者都期待着你们在这次取得三百万张选票的胜利后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制定出一种政策。你们在你们报纸上大喊大叫：“帝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不！帝国还不是你们的，因为你们甚至还不保证你们能否在你们的首都很好地接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掌声）

因此，你们不知道你们将选择哪一条道路。在这个巨大胜利后的第二天，人们在期待你们提出口号、行动纲领和策略。你们一再研究，反复探索，你们一直在等待事变，但却依旧没有成熟的见解。你们躲在不可调和的理论公式后面，在本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掩饰自己在行动上的无能

为力。象那样的理论公式，你们杰出的考茨基同志这一辈子会源源不断地供给你们的。（掌声和笑声）

如果这次国际代表大会通过德累斯顿的决议，就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要一切国家，要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它的一切力量都陷入德国民主派的这种暂时的，但却是危险的无能为力状态，陷入这种暂时的、但被迫的放弃行动的状态。

因此，你们这种强制和专断形式的决议案在哪个国家遭到最激烈的反对呢？那就是在法国，至少是在法国的一部分，在荷兰、比利时、瑞士、丹麦、瑞典，我认为还有英国，也就是说民主和自由越多的国家，无产阶级在议会中越起有效的政治作用的国家，越是受到你们的决议案的损害，你们的决议案将是普遍的政治自由发展的障碍，因而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障碍。（经久不息的掌声；长时间的欢呼声。——发言人回到座位上受到朋友们的祝贺）

发表于1904年8月19日。译自《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六次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4年布鲁塞尔法文版第67—82页。

奥·倍倍尔

##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

(1904年8月19日)

我们的饶勒斯同志今天的发言想造成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是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挑起了这场争论。

不论在德累斯顿大会之前还是在大会之后，我们都不曾有过这种想法，而是我们的一部分法国同志认为，我们的德累斯顿决议很适合作为所有议会制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基础。

我们当然决心拥护我们自己的决议，尤其是因为促使我们在德国通过这项决议的那些原因也存在于一系列的国家里，尤其是因为1900年的巴黎代表大会虽然一致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但从那时以来这种倾向和这种实践还继续存在，而且在不止一个国家里在实践方面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势力。正因如此，所以格外有必要对这种思潮表明态度。

听了饶勒斯的发言，人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委员会里怎么会有多数人赞成这样的决议呢？因为照饶勒斯说的那样，别的国家的同志要是投票赞成这样一个决议，那他们准是

一帮傻瓜。他把事情说成是取缔一切自由和独立思考，压制少数派，总之，是社会民主党内无法想象的精神恐怖主义。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我们的一部分朋友对决议的措词并不全都赞同，但是阿德勒—王德威尔得修正案也只做了轻微改动，它仍保留了我们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内容。

单凭这一点，饶勒斯的批评的实质和意义都大为减色了。饶勒斯说决议只适用于君主制的德国。诚然，德国不仅是一个君主国，它是差不多两打君主国，因此，如果说一个君主国的话，那就差不多还要再加上两打君主国。（大笑。说得好！）所以德国的情形确实是很特殊的。的确，德国是一个反动的、封建的警察国家，全欧洲治理得最差的国家。对这点我们很清楚，我们每天都在和这个制度作斗争；我们不需要哪个外国人来教我们懂得我们的处境多么可悲。但事实是，我们的决议也同样能够正确地指出其他国家里应当遵循的策略。资产阶级报刊异乎寻常地转载了我的关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声明。现在我把在委员会里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不言自明，我们是共和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赞同声）这是迄今为止毕洛夫伯爵和俾斯麦公爵以及整个德国反动派对我们的最严重的指控之一。我们从来不否认，但我们也不会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欢欣鼓舞。

不管我们多么羡慕你们法国人有你们这样的共和国，而且希望我们也有一个，但我们不会为它去拚命，因为它不值得。（暴风雨般的欢呼声）资产阶级君主国也好，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好，都是阶级国家，本质上都必然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必然竭尽全力使资产阶级保持全



部立法权。因为资产阶级一旦失去政治权力，也就失去了它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君主国并不象你所描绘的那么坏，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象你所描绘的那么好。（热烈鼓掌）甚至在我们军国主义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德国，我们有一些制度在你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还仅仅是一个理想呢！请看普鲁士和另一些邦的税法吧，再瞧瞧你们法国的情形。我不知欧洲还有哪个国家的税制象法国的那样可悲，那样反动和那样贪婪。面对这个拥有三十五亿法郎预算的吸血制度，我们起码还有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

当问题涉及实现工人阶级的要求时，资产阶级共和国就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对付劳动者。劳动者在哪儿还能受到比许多人憧憬的大洋彼岸的资产阶级大共和国里更粗暴、更无耻、更下贱的待遇呢？甚至在瑞士这个远比你们法国还更加民主得多的共和国里，光是这个短暂的夏季，国民警卫队就曾六次被召来镇压工人，仅仅因为工人们在几次规模很小的罢工中行使了自己的联合权和结社权。

我尤其羡慕你们的共和国在所有的选民集团中都实行普选制。但我直言不讳地跟你们说，如果我们的选举权有你们这儿这么广泛这么自由，那我们一定会让你们瞧瞧崭新的东西，（热烈鼓掌）这是你们迄今没有做到的。（再次鼓掌）在你们那儿，每当工人和老板冲突起来的时候，总是用可恶的方式镇压法国无产阶级。现在的军队若不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最得力工具又是什么呢？近四年来，在任何一次稍许重要的斗争中，无论是在利尔、鲁贝、马赛、布雷斯特、马提尼克还是最近在诺曼底镇压罢工的玻璃工人（特列港血案）时，（热烈鼓掌）

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内阁或孔勃内阁没有哪一次不动用军队对付劳动者。去年11月巴黎警察最无耻最残暴地袭击了巴黎劳动交易所，殴打和打伤了七十个工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身为议员的社会主义朋友竟没有投票赞成处罚警察总监。（纷纷谴责）饶勒斯教训我们应当做什么。此刻我只能答复他一件事：在德国，如果谁胆敢投票赞成一项有利于政府的议程，如果谁胆敢抛弃无产阶级的最重大利益，他第二天就会失去自己的委托书，（热烈赞同）他一刻也不能再担任人民代表；我们是纪律严明的，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饶勒斯说德累斯顿决议流露出缺乏信心、迟疑不决的精神。象饶勒斯同志这样一个有教养、熟悉历史的人竟对德累斯顿决议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这样的误解，我感到非常惊讶。当然，我们德国的政府的确是除土耳其和俄国之外最坏的政府，然而我们还是利用帝国议会的普选权和各邦残缺不全的选举权，把相当多的代表选进了德国的立法机构。难道他们曾反对过哪一次改革吗？难道他们拒绝支持过哪一项进步吗？恰恰相反。如果在德国还取得了一点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我们可以把它完全归功于我们社会主义者。（喝采声）我们的朋友饶勒斯凭借我们的敌人俾斯麦的权威攻击我们，我们可以用这些话来回敬他。（鼓掌）他们只是在我们的鞭策下才被迫进行改革的。社会民主党有足够的的气量接受从敌人方面争来的一切让步，只要这些让步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进步，我们可以今天支持政府，明天支持自由党，后天又支持力图争取工人选票的中央党。但事情一完结，我们就把中央党、政府、自由党的人当作宿敌而一概打倒。我们一分钟也没忘掉横

在我们和政府、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无底深渊。

英国的政府进行改革也只是为了阻挠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英国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精明的。(英国代表团里有人喊：听他讲！听他讲！)明年大选英国自由党如果获胜，它将再次从你们中间任命一个人，也许是约翰·白恩士<sup>①</sup>作副大臣；可不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而是为着能对工人们说它自愿满足了他们在火陆上遭到拒绝的斗争要求，(英国代表团热烈鼓掌)为着保住工人的选票，防备社会主义。(英国代表团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就是饶勒斯要求得到的他通过和资产阶级激进党结盟而立下的功劳的证书。(笑声)如果法国的共和国这几年曾处于危险中——我假设这是个事实——那你们和它的资产阶级捍卫者一起拯救了共和国就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会那样做的。我们也不指责你们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如果你们单独同教权主义斗争力量太薄弱，那就和自由党人联合起来吧；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战斗一结束，就和他们分道扬镳。饶勒斯拯救的普遍和平近年来究竟在欧洲何处受到威胁了呢？(大笑)说到拥护普遍和平，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和我们相反，你们竟投票赞成陆军和海军预算，(饶勒斯派喊：没有！)殖民预算，(饶勒斯派：没有！)间接税，(你们自己呢？)秘密基金，(饶勒斯派喊叫)这样一来，你们实际上助长了可能威胁和平的一切。

---

<sup>①</sup> 约翰·白恩士(John Burns 1858—194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年代为新工联的领袖之一，九十年代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从1892年起当选为议员，曾任自由党内阁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1914)和贸易大臣(1914)。——编者注

(热烈鼓掌) 我们不会把赞成预算的信任票投给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热烈的掌声)

饶勒斯还指望通过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实现铁路、矿山的国有化。他的纲领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在实行君主统治的德国已经实现了。(笑声)

我们要在德国取得这种类型的进步，自然也得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但我们断然拒绝和这些党长期结盟。

饶勒斯以为德累斯顿决议即使对德国也只有暂时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看他是个很糟糕的预言家。我绝对想象不出一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我们可以不按这个决议的原则行事。至于硬说我们的德累斯顿决议是缺乏信心和迟疑不决的精神造成的，我也从未听到过比这更骇人听闻、更违背理智的说法了。这个决议针对的正是那些缺乏信心的人，那些迟疑不决的人，那些想让我们背离它所指出的久经考验的老策略的人。(掌声)还有一件事能证明我们的自信心：我们从未想到过开除哪个人。

饶勒斯还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上软弱。那他指望我们在取得了三百万张选票的胜利后做些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把三百万选民召集起来带到王宫前呢？(笑声)在这次丝毫没有叫我感到意外的胜利之后，我当即说过，暂时它起不了什么作用。在我们这儿，三百万张选票是不够的。等我们有了四百万或八百万张选票时再看吧。(热烈鼓掌)面对资产阶级方面八百万张选票的优势，我们现在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我实在不清楚。既然我们迄今未后退过一步，我们今后仍将在德累斯顿决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且我们将乐意看到别人和我们

一样干。(鼓掌)眼前，我们只拥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派精神上的力量。我们也不能有更大的奢望了。的确，我们投票赞成法律草案时常被政府顺手塞进了字纸篓。这其实更有利于我们的鼓动；当那些合理的必要的提案不能形成法律时，我们的事情才有起色。

饶勒斯说，我们刚一取得三百万张选票的胜利，取消帝国议会普选权的念头就出现了。可是，饶勒斯同志，这除了表明资产阶级害怕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普选权的巨澜围住了一座小小的孤岛。水不停地上涨，岛上的一群可怜的家伙惊恐地等待着大水没顶的时刻，这一时刻是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的。那么，如果你们获得二百万张选票，在法国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难道你们的资产阶级会安静地坐以待毙吗？（饶勒斯派骚动并发出笑声）等着瞧吧！

饶勒斯说：“你们软弱无力，因为普选权是上面恩赐给你们的。你们没有革命的传统。”虽然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曾帮助过无产阶级取得普选权，但当无产阶级要求进行社会改革时，资产阶级就在六月战斗中把它战败了。<sup>①</sup>共和国不是法国无产阶级靠勇气给自己争得的，（法国代表中骚动）是俾斯麦的胜利把你们的皇帝押到了威廉斯赫埃<sup>②</sup>。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大笑）而在德国，俾斯麦被迫顺从1848—1849年

① 这段论述中有一段脱漏了。倍倍尔提到，6月以后共和国取消了普选权，后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2月2日又把它恢复了。——原书编者注

② 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虏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编者注

的革命传统，他实行了普选制。他本想借助一个小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对付被削弱了的资产阶级，他的算盘打错了，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功绩。

米勒兰事件如今已经是一件往事了，但它所引起的使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深受其害的致命纠纷还在继续下去。1898年饶勒斯在《国际都市》杂志上用精辟的语言预见到了这种精神上的混乱（听着！听着！）：

社会主义不应接受政权的一小部分，它应当等待取得整个政权。我们可以协助实行局部的改良，而且事实上也在协助；但是一个打算实行社会的全面改革，主张用一种所有制和生活的原则代替另一种原则的党，却只能接受全部政权。如果它只取得一部分政权，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这种局部影响会被在现今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所抵销。敌人在根本利益还未遭打击时就已经害怕了，新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受到损害，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危机而社会主义无法从这个危机中产生出来。

饶勒斯同志，您预见这个发展进程时多么有眼光啊。（饶勒斯：是啊。——听众大笑）是您自己由于一再支持米勒兰而极严重地损害了自己。这是您一生中迈出的最致命的一步，是您给国际社会主义设下的最危险的陷阱。（热烈鼓掌）1900年米勒兰不向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致意，却向欧洲最残忍的暴君沙皇顶礼膜拜。当我们前往拉雪兹公墓向被杀害的公社社员献花圈时，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竟调集步兵、骑兵、炮兵来捣乱。到场的警察比大会代表还多，他们千方百计破坏国际代表大会悼念公社社员的活动。仅此一举就足以使米勒兰

名声扫地。(狂热鼓掌)从那以后，法国议会里每一次表决时，饶勒斯集团都分裂为两部分或三部分。这种情况在德国只有在最被人瞧不起的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自由党里才可能发生，而今天，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派别里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后果当然是损害党的声誉和瓦解党。

以前，维克多·雨果曾把法国资产阶级称作“世界的光明”。这本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应当为国际社会主义担当起来的使命。遗憾的是，法国社会民主运动的表现与其说是楷模，不如说完全相反。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设法结束这种状态，我们对全世界负有义务使法国社会主义重新占据和它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相称的地位。

请你们投票拥护德累斯顿决议！我不担心后果。相反，法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考虑本届代表大会的警告，它的面貌就不可能是我所确信的那个样子了。尽可能一致地通过德累斯顿决议吧。

发表于1904年8月19日。译自《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六次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4年布鲁塞尔法文版第83—94页。

爱·安塞 尔

## 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

(1904年8月19日)

我们在委员会里是少数，但我们对这次十九票对二十一票的表决泰然处之。三十年来我们由于宣扬合作制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并且受到嘲弄，但现在呢，正是那些嘲弄过我们的人在效法我们。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他们在事实面前认输了。那么，新的方法只要在一个国家里取得成就，人们也会在它面前认输的。所以我们把问题明确提出来。

无产阶级在其前进过程中目前面临着一条新的道路。在欧洲的某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需要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帮助，这些人为了取得我们的帮助，准备向我们让步，他们请我们或者将要请我们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政府。

你们说：“社会党的同志们，不要走这条道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没有作好准备。社会主义还处在宣传阶段，它还必须长期保持戒备。”而我们说：“社会党的同志们，走这条道路吧，



走的时候要十分谨慎，多谋善断，高度团结，严守纪律，但一定要坚决果断地走下去。在这条道路上你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正如过去在别的道路上所做的那样。但绝不可放弃阶级斗争，绝不可放弃我们的最终目的：集体主义。”

意见分歧愈来愈大。你们说，“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政府，只能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和最终目的。这只会使我们脱离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脱离我们的党。”可是，我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拥有强大组织的那些国家来说，没有这种危险。如果在比利时有一朝一日根据工人党的意志成立了联盟，或者有一个社会党人当了部长，我们也将继续保持和工人党的联系并接受工人党的领导，我们不会丧失自己的觉悟，而且正好相反。

工人们清楚地懂得，一个处于少数的党，资产阶级内阁中的一个社会党人部长是不可能左右国家的，而只能要求履行联合的协议。既然我们在谈论策略，就必须列举事实，因为只有事实才能说明一种策略正确与否。比利时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在最近几次选举中我们失去了一些议席。你们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吗？那就是自由党人说我们不是一个准备参加政府的党，他们反复这么讲，并且使人相信了这种说法。

而我们的工人们则希望尽快地进行一些改革，他们是对的，你们多数派不能指责我们比利时人，说我们在工会、互助储金会、合作社等领域和在议会里斗争不够。你们无法证实社会主义工人的比利时放弃了阶级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几乎是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

我们甚至还走得更远。我们曾试图通过 1902 年的罢工从反动派那里夺取普选权，但我们被击败了，在街上留下了我们的同志的尸体。

所以，如果有一天某个资产阶级党派主动提出实行普选、义务教育、劳工法，条件是要我们承担部分政府责任，而有人加以拒绝并使比利时无产阶级重新遭到屠杀，这种人才是该诅咒的！如果有一些比利时社会党人宁可参加流血的巷战而拒绝任何改良（哪怕这是贴着政府标签的改良）的话，那也是该诅咒的。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只接受一部分政权，应当取得全部政权。要么全部，要么一点也不要！如果你们能提供我一种办法一下子把全部政权拿到手，那我赞成你们，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办法都行，但我看不到有这种办法，而且你们也拿出这种办法。那么，如果资产阶级的一个党派建议我和它一起实现我的部分纲领，难道我应当拒绝吗？难道我应当让敌对阶级独揽政权吗？我不会这样做，我也没有权利这样做。即使他们只给我们一个部长职位，我们也应接受，并且说：“先生，非常感谢！什么时候再给第二个呀？”

怎么？当我们的工人阶级受着教会的影响，遭受军国主义的虐待，由于过度劳累而精疲力竭，被贫困折磨得虚弱无力，晚年生活无着，在求生存的斗争中被压得喘不上气来，如果一部分资产阶级向我们建议在承担部分政府责任的条件下改变这一切，难道我应当说“不”吗？不，我不会这样说，而且我深信，当比利时工人阶级强大到足以造成这种局势时，我的拒绝必然会招来工人阶级的一记耳光！

俄国、保加利亚、西班牙、波兰、日本的社会党人现在拒绝承担政府责任是非常容易的事，因为无疑要等上许许多多年后才会有人向他们提出这种建议。噢，如果我是他们中间某个国家的代表，我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表示态度，我绝不轻易去谴责一些我还没有能力在本国运用的社会主义策略。

我完全理解，少数派是不妥协的，因为唯有这种不妥协性才能锻炼出使少数派最终成为多数派所必不可少的品质。但我不赞成这个少数派把它的不妥协性强加在一些已不再象它们那样无足轻重的党身上，而且对于这些党来说，承担政府责任是愈来愈必要了。一旦承担了责任，不妥协性也就告终了。但人们绝不会因为是在内阁里而不是在议会大厅里和资产阶级争辩就变得比较软弱、比较无能了。

阿德勒同志说，他在考察了饶勒斯及其朋友们在法国应用的方法后感到担忧。而我呢，我也感到担忧，但是为着别的事情担忧。当我看到种种事件在进展着甚至迅猛地进展，当我看到资本主义在高速发展，而我们的工会，我们的合作社和各项组织工作却缺乏专门人才来进行管理时，我为这种过于迅速的发展的前途担忧。因此我觉得需要成倍地增加学校，需要进行一切能够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改革。

同志们，我的话讲完了。我恳求你们投票赞同阿德勒—王德威尔得提案。这个提案没有提出开除谁，也没有谴责谁。如果我们把德累斯顿决议带回国内，我们的工人阶级绝不会明白我们受到什么谴责，为什么受到谴责。人们会讥笑你们的决议。就连大家一致通过的关于统一的提案也会完全失去

意义。请投票赞同阿德勒—王德威尔得提案吧！

发表于1904年8月19日。译自《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六次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4年布鲁塞尔法文版第108—112页。

## 格·普列汉诺夫

### 在阿姆斯特丹(摘录)

(1904年)

#### 二

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们在阿姆斯特丹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和最迫切的问题是：

“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

这是四年前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同一个问题，只是提法稍有不同。当时主要争论的是，社会党人能不能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而又不背叛自己。巴黎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被称为考茨基决议。我们在这里不妨引证这个决议，以供参考：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简单地是某种暴力行动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

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

时性的特殊手段。

至于在某种情况下，是否存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形势，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社会党的多数赞成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又继续成为本党的全权代表时，这种冒险的尝试才可能是有益的。

如果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不服从自己的党，或者不再是党的全权代表，那么他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一行为就从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手段变成削弱无产阶级的手段，从有助于夺取政权的手段变成阻止夺取政权的手段”<sup>①</sup>。

讨论这个决议案的委员会根据我的建议对决议补充了这样几句话（不过由于饶勒斯狡猾的手腕，已作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大会确认，即使在这些非常的情况下，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该退出内阁。”

如果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来看，那么，在作若干保留的条件下，可以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正如在文学中除了枯燥无味的品种之外所有的品种都是好的一样，在政治中除了不适宜的策略方法之外所有的策略方法都是可以允许的。不能永远宣布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不符合我们的目的。大家知道，我们的目的就在于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有觉悟的无产阶级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44—45页。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引用的决议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与巴黎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法文本在文字上略有出入。——编者注

级才能够完成这一变革。因此，凡是能够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都符合我们的目的。而凡是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都违背我们的目的。正是必须从这一观点来考察关于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是否可以断定，这种加入无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呢？不，不能绝对地这样断定。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从形势、工人阶级政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参加政府的工人阶级代表所采取的行动来说，社会党人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参加内阁就不会模糊无产阶级的自觉，相反，会加强无产阶级的自觉。因此，当考茨基不愿意无条件地在自己的决议中对这种参加表示反对时，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他是正确的。但是巴黎代表大会需要解决的任务主要具有实际意义。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必须考虑目前的情况和社会党人部长米勒兰目前的行为。而米勒兰的行为不能不对工人的自觉起十分有害的影响。除了有意识的机会主义者饶勒斯、福尔马尔、伯恩斯坦、安塞尔之流外，大家都同意这一点<sup>①</sup>。因此巴黎代表大会不应满足于抽象地回答生活本身向它提出的问题；它必须寻找

---

<sup>①</sup> 这里要提一下，巴黎代表大会的所有参加者都知道法国众议院1900年6月25日通过的议事日程。在西米扬就通过血腥方式在夏龙堡工工人中间维持“秩序”问题提出质询时，众议院以多数票决定不予讨论而转入下一项议程，对(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表示信任并对用来欺骗工人的“集体主义学说”表示谴责。米勒兰对此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而他的同志们——拥护“新方法”的社会党议员们甚至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读者知道，这样的行为必然会严重损害社会党人在工人中的声誉，而这一点恰恰是在法国无产阶级中流行对政治采取否定态度的原因。——普列汉诺夫注

能够明确表示对米勒兰策略的否定态度的表达方式<sup>①</sup>。它没有完成自己的这个职责。它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模棱两可和不彻底。它在自己的决议中列举了伴随着米勒兰加入瓦尔维克-卢梭内阁而发生的一系列情况，似乎证明这种加入是不正确的。同时却又装作完全不涉及“米勒兰事件”、尊重法同党的自主权的样子。从这种完全没有必要的模棱两可和十分明显的不彻底态度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产生了本来可以预料到的结果。法国机会主义者饶勒斯、米勒兰之流把抽象的、不彻底的和模棱两可的巴黎决议解释成对他们有利，并且继续十分卖力地实行自己的“新方法”……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新方法”。从“共和国的拯救者”米勒兰在沙皇访问法国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出，他们在实际否定社会主义的所有原则和所有革命传统方面走得多么远。他曾参加1896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却在“全俄罗斯”的刽子手和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图的最凶恶敌人面前奴颜婢膝。这甚至对于最庸俗的激进党人来说也是可耻的和不可饶恕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许多抱有错误看法的真诚的社会党人看到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失策的意义。此外，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还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情况，巴黎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辜负了力图

---

① 见《曙光》杂志第一期上我的关于巴黎代表大会的文章（本书第218—226页）。我在文章中谈到我在政治委员会中如何企图弥补考茨基决议中的这个重大缺陷，以及我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顺便提一下，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俄国集会上，有一个弗拉基米罗夫先生硬说我在巴黎投票赞成考茨基决议。这不符合事实。我同整个“劳动解放社”一起投票反对这个决议。——普列汉诺夫注



调和“新方法”的拥护者和老的革命策略的捍卫者(即马克思派和布朗基派)的那些人的期望。这个决议不仅没有巩固法国社会党的统一,而且无疑成了法国社会党分裂的最严重的原因之一。因此,甚至在巴黎曾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许多人也开始觉得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愈是接近新的国际代表大会,各国社会主义者对法国机会主义者的评价就愈低。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主子瓦尔德克一起下台的“社会党人”米勒兰如此名誉扫地,以致他的党——“新方法”的党、“法国社会党”认为把他开除出去对自己有利。但是这种 *Spaccio della bestia trionfante* ① 丝毫没有改变这个党的行动方式。它受到“新方法”在法国的主要的和最有影响的代表饶勒斯的鼓舞和领导,始终是极端资产阶级的共和派联盟(*bloc républicain*)不变的成员,并且成了资产阶级内阁的首脑孔勃的某一种“社会主义的”禁卫军。于是,所有谴责米勒兰的策略的人看到,这种同资产阶级政党的经常的联盟,这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对于无产阶级事业来说比社会党人直接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更加危险。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舆论现在转过来反对法国机会主义,以致甚至在其他国家的党内那些内心深处对机会主义十分同情的机会主义分子中也很少有人敢于为之辩护。

因此,如果法国的革命策略的拥护者不利用这种情绪在阿姆斯特丹修改不能令人满意的巴黎决议,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由于法国把国际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所制定和

---

① “出售获胜的牲口”。——编者注

传播的思想付之实现，因此法国也应当发起对机会主义实践进行新的讨论，如果可能的话，并加以谴责。法国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法兰西社会党”提出了这样的倡议，根据它的建议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议程中列入了关于“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的问题。它把去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关于德国“修正主义”问题的决议稍加修改，使它成为普遍适用的，把它提出来作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的新的形式是这样的：

“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那种旨在改变我们的久经考验和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用一种迎合现存的制度的政策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来夺取政权的政策的修正主义企图。

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就会是：使得我们这个以尽快地把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为宗旨的政党，也就是真正的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

因此，和现存的修正主义派别相反，代表大会深信阶级矛盾并没有削弱，而是在不断加剧。代表大会宣称：

1. 对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它决不承认为了使统治阶级保持政权所需要的任何拨款。

2. 根据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考茨基决议，社会民主党不能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

代表大会还谴责为了便于投靠资产阶级政党而抹杀当前的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的任何企图。

代表大会期望，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运用由于它的成员

增多和支持他们的选民群众大大增加而得到加强的力量，一如既往地阐明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并且按照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利用这一力量，最有力地和最坚决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保证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比以往更为有力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并为扩大社会立法和完成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而努力奋斗。”

不难看出，这个草案不同于1900年的巴黎决议。巴黎决议只停留在理论领域，小心翼翼地回避实践这个“该死的问题”，新的草案则勇敢地接触实践问题，毫不动摇地作出唯一的堪称为无愧于当代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回答，采取不调和的反对立场和进行不断的革命鼓动的回答。新的草案直截了当地要求国际代表大会谴责修正主义。

每个人都清楚，法兰西社会党所提出的问题是阿姆斯特丹大会要讨论的所有问题中最紧要的一个。无论是“新方法”或者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双方都按照自己的性格特点准备投入决定性的战斗。

大家知道，机会主义的实质在于过分企图迎合环境，忘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或者忽视这个目的。一般说来，这种企图对于社会主义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死抱着这种企图的人在本质上就没有能力看到超出自己鼻子之外的东西。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机会主义者的这种原罪给革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某些好处。由于目前社会民主主义人士对于主张实行“新方法”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有着很坏的印象，因此后者不敢公开起来为“新方法”辩护，而装出他们自己对

它很不满意的样子。只有比利时人菲尔内蒙和安塞尔(前者在政治委员会中,后者在代表大会闭幕前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表示拥护“新方法”,而所有其他的机会主义者(有不少机会主义者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大会)对待它,就象耶稣的“隐蔽的信徒”对待耶稣一样,他们由于害怕革命而竭力掩饰对它的同情。因此,在讨论关于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这个问题时,法国的机会主义派完全遭到孤立,而它的领袖饶勒斯经过审核这个问题的委员会中的三天辩论之后,有充分理由这样说:“在整整三天中我听见的是令人痛苦的批评、表示不信任和不满意的话”。如果王德威尔得和安塞尔没有在委员会中建议对法兰西社会党提出的、在代表大会上被简称为德累斯顿决议的草案进行“修正”从而给了机会主义者帮助的话,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

这个修正案是这样的:“德累斯顿决议的第一段的措辞应为:‘代表大会非常坚决地肯定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久经考验和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社会主义策略,在任何情况下不应用一种迎合现存的制度的政策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来夺取政权的政策’。

第二段的开头应是:‘这种让步政策的后果就会是’。在第三段中删去:‘和现存的修正主义派别相反’。决议中谈到巴黎决议的那一部分应改为:

“2.至于在现存制度下参加政府的危险性和不适宜性,代表大会重申1901年<sup>①</sup>代表大会通过的考茨基决议。”

---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0年。——编者注

请设想一下德累斯顿决议中的这些修改，你们就会立即发现，“谴责”这个可怕的词仍旧保留在决议中；只是仅仅出现了一次（“代表大会还谴责”等等），而不是象“德累斯顿决议”中那样出现两次。这真是奇怪的事；既然想要去掉“谴责”，为什么自己又把这个词留在自己的草案中呢？看来，机会主义干了这么多好事，甚至那些想把对机会主义的谴责赶出门外的人，又不知不觉地被迫把同样的谴责从窗户里放了进来。但是，他们自己怎么会没有看到这样的奇怪的情形？我只能这样来解释：对他们来说，“问题的实质”恰恰不在于词句，而在于“德累斯顿决议”的内容本身。只要对事情略加注意，就很容易确信这一点。如果代表大会接受他们的“修正案”，结果将会是代表大会在对待社会主义政策的争论问题的态度方面不超出巴黎代表大会；但是，经过了从巴黎代表大会到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这四年中所发生的一切，由于巴黎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模棱两可给法国社会主义带来的巨大危害，拒绝前进就意味着倒退和直接鼓励饶勒斯之流重新非法地滥用无产阶级名字。这将会是极大的不可挽救的错误。

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由于他们一致的坚决努力，不适当的“修正案”在委员会中以二十四票对十六票遭到否决。接着对“德累斯顿决议”进行表决。二十九票赞成，三票反对，十票弃权。因此，在委员会里的争论以马克思主义获胜告终；但是暂时只是在委员会里，最后的决定要由代表大会来做。如果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并且赞成阿德勒—王德威尔得的“修正案”，那会怎样呢？饶勒斯的隐蔽的信徒们竭力把在委员会表决中弃权的同志拉到他

们一边去。他们期望在这些人帮助下能够否决“德累斯顿决议”。

.....

现在回过来谈谈代表大会的会议。机会主义者企图使王德威尔得—阿德勒的修正案得到通过来击退我们的进攻，这种努力不是没有结果的。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日子——8月19日，——就可以看到，反对“德累斯顿决议”的势力在增长。问题在于这种反对势力会增长到何等地步。机会主义者把很大希望寄托在饶勒斯的演说家的才能上。他们在他发言时一再热烈鼓掌，当他结束发言时，他们向他热烈欢呼，其中表现得非常兴高采烈的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凯尔·哈第，顺便说一句，这位凯尔·哈第，对法语是一窍不通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全世界都知道饶勒斯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他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演说的形式甚至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喜欢。我不属于这样的人。我只喜欢雅典人称之为“瘦的”那种演说术，他们把它同东方各国的“肥胖的”演说术相比较。而饶勒斯的演说才能恰恰是十分“肥胖的”。在他的用华丽辞藻装饰起来的演说中看不到逻辑的结实肌肉组织。他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演说中这个缺点尤其严重。这些冗长的、大吹大擂的、松散的和夸夸其谈的演说给我留下了几乎是滑稽可笑印象，非常贫乏的内容同冠冕堂皇的形式很不适合。他在委员会作了第二次发言后，有一个人（好象是惹罗-里夏尔）问我如何。我回答说，我非常高兴。——是真的吗？——“这是真的！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发言不能不感到高兴，因为这是在

这里发表的反对饶勒斯主义的所有发言中最好的发言”。怎么会是这样？——“很简单。他整个发言中没有一句话谈到社会主义。这是竭力为自己的反教权主义纲领辩护并力图用细微的社会改良的诺言来收买自己的听众的激进资产者的演说。公开的资产阶级克列孟梭大概会同饶勒斯说同样的话”……——“克列孟梭会表现得更为进步”，——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位大概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同志指出。他没有说错；确实，克列孟梭会说得更激进一些。

饶勒斯无法消除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发言中的这个缺点，除非他不再是饶勒斯。在这些发言中还有另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由于这位“大雄辩家”所暴露出来的焦躁不安、甚至是不知所措而产生的。“这是他发表的所有演说中最糟糕的一次！”——他的一位“隐蔽的信徒”在听了他的大会发言后大声说道。从他的观点来看这是正确的。这次发言非常缺乏分寸感，这样说不算过分。饶勒斯竟然想起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你们想，他指责什么？他指责它缺乏革命的热情！这个指责是由法国机会主义的最高祭司提出来的，这个人曾鼓舞了米勒兰，同伯恩施坦相好，支持屠拉梯并且随时准备给予整个文明世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中一切反对革命的分子以兄弟般的援助！这是既不聪明的，也没有益处的，因为只会激怒德国人，而且恐怕难免使支持饶勒斯的代表团恰恰由于他的政治纲领的反对革命的性质而变得糊涂起来。C'était une grande gaffe！<sup>①</sup>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

---

<sup>①</sup> “这是干了一件大蠢事！”——编者注

“正派的”饶勒斯的较为狡猾的、虽然是同样程度地不“正派的”手法是他指责倍倍尔和盖得对共和制漠不关心。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政治的态度和熟悉盖得和倍倍尔的活动读者用不着解释，他们完全没有暴露出这样的漠不关心。倍倍尔曾坦率地说，他羡慕有着共和制度的法国人。但是他提醒饶勒斯说，法国存在的共和制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它反对工人要求的态度有时甚至比半封建的德意志帝国更加厉害。这样的提醒对于象饶勒斯这样的人可能是不愉快的，象饶勒斯这样的人不停地颂扬资产阶级共和制，把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用来哄骗法国无产阶级的那些进行可怜的社会改良的可怜计划说成是伟大的慷慨的恩典；但是这样的提醒完全符合实情，在这里必须象克雷洛夫那样说：“脸丑别抱怨镜子”。共和国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和最有影响的执政者肯定地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对于拯救共和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共和国到目前为止替工人阶级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不算微不足道的细节——资产阶级“社会政策”的破烂衣服上的最细小的补丁，——那么，“保卫共和国”政府所想出来的改良到目前为止没有超出计划和诺言的范围。又是怎样的计划和怎样的诺言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许诺给予年满六十五岁的工人微薄的，——真正是叫化子般的，——养老金。但是目前无产阶级的状况是这样的，只有极少数的无产者达到这样的年龄；因此有觉悟的法国工人一针见血地把这个非常慷慨的计划称作死人养老金计划。这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答应给予工人阶级的主要“改良”，善于辞令的饶勒斯富有感情地提出这个改良来为自己的策略辩护。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



这种慷慨(真正泼留希金式<sup>①</sup>的慷慨)不屑一顾,但绝对不是为君主制辩护;他们只不过认为,饶勒斯和“新方法”的其他拥护者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化是荒谬的<sup>②</sup>。

马克思很早就完全正确地指出,共和国是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统治形式,因为在共和国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达到最充分的发展。当然,无论盖得或者倍倍尔都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是,如果在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共和国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之一,那么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当然不可能是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社会革命。正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它进行批判,以便提高工人的革命自觉性。而饶勒斯恰恰背道而驰:他把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手段变为目的,而当革命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起来反对这种改变时,他就滑稽可笑地愤怒起来。

当然,饶勒斯也有他喜欢的革命,但是,他所喜欢的革命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已经解决了文明人类的革命任务:工人阶级只要争取改良,进一步发展伟大

---

① 泼留希金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贪婪成性,吝啬成癖,是一个“守财奴”的典型。——编者注

② 对共和国的热爱没有妨碍饶勒斯成为伯恩斯坦和屠拉梯的同伙。伯恩斯坦的共和主义在去年著名的论战中表现得非常值得怀疑,而屠拉梯则同王国的大臣焦利蒂接近。这种热爱也没有妨碍饶勒斯同比利时机会主义者保持最好的关系,后者在不久前争取平等的选举权的斗争中呼吁国王采取公正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中有着自己的铁的逻辑,这就是随时随地迎合现存的制度!——普列汉诺夫注

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就行了。法国社会党把这个极端错误的观点作为自己的纲领的基础，这个纲领是由饶勒斯起草的，它把社会主义描绘成自由主义的简单的附属品；这个观点使人想到饶勒斯在阿姆斯特丹的全部论断。但是不言而喻，革命社会民主党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除非判处自己死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说，在阿姆斯特丹所争论的是革命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

“正派的”饶勒斯曾经大肆宣扬，似乎盖得曾说在目前社会中无产阶级不可能得到思想上的解放，在某种程度上饶勒斯现在仍旧这样大肆宣扬。但是这是不“正派的”争论方法。盖得没有犯上述罪过，正如没有犯对共和国漠不关心的罪过一样。他只是说，教会同国家分离还不能使人类摆脱宗教偏见；他援引美国作为证据，接着补充说，使人类从这些偏见中宗；解放出来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后才能实现，那时在人间将建立起天堂，那时人们将没有必要去幻想天上的天堂。这个思想也是马克思早已说过的，而现在，——几乎就在这几天，——罗马自由思想派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重复了这个思想。饶勒斯的机关报《人道报》对罗马决议极为赞许，但是他到目前为止不能容忍盖得的“宗派主义”观点。怎样来解释这个差别呢？不过是因为罗马代表大会对目前法国内阁的首脑孔勃说了大量的恭维话，而盖得丝毫不想这样做。啊，这就是“正派”！！

在快要投票的时候，德国代表团在法兰西社会党的赞同下建议把“德累斯顿决议”中的“谴责”一词改为“拒绝”一词。这样一来阿德勒—王德威尔得的“修正案”显然失去了任何意

义。但是问题在于，“德累斯顿决议”完全不是由于“谴责”这个词而使机会主义者感到不安。投票赞成阿德勒—王德威尔得“修正案”的同投票反对的一样多。而幸福曾经是那样的可能，那样的接近！<sup>①</sup>假如从动摇者中间再有一个国家向右转，就会给机会主义造成一个缝隙，通过这个缝隙它可以重新把自己的全部货色塞到社会党的实践中来。国际机会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无法得到安慰，仍旧在寻找祸首。不久前《小共和国报》（机会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惹罗—里夏尔的机关报）对片山潜猛烈攻击，认为他不应当到阿姆斯特丹去，而应该参加日本的作战部队去同俄国人打仗。这种难于置信的荒唐话只不过是安塞尔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意見的畸形的再版。安塞尔在8月19日的发言中劝告日本、俄国、波兰、保加利亚和西班牙的代表在表决关于社会党政策的准则问题时弃权，因为，要知道，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生活太不开展了。片山潜、罗莎·卢森堡、我、保加利亚的拉柯夫斯基和西班牙的伊格列西亚斯在安塞尔发言结束后立即向代表大会发表了书而声明，坚决抗议这种“企图把大会代表划分为积极代表和消极代表两部分的做法，抗议据说想要成立一个唯一有权解决国际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欧洲大国社会党同盟的做法”。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上指出，代表大会对于我们的抗议表示同情。这一情况是必然的，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不是机会主义者，而是革命者。

---

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借用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至于说到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对安塞尔同志说，这个运动是俄国的进步因素，而通过俄国，是全欧洲的进步因素，同他由于过分热中于合作社而企图用来“轰炸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土豆和大圆面包相比，要重要得多。Qu' il se tienne pour averti! ①

“修正案”由于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而被否决。接着对“德累斯顿决议”进行表决，它以二十八票的多数对五票获得通过。阿根廷共和国、比利时、丹麦、瑞典、荷兰和瑞士在表决时弃权。社会主义的山岳党战胜了社会主义的吉伦特党，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饶勒斯的许多隐蔽的信徒再一次抛弃了他! ②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祝贺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对革命机会主义的这个胜利。

顺便谈一谈被过去的德累斯顿决议、现在的阿姆斯特丹决议“拒绝”的修正主义意图。大家知道，这些意图不仅表现在实践领域中，而且表现在理论领域中：只要提一下伯恩斯坦和大卫这些先生们的写作活动就足够了。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即使不是在所有的方面，也是在许多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情这些先生们在理论上的功绩。他们怎么会投票赞成“德累斯顿决议”呢？请你猜一猜，聪明的奥狄浦斯③！

① “请注意！”——编者注

② 荷兰代表团在表决时弃权，从而破坏了荷兰社会民主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决定赞成德累斯顿决议。据我所知，荷兰代表而的少数派是坚决拥护这个决议的。——普列汉诺夫注

③ 奥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他猜中了狮身人首怪提出的谜语。——编者注

当委员会通过了德累斯顿决议后，倍倍尔、考茨基、费利、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和特鲁尔斯特拉提出了作为对它的自然补充的一个决议案，其中说，在每个国家应该只有一个社会党，就象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一样。鲁巴诺维奇先生对此声明说，如果我们撤销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涉及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他就赞成同我们实行统一。外国人中间谁也不懂得他的这个声明，谁也没有加以注意，因为顾不上。但是，难道鲁巴诺维奇先生真的以为“关于统一的决议”哪怕多少有点涉及他的党吗？完全不是！决议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革命党人”不属于这样的党。

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统一的决议给法国无产阶级带来很大的益处。饶勒斯多年来不停地叫嚷必须实行统一：现在他是否愿意……在如此坚决地拒绝机会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决议的基础上同盖得一瓦扬的党实行统一呢？

发表于1904年。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6卷  
1925年莫斯科版文版第322—329、331—337页。

# 人名索引

## A

阿德勒·维克多(Adler, Victor)——  
第 6、34、41、42、48、83、144、304、  
314、315、319、320 页

阿尔伯(Albert, 真名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第 132 页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里索维奇  
(Axelrod, Pavel Borisovich)——  
第 226 页

阿拉尔, 莫里斯(Allard, Maurice)  
——第 2、198 页

阿列曼, 让(Allemane, Jean)——第  
242、263 页

埃伦博根, 威廉(Ellenbogen, Wil-

helm)——第 144 页

爱尔威, 古斯塔夫(Hervé, Gustave)  
——第 247 页

安贝尔(Humbert)——第 251 页

安塞尔, 爱德华(Anserle, Eduard)  
——第 28、62、172、301、308、313  
320、321 页

昂利(Henry)——第 99 页

奥艾尔, 伊格纳茨(Auer, Ignaz)——  
第 6、64、139、145 页

奥尔森(Olser)——第 32 页

奥利维耶, 艾米尔(Ollivier, Emile)  
——第 127 页

## B

巴尔图, 路易(Barthou, Louis)——  
第 164 页

巴赫, 亚历山大(Bach, Alexander)  
——第 3 页

巴克斯,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Bax,  
Ernest Belfort)——第 27 页

白恩士, 约翰(Burns, John)——第  
296 页

白里安, 阿里斯蒂德(Briand, Aris-  
tide)——第 233、234 页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第 24、48、51、108、109、126、  
158、175、176、286、287、289、292、  
298、317、322 页

贝特朗, 路易(Bertrand, Louis)——  
第 28 页

贝尔托(Berthaut)——第 3 页

贝内泽赫, 让·巴蒂斯特(Benezech,  
Jean Baptiste)——第 138 页

俾斯麦, 奥托·冯(Bismarck, Otto

von)——第 189、293、298 页  
毕洛文, 伯恩哈德(Bulow, Bernhard)  
——第 293 页  
波拿巴, 路易-拿破仑(Bonaparte,  
Louis Napoléon)——第 11、298 页  
博丹, 欧仁(Baudin, Eugène)——第  
132 页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第 91、  
100、132、133 页  
伯恩施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  
ard)——第 26、51、64、73、130、142、  
162、167、262、308、316、318、321 页  
伯特, 托马斯(Burt, Thomas)——第  
132、133 页  
布尔茹瓦, 莱昂(Bourgeois, Léon)  
——第 95、126、201 页  
布拉奇福德, 罗伯特(Blatchford,  
Robert)——第 27 页

蔡特金, 克拉拉(Zetkin, Clara)——  
第 26、154 页  
查亦利奇, 维拉·伊万诺夫娜(Zasn-

达申斯基, 伊格纳齐(Daszynski, Ig-  
nacy)——第 34 页  
达勒, 维克多(Dalle, Victor)——第  
230 页  
大卫, 爱德华(David, Edward)——  
第 142、321 页  
戴鲁莱德, 保尔(Derulède, Paul)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第 151、263 页  
布雷东(Breton)——第 187、198 页  
布里松, 亨利(Brisson, Henri)——  
第 26 页  
布里索拉蒂(Brissolati)——第 29 页  
布鲁德赫斯特, 亨利(Broadhurst,  
Henry)——第 132、133 页  
布鲁歇尔, 路易·德(Brouckère,  
Louis de)——第 28 页  
布鲁斯, 保尔(Brousse, Paul)——第  
239 页  
布瓦埃, 昂提德(Boyer, Antide)——  
第 200、268 页  
布瓦代弗尔, 拉乌尔·弗朗索瓦·沙尔  
(Boisdeffre, Raoul-François-  
Charles)——第 117 页

## C

利奇, 维拉·伊万诺夫娜)——第 206  
页

## D

——第 148 页  
德菲伊索(Defuisseaux)——第 28 页  
德雷福斯, 阿尔弗雷德(Dreyfus, Alf-  
red)——第 37、99、116、117、118 页  
德洛里, 古斯塔夫(Delory, Gustave)  
——第 3、86、88、90、94、95、104、  
106、107、112、125 页

德尼斯, (Denis, H)——第 28 页  
德让特, 维克多 (Dejeante, Victor)  
——第 3, 187, 198 页  
德夏内尔, 保尔 (Deschanel, Paul)  
——第 125 页  
迪布勒伊, 路易 (Dubreuilh, Louis)

——第 201, 202, 210, 234, 235 页  
迪富尔, 雅克 (Dufour, Jaques)——  
第 158 页  
杜毕伊, 沙尔·亚历山大 (Dupuy,  
Charles Alexandre)——第 124 页

## E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

rich)——第 91, 185, 242, 276 页

## F

法尔雅, 加布里埃尔 (Farjat, Gabriel)  
——第 301 页

法伊埃, 欧仁·路易 (Faillet, Eu-  
gène Louis)——第 3 页

菲尔霍尔茨 (Färholz)——第 53 页

菲尔内蒙, 莱昂 (Farnemont, Léon)  
——第 313 页

费利, 恩利科 (Ferri, Enrico)——第  
29, 41, 44, 48, 52, 53, 55, 57, 60, 61,  
68, 69, 144, 145, 173, 175, 176, 286,

322 页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亨利希·冯  
(Vollmar, Georg Heinrich von)  
——第 6, 25, 142, 157—159, 171—  
176, 195, 198, 199, 232, 328 页

弗莱西埃 (Flaissières)——第 103,  
112 页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第 91 页

## G

甘必大, 莱昂 (Gambetta, Léon)——  
第 204 页

盖得, 茹尔 (Guesde, Jules)——第 3, 8,  
11, 21, 44, 49, 52, 59, 61, 63, 69, 70,  
84, 86—88, 90, 96—98, 107, 109,  
113, 119, 136, 138, 141, 143—149,  
151, 163, 173, 183, 188, 189, 191,  
224—229, 242, 258, 270, 317, 319 页

戈伊埃, 于尔班 (Gohier, Urbain)

——第 185 页

格雷利希, 海尔曼 (Greulich, Her-  
man)——第 33 页

格鲁西埃, 阿尔菲尔 (Groussier, Ar-  
thur)——第 3, 187, 198 页

格内科, 欧多克西奥·塞扎尔·达泽  
多 (Gnecco, Eudoxio Cesar  
d'Arede)——第 34 页



## H

哈第, 詹姆斯·凯尔(Hardie, James Keir)——第 27、315 页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ayers)——第 26、54 页  
雨果, 维克多(Gugo, Victor)——第 300 页

## J

加利费, 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特(Galliffet, Gaston-Alexandre-Auguste)——第 1、19—21、99、101、170、197、202—205、210、215 页  
焦利蒂, 卓万尼(Giolitti, Giovanni)

——第 318 页  
杰维尔, 加布里埃尔(Deville, Gabriel)——第 6、270、271 页  
居奥, 伊夫(Guyot, Yves)——第 120 页

## K

卡德纳, 贝尔纳(Cadenat, Berhard)——第 152、200、205、208、209 页  
卡恩(Kahn)——第 102 页  
卡雷特, 昂利(Carrette, Henri)——第 277 页  
考茨基, 卡尔(Kautsky, Karl)——第 25、44、48、51、55、56、59—61、64、67—69、110、138、142—146、148—150、154、160、162、164、165、168、171—173、175、176、217、219—221、223、224、226、266、291、308、322 页  
柯尔佐夫, 德(Koltsov, D.)——第 226 页  
科斯塔, 安得列阿(Costa, Anderea)——第 29、68 页  
克雷洛夫, 伊凡·安德烈也维奇(Krylov, Ivan Andreyevich)——第 317

页  
克里切夫斯基, 波里斯·纳乌莫维奇(Kritschewski, Boris Naumovich)——第 31、58—59 页  
克列孟梭, 若尔日·本扎曼(Clemenceau, Georges Benjamin)——第 259、318 页  
克吕格尔, 保卢斯(Krüger, Paulus)——第 111 页  
孔德森(Kundsen)——第 32 页  
孔勃, 茹斯坦·路易·埃米尔(Combes, Justin Louis Emile)——第 295、310 页  
库唐(Coutant)——第 198 页  
奎尔奇, 哈利(Quelch, Harry)——第 27 页

拉波特, 德(La Porte, de)——第 234 页

拉布里奥拉, 安东尼奥(Labriola, Antonio)——第 29 页

拉柯夫斯基, 克利斯提安·格奥尔基也维奇(Rakovsky, Christian Gheorgiyevich)——第 320 页

拉法格, 保尔(Lafargue, Paul)——第 3, 9, 21, 100, 141, 188, 185, 242, 258 页

拉加德尔, 于贝尔(Lagardelle, Hubert)——第 155, 159, 207, 208, 212, 226, 238 页

拉克鲁瓦, 西吉斯蒙·朱利安·阿道夫(Lacroix, Sigismund-Julien-Adolphe)——第 253 页

拉皮克, 路易(Lapique, Louis)——第 247 页

拉甫罗夫, 彼得·拉甫罗维奇(Lavrov, Petr Lavrovich)——第 30 页

拉维, 艾梅(Lavy, Aimé)——第 97 页

拉维涅, 雷蒙(Lavigne, Raymond)——第 6, 7 页

莱宾, 茹尔(Lépine, Jules)——第 100 页

莱格, 若尔日(Leygues, Georges)——第 236 页

莱唐(Letang)——第 198 页

朗德里(Landrin)——第 2 页

朗格, 奥托(Lang Otto)——第 33 页

李卜克内西, 威廉(Liebknecht, Wilhelm)——第 6, 7, 15, 18, 23, 25, 51, 58, 60, 88, 105—107, 121, 126, 135, 175, 176, 179, 181 页

里沙尔, 阿尔伯(Richard, Albert)——第 230 页

利鲍(R'bot)——第 249 页

列诺得尔, 比埃尔(Renaudel, Pierre)——第 223, 235 页

龙格, 沙尔(Longuet, Charles)——第 227, 241, 243 页

卢森堡, 罗莎(Luxemburg, Rosa)——第 26, 35, 51, 171, 174, 195, 206, 208, 212, 320 页

鲁巴诺维奇, 伊里亚·阿道佛维奇(Rubanovich, Ilya Adolfovich)——第 322 页

鲁塞耳, 斐迪南·弗朗索瓦(Roussel, Ferdinand François)——第 3 页

路贝, 埃米尔(Loubet, Emile)——第 66, 138, 148 页

路德, 马丁(Luther, Martin)——第 110 页

路透, 弗里茨(Reuter, Fritz)——第 65 页

## M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第 38、75、91、94、100、132、158、182、184—186、219、319 页
- 迈耶尔 (Meyer, L.)——第 32、33 页
- 曼, 汤姆 (Mann, Tom)——第 27 页
- 梅利纳, 茹尔 (Mélina, Jules)——第 95、124、164、180、249、250、256 页
- 米勒兰, 亚历山大·埃蒂耶纳 (Millerand, Alexandre Etienne)——第 6、13、20、21、46、52、58、60、73—75、77—84、87、97、122、125、126、132、134、136、138、140、143—146、150—158、160—175、179—181、188、191、193、196、197、199—203、205—211、215、217、220、221、224、225、229、230、236—239、243、246、248、255、258、265—269、271、274、275、299、308—310 页
- 莫尔加里 (Morgari)——第 79、104 页
- 莫里泽 (Morizet)——第 235 页
- 默尔, 查里 (Mohr, Karl)——第 33 页

## N

- 牛顿, 伊萨克 (Newton, Isaac)——第 261 页

## O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第 57、91 页

## P

- 帕尔乌斯 (Parvus 即格尔夫德, 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 Helphand, Alexander Lazarewitsch)——第 26、145 页
- 佩德龙, 保尔 (Pédron, Paul)——第 3 页
- 佩里埃 (Périer)——第 124 页
- 佩斯切蒂 (Pescetti)——第 30 页
- 片山潜 (Katayama, sen)——第 320 页
-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Plekhanov, Georgi Valentino-vich)——第 30、58、80、213、218、226、306、307、320 页
- 普勒桑塞, 弗朗西斯·德 (Pressensé, Francis de)——第 233 页

## Q

- 契普里昂尼, 阿米耳卡雷 (Cipriani, Amilcare)——第 235 页

## R

德勒斯, 让(Jaurès, Jean) ——第  
6, 9, 11, 23, 35, 38, 47, 49, 50, 54—  
56, 86, 88, 90, 94—96, 98, 99, 103,  
106, 108, 113—116, 119, 121, 125,  
136, 137, 145, 147, 148, 167, 168,  
173, 176—179, 181, 182, 184, 185,  
186, 188—192, 199, 206, 209, 210,  
220, 223—225, 227, 228, 230, 242—  
244, 251, 252, 255—257, 260, 264,

275, 279—281, 282, 283, 295—299,  
304, 307—310, 313—319, 321, 322  
页

惹罗-里瓦尔, 阿尔弗勒德·莱昂  
(Gérault-Richard, Alfred Lécir.)  
——第 278 页

乔安迪(Joindy)——第 58 页

茹尔德, 安都昂(Jourde, Antoine)  
——第 97 页

## S

萨尼亚尔, 律西安·德拉巴耳(Sani-  
al, Lucien Delabar)——第 33 页  
桑巴, 马赛尔(Semhat, Marcel)——  
第 2, 57, 152, 169, 187, 198, 252 页  
沙文, 勒奈·奥古斯特(Chauvin, Re-

né Auguste)——第 55 页

施德洛夫斯基(Schidlowski)——第  
31 页

施奈德(Schneider)——第 63 页

## T

特拉利厄(Trarieux)——第 120 页  
特鲁尔斯特拉, 彼得·耶莱斯(Troe-  
lstra, Pieter Jelles)——第 31, 322  
页  
梯叶里, 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

(Thierry, Jacques Nicolas Augus-  
tin)——第 103 页

屠拉梯, 非力浦(Turati, Filippo)——  
第 30, 49, 318 页

## W

瓦尔德克-卢梭, 勒奈(Waldek-Rous-  
seau, René)——第 1, 20, 21, 122,  
150, 165, 169, 201, 202, 239, 249,  
250, 252, 253 页  
瓦尔特(Walter)——第 2, 198 页

瓦扬, 爱德华·玛丽(Vaillant, Edou-  
ard-Marie)——第 2, 63, 97, 104,  
119, 137, 143, 146, 147, 152, 169—  
171, 173, 186—191, 199, 203—207,  
212, 227—229, 242, 258, 270 页

瓦扬德, 阿尔弗雷德 (Vaillandet, Alfred)——第 247 页	56、61、62、83、144、172、213、214、223、283、313—315、319、320 页
万·科尔, 亨利克 (Van Koi, Henrik)——第 31、46、58、68 页	维维安尼, 勒奈 (Viviani, René)——第 97、119 页
王雅威尔得, 埃米尔 (Wanderveelde, Emile)——第 28、41、42、48、55、	翁伯托一世 (Umberto, I)——第 52 页

X

西皮多 (Sipido)——第 104 页	(Chauvière, Emmanuel Jean-Jules)——第 2、193 页
席佩耳, 麦克斯 (Schippel, Max)——第 26 页	辛格耳, 保尔 (Singer, Paul)——第 26、100、175、176 页
夏努安 (Chanoine)——第 147 页	
肖维埃尔, 艾曼纽尔·让·茹尔	

Y

伊格列西亚斯, 帕布洛 (Iglesias, Pablo)——第 32、320 页
---

Z

泽瓦埃斯, 亚历山大 (Zévaès, Alexandre)——第 104、167、190、198、211 页	左拉, 埃米尔 (Zola, Emile)——第 97 页
---	-------------------------------